

# 目 录

- 伊盟“三·二六”事变的回忆……………鄂齐尔呼雅克图 ( 1 )
-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任秉钧 ( 15 )
- 伊盟“三·二六”事变亲历记……………经革陈 ( 25 )
- 伊盟事变乌审旗战役回忆……………胡逢泰 口述  
宋海湖 整理 ( 38 )
- 记忆中的老瑞排长……………徐伯毅 ( 52 )
- 陈长捷“有请”——兼记罗聘卿之死……………徐伯毅 ( 55 )
- 伊盟事变侧闻点滴……………许 如 ( 58 )
-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的片断回忆……………范辑五 ( 62 )
- 诺门汗事件亲历记……………胡克巴特尔 ( 67 )
- 肇源事件……………鲍靖方 ( 130 )
- 国民党“蒙古国大代表”在“行宪国大”  
    会上的活动纪实……………邢复礼 ( 147 )
- 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博彦满都 ( 187 )
- 解放前原绥远省甘草和甘草行业的  
    概况……………尹子衡口述 阎秉乾整理 ( 194 )
- 包头死人沟的“梁山”……………刘映元 ( 213 )
- 抗日战争期间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刘映元 ( 226 )

# 伊盟“三·二六”事变的回忆

鄂齐尔呼雅克图

## (一)

一九三七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呼、包二市被日寇侵占后，当时的形势是外受敌寇的欺凌，内受国民党的压迫，交相煎逼，苦痛难言。而伊盟七旗的王公们则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和行动，形成一种各奔前程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杂牌部队纷驻伊盟，军纪败坏，奸淫抢掠，无休止地敲诈勒索蒙民的牲畜。反动派说什么蒙古人都投降了日本，是亡国奴、蒙奸。蒙旗的名胜古迹和喇嘛庙，多数被焚烧和破坏。陈长捷任伊盟警备总司令以后，更大肆屠杀无辜蒙汉人民。伊盟广大人民称他为“陈屠家”，军队随意开垦牧场，逼使蒙古人流离失所，过着悲惨的生活。不仅如此，反动派还制造蒙汉隔阂，挑拨民族关系。在一九四九年和平解放前夕，伊盟不啻是人间地狱，蒙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反动派军阀血腥统治下，蒙汉人民的农牧业遭到严重的破坏。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反动军队，驻伊克昭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以解决伊盟驻军的粮食为名，于同年九月下旬来到札萨克旗，会晤我父（沙克都尔札布），商谈在伊克昭盟开垦五百万亩土地事宜。当时我父任伊克昭盟盟长及国民党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在场任翻译的是绥境蒙政会委员胡凤山（蒙族）。我父虽不会说汉语，但一般汉语还能听懂，并且从陈长捷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非常蛮横，不是商量办事，而是用压服手段来强制。我父看出事情不妙，就理直气壮地答复：“此事不仅关系到蒙古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宗教问题（因为未开垦的可耕地绝大部分是在庙周围和脑包禁地），需要同七旗的仕官和民众商量，才能决定，我个人不能作主答应。”（事实确实如此，关系到全盟事情，不能个人擅作处理）陈长捷听到这些话后说：“伊盟开垦问题，是蒋委员长批准的，无论如何也要开。加之国难时期，你们也应当拥护这个政策。”我父听后，非常气愤，内心想：“蒋介石批准在伊盟开垦，难道不通知绥境蒙政会吗？就你陈长捷一个人知道吗？”这时陈的随从副官当场从腰里掏出手枪，装进子弹，威胁我父。这次会晤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清晨，陈长捷不言不语就返回了东胜。

陈长捷走后，白音仓向我父汇报说，他和陈总司令及杨副官长（陈长捷的副官长）已商谈妥，在翌年正月下旬，召集各旗仕官在东胜开会研究，再作决定。根据白音仓的汇报，我父同仕官们研究决定，给各旗下达通知，利用阴历十月初三祭成陵典礼时，七旗事先开会商量，以便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和办法。

陈长捷回东胜不久，没有取得蒙旗的同意，就擅作主张宣布开垦，想对蒙古人进行强制压迫，使蒙古人俯首接受他的要求。宣布开垦后，从外地招引了不少农民，并指使说：“哪里有好地，就在哪里开。”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全盟普遍涌起了开垦草野的浪潮，不仅开垦牧场，连同庙地、

脑包地以及祖先伊金霍洛（成陵）禁地都开垦了。这就引起全盟蒙古族人民的反对。伊克昭盟本来是开垦最早的盟，除沙漠之地以外，<sup>1</sup>比较好的可耕地绝大部分都已开垦，留下的可耕地，仅仅是一点庙地和脑包地而已。再继续开垦的话，蒙古族人民依靠养牧的生活，确实难保。为此，我父在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之后，为尽量避免纠纷和遭受损失，特派白音仓去交涉数次，结果无效。陈长捷最后态度蛮横，气势汹汹地说：“开垦是一定要开，没有商洽的必要，这是蒋委员长批准允许的，你们也应该拥护执行。”当这个消息传出后，蒙古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指陈长捷）要用武力对待我们，那好吧，我们也不客气，用武力对待他；我们的装备不如他们，但我们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可以对付反动派。”这种反映不但在札萨克旗到处可以听到，在其它六个旗的蒙民中也普遍地传开了，形成一种见面的口头语。

反动透顶的陈长捷，对于这些情况，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认为蒙古人软弱可欺。

一九四二年阴历十月初三，祭祀成吉思汗时，七旗差不多都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根据仕官们回来汇报：在会上七旗坚决反对开垦，主张继续同陈长捷商谈；并决定翌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在东胜开会，向陈长捷提出一致要求，停止开垦；如果对方坚决不接受，再另行研究决定。

根据十月初三的会议决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我父又派白音仓前往东胜，和陈长捷磋商关于开垦的问题。当时我父的指示：“主要去刺探陈长捷的态度，看他对开垦的主

张是否有所改变，有无商谈的可能。如果比以往的态度好一些，我们也应改变态度……。”并没有允许开垦的意思。不料白音仓竟然逢迎陈长捷，擅自作主，满口答应开垦。他返回札萨克旗后，也没有向我父如实地汇报他已允许开垦的问题。后来西协理鄂齐尔巴图等仕官们，知道了白音仓已妥协答应开垦之事，便在仕官中引起强烈反对。为此，鄂齐尔巴图和白音仓犯过嘴舌，愤怒到极点。

白音仓一贯胡作非为。过去逼迫保安队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次又擅作主张，答应开垦，出卖蒙古人的利益，札旗上下，对他痛恨万分，尤其是老瑞、鄂齐尔巴图。

## (二)

陈长捷也深知没有取得蒙旗的同意，擅自开垦，会引起纠纷，于是想尽各种办法，从蒙古人内部了解蒙旗对开垦的态度和反映，以便再想对策。在这个斗争当中，陈长捷用拉拢手段收买了白音仓，终于达到了开垦的目的。

白音仓在札萨克旗工作年久，此人系甘肃省人，雍和宫白大喇嘛姘妇的儿子，学会满口蒙语，并且说的非常流利，经白大喇嘛介绍给我父担任随从数月，以后在旗政府工作。仕官们也很信任他，当做亲信使用，外出公干时让他充当翻译。这样，各方面的上层人士，他认识的多了，眼界扩大了，便滋长了野心，看不起仕官们，搞名利地位，对旗府的一切事务都想垄断。就是这样，札萨克旗仕官们也是再三迁就忍耐。最后他竟发展到出卖蒙族人民的利益以求荣，把自己的发财致富寄托在卑劣的行径上，“忠心耿耿”为陈长捷效劳。

因而，更引起札旗军民的愤恨。

其次，白音仓的品质非常恶劣，对自己有利时，不择任何手段。如札萨克旗的事情，仕官们批准允许的，他却从中造谣生事，欺蒙我父，有些应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对他稍有一点利益或行一点贿赂，他马上又制造别的理由，请我父批准或允许。这种事情是举不胜举的。以后白音仓、王兰友、顾兆忠等形成一个集团，歧视蒙古人，妄想掌握整个札萨克旗的军政大权。

有一次，白音仓让旗保安队士兵集体入国民党，引起札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排长老瑞的不满。以后不断冲突，互相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提到白音仓时，所有蒙古人都切齿痛恨，尤其是老瑞对他恨之入骨。

老瑞系札萨克旗人，先在阿木图庙当喇嘛，没有念过一天书，但为人忠诚灵敏，还俗后在家劳动。以后由于札萨克旗遭灾，迁移到乌审旗居住。当时锡尼喇嘛正在搞“独贵龙”运动，这个运动以后发展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旗革命组织时，他积极地拥护并参军，接受了党的教育，阶级觉悟提高了，懂得了革命道理。在当时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奋不顾身，忠勇异常，逐渐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敢与敌人作斗争的战士。可惜对革命缺乏较深的认识，没有远见，意志不坚定，在伊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锡尼喇嘛逝世后，他以为革命也会跟着死者熄灭，而脱离了革命，半途而废，竟然返回原籍札萨克旗，从事劳动。

札萨克旗的仕官们，对老瑞都了解，不管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如何，认为他总是本旗人，并在革命战争中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有一定的实践军事知识，所以在他回到本旗不久，

立即派他为旗保安队的排长。事变当中，他确实表现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如到达乌审旗后，在战争中右手受伤，医治好后，立即归队参战。同时在每次战斗中，他能够主动灵活的运用战术，特别到达乌审旗后，更善于根据地形部署战斗，引诱敌人，给予歼灭性打击。以后被提升为连长。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阴历正月十七日），恰好白音仓到榆林办私事，在返回札萨克旗的途中，被保安队第一连击毙。这个消息传来以后，所有的蒙古人都大为快慰，心想：早应该杀了他，不然将来总是蒙古人的祸患。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陈长捷来电说：“白委员（白音仓）忠贞爱国，不幸为奸匪刺害，请沙委员长（指我父）迅速采取措施，逮捕凶手，依法制裁；否则即派兵到札萨克旗搜查扣押凶手。”实际上，这时陈长捷已调动骑七师侵驻了伊金霍洛和再生召。反动派妄图采取惯用的手段压服我们，并且鼓励和支持白音仓的伙伴王兰友、顾兆忠等，制造流血事件。王、顾以为有陈长捷撑腰，可以为所欲为，更加疯狂起来，要给白音仓报仇。这样加剧了局势的发展，事变迫在眉睫。

### （三）

国民党骑七师侵驻伊金霍洛和再生召后，形势愈来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老瑞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并且听到顾（兆忠）、王（兰友）要给白音仓报仇，老瑞立即产生了暗害王、顾的念头。据说，老瑞曾听到顾要到东胜，他就在去东胜的路途上等待顾数次，因顾有其它事情没有去东胜，老瑞的目的没有达到。以后形势更紧张，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定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夜間，暗杀王兰友、顾兆忠。由于对方早有准备，双方射击持续约一小时左右，最后击毙王、顾。拂晓时枪声稍微缓和，大约七时许，有人来汇报，说是在札萨克旗街上保安队暴动了，杀死了王兰友、顾兆忠，还逮捕了其他徒众。另外，捣毁了国民党部，把国民党绥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赵城璧（蒙族）也拘留起来了。当时秩序很混乱，人心恐慌。就在这个时候，保安队第一连排长老瑞来到王府，向我们汇报暴动的原因，并向当时在绥境蒙政会工作的外地蒙古人，如任秉钧、胡凤山、经革陈等人说明：

“事变系反对陈长捷开垦，消灭内奸，对你们毫无关系，请你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和怀疑。同时作为一个蒙古人，你们应该同情我们的斗争，支持我们……。”

这个时候，札旗仕官们聚在一起，在绥境蒙政会和几位委员——任、胡、经等，一同开会，研究了当时的形势（我没有参加这次会）。据说在会上大家劝阻老瑞排长，不要过猛，把事情闹得严重了，别人不好调解，应停止杀人，不要动武，用和平方法处理，以期避免更大的流血事件。当时老瑞坚决不同意，决心要干到底，不到陈长捷放弃开垦，决不罢休。但以后再没有杀人，并把拘留起来的人也释放了。

当天上午约九时左右，侵驻伊金霍洛的骑七师的李连长（名字忘记了），随带士兵数人来到王府说：“奉上级命令，要来札萨克旗街上驻扎。”经绥境蒙政会同他交涉，当时没有来。鄂齐尔巴图和老瑞看到形势不佳，立刻让保安队占据札萨克旗街，作战斗准备，并下令：如骑七师胆敢进犯，要迎头痛击。

我父看到形势将更紧张，立即召集仕官和绥境蒙政会委



员胡凤山、任秉钧等人，开会商讨了当时的形势，在会上决定电报国民党中央和傅作义，说明事变的原因，并且要求立刻采取措施和解纠纷，停止开垦。同时还决定打电报给邓宝珊、高双成二位，请他们劝告陈长捷停止动武，要和平解决纠纷。与此同时，还派任秉钧到榆林与邓宝珊当面接洽，要求调解；派贺耆寿劝阻骑七师暂不要到札萨克旗街上驻扎。在会上有些人不同意，认为这种办法是向国民党屈膝。

去劝阻骑七师进军的贺耆寿被软禁，不让回来，翌日（四月二日）骑七师进攻我府时，将贺带到途中杀害。

四月一日，陈长捷突然来电，表示愿意商谈和平解决纠纷，但又要求我保安队全部撤出札萨克旗街为先决条件。我们深知这是陈长捷的鬼把戏，他打算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同我们隔离开，然后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收拾我们。

四月二日拂晓，骑七师四面围攻我府，当我们知觉后，国民党军已占了距离我府东南约七八十步远的国民党长官公署眷属院子，并开始向我府射击，于是战斗就开始了。激战了一整天，在战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用炮火轰击我府，大约放了数十发炮弹，摧毁了不少建筑物，特别是我府遭受损失严重。有一颗炮弹击准了我父寝室，幸亏炮弹未炸。这样的激烈战斗，札旗保安队从来也没有经见过。但是这次守卫我府的三十余名保安队的战士，没有让国民党反动派的猛烈炮火吓倒，英勇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用炮轰击，我们也从库里拿出两门迫击炮要还击，但我们保安队素日没有练习，不会使用，不得已我亲自射击，第一炮放野了，第二炮打的很准，打中了，从长官公署眷属院内把敌人轰出去了。这一下鼓舞了士兵的勇气，有了坚持战斗的胆量，思想也稳定了，并且给了

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我父考虑到，敌人的火力猛，我们不能坚守王府，假使国民党包围我们数十天，堵塞了我们的出路，那时我们只有放下武器投降。要是我们出去，利用沙漠，进退就能主动，于是决定退走。

#### (四)

四月二日下午五时许，我父率领三十六名保安队，携带眷属和印信，退出王府。当时家里只有三匹马，除我父骑一匹外，其余二匹轮流着骑或两人双骑退走。为了掩护退走，我当时只留三四名士兵，用迫击炮盲目轰击约四五十发，七点许，已黄昏，把大门从里边关上，从墙上跳出，最后退走。恰好当天晚上，天阴墨黑，在沙漠里走了一夜，约四点许，到了温克吉图庙，离我府大约三十余华里。休息了数小时，因我父有嗜好，用完烟后，接着继续走了三十余华里，到了森盖多尔济老乡家，住了一宿。这里离我府仍然很近，怕国民党军追赶上袭击，同时得到国民党军西进部队进入了沙漠的消息。

四月五日又走了一整天，进了大沙漠，找到一个叫乌力吉毕勒格的老家。这个地方很偏僻，不熟悉地形的人，不容易找到。这里离札萨克旗王府七十余里，在这里住了三天，我们立刻研究决定，派巴札尔布仁携带公函，到巴图湾（解放区）和共产党联系。函内大意：“我们反对国民党开垦，引起武装斗争，请你党协助我们反击国民党。”原来打算在这里住一时期，等待联系的结果，以后考虑到在这里不能呆久，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奇玉山，一定会骚扰我们。因

而立刻决定转到鄂托克旗等待联系人。四月九日起身，路上走了八九天。

四月中旬，到达鄂托克旗，在苏木图区一个叫巴图的老乡家等待联系人，住了一个月左右后，联系人返回来，已同共产党的曹开诚、赵通儒取得了联系。共产党方面，为了我们的安全，决定让我们到西乌审旗西部章高图居住。同时党又派了数十名武装队伍，护送我们到章高图。

就在这个时候，鄂托克旗的章司令（文轩），也派秘书阿日宾格什格带些吃的东西慰问我们，并要我们到该旗偏僻的地方纳林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左右为难，向南走吧，怕惹下章司令，使他怀疑我们投靠共产党。所以决定让护送我们到章高图的队伍夜间再来，我们就可以用共产党“强迫”带走为名作掩盖。当天夜间约一时左右，由此地出发到西乌审旗（解放区）。

五月中到达西乌审旗包儒和硕庙，住了数十天，这里离东乌审（白区）较近，为了安全，以后又向南迁移至章高图，住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同党的伊盟负责同志赵通儒磋商有关问题，并派札萨克旗东协理阿木古朗到革命圣地延安取联系。他到延安受到党的热烈欢迎，据说中央负责同志还接见了，向他讲了当时党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支持和同情我们蒙旗，反对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武装斗争。还向他讲述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同时会见了毛主席，给我们保安队补充了武器，步枪三四十枝和若干弹药，供给了服装、给养；另外对我们上层人士每人赠送了一身衣料和其它日用生活必需品。以后又专派负责干部，如曹开诚、薛向晨、张旅长（名

字忘记)等,经常对我们讲述党的各项政策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感动。

我们到达西乌审旗革命根据地以后,保安队官兵随我们陆续到达这里的共达八百余人,当时由党指定驻扎在西乌审旗边境什拉乌苏一带,防御民族败类奇玉山和国民党军队窜犯根据地,抢劫和危害人民。确实未出党的预料,同年秋季粮食入仓时,东乌审旗特日毕札拉森(奇玉山兄)团长,竟然闯进根据地抢劫粮食,奸淫妇女和搜刮人民财产。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我保安队和党的武装队伍,共同作了数月游击战,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给根据地人民作了一点有益的事情。

九月上旬,从这里又移到石边庙住了一个多月。鄂托克旗章司令(文轩)派副司令奇恩庆到石边庙同我们商谈,让我们返回札萨克旗。他再三说服我们,“应考虑全盟,作为盟长和委员长,住在红色政权地区内,对蒙古人影响不好,造成很多麻烦也不好。”他又说,傅作义也要求我们立即返旗(傅对事变装作不知道,说是陈长捷擅作主张的),他们(指国民党)已经把事情都推到陈长捷身上。承认了错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必提了。尤其带出这么多人马,日久了也有困难,现在有人从侧面和解,返旗还是对的。我父在这种劝说引诱下,思想也动摇了。

另一方面,士兵们离别家乡日久,也都渴望早日回家。特别是听到陈长捷被撤职,国民党中央宣布停止在伊盟开垦以后,更认为斗争已取得胜利,万事大吉了。

国民党派奇恩庆到石边庙劝说我们返札萨克旗的问题,共产党的方面也知道。奇恩庆也同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接洽过。

我们当时把这些情况向石边庙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曹开诚汇报后，党的方面毫无意见，去留问题完全让我们自己选择决定。

### (五)

九月下旬，我们由石边庙（解放区）返回鄂托克旗的阿拉庙（章司令驻地），当时共产党方面也派几位同志陪送我们到鄂托克旗白区边境。从此我们离开了解放区，走了五六天，十月初到达阿拉庙，受到章司令的接待，他给我们已安置好住宅。

次日上午，章司令来看我们，商谈和解问题，他将奇恩庆在石边庙所谈的内容又重复了一次。在阿拉庙住了两天后，傅作义派来一人，马鸿逵也派来一人（其姓名忘记），胡宗南派来高级参谋连钟山，在阿拉庙商谈了两三天，就算和解了。商谈时，国民党方面说：“开垦，中央有命令。但我们决定让陈长捷同蒙旗协商办理，并没有指示他强制开垦。”把事变发生的根源说成是傅作义不知道，把一切责任罪过归给陈长捷。对我们，毫无谴责的口气，并说：“这次事变，沙王爷（指我父）也可能不知道，主要是您下边的无知识人，受了共产党的蒙蔽搞起来的，今后可得注意。”等等，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阵。

在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陈长捷伊盟警备总司令职务的同时，宣布了停止对蒙旗的开垦。

商谈中满口答应，要赔偿蒙民和我家在事变中所受的一切财产损失。另外，还决定已开垦地的庄稼，全部归还当地蒙民。

谈到撤销我父职务时说：“因事变后您走了，需要作的事情很多，没有人负责不成，不得已，暂时让图王（原郡王旗王爷）代理。您回来后，中央会马上恢复您原来的一切职位的。”这样就算和解了。

十月中旬，回到札萨克旗后，房屋已被国民党骑七师、二十六师破坏得不象样子，为搜寻财物，房子和墙根都被挖掘至一丈余深。有的房子前墙已倒，全府没有安身之地。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难过异常。我们几代积蓄下的财物，被国民党反动派抢劫得一干二净。我们只好另找几间房子暂时住下了。

不久以后，阴历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姚琮、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偕同傅作义来到札萨克旗，当时傅作义表面上装作对事变不知道的样子，十分殷勤地慰问我们，并赠送了一些礼品，每人一件府绸衣料和被面料。同时调查登记了事变中伤亡的人数和我家损失的财物。当时他们异口同声地都说要赔偿我家的损失。但最后仅仅给了八百万元法币，就算完事了。其实国民党使用花言巧语愚弄蒙古人的鬼把戏，我们是早已知道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间，国民党中央恢复了我父的原职——伊克昭盟盟长和绥境蒙政会委员长职务。同时把事变发生的一切罪过归于札萨克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排长老瑞二人，最后，鄂齐尔巴图被撤职。

当时驻在札萨克旗的国民党新三十一师驻地，和我旗保安队相距很近，日久了，双方也就认识了。有一天，三十一师的孙英年营长出操回来，路过保安队老瑞的连部门口，招呼老瑞去打靶子。当时士兵们不让老瑞出去，怕被国民党陷

害。可是老瑞说：“怕什么，没有关系。”就立刻出去和孙营长谈话。一见面，孙也很客气，笑容满面，两人同去打靶子，结果老瑞被诱捕，拉到营部，立刻被枪毙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段太卑鄙无耻了。

这场震动一时的伊盟“三·二六”事变，是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垦和消除蒙旗内奸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斗争，但是札萨克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缺乏政治头脑，个人独断专行，事先不同札萨克旗的仕官们磋商研究，不考虑大局，为解除自己的仇恨，鼓励和指使老瑞杀死白音仓，造成了流血事件。在事变中，我们虽然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札萨克、乌审两旗蒙民的损失也是严重的。如果我们事先能有一个统一的布置和计划，集中力量，开展全盟性的武装斗争，事变的成果会更大。斗争无计划、无准备，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是由当时我们负责人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

#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

任秉钧

伊盟“三·二六”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以解决驻军粮食、开垦荒地为名，实际上企图侵占蒙民牧场，剥夺蒙民生活基地，同化蒙民而挑起的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指示陈长捷一手组织的，企图利用蒙汉败类，分化蒙民团结，消灭进步力量而引起的事变。也是蒙古族人民被迫用武力抗拒国民党反动势力，保护民族利益的事变。这次事变，当时曾经震动全国。现就个人记忆所及，略述事变情况如下。

## （一）事变的发生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在天水召开军事会议时，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以解决驻军粮食为名，建议在伊盟开荒五万顷。蒋介石询问傅作义是否可行，傅表示原则可以，但开荒不宜过多。蒋介石当即指示陈长捷试垦五千顷，以后再继续开垦，详细办法须与傅研究决定。但陈长捷刚愎自用，蛮横成性，未和傅作义详细商议，竟断然自定开荒一万顷，以后继续开垦。他一面通知各旗照办；一面直接招人开荒。他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地好就开什么地。”其中不但包括各旗的脑包地、庙地、马场地、苏把汉会盟地，甚至伊金霍洛的“禁地”也要开垦。



陈长捷作好布置后，便到札萨克旗会晤伊克昭盟盟长、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通知要开荒。沙王当时答复：“此事关系全盟蒙民的生活问题，我一人不敢答应，要各旗的官民同意，才能决定，应该从长计议。”不想陈长捷竟然说：“此事委员长（指蒋介石）已决定，无论如何，非开不可。”沙王当时虽然听懂陈长捷的汉话，但未表明态度。当时担任翻译的绥境蒙政会委员胡凤山，听后非常气愤，从旁说道：“总司令此来，说是和沙王商议开垦荒地，但如此谈法，哪有商量余地。”沙王表示同意胡凤山的话。此次会晤不欢而散。第二天，陈长捷即返回东胜。

陈长捷给了沙王很大刺激，不但陈长捷本人态度傲慢，言语伤人，而且他的随从手持短枪，如临大敌。会晤后，沙王就对人讲：“我此生见了很多大官，还未见过这样对待我的家伙。”从此沙王对陈长捷就有了戒心。

陈长捷大量开垦牧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盟。蒙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反对开荒，大家认为：伊盟自清朝中叶开荒以来，已历一百余年，凡是可垦的地方，已开垦殆尽。留下的地方，绝大部分是沙碛之地，是蒙民赖以放牧牲畜的牧场，绝不能再开了。

陈长捷一意孤行，不顾全盟蒙民的反对，竟在东胜他的总司令部，呼此旗唤彼旗，宣布垦荒地点和数字，引起蒙民更大的愤慨。沙王曾经派员交涉数次，始终无效。陈长捷一再表示，荒地非开不可，毫无商洽余地。

沙王看到商谈不会成功，便借阴历十月初三伊盟惯例祭祀成吉思汗的机会，在伊金霍洛秘密召集各旗开会，议定集合各旗武装部队，于次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祭祀成吉思汗之

际，武装抗垦。会后一面派员到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旗秘密传达会议决定(或以信件，或以口传)；一面限令札萨克旗保安队在阴历年前集合完毕。各旗蒙民对此都很拥护，并积极准备起来。

不久，陈长捷对沙王的抗垦，也有所闻，于是采取拉拢败类的办法，企图刺探消息，以便从内部破坏沙王的计划，于是便找到沙王的亲信白音仓这个败类。白音仓本系北京雍和宫白大喇嘛姘妇的儿子，为人机警聪明，蒙语颇流利。经白大喇嘛介绍，名义上给沙王当随从，但实际常跟札萨克旗章京僧格林沁办事，僧格林沁代表沙王外出公干时，白音仓担任翻译。以后，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占绥包，僧格林沁留居包头，应付日伪，白音仓就有机会接近沙王，得到信任，逐渐弄权。他一面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树党营私；一面欺蒙沙王，把持各机关的事务。他的派系中的重要分子有王兰友、顾兆忠、王天籁等，都是宵小之徒，他们把沙王所领导的各机关，都当作自己集团营私舞弊的场所。例如有一次榆林有一个商人想包租札萨克旗的碱淖，已经得到札萨克旗仕官们的同意，但因未给白音仓贿赂，他就编造理由，在沙王面前破坏其事。后来经人疏通，贿给千元，他又另编理由，请沙王批准。又有一次，白音仓让保安队集体入国民党，札萨克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第一连排长老瑞反对。但他悍然不顾，竟强迫举行了“集体入党”仪式。总而言之，白音仓等经常勾结国民党特务，出卖蒙古民族利益，凡是正直人士都唾弃他们，尤其是蒙古族各阶层人士，更为痛恨他们。

陈长捷为了压迫沙王，剥夺蒙古劳动人民的生活基地，便对白音仓等大加赏识，经常派员与他们往来。白音仓亦派

其羽翼王兰友、顾兆忠常去东胜通风报信，出卖蒙旗的机密。对于开垦一事，更属积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沙王派白音仓前往东胜见陈长捷谈判开荒问题，并且嘱其只能答应开垦较少数荒地，以示让步。不料白音仓竟擅作主张，逢迎陈长捷，当面承认了大量开垦荒地。等他返回札萨克旗向沙王汇报后，鄂齐尔巴图等札萨克旗仕官都反对，并访白音仓研究妥当解决办法。白音仓竟面斥鄂齐尔巴图等说：“你们是官儿，有意见可以到东胜说去。”鄂齐尔巴图闻之甚怒，拂袖而出，对人说：“我们无能，当饭桶！”言下气愤万分。

从白音仓强迫保安队“集体入党”，到鄂齐尔巴图等反对大量开荒，经过一系列的冲突。白音仓集团和鄂齐尔巴图、老瑞等人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彼此都有消灭对方的打算。特别是在因开荒问题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以后，更坚定了鄂齐尔巴图、老瑞杀死白音仓的打算。对此，白音仓也有所闻，他决定暂时逃避，不久就去榆林暗作安排。回来后预备逃到鄂托克旗，逗留一时。一九四三年二月间（阴历正月十七日），白音仓在由榆林返札萨克旗的途中，果然被札萨克旗保安队第五连击毙。陈长捷闻讯后，气势汹汹，一面电沙王要求“缉凶”，在电文中竟然说：白委员忠诚为国，不幸为奸匪刺杀，请速缉捕凶手，以慰忠魂。否则，即派兵来札旗搜捕。一面派国民党骑七师李连，侵驻伊金霍洛，用武力威胁沙王。同时，白音仓的羽翼顾兆忠等亦积极进行反动的活动，声言要为白音仓报仇。这就更加速了事变的爆发。

## (二) 事变的经过

国民党骑七师李连侵驻伊金霍洛(距沙王府约三十里许)后,形势马上紧张起来。他们剑拔弩张,准备武力开荒,而札萨克旗的军民,认为非武装反抗不可。保安队和鄂齐尔巴图看见形势紧迫,便不按原定计划行动,匆匆忙忙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晨四时许,首先在札萨克旗的街上发动事变,分数路杀死白音仓的主要帮手王兰友、顾兆忠,逮捕了白音仓集团的其他徒众,拘禁在一处;并拘捕国民党绥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赵城璧(蒙古人),捣毁国民党党部。在约四小时中,枪声大作,秩序混乱。枪声稍息,保安队第一连排长老瑞便来对胡风山、贺耆寿、任秉钧声明:“事变系反对陈长捷,消灭蒙汉内奸,不但与你们无关,而且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致行动。”接着札萨克旗的东西协理仕官等,也来商议。

我们几个人和仕官们同到蒙政会开会。我们首先劝告老瑞等,暂停杀人,提出用和平方式处理问题的意见。劝告他们,就是对白音仓集团的重要分子和赵城璧,也不要杀,以后可以驱逐出境,或用其他方式处理,以避免演成蒙汉民族仇恨。老瑞等开始不许,经过一时许的辩论,他们才勉强同意,以后果然再未杀一人。

正在我们讨论如何对付陈长捷的时候,国民党骑七师李连长忽然找来,说是该连要进驻札萨克旗街上。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劝他暂时停止前来。李连长未作肯定答复,引起保安队的怀疑,立刻在街上布防,准备李连来了就打,决不退让。

沙王看见形势紧张，便在八时左右，召集我们在王府开会，商议阻止骑七师前进的办法，并研究进一步对付陈长捷的行动。当时决定：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说明事变原因，要求停止开荒，以维蒙民生活；致电陈长捷，劝他临崖勒马，以免造成更大损失；派贺耆寿到再生召，劝阻骑七师前进；派任秉钧到榆林，请邓宝珊、高双成调解；留下胡凤山、奇世勋协助沙王处理一切。我们还建议派经革陈到东胜劝陈长捷停止扩大事件。虽然鄂齐尔巴图背后有异议，但经革陈已起程了。从此我们不眠不休，紧张地工作了六天。

四月一日至二日，陈长捷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来电表示不派兵来，愿意和平解决；一面令骑七师软禁贺耆寿，并要求将保安队撤离沙王府。在一阵紧张、一阵缓和的情况下，陈长捷突然在四月二日拂晓，四面围攻沙王府，激战终日，炮火猛烈，街上建筑物毁坏不少，沙王府亦遭到破坏。有一炮弹落到沙王卧室上面，幸未爆炸。保安队奋勇抗击，消灭伪七师李连大部，李连不支退去。但沙王因众寡悬殊，恐难持久，遂于当天下午五时许，率保安队三十余名，携眷带上印信向乌审旗退走。

三日，骑七师又用一团兵力，进袭至沙勒刚勒和克奔图梁二地，遇到保安队的英勇抗击，激战一日，保安队仅以少数兵力，诱战围歼该团大半，使该团遗尸遍野，不支溃退。保安队缴获轻机枪二十余挺，马枪无数。

至此，骑七师名为追击，实则再不敢进迫。以后数月之间的战斗，都不过是零星战斗而已。在全部战斗中，札萨克旗保安队仅团副巴音呼、第五连连长巴图巴雅尔及士兵四五

名壮烈牺牲，而骑七师则伤亡溃散将近一团之众。这就使陈长捷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后，不得不设法停止战斗。他曾致电邓宝珊说：“红柳沙区，伤亡颇众，我兄有何高见，请示弟。”

在事变过程中，骑七师、二十六师，竞相焚毁札萨克旗、乌审旗蒙民的房屋，捣碎蒙民的器具，抢走蒙民的牲畜，甚至把乌审旗的树木也给烧焦。好在蒙民大部逃走，极少伤亡。尤其是陈长捷的所谓前线指挥官黄副司令，占据沙王府后，闭门深掘，劫掠财物。大部分房子，都掘至数尺，甚至两丈余深，搜寻金银、衣物和烟土，运至榆林、神木等地出售。使沙王几代的积蓄，一朝被抢得干干净净。

陈长捷一贯压迫和残杀蒙古人民的借口是对付共产党。他刚到伊盟，便以共产党“罪名”枪杀了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这次他把自己制造的“三·二六”事变，也说成是蒙古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发动起来的，强指枪杀白音仓的是共产党，要沙王“缉捕凶手”。他把贺普寿、胡凤山、任秉钧也看成是可疑分子，曾密令骑七师和二十六师，借事变机会，捉住就杀。当贺普寿第二次赴骑七师办交涉的时候，便被软禁，在攻击沙王府的时候，卒被杀害。胡凤山也曾被陈长捷捕去监禁在东胜，企图杀害。后来经过傅作义再三去电，才解往陕坝后释放。任秉钧则因为到了榆林，由于有邓宝珊的庇护，始免于难。

### （三）事变的结束

由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伊盟“三·二六”事变，是陈长

捷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高潮中策划发动的。他们原想配合全国反共形势，在伊盟制造事变，从北面威胁陕甘宁边区。由于全国反共高潮被打退，伊盟事变也就不得不结束了。事变能够在几个月内结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了蒙民的反对压迫的武装斗争。据我所知，一九三八年春季，党曾派赵通儒同志数次和沙王联系。一九三八年秋季，当沙王赴重庆经过延安时，党曾热情招待，并对他说明党的民族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他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因此，在“三·二六”事变后，他就毅然奔赴边区附近——乌审旗南部章高图、石边庙二处，与党往来。在沙王退至边区附近以后，深受党的支持和照顾，给保安队补充了弹药、服装和给养，对沙王赠送了生活用品。并派张旅长、曹开诚二同志经常与沙王联系，讲述党的各种政策，这对沙王和蒙民是有力的支持，对国民党反动派和陈长捷是一个沉重打击，结果使事变很迅速地结束了。

第二、国民党中央被迫采取威胁利诱办法，迫使沙王回了札萨克旗。当沙王到了乌审旗后，傅作义就以“绥蒙自治指导长官”的名义，停止了沙王的绥境蒙政会委员长和伊盟盟长的职务，另委图王代理。这很显然的是支持陈长捷分裂蒙古上层的毒辣手段。以后由于事变进程对他们不利，这才不得不另行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傅作义调任秉钧、康济民到陕坝询问事变详情，又令胡凤山、经革陈到陕坝开会，商议解决办法。他当时曾宣布说：“我们要尽力促使沙王回来，我已派徐某到鄂托克旗阿拉旗就近联系。他如逾期不归，我们便和他断绝关系。”同时，胡宗南也派高级参谋连钟山驻

在阿拉庙，极力拉拢沙王返回札萨克旗。这就使沙王的斗争决心开始发生动摇。以后由于全国的进步人士和蒙古人民的一致反对，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于十月初旬，一面下令撤了陈长捷的伊盟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宣布停止开垦伊金霍洛的“禁地”、各旗的脑包地、部分庙地和沙王的祖坟地。一面不得不于十二月间（阴历十一月十九日）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姚琮、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和傅作义到札萨克旗慰问沙王，赠送礼品。以后经过互相折冲，国民党中央于一九四四年二月间恢复了沙王的绥境蒙政会委员长和伊盟盟长的职务，但另加罪于鄂齐尔巴图和老瑞二人，撤除了鄂齐尔巴图的札萨克旗西协理职务，诱杀了老瑞。至此，震动一时的“三·二六”事变，算是结束了。

第三、伊盟各旗准备不足，札萨克旗保安队日久思归。事变以前，沙王本曾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借祭成吉思汗陵的机会，对武装抗垦作过布置，但是由于事变的时间提前月余爆发，因此，使各旗的部队集合未能完成，一切准备尚未就绪。在札萨克旗首先发动以后，陈长捷、马占山及其他杂牌军队监视更严，致使多数旗没有行动起来。只有乌审旗于四月中旬发动起来，杀死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特务等数十人，并消灭伪二十六师一营左右。从乌审旗的北境直至南界，广泛展开游击战，战斗月余，就使二十六师疲惫不堪。事变以后，该师师长何文鼎曾对人说：“这种战斗，进无可取，退无可守，占了乌审旗的王府，也不能解决问题。”言下不胜苦恼。鄂托克旗虽已准备完毕，正拟发动，但是沙王派员制止，不令再动。其原因是沙王鉴于札萨克旗损失甚重，不愿让其他旗再遭损失。所以除札萨克、乌审两旗外，其他各旗



都未动。结果不能集中更大的力量，不能展开更广泛的斗争，一遇国民党中央的欺骗，便会停止战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札萨克旗保安队的官兵，因久别家乡，大部思归，一听到国民党中央把陈长捷撤职并停止开垦“禁地”，认为斗争已获胜利，愿早日结束。

总之，伊盟“三·二六”事变，是陈长捷一手造成的。他原来企图用屠杀办法，威胁沙王，压服蒙民，以达到他开垦荒地、实行法西斯反动统治的目的。不想札萨克旗保安队只有四百二十余名，乌审旗保安队亦没超过五百余名，便抗击住骑七师、二十六师五千余众。时间经过半年以上，地区纵横数百余里。保安队装备虽差，但一致反对开垦，敌汽同仇，斗志昂扬，而且地形熟悉，射击准确，所以就能够以少敌众，击败了陈长捷的反动军队。这是陈长捷始料所不及的。可惜这次事变，在军事上未能准备完善，而封建王公意志又不坚定，以致未能进一步给予反动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

# 伊盟“三·二六”事变亲历记

经 革 陈

## 事变前的伊盟形势

抗日战争时期，伊克昭盟与日寇隔河对峙，变成了紧靠前线的后方。按说这里应该是戎马倥偬，局势紧张的地区了，然而表面上却异常宁静。虽然有时也能看到些兵荒马乱的现象，但只是出现在一个点上，或者是一条线上。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是和平常一样地生活着，看不出动荡的景象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根本没有矛盾和斗争，恰恰相反，这里有过激烈的斗争。“三·二六”事变就是斗争的集中表现。

当时伊盟的军政大权，本来是属于盟长沙克都尔札布的（以下简称沙王）。他当时兼任绥境蒙政会的委员长、伊盟保安长官、蒙旗宣慰使、国民党政府委员等八九个重要职务，不论从那个职务上说，他应该是能直接支配全盟事务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直接统治伊盟，硬把沙王搞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他们不但给每旗派了一个司令，把沙王的实际权力，分散成七股八系，而且派来大批特务，打入伊盟的各个机关，左右沙王的一切。最后又在伊盟东胜县设立了一个“伊盟警备总司令部”，派反动军官陈长捷为总司令，紧紧地控制着伊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

在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关系、武力镇压蒙古民族的政策下，伊盟在沙王的周围，形成三种力量的矛盾和斗争：一种力量是以白音仓为首的特务反动集团，他们和蒋介石的特务勾结，出卖蒙古民族的利益；一种是以鄂齐尔巴图为首的札萨克旗仕官的势力，他们为了维护原有的封建利益，和白音仓等形成直接的对立；另一种力量是以蒙政会委员为中心的非伊盟籍贯的蒙古族青年，他们居于中间状态，和两方面都有微妙的关系。这部分人和以上两种势力不同的地方是，没有形成一种集团，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但总的说来，反对白音仓、厌恶白音仓，大家是一致的。“三·二六”事变，正是这三种力量矛盾的总暴露。

白音仓本来是北京雍和宫白大喇嘛的私生子，以后把他收为义子，并给他起了个蒙古名字——白音仓。白音仓自幼随白大喇嘛学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话，长大以后，白大喇嘛曾尽力给他介绍职业。起初是给吴鹤龄当仆役，以后又给沙王代表僧格林沁当侍者，最后由僧格林沁转介绍给沙王，当了沙王贴身的近侍，从此便找到“发展”的机会。由于他会殷勤谄媚，又能在没有翻译时，作会客的临时翻译，因此渐渐地更得到沙王的信任。

绥境蒙政会成立时，沙王提拔白音仓当了财务委员会的科长，掌握了全蒙政会的财政大权。沙王到南京时，他利用当翻译的机会，认识了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头头和中级官僚，并进而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拉上了密切关系，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蒙古人民的忠实走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绥境蒙政会由归绥移至札萨克旗办公，白音仓更是逐年被提升，两三年内，便飞黄腾

达，青云直上，身兼反动党、政、军、团八九个重要职务：蒙政会的委员、国民党绥蒙党部的特派员、三青团的干事、保安长官公署的副官长、保安司令部的团长等等。所有这些机关的用人和财政大权，都由白音仓全盘掌握，这样他便一跃而成为当时伊盟炙手可热的人物。

为了勾结特务，树立个人势力，白音仓首先从榆林请来了军统特务头子褚大光，白音仓以沙王的名义保荐他为保安长官公署的少将参谋长。接着又引来中统特务头子王天籛、于雪年等人，将其安插在国民党绥蒙党部内。这些大特务一来，跟着便带来了许多小特务，都由白音仓安置在札萨克旗的各机关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白音仓的庞大的特务反动集团。

白音仓集团外借特务老巢的支持，内假沙王的名义，翻云复雨，发号施令，无恶不作，他们自以为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各机关的大小事务，非经过白音仓集团便办不通。他们的势力越来越雄厚，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以后竟渐渐地把贪婪的毒手伸向伊盟盟政府和札萨克旗旗政府去了。这样一来，显然直接侵犯了札萨克旗仕官们的封建权力，抢夺了仕官们的额外收入，因此，不能不引起仕官一派和白音仓集团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对白音仓更是恨之入骨，屡次想设法除掉白音仓。

一九四二年，达到札萨克旗仕官反白音仓的最高潮，当时各仕官曾密向沙王建议驱逐白音仓，因为未得沙王同意，他们便密谋杀死白音仓。白知道这个消息后，一面放出空气，说他要到鄂托克旗种地；一面和他的娄罗密议，采取扩大外援的对策。他们的办法是：第一步北向东胜，和陈长捷进一

步勾结，使白音仓取得“伊盟警备总司令部”参议。第二步南向榆林，和马鹤天进一步拉拢，想把荣祥的蒙政会秘书长职务去掉，由马鹤天来接替，以期取得伪蒙藏委员会对白音仓集团的支持。针对白音仓集团的这种诡计，仕官们也积极采取抵制的办法。这时明争暗斗的局面，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可是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斗争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我当时是伊盟中学校长，经常住在学校，很少过问这些事情，对于斗争内幕，一无所知，直到事变发生，才霹雳一声地把我惊醒。伊盟几年表面宁静状态也被打破了。

### 事变的原因和经过

一九四三年“三·二六”事变的主要原因是反对陈长捷大量开垦草地。陈长捷自到伊盟之后，就以解决军粮为名，计划开垦一万顷土地，曾几次和沙王商议，都遭到沙王和西协理等的反对。以后陈长捷和白音仓勾结起来，企图压迫沙王答应开垦。沙王为了反对开垦，曾利用一九四二年阴历十月初三日祭成陵的机会，集合各旗王公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在第二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发动反对开垦的武装暴动。西协理鄂齐尔巴图一派当然是这个决议的积极支持者，但白音仓集团却另有打算，仍想利用这个问题再捞一把。

一九四二年秋天，陈长捷再电沙王，请派代表到东胜商议开垦问题。沙王就派白音仓前去，希望利用白和陈的关系，缓和开垦局面。不想白音仓在商谈中不但没有反对，竟然擅自答应开垦将近万顷草原，其中包括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寝地和沙王祖坟地。白音仓回旗以后，鄂齐尔巴图曾向他探听

结果，知道他已答应开垦大量土地，当下鄂齐尔巴图表示不满，白音仓认为有陈长捷作靠山，便厉色地说道：“你不同意，不会自己去和陈总司令说去！”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平素就和白音仓不和，现在又加上在开垦问题上新的尖锐矛盾，便使斗争趋于白热化。鄂齐尔巴图决心要消灭白音仓了。果然，一九四三年刚过阴历年，白音仓便被札萨克旗保安队五连的士兵刺死在由榆林回旗的途中。

白音仓之死，引起各种不同的反映：平素反白的人们，个个称快。而他的爪牙一面喊叫“缉拿凶手”，一面要陈长捷出兵报仇。鄂齐尔巴图得知白的爪牙的阴谋后，便集中全旗保安队士兵约四百多人，提前一个月发动了事变。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拂晓，在札萨克旗境内，以王府为中心，西自札萨召，东到伊盟中学，同时发动了事变，在一刹那间，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所有的人们，参加事变的主力部队，共约四百多人，分三路出动：主要一路由王府向蒙政会和蒙政会宿舍进攻，一个连向国民党绥蒙党部所在地札萨召进攻，另一个连（七连）二十多人，向伊盟中学校长院包围。

我当时住在伊盟中学，睡梦中被枪声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面提枪作了自卫的准备，一面猜测这突然事变的性质。我反复考虑，最后想到可能是日伪军突然袭击。不管是那种情况，我不能不进行抵抗。

僵持了将近两三小时之久，经过教师和学生的传话，才知道来者是札萨克旗七连的士兵。这时我又产生了新的疑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学校，为什么要打枪。再经过传话，才知道他们是沙王所差，请我回蒙政会议事的，开枪是因为

失火，但这还是解除不了我的疑虑。我想：沙王找我开会，为什么要派一连士兵？失火那有僵持两小时之理？我再三考虑：不和他们见面，不会知道事情的究竟，事情也解决不了。于是开门让他们进来了。首先进屋的是一个排长，以后见到了连长，他和我解释了失火的误会，并说明来意，我这时才知道全旗发生了事变。我只好半信半疑地随他们离开了学校，有五六十个学生尾随在后边相送。

在路上，马走得很慢，我边走边想：保安队的这种行动，莫不是把我当做白音仓的一派？果真如此，我将如何分辨呢？以后的结果又如何呢？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远远望见我妻和一个士兵迎面而来，这使我更加纳闷，莫不是家里也出了问题？等到下马交谈后，才知道是宿舍里的奇世勋、胡凤山等友人听说我在抵抗，征得老瑞排长的同意，让她来做解释工作的。这时我不安的心情，才稍稍稳定。一面劝慰伴送我的学生返校，一面上马继续前进。我妻一路边走边谈，详细叙述了蒙政会事变的经过。

她说蒙政会、札萨召和学校，是在一个时间发动的事变。她在蒙政会宿舍，拂晓时候，忽听枪声大作，出门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人马，向蒙政会攻来，枪声夹杂着喊声，到蒙政会附近时，一批攻入了蒙政会办公室院内，一批包围了蒙政会宿舍。进入蒙政会的士兵，专捕白音仓的爪牙，他们把一个新来的王秘书，错当王兰友枪杀了。宿舍内没有伤人，也没有抢劫，只是把全院的枪支都收了。在各家房上，都放了岗哨，形势很紧张。接着她又说，领导事变的有力人物是个排长，名叫老瑞，只有他说了才算，看来对宿舍住的人比较客气。白音仓的爪牙顾兆忠、王兰友、王天籁等人，恐怕凶

多吉少了。听了这段介绍，才使我担惊受怕的心情安定下来。

我回到蒙政会宿舍，已是上午八时左右，看到周围情景和往日大不相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房上地下，岗哨林立，在王府迤东白音仓小院附近，仍有战斗，不时送来断续的枪声，仔细看来，有的兵正在挖墙，有的兵正在屋顶上掏洞。宿舍里住的人告我说：“这是顾兆忠在作垂死的挣扎哩！”

刚到宿舍门前，老瑞和奇世勋、胡凤山等许多同事都围了上来，然后一同进了屋子。我过去不认识老瑞，这时当然会引起我的注意。老瑞中等身材，四十岁左右，面庞显得消瘦，从他的言谈举动中，看出他很机警敏感。他对人很礼貌，很客气，但谈起话却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不容对方有插嘴的余地。他第一句对我说的话，就是埋怨我不应该抵抗。接着便向我说明了事变的目的。他说：“我们这次举动，主要是反对陈长捷的开垦，这是真正蒙古人的意志。几年来，委员们口口声声喊着为蒙古人办事，现在是为蒙古人办事的时候了。现在陈长捷大兵压境，我们不能不起来反抗。还有白音仓这帮败类，我们必须铲除，决不饶恕。你和白音仓的关系，我们很了解，界限划得很清楚，希望不要担忧。”他稍顿一顿，接着又说：“现在事情已经做下了，你是委员，考虑考虑以后的事情应该怎样做？”

听了老瑞这一席话，知道对我确实是出于误会，于是提出我的意见说：“事已至此，最好不再扩大，还比较容易收拾。现在祸首已除，其追随者最好不杀，等秩序安定以后，徐谋退兵之策。”老瑞说：“这事大家可以研究，但最坏的



人，是绝对不能留的，象顾兆忠，这个白音仓的忠实走狗，我们是一定要消灭掉的，其余可按情节决定。”

在我和老瑞谈话中间，八连连长进来报告，说士兵已经从札萨召把赵城璧押到蒙政会西面小河一带，请示如何处理。老瑞一听大怒，喊道：“为什么不就地打死？马上枪毙！”这时奇世勋、胡凤山、任秉钧和我再三劝老瑞先把赵城璧带回宿舍，然后再研究处理办法。老瑞才勉强听了我们的话，让把赵城璧带到宿舍。

八连连长把赵城璧带走后，奇世勋与我向老瑞说：“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人也不好解决，最好是向沙王请示办法。”老瑞同意我们的意见，就由胡凤山、奇世勋、任秉钧、贺耆寿和我去见沙王，并且派一连连长和王府的巴梅令相随。走到王府大门前，看到情况也和平时不一样了，大门前增添了守卫，簇新的枪支，闪闪发光，王府院内士兵出出进进，看样子都很忙乱，墙上架有机关枪，放有不少岗哨。

我们进西跨院见过沙王的长子鄂齐尔呼雅克图，然后进入东跨院沙王的卧室，看样子沙王很忧郁，很疲倦，对白音仓的死，还表示惋惜。当我们提出不要再扩大事态的意见后，他表示同意，并且嘱咐我们说：“下边的人既然闹出这件事来了，希望你们几个人都想些办法，收拾一下善后。”在我们临别的时候，沙王一再郑重叮咛道：“有事，要多和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商量。”我们乘便说：“既然这样，最好请沙委员长再指定几名旗下的仕官，共同开会商量办法才好。”沙王表示同意，当时就指定西协理、东协理、东西梅令、老瑞排长、一连连长和我们共同研究办法。在蒙政会方面又增加罗永庆、白玉山等人。但开会时，鄂齐尔巴图和老瑞参加

的次数不多。

我们几个人从王府出来，听人说顾兆忠终于被击丧命。我们折向伊盟保安公署院内，一进门就看见这里集中捆绑着四十多个各机关的职员，他们都向我们大喊“救命！”我们和一连连长与巴梅令二人商量，暂时放开缚绳，继续看守起来，听候处理。一连连长和巴梅令立刻命令士兵执行。这件事办完，我们几个人就朝宿舍回来。回到宿舍，我们把见沙王的情况和释放众人的事情告诉了老瑞，他也没表示异议。

当天下午，由罗永庆通知，召开了一次全体紧急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应付当前的局面。会上王府的仕官介绍了情况，说是陈长捷派来骑六师的一个团，已经进驻在伊盟中学，前锋哨兵已推进到王柜（王柜距王府十五里，在伊盟中学和王府中间），再往前进，那就只有开火了。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本来已经有些紧张，忽然又有人进来说，他看见北面十几里的格勒登庙，又开来一批陈长捷的部队。大家当然更惊慌了。经过匆匆讨论，决定了一个临时措施：先派和骑六师熟识的贺耆寿前去劝阻进兵。贺一人去了，大家又决定让我同去。傍晚，当我们骑马到格勒登庙时，那里并没有什么兵，除了几个惊惶失措的喇嘛外，寺院里可以说空无一人。一句谣言使大家受了一次虚惊。

晚间，接着再开大会，出席人数比白天增加很多，主要讨论了如何阻止陈长捷进兵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先向外边发几个通电，说明事变原因，要求电阻陈长捷进攻。发电的对象，记得是蒋介石、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朱绶光等人。

一连几日，日夜都有会议，收发电报也很频繁，但是陈

长捷是否退兵，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三月二十八日开会时，有人提议，事急了，电报表达不清，可否派代表出去。大家同意这个建议，并推东协理请示了沙王，沙王也同意。于是决定分两处派出代表：贺耆寿、东协理和我三人到东胜，面见陈长捷，谈判和平解决办法；任秉钧到榆林，请邓宝珊、高双成、朱绶光居中斡旋，阻止陈长捷动武。代表人员虽然确定了，但是出发时间，王府方面却迟迟不能决定，原因是东协理不敢到东胜，贺耆寿需要留下来，以便和骑七师来回联系。结果去东胜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任秉钧出发了。下午我和贺耆寿也起了身，走到王柜附近，就看到两个哨兵，我们下马说明身份和来意，他们请来一个排长，和我们打了招呼，允许我们通过前线。

到了伊盟中学，师生见我回来，个个热泪盈眶，悲喜交集。大家告诉我：“你们刚刚离校不到二里，骑七师因迷失方向，便开到学校，团长问明情况后，就要开枪追击，被师生劝阻，真够危险的了。现在校内驻的团长名叫贺迪光。”不大工夫，说是贺迪光要见我们，但不让我和贺耆寿一同会见。先见我，后见贺耆寿。贺迪光见到我，首先问到的问题是札萨克旗士兵的人数和装备情况，我因为不知道详情，很难告诉他确数，只是笼统地说：“沙王新枪很多，这次都从枪库取出，武器相当不错。”谈到我的任务时，贺迪光也同意不打，不过他说：“这事我不能作主，陈总司令一日数令，让我火速进兵，事情很急，希望你立刻就往东胜。”为了我路上的安全，他派了两个士兵同去。

我在当天黄昏出发，路上住一宿，四月一日傍晚到了东

胜，当晚会见了陈长捷，我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意见。他说：“蒋委员长的命令很严，我也很难自主，等我把你此来的任务报告上去后，看蒋委员长怎样批示。今天已经晚了，你长途跋涉，一定很疲累，早些休息吧。打与不打的问题，明天早晨再从长计议。”第二天清晨，我再次会见陈长捷时，他的口气变了。他说：“昨夜蒋委员长连来数电，急如星火，不能不进兵，现在已经打下了蒙政会，从宿舍救出了一百多个眷属，都平安收容在伊盟中学。”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不由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什么话来。我想自己担负的任务，既然落空，只得失望而归，当下收拾行囊，动身返校。

在途中，骑七师的一个排长抢去了我的一匹马。快到伊盟中学时，迎头碰上胡凤山由四个士兵看押着正往东胜去，我愕然，下马盘问原因。监视的士兵屡次阻挠我们谈话，我和胡只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他一再托我尽力营救，并再三嘱我务必要给傅作义打一电报。我回到伊盟中学后，当天就发了几分营救胡凤山的电报。

我一到学校，就看到秩序大乱，校内原驻的团部，已经开向前线，只剩一个连留守。这一连曾参加过蒙政会的攻击，现在每个士兵都大发横财，在连排长的带动下，搞起了明目张胆的狂赌，大家口袋里都是倘来之物，谁也不心疼，最后都被资本雄厚的官儿们给卷包去了。晚间，许多眷属都和我谈到四月一日晚上打仗的情况，她们说：贺迪光团向蒙政会出发时，诡称让贺耆寿带路，结果在途中把他打死了。贺团攻下宿舍后，把所有的男女老少集中到一起，由这个留守连美其名曰“护送伊中”，可是家家的衣被什物，都无法带走。

国民党这帮匪军，便如入无人之境，挨门逐户，大肆搜掠，洗刷一空。贺迪光还前后枪毙了白玉山（蒙人）、罗永庆等几个人。沙王在激战中，携眷西走乌审旗，骑六师尾追不放，沙王且战且走，在乌审旗一带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沙王走后，匪军打开王府，听说掘地三尺，又发了一次更大的横财。伊盟中学名义上是骑六师的供应站，实际上成了匪军官兵的公开赌场，吵嚷闹事，弄得鸡犬不宁。我看到这种混乱局面，感到非常危险，于是先把这些眷属作了安置，能走的走，能留的留，我自己也随后携眷避走榆林。

到榆林后，还不断听到事变的发展消息，听说乌审旗响应了札萨克旗，随着札萨克旗保安队的进入，也发动了事变，当天击毙了国民党派驻该旗的汉人特务三十多人。又听说，榆林邓宝珊总司令和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为了寻回沙王并平息伊盟动乱，曾派二十二军副官主任王公弼、总司令部参谋彭尔玉和蒙政会的代表任秉钧三人，前往乌审旗作安抚工作。以后又听说，当王公弼、彭尔玉、任秉钧到达乌审旗时，沙王已退入鄂托克旗境内，乌审旗保安队不受安抚，将王公弼打死。任秉钧，彭尔玉经过多次危险，勉强被释放回榆。

### 事变的结束

很长一个时期，人们找不到沙王停留的地方，只是听说战斗还在时断时续，直到秋天，才由傅作义的代表陈玉甲、胡宗南的代表连钟山找到了沙王。国民党反动政府眼看不能用武力压服蒙人，于是采取了缓和的欺骗办法。一面下令免去陈长捷的职务，停止开垦，一面派姚琮、楚明善二人由傅

傅作义陪同到伊盟慰问，发放了一批救济费，整修了王府，请回了沙王。

据以后陈玉甲对我说，他到札萨克旗时，傅作义就给他过密令，必须杀死鄂齐尔巴图和老瑞。可是当陈和沙王密议此事时，沙王很不同意杀鄂齐尔巴图。陈玉甲为了向傅作义交差，就和营长孙英年设计相机捕杀老瑞。但老瑞回旗以后，心存戒心，防范很严，一时不易下手。于是陈玉甲和孙英年又想办法诱杀老瑞，他们和老瑞故讨交情，尽力与他接近。但是老瑞依然存有戒心。平常来往，总是陈、孙去老瑞兵营的次数多，老瑞回访陈、孙很少。偶然来访，也要带很多卫兵，这也使陈、孙很难下手。

以后陈玉甲让孙英年全营士兵每天按时在老瑞的兵营附近演习，起初，老瑞紧闭营门不肯出来，并且有应变的准备。但日久天长，也就习以为常，提防之心也逐渐松懈下来。而陈、孙对老瑞则更加紧了来往过从。

一天，陈、孙以演习新机关枪为名，力邀老瑞参观。老瑞对这一邀请十分犹豫，左右为难。拒绝吧，怕失去多日的“交情”，出去吧，又怕有不测的危险，在为难之下，便带领了五六个亲信卫兵，出去观看演习。在轻机枪打完几梭子以后，大家赞不绝口，连称“好枪，好枪！”这时陈、孙二人便从旁怂恿老瑞亲自试打几发，老瑞在好枪的诱引下，不知是计，刚刚伏身下去时，背后预先布置下的四五个士兵，便把他按住缚了起来。老瑞所带的卫兵，每人后边有两个士兵持枪监视，一同被缚。老瑞就这样被害了。

# 伊盟事变乌审旗战役回忆

胡逢泰口述 宋海潮整理

一九四三年伊盟“三·二六”事变，是蒙古人民反抗陈长捷武装开垦的民族起义。国民党反动军队为了平复乌审旗事变，对乌审旗军民作了残酷的镇压。那时我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七师二十一团团长，在这次战役中作了帮凶。我曾为了自己的“前途”，在恐吓和安抚蒙民政策方面，在部队纪律和作战部署方面，耍了许多花招，以此欺骗蒙民，欺骗“层峰”，至今思之，犹觉赧颜，兹将战役经过追记于下。

## （一）乌审旗事变的原因及经过

一九四三年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之前，乌审旗西协理齐国贤已无辜被陈长捷杀害，当时乌审旗官民愤恨万分，但慑于陈长捷的淫威，不敢有所举动。“三·二六”事变时，乌审旗及时响应，在旗保安队奇金山队长指挥下，于旧历三月十一日拂晓也发动了事变。首先逮捕了保安司令部国民党特务人员和蒙汉官员中的坏分子，如上校副官长赵中周、中校秘书田汝楠等五十余人，随后将罪大恶极的赵中周等四十五人全部处死。按预定计划，先肃清内部奸细，然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时乌审旗的有利条件是：地形复杂，到处是沙哈拉、红柳林，没有固定道路及村庄。尤其缺乏饮水，外

来部队进攻，因地形不熟悉，没有不被消灭的（从前榆林军阀派到乌审旗镇压蒙民的几个连，曾被乌审旗保安队全部歼灭。）。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步兵新二十六师和骑七师二十一团，企图歼灭乌审旗保安队主力，前后经过十七天的战斗，终未能达到目的，这说明乌审旗保安队战斗力之强、韧性之大。

## （二）奉命开拔和战斗准备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上午九时，我正在后套（现称河套）狼山县永安堡集合全团官兵开国民月会的时候，忽见团部传令兵飞奔前来，报告说：“师长请团长接电话。”我让副团长主持开会，自己回团部接电话。朱巨林师长说：“伊盟老沙王受敌煽动，已经叛变，现在七旗不稳，你团今天准备，明天出发，先到杭锦旗桃力民集结，到达以后归新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指挥……。”我接电话以后，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研究部队出发准备事项，如携带人员、给养、服装、武器、弹药及马匹饲料、装备……，限令当天准备好，次日早晨部队出发，决定初次集合地点在杭锦旗“索口”。因为乌审旗正北有个乌审召，距“索口”约六十里，拟先占领乌审召，了解情况以后，再决定行动。

四月七日早晨，部队由永安堡出发，当日夜间宿营在惠德成。四月八日早晨，渡过黄河，以急行军速度兼程前进，夜间宿营在代庆召。经过两天的急行军到达杭锦庙，又继续行军三天到达桃力民。在桃力民东边某村（村名忘记），见到新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他简略介绍了伊盟“三·二六”



事变的原因及经过，继由该师吴参议详细说明札萨克旗、乌审旗事变的经过情况。当时决定，步兵新二十六师（欠一营又一营）及骑兵二十一团先到“索口”集中。这时发现各旗之间，鸡毛信传递不绝，蒙民们密言密语，人心不稳，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据传各旗的王公仕官，思想已经动摇，惟在行动方面还存着观望态度，观望乌审旗情况如何，是否能够顶得住，撑得下去。如果乌审旗利用复杂的地形，能够撑持下去，各旗就可以继续发动事变。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将乌审旗事变迅速平复下去，就可以制止住各旗再发生事变。这就说明事变的重心移到乌审旗方面来了。

四月十八日，骑二十一团到达“索口”。自七日部队由后套出发，行军已经十二天，部队人困马乏，只好暂时休整一下，并等待师长何文鼎及步兵二十六师的到来。在这里得知乌审召驻有乌审旗保安队两队，构筑工事，戒备甚严。当时我告知部队长：“乌审召不是能轻易占领的，先要打仗，官兵应有充分准备。”

何文鼎师长和步兵二十六师到来以后，会议情况如下：

（1）确定何文鼎为战斗总指挥，并兼步兵新二十六师指挥，胡逢泰为骑兵二十一团团长。

（2）任务和要求：拟先将乌审旗事变平复下去，早日恢复乌审旗正常秩序，这样伊盟各旗就不敢轻举妄动，事变不致扩大，否则伊盟各旗难免继续发生事变。

（3）对乌审旗境内情况和保安队作战方法的了解：在乌审旗作战困难很多，全旗地形多系沙哈拉，高一岭低一沟，遍地红柳林，没有固定道路及村庄，最容易迷失方向。尤其缺乏饮水，每隔八十里至一百里才有水井，人马行军作战时

饮水甚为困难，作战稍有不利，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乌审旗保安队作战方法，是正面软顶，两侧包围，善于隐藏伏击，打冷枪。步枪上装有三角架，射击准确，百发百中，在战术方面惯用机动游击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胜则包围歼灭，败则乘马而跑，不致处于被动地位。同时蒙民普遍组成游击队，处处伏击扰乱。

(4) 我军采用的战法：何文鼎说，“这次作战，我们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捕歼乌审旗保安队主力。对蒙民采取威胁利诱方法，一面威吓，一面安抚慰问，使他们不继续作乱。”

### (三) 骑二十一团采取的措施和作战策略

#### (1) 雇用向导和调配指北针：

乌审旗地形复杂，容易迷失方向，行军作战，不能依道路前进，须依方向前进，这就需要调配指北针，使每连、排、班至少要有一个指北针，借以辨认方位。

团部及连排，均在“索口”雇用会说蒙古语的汉人作向导，多花钱雇用，要他们自始至终追随部队行动，不要随便更换。利用这些人当翻译、领道路、指方向、宣传政策，并作纪律好坏的证明人。在宣传政策方面，利用他们会说蒙古话对蒙民说明：“安分守己、安居乐业者安抚慰问，顽固反抗者严惩不贷。”

#### (2) 严饬官兵守纪律：

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害怕部队纪律不良会遭杀头处分，再三宣布违犯纪律者军法从事，决不姑宽。

### (3) 战法上不采取常规战法：

针对乌审旗的特殊情况，我们作战行动不能按道路前进，要按方向前进。前进队形也不能按常规的行军纵队，派什么前卫、前兵、尖兵、斥候，及侧卫、后卫等警戒部队；所以部队行动，应变行军纵队为横广形，全团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之间相距三四百公尺，以能互相看见联络为主，全团四个连，每连十个班，横正面约达三十华里，用这种横广队形搜索前进。基准连树立大红旗一面，各连不得脱离基准连，遇有情况，各连、排、班，都向发生枪声的地点包围。重武器机关枪、迫击炮归团长掌握。以这种横广队形搜索前进，可以防止保安队、游击队的伏击、奇袭，使他们熟悉地形、惯于伏击、奇袭、打冷枪等长处受到削弱。

战斗发生的时候，一方面积极战斗，一方面利用会说蒙古话的向导喊话，如：“蒙汉一家人，放下武器不要命……。”俘获保安队和游击队人员时，由我们连、排长讲话，说明我们都是中国人，蒙汉是兄弟民族，共同打日本敌人，这次事变谁是谁非，中央是会依法处理的，请他们给奇玉山司令送信，让他迅速回来，保证既往不咎……。讲话以后，立刻遣散。

### (4) 对全团官兵讲话：

“这次部队到乌审旗的任务，是将乌审旗事变迅速平复下去，恢复正常秩序，全团官兵思想上要认清：蒙汉是兄弟民族，是一家人，都是抗日的。这次事变是少数人‘闹家务’，很快的就会解决。我们在战斗中如何表现出是‘闹家务’而不是对待敌人呢？就要在纪律上表现出来。必须遵守纪律，秋毫无犯。对于俘虏不准搜腰包，由连排长讲话以后，立即遣散。否则就是破坏抗战，破坏民族团结，要以军法惩处。”

当时我还给部队做了一个比喻说：“一家人因为抗战的关系，父母远处在后方，前方家中留有小弟妹，现在他们闹起家务来，父母让哥哥处理，哥哥处理有三个办法。第一，是一面吓唬，一面劝慰，使弟妹和好起来，这样父母喜欢，弟妹和好。第二，是将弟妹痛打一顿，不让他们闹家务，这样不但父母不喜欢，哥哥和弟妹间也留下裂痕。第三，是哥哥趁弟妹闹家务的机会，大捞一把，抢劫弟妹的东西，这样不但要受父母的责难，还要落下骂名。我们现在当然要采取第一种办法，一方面吓唬，另一方面安慰。如果有人采用第三种办法，想借机抢劫东西，那就要受到军法制裁，先斩后奏，决不姑息，希望大家勿以身试法……。”

#### （四）战 斗 经 过

战斗由四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五月十七日结束，前后经过十七天，兹逐日叙述如下：

四月二十一日晨，步骑联合由“索口”出发，向乌审召前进，在行军的一天中，未遇见情况。下午五时许到达乌审召附近，步兵先头部队发生战斗，激战约十五分钟，尖兵排长受伤，阵亡士兵二名、受伤者甚多。此时何文鼎师长让我派骑兵两连向侧后迂回，占领乌审召，准备今夜在乌审召宿营，否则今夜还无宿营地点。我遵命派骑兵两连从西边迂回包围，经过短时间的激战，保安队撤退，部队遂占领乌审召，当夜在乌审召宿营，并得知情况如下：

乌审旗保安队原拟在乌审召防御两天，将国民党军困在缺水、缺粮的沙哈拉地带，饥饿疲劳以后，再诱使前进二百

余里到无水地区，空室清野，歼灭国民党军。但战斗不久，即被击退，这是保安队始料所不及的。

四月二十二日，何文鼎命令部队在乌审召休整一天。这一天我在召内巡视，发现二十六师部队，翻箱倒柜，抢劫东西、破坏门窗、打毁神像、剥去神像身上衣服，纪律之坏，不堪言状。这种事情虽然是步兵作的（新二十六师原系陕西杂牌部队编成，纪律不良。），但是骑兵驻在这里，我害怕事后泾渭难分，背上黑锅，上级处分时无法分辩，于是召开排长以上军官会议，约法三章，我说：这次作战无论任何人不得拿老乡一针一线，否则就地正法；明早出发以前，必须将驻地打扫干净，借物归还，损物赔偿，烧柴和马草，按价付款。在部队集合前，让向导翻译领上喇嘛，检查住室是否短少东西，宁可迟集合也得弄清楚。这样检查还不算，在部队集合后，官兵都得将衣服解开，将自己携带物品摆在前面，仍让向导领上喇嘛检查，看看有无他们的物品。蒙民和喇嘛用的东西和穿的衣服，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用的东西是刀、勺、木碗，穿的是红、黄、紫色的，这些东西和衣服官兵都没有，一目了然，很好检查，让向导和喇嘛看个明白，以便将来作证明。今后无论住在召庙或老乡家中，都照这个办法检查，这样事后我们骑兵就不背黑锅，向导也能给我们作证明。这样做并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我个人害怕受到杀头处分，以此欺骗人民，欺骗上级。

四月二十三日晨，部队奉命向乌审召以南一百余里的梅令庙前进，因为梅令庙驻有新二十六师一个营，事变以后失掉联系。部队先向梅令庙前进，拟和这个营会合以后，了解情况。但在百里之内全系沙哈拉，没有人烟、没有水井，部队

吃饭休息就在沙漠内自掘水井找水喝，吃自己携带的干粮。下午黄昏时到达梅令庙，得知情况如下：

根据驻梅令庙新二十六师营长报告：乌审旗事变发动后，保安队对梅令庙攻打过两次，我营据庙抵抗，集中六零迫击炮射击，将其击退，他们目前主力退到何处，尚不明了。何文鼎问：“你们为什么不来报告？”营长说：“前后派出八个传令兵向师部团部送报告，都被蒙民游击队捕获杀害，现在单人不能行走，因为蒙民普遍组织起来，组成若干游击队，到处伏击、打冷枪，捕杀行人。”

何文鼎根据情况召集部队长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当时决定，电令驻札萨克旗王府的新二十六师岳团于四月二十五日出发，由东向西扫荡，向梅令庙前进；总指挥部率二十六师两个团及骑兵二十一团，于四月二十五日出发，由西向东扫荡，向札萨克王府前进，先将伊盟东西各旗隔离开，使他们不能联络，不能互通消息。如在途中遇到沙王，劝他回旗，事变就容易解决了（实际沙王此时已向鄂托克旗阿拉庙走去）。

在扫荡途中，我们对待蒙民之办法是软硬兼施。对安分守己未逃避的蒙民，给予安抚，但还要吓唬他们，使其知所戒惧。遇到已经逃走无人居住的房屋和蒙古包，立即破坏烧毁，给以膺惩，使其不敢再作乱。

四月二十五日晨，部队由梅令庙出发，骑兵在前，步兵在后，经过的地方，凡是蒙民已经逃走无人居住的房屋和蒙古包，都被破坏和烧毁。但在当日晚间宿营汇报情况时，大家认为这种办法不恰当，因为既要招抚蒙民安居乐业，不参加变乱，而又将他们的房屋烧毁，让他们回来如何安居呢？

因此决定自明天起，不论蒙民在家与否，一律不准破坏和烧毁，完全改为安抚政策。

四月二十六日，骑兵在前，横正面搜索前进，各连都遇有情况，有的遇到十几个，有的遇到几十个，都是蒙民游击队，当即被包围缴械。所缴枪支多系老毛瑟、套筒、土枪等。对俘虏人员讲话以后，立即遣散。马匹低小不合军用者，仍让他们骑去。

在前进中，为预防蒙民游击队在沙哈拉、红柳中伏击和奇袭，预先规定：遇有复杂地形，不管其中有无潜伏的敌人，先用轻机关枪盲目扫射一阵（携带子弹充足）。在这样盲目扫射之下，果然将潜伏在沙哈拉、红柳中的游击队打的跑出来了。据俘虏回来的蒙民谈，他们认为国民党军有反光镜，可以照见沙哈拉、红柳内的人员，这是受盲目射击后的猜想。

四月二十七日，部队仍然用广正面队形搜索前进，在复杂地形中遇到的潜伏游击队，有的坚持抵抗，有的机动游击，还有的因为自己衣服的颜色和沙漠不同，就把衣服脱掉，光着屁股爬在沙漠中，作为他们隐藏的保护色，坚决战斗。这一天虽然把一部分游击队缴了械，但乌审旗保安队的主力还没有遇见。

本日正前进途中，遇上新二十六师岳团，正向西扫荡前进，何文鼎问明情况后，仍令岳团按原计划向梅令庙扫荡前进，他率步骑兵仍向札萨克旗王府扫荡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部队以广正面队形向东搜索前进，途中未遇到情况，顺利到达札萨克旗王府。在四天的行军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维持部队纪律，原来规定的部队打尖、宿

营所用的柴草，都要按规定付价，但这四天所过的地方，人民都逃避一空，无法付价，以后应如何办呢？经过研究，认为在老乡家中留下钱，会被别人拿走，最后决定在老乡家中留下欠款条，写明用柴若干、用草若干、应付款若干，在事变平复以后，凭条到骑七师二十一团取款，将字条贴在墙上，使老乡容易看见。

四月二十九日，部队由札萨克旗王府向西返回，经过四天的行程到达梅令庙。在这四天中，部队所用的柴草遇见家中无人时，都留下欠款条子，实际上这是沽名钓誉欺骗老乡的办法，战后没有一个老乡到部队取欠款。只是搪塞上级，欺骗人民。

五月二日，回到梅令庙宿营。此时有人向何文鼎反映：多日以来骑兵纪律较好，步兵纪律不好。何为了维持纪律拟抓一个典型，杀一警百，以整军纪，恰在他出去巡视时，正遇上二十六师一位排长拉着老乡的一只羊，何文鼎喝令逮捕，怒气冲冲的要枪毙。许多幕僚人员求情都不允，一位参谋来请我去求情，我很为难，但又不能不去。见了何后，他怒气还未息，我说：“某排长违犯纪律，罪有应得，应把他送到军法处法办，师长不必亲自枪毙他。”在我说话以后，何怒气稍息，他说：“看在胡团长面上将他送军法处法办。”这是何文鼎惩办步兵要骑兵来看，以证明他不是不注意军纪。

五月三日晨，部队由梅令庙出发，向西前进，途中未遇到大的情况，但打冷枪的很多，子弹由沙岭和红柳林中不断飞来，经过搜索又找不到一个人，就这样被冷枪打死打伤十几个士兵。



五月四日，途中打冷枪的更多，我和团部向导刘虎羔正并肩行进中，一颗子弹突然飞来，擦伤刘虎羔脖颈的皮肤，他虽未受大伤，但危险极了。为了不迟滞行军速度，我命令部队勇往前进，不要怕冷枪子弹打死打伤。本日得到情况是：乌审旗保安队主力拟在王府附近和我军决战。我们在夜间汇报情况时，研究了明天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准备明天战斗。

五月五日晨，部队出发，步骑并进，步兵靠左，骑兵靠右，预计本日行程超过王府，部队一律不住王府，步兵进到王府西南地区宿营，骑兵进到西北地区宿营。本日骑兵前进队形，以连为单位集中使用，以两连为第一线，另两连为第二线，预先规定，遇上保安队主力，第一线连立刻乘马冲锋，第二线连两翼迂回包围，使保安队措手不及，没有还手机会。果然在前进中约距王府二十多里的险要地点，遇上保安队主力据险阻击，发生了战斗，骑兵第一线连立刻冲锋，第二线连由两翼迂回包围，经过激烈战斗，保安队官兵虽然奋不顾身，英勇战斗，终因武器不良、众寡悬殊，伤亡甚重，不支撤退。他们下马徒步战，没有牵马的人，将马拴在附近树上，情况不利时即乘马而跑。当时看见他们撤退的方向是分两股，一股向正西退走，一股向西南退走。步骑兵追至王府以西到达预定宿营地点，停止前进。下午何文鼎在王府召开会议，他害怕部队纪律不好，驻在王府会发生破坏抢劫的事情，为了免得再蹈沙王府掘地三尺的复辙，因此规定部队一律不驻王府。当时有人提议说，王府不驻部队，如果夜间有人偷窃王府东西，何人负责呢？于是何文鼎决定令我派一连人驻在王府，我很为难，不得已派一连住在王府，将大小

房门封锁，派卫兵守卫，这样算是维持了王府秩序，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五月六日，部队继续向西前进，行至两座大沙岭地点，何文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给步骑兵各划一个大圆圈搜索，准备夜间宿营。部队为什么在此停止不西进呢？据何文鼎说：“乌审旗东西部仇恨很大，向来是不合作的，现在部队继续西进，反使乌审旗东西部合作起来，因此暂时停止西进，观察情况以后，再决定行动。”

本日下午，我在沙岭上视察，发现沙岭下有一个村庄，用望远镜细看，又发现村内有人马行动，我拟派部队到村内搜索，但一考虑部队如由大沙岭正面下去，恐遭村内伏兵腰击，于是决定令部队由大沙岭两侧绕下。又鉴于绕行道路太远，不得已集中全团八二迫击炮从沙岭上向村庄周围射击，实行威力搜索。正射击间，看见村内出来一伙人马约数十人，秩序很整齐的乘马向北走去，我令部队立刻向村庄前进，随后我已赶到村内，向两位老乡询问情况，才知道刚才出走的一伙人，正是奇玉山和他的嫂子、小王爷及仕官卫士等。此时我喜出望外，认为打了十几天，今天才知道护理札萨克、保安司令奇玉山的行踪。我问老乡：“他们到哪里去？”据说，他们先到正北二十多里一个亲戚家暂住，如果我们部队继续西进，他们就拟出走鄂托克旗。我听了以后，立即领上两位老乡见何文鼎，说明情况以后，何也非常欢喜，并说：“我和奇玉山是盟兄弟，我给他写封信，请他回来。”当时就写了信，大意是：希望他迅速回来，愿以身家性命保他无事，如迟误拖延，我们就要进军等语。信写妥后交给两位老乡送去，部队即在原地宿营，等候消息。

五月七日上午，奇玉山自己来了，和何文鼎见面以后，说他是被人煽动，误听谣言，传说陈长捷要杀尽蒙古人，因此才发动事变。何文鼎安慰他许多话，力保他无事，请他写信派人去接小王爷和眷属等回来。奇玉山当天住在何文鼎的指挥部，等待翌日一同回王府安置。

五月八日，何文鼎偕同奇玉山等一同回到王府，何文鼎请奇玉山安置，谁该住那里就住那里，损坏的地方即刻修理，逐渐恢复了王府秩序。

五月九日，何文鼎请奇玉山下命令，让保安部队各回驻原处，仕官们各执行职务，蒙民们各回家中，就这样平复了事变，恢复了乌审旗秩序。何文鼎电报傅作义及有关方面说：乌审旗事变已经平复，奇玉山等已经回到王府，一切秩序恢复了正常。

本日我请示何文鼎说：“骑兵驻在乌审旗，缺乏草料，如何处理？”何即电傅作义请示，傅复电说：“骑七师由朱巨林师长率领，已经渡过黄河，现驻伊盟公尼召，令骑二十一团胡逢泰部，开往公尼召归还建制。”

### （五）任务完成归还建制

五月十日，我辞别何文鼎、奇玉山等，率部向公尼召前进，当日宿营在班禅召。五月十一日继续行军，夜间宿营在泊尔都庙。五月十二日到白彦不拉，此时马匹已能放青，可吃半饱。我到公尼召向朱巨林师长报告了由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七日作战经过。伊盟“三·二六”事变告一段落后，骑七师师长朱巨林被撤职。原因是攻占札萨克旗王府的骑兵二

十团团长贺迪光，是朱的军校六期同学，原在天水骑兵学校充马术教官。朱接任骑七师师长后为培养私人力量，特调贺任二十团团长。贺率部进占札萨克旗王府后，烧杀抢劫，甚于土匪，王府内悉被挖掘，有深及黄泉者，纪律之坏，不堪言状。国民党中央逼于舆论，曾下令将贺迪光扣押，听候法办。朱巨林先将他扣押，后又私行放走，伪称潜逃。国民党军互相拉拢、互相包庇的情形，由此可见一般。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乌审旗指定要二十一团驻防该旗，其他部队不要。继任师长张绍成即派骑二十一团驻防乌审旗，一直驻到骑七师调往甘肃整训时才离开。

以上所述，因为事隔多年，遗漏错误在所难免，希望知者予以订正补充。

## 记忆中的老瑞排长

徐伯毅

札旗事变的枪声驱散了蒙旗四周的阴霾，划破了西北长空的沉寂；它是伊盟广大蒙胞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吼声，它在蒙旗人民革命的史册中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那天，天临破晓；我也被枪声震醒。继枪声之后，又听到院内院外有好多人走动的脚步声。我披衣急出，才知道院内已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战士，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和同院住的几个同事便被“护送”到札萨召——国民党绥蒙党部所在地。

绥蒙党部距离我的住所不过百余步。我的住所是札旗民众日报社的职员宿舍，因为那时札旗民众日报社已合并到绥蒙党部内，成了绥蒙党部的宣传科。我服务于该报社，当然也是绥蒙党部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被护送到这里来。

绥蒙党部院内已排好了一长串人。天开始蒙蒙亮了，我辨识得出长串内的人都是绥蒙党部的工作人员，站在最前头的是书记长赵城璧。我排在长串的末尾，低声问旁边的人：

“什么事？”使我很失望，他们原来和我一样——不知道！

早饭时间，我们被“护送”到距札萨召约十里的蒙政会。很出人意料，蒙政会的秩序和往常也差不了多少，只能听到远处有稀疏的枪声。我们陆续进入礼堂内，只有赵城璧被截留在大门外。

大家都好象被眼前一连串的事实搅糊涂了，又都好象深知别人和自己都还不是彼此彼此。因之，虽然都是站在礼堂里，却都低着头，默默不语。偶尔也有人抬起头来扫视一下，但当双方的眼光碰到一起时，却又不约而同地恢复了原样——脸向着地下。

突然从外边走进三个人来，大家的视线很快地集中到他们身上。三个人中，胡凤山和赵城璧是大伙所熟识的，另一位身着军服的却很陌生。

这位一身军服的人，一进门就开始讲话，似乎他有好多话装在肚子里，在外边没来得及讲。他讲话时，面对着赵城璧，同时也对着我们一伙。讲话的声音好象金石，铮铮作响。他慷慨陈辞，好象发出了连续不断的炮弹。他的话吸引了所有的人，全场没有一点儿声息。我注意到他：中等身材，腰挂一支匣子枪，面庞稍显瘦削，但眼神四射，看得出他是一个智慧极高魄力过人的人。在他讲话的时候，只见站在他对面的赵城璧不断首肯，同时也有低低的“佳！佳！”声。我很生气自己没早学点蒙语，以一聆这诗歌般的讲词内容。迫切的心情，促使我在讲话刚结束，便立即请教于胡凤山，才知道这位身穿军服讲话的是老瑞排长。讲话的内容大致是：

我们蒙旗人民所赖以生存的是畜牧业，牲畜得以繁息的是牧地。道理很明白，尽人皆知。现在陈长捷（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不顾蒙旗人民的意愿，一意孤行，夺垦草地，这等于切断我们生活的源泉，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不能静静地待死，我们应该立刻起来反抗！有人心的人，谁能不同情我们这样做？你（指赵城璧）是蒙旗人，对蒙旗人民的疾苦，了解得更为清楚透彻，只要你能替蒙旗人民想一想今后

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就会站在我们一边来……。

我恍然了。我同情这位排长，我钦敬这位排长。

过了不几日，陈长捷派骑七师攻占了札旗，听说这位排长随着撤离的沙王到乌审旗了。

半年以后，沙王重返札旗。傅作义派驻了一连兵在蒙政会。

忽然一天下午，传来了傅作义驻军枪杀老瑞排长的不幸消息。

老瑞排长在随着沙王回到札旗后，带领着他的战友驻在沙王府附近。为了避免和傅作义驻军发生意外纠纷，他从不轻许部属外出，当然，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了。但傅作义的驻军是奉命来杀害老瑞排长的，这样却斩断了他们觅取机会的线索。于是他们（傅作义驻军）不得不出计谋、想办法，也用过搭台唱戏、文娱会演等等手段，企图诱老瑞排长和他的部属离开自己的寨垒，但伎俩虽多，终未得逞。过了多时，傅作义驻军见计不得逞，又另耍了一个花招：以野外演习机枪射击为名，邀请老瑞排长和他的部属参观。老瑞排长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果然中了他们的好计。

老瑞排长牺牲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的英雄形象，还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中。他慷慨陈辞的声音，只要回忆起，还经常敲击着我的耳膜。我为蒙旗失掉这样一位先驱者表示惋惜。

# 陈长捷“有请”

——兼记罗聘卿之死——

徐伯毅

札旗事变后，陈长捷派遣骑七师攻占了蒙政会和沙王府，札旗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眷属，多数避难于距蒙政会约二十里的再生召（伊盟中学的校址）。这时谣言丛起，人各自危，再生召的四周，已成了无形的禁地。困居在再生召一隅的好多人，终日相对如“楚囚”。这样的岁月，着实难熬啊！一天，我苦坐无聊，信步走到罗聘卿（永庆）屋里。万分不巧，刚坐下来，突地一个工勤很慌张地跑进来说：“东胜陈司令派人请……”话音没落，就有十多个凶气满脸的武装士兵闯了进来。我俩睹此，不禁都为之愕然。幸好走在最头前的一个作了一番自我介绍，说他是东胜警备总司令部的科长，奉陈总司令的命令来请罗委员的。之后，便问：“哪位是罗聘卿委员？”罗聘卿向他打了招呼。我不便久留，遂退了出来。使我不能不怀疑的是罗聘卿的门口，在我走出来时，已站了两个岗哨，一边一个。但继而又自作解释：罗聘卿可能是陈长捷的座上客，所以这些奉命来请的就不能不严阵以待了。想到这里，对自己起先的怀疑又觉好笑起来。在我边走边胡思乱想之际，背后罗聘卿托人追来，让我代他准备些路上的必需用品，如干粮、川资等。我刚走几步，又



有一个人追上来说：“罗委员告诉，不必替他准备了！”前后如此不同，但这倒并没引起我惊疑，我当时这样想，既是陈司令请，当然陈司令对此会有周到的准备。谁知做梦也没想到，刽子手陈长捷给他准备的竟是坟墓！

罗聘卿走后多时，杳无音信。询诸东胜的来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不但没见到罗聘卿的面，连罗聘卿到东胜的消息也没听说过。这岂不是活见了鬼！明明从这垦请到东胜的，而且还相随着一个工勤，怎会一齐没了踪影呢？大家都在猜谜，但真相究竟如何，有谁能知道呢？

谜底终于揭开了。

罗聘卿被劫持出再生召后，向东行约五六十里，至一大水潭边，这些如狼似虎的请客使者一齐围拥上来，拔出手枪大声喝令下马。罗聘卿应请前来，也觉察到来者不善，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想到会在这儿出此一着。他要这些不速之客容许他到东胜见了陈司令请得“罪状”，再行处理，他说：

“我犯了什么罪，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岂不是千古未闻的事！而且纵然我犯了罪，也应当有法律的判决，不能这样草率马虎，须知人命关天啊！”那些人对他说的话都表示不值得理睬的样子，但都没有吭声。还是那位科长开了口：“哼！哪有时间和你开讨论会！法律还不是人定出来的。我们陈总司令指示我们杀你，在路上杀你！我们只知道总司令的命令就是法律，天下再没有其他的法律！”说到这里，把臂一挥，只听到“砰砰”两声，罗聘卿应声倒下。另一个还怕他没死，又对准头部射了两枪。这伙强盗枪杀了罗聘卿以后，几个人匆忙地掩埋尸体，另几个人把躲在一边惊成“木鸡”的工勤，喊过来威吓他道：“本来也应当

送你和罗聘卿一道回老家，念你年纪很轻，暂饶你不死！但有一件事要牢记：赶快回你的家，罗聘卿的事，不许泄露一字。要有些风吹草动，传到我们耳朵里，那你可就活够了！滚罢！”这个工勤得了命，脚不点地的直奔家中，到家后，好多时才定下神来。这场惊骇，着实非同小可——一场伤寒病，炕上整整躺了三个月。病前病后，对罗聘卿的惨死，连牙角缝也从没敢挤出半个字来。这边不敢说，那边没人说，所以这个消息一直封闭了好多时。

陈长捷和罗聘卿从未见过面，有什么过不去的，使陈长捷下这样的毒手呢？原来是札旗事变后，傅作义曾电陈长捷申斥他办事操切，激起民变。陈长捷接到电文，不禁怒火冲天，但思前想后，只有“徒唤奈何”。后来探知傅作义所据以申斥他的材料是罗聘卿反映的，遂把“奈何”搁起，一径冲向罗聘卿来，要让罗聘卿看看他的手段！

东胜的“陈记杀坊”是远近驰名的，从开张以来，四方无辜遭戮的每年何止数十百个！不过困居在再生召的这一伙，以往只是闻名罢了，在罗聘卿亲试了他的刀锋以后，谁能不在愤怒之外，又增添几分恐惧呢？就在这时，平时爱开玩笑的人，有时一见面冷不防就来个“陈长捷有请！”听到的人虽知这是戏谑，但也往往在听到后为之一怔。就因为如此，人们也就越发讲得惯常了。

我知道中国有不少地方做母亲的，当她的小孩子顽皮不听管束时，她会吓唬她的孩子说：“马虎来了！”这是多少年来人们听惯了的词句，不想竟又找到比它分量更重的同义词！

## 伊盟事变侧闻点滴

许如

### (一)

伊盟事变期间，我在榆林，从侧面也知道一些情况，兹追记如下：

抗战初期，蒋介石无端生事，硬把成吉思汗陵寝由伊金霍洛劫走，沙王即伤心痛哭，怨愤不止。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的伊金霍洛，蒙族人民一向视为圣地，附近荒地，不准开垦，早已悬为厉禁，所以一般称为“禁地”。陈长捷这个屠夫，为了邀功图赏，不顾一切，竟要武装开荒，多至万顷，连沙王的祖坟地和伊金霍洛的“禁地”也不例外。这真是赶尽杀绝，欺人太甚。从劫走“成陵”到逼开“禁地”，真是忍无可忍了。所以一向老诚持重的沙王，此时也就不再进行武装反抗了。

当劫走“成陵”时，绥西、伊盟、包头滩上和陕北榆林这一带的国民党蒙汉高级将领如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白海风等，都认为是多此一举。陈长捷在伊盟大举垦荒时，傅主张勿过于操切，邓主张息事宁人。及至伊盟事变爆发，傅、邓当时都不愿事态扩大。邓曾电劝陈勿进兵，陈复电态度傲慢，并称可以“不日敕平”云云。不想没有多久，札、乌两旗保安队奋起反抗，予陈部匪军以重创，各方面对陈亦加以谴责，陈便前倨后恭，急电傅、邓乞援。陈致邓电乃称

邓为“钩座”，连电请设法斡旋。这时候，沙王府已被掘地数尺、破坏不堪，当地蒙汉人民被国民党匪军抢劫一空，贺耆寿等多人已被陈长捷杀害，沙王也出走乌审旗。伊盟事变，震动全国，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蒙古民族的罪恶活动完全暴露出来了。何以善其后呢？总得遮掩一下吧，于是先有榆林方面派人到乌审旗的试探，后有陕坝方面派人追踪沙王等等的威胁利诱举动。

榆林方面派往乌审旗受伤毙命的王公弼，是高双成的亲信副官，这个高双成下面的“红人”，同沙王下面的白音仓是一流人物。就在白音仓从榆林返回札旗丧命的前夕，我亲眼看见他还同王公弼在一起，不知搞过什么鬼。王公弼同彭尔玉、任秉钧到了乌审旗，乌旗保安队也没有要王公弼命的意图，只是因为保安队进屋盘问时，王公弼向来作威作福惯了，坐在那里向后移动，有掏手枪的模样，所以才被击数枪，抬返榆林的途中不治而死。彭尔玉当时木然坐定，一言未发，任秉钧是土默特旗蒙古人，会蒙语，经过解释，疑虑顿消，所以彭、任二人安然无恙。

沙王是傅作义在抗战前夕为与德王对抗而一手捧出来的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抗战期间，伊盟与日寇占领的包头仅一河之隔，既是陕北榆林的前卫，又是绥西陕坝的侧背，地位相当重要，因此，不论陕坝的傅作义，或是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都需要有沙王在伊盟支持他们。即便把沙王当成个牌位，也能欺骗蒙汉人民于一时。伊盟事变一发生，沙王一走，欺骗的花招使不成了，这对反动派是不利的。特别是傅作义，多年来手上的一张王牌不见了，更为着急，所以才千方百计，一定要把沙王请回来。但傅对首义的老瑞排长是

放不过去的，必欲杀之而后快（说不定也许是蒋介石授意的）。当傅同楚明善等到达札旗时，即欲下手，后来看见大乱之后，人们余恨尚在，怕又闹出乱子来，所以才给了陈玉甲一纸密令，定要杀害老瑞。善良的人们，对于披上羊皮的豺狼剥去了羊皮后也还不易认清。老瑞的牺牲就是吃了这个亏。

## （二）

荒凉偏僻的伊克昭盟，为什么在抗战时期骤然显得非常重要呢？对日寇的斗争当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西北各省的军阀，把它当作包围陕甘宁边区和限制共产党发展的一个战略地区。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伊盟事变还在发展中，由于沙王受到党和边区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礼遇，西安的胡宗南、兰州的朱绍良和宁夏的马鸿逵，都无中生有地说：

“共产党要打通国际路线，企图占领伊盟。舍今不图，后果难测”等等，建议蒋介石下令“会剿”。一天蒋介石的官邸军事会报，刚抵重庆的邓宝珊和孙蔚如亦被邀参加，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之辈都出席了。蒋介石把胡宗南、朱绍良、马鸿逵等来电内容向众说明后，征询他们的意见，一时无人作声。蒋催促再再，大家仍默然无语。后来，还是徐永昌打破了僵局，他冷静缓慢好象无动于衷地说了一句：“傅宜生（作义）熟悉那边的情况，先问问他吧。”蒋介石颌首唔唔，遂即散会吃饭。由此可见，伊盟事变固然是陈长捷一手造成，而借口反共则依然是合乎蒋介石的心意的。

陈长捷，这个伊盟事变的祸首，是怎样和傅作义勾搭在

一起的，这里不妨介绍一下：

原来陈长捷发迹于山西，在晋军中素有“陈小鬼”之称，据说他“治军作战较有一套”。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混战时，陈任李生达的三十六师的旅长，属津浦线上傅作义的第二路总指挥部指挥，在一批庸碌的“败军之将”中，他当时是略有“建树”的佼佼者，以此受知于傅作义。抗战中，他在阎锡山的提拔下屡有擢升，由师长，军长一直升到集团军总司令，但终以飞扬跋扈，私通“中央”，被阎锡山撵出山西，一下成了光杆将军，困处重庆，一筹莫展。当时，摆脱阎锡山束缚而独树一帜、建鑫峡坝的傅作义，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和阎锡山要劲，“闽材（陈长捷系福建人）晋不用”、“晋将绥吸收”（在陈长捷前即有鲁英麟、朱大纯、陈光斗等由山西转到绥西），于是本着其一向爱“烧冷炕”的作风，保举陈为伊盟警备总司令。在傅作义方面，以为陈已经过挫折，多少总要收敛点，何况“我举之于铩羽之际，岂有不绝对服从我之理。”在陈长捷这方面，以为既因与“中央”勾搭而丢掉兵权，安知再进一步勾搭而不能重掌兵权。因此他就任伊盟警备总司令后，表面虽应付傅作义，却不完全听从傅作义了。伊盟事变中，陈与傅的关系，可作如是观。

#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的片断回忆

范 辚 五

## (一)

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伊盟“三·二六”事变已基本结束。国民党骑七师二十团在受到严重损失后，驻在札萨克旗王府，名义上进行整训，实际上是在王府继续挖掘财物。据我所知，骑七师二十团团部有一个姓任的副官，在此期间就发了洋财，并化了大量的财礼搞了个老婆，除他卖掉物品之外，家中还有不少东西。据说他娶老婆的时候，在表面能看见的东西就有四六栽绒毯子两块、缎被褥三床、较好的大皮袄两件，还有银碗四个。此外，元宝、白洋、烟土不知有多少。在当时发这样洋财的人，当然不仅是任副官一个。不要说别人，我这最后去的，还托二十团第一连李连长给搞了一床缎子被面。

当事变结束后，各地在陈长捷的指示下，都在开垦牧场。“昌汉庙”的开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昌汉庙”是郡王旗辖区的一个召庙，位于郡王旗王府南约五华里，庙前的牧场面积约有三——五平方公里，土地肥沃而平坦，靠东南角有水滩，真可称为水草兼备的好牧场。在这里放牧的牲畜，包括王府、“昌汉庙”及其附近上百户牧民的畜群。有几万

头牲畜是专靠这片牧场生活的。就在这种情况下，陈长捷要强夺牧民这块土地。陈长捷还召集东胜附近的地主当“地把头”，另由“地把头”再召集农民自带牛犂到“昌汉庙”去开垦。有牛犂的大多是“地把头”的亲戚朋友。与“地把头”没有关系的农民老乡，即便想去也不可能。为什么农民想去那里种地呢？因为土地肥沃能多打粮，不只是当年能得利，根据一般情况，一年辛苦能连续丰收好几年。于是想去“昌汉庙”开垦的农民，就到处找门路、行贿、送礼。

当时牧民对陈长捷强迫开垦牧场是极为反对的。为此，郡王旗的保安队就集中在王府，加以戒备。陈长捷为了保护“地把头”的开垦和威胁牧民群众，就派机枪连驻在“昌汉庙”。名义上去的是一连，实际上仅有官兵二十余名，步枪十余支。当时看到郡王府保安队一集中，其力量要好几倍，于是陈长捷又调兵前来。这次所调来的就是我所带的工兵连。工兵连是骑七师司令部的一个直属连。当时驻在河套百川堡。师部接到调令后，就令我连克日起程，速去东胜。工兵连的人数仅有一百八十名，不能满足陈长捷的要求，于是又在第十九团第三连抽调一部，共计二百五十人左右，限三天到东胜。工兵连接限定日期到达东胜后，我就到陈长捷的司令部参谋处去请示命令。当时参谋处负责人概括给我介绍了“昌汉庙”的情况，并令即时出发，当日必须赶到“昌汉庙”。

## （二）

我连在“昌汉庙”驻了一部分，大部住的是牧民房屋。



当时“昌汉庙”一带还驻了很多骑兵。在“昌汉庙”指挥部的是陈长捷的一个姓康的参谋。据康参谋谈：“现因我们在此开垦，当地牧民有些反抗，同时郡王旗的保安队都集中驻在王府，我们这里所驻的机枪连，因大部兵力还在执行其他任务，一时还不能调回，这里兵力较少，蒙旗保安队如有所行动，我们就无力抵抗，因此调你连来此，主要任务是，对王府保安队进行严密警戒，同时要保证在此地开荒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彼此交换意见后，因当日天色已晚，遂决定人马休息，夜间并对王府方向注意警戒。明日再侦察地形，构筑工事。

次日早，康参谋同机枪连董连长前来找我，准备出去侦察地形，我随即召集各排排长一同前往。上午将地形侦察完毕，下午即令各排按分配地段构筑工事，当时因土质坚硬，锹镐失效，于是就利用爆破来炸山头。在“昌汉庙”以北约一华里，东西长约五华里的山地上，用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经过爆破，构筑了工事。并用连天炮火，威胁蒙民。

### (三)

国民党骑七师二十团在“三·二六”事变战斗中的损失和抢劫民财的实况，据我所知，大体如下：

在此次战斗中，骑七师虽有一团之众，其兵力要大于蒙旗保安队兵力的几倍，它的装备也比对方好得多。为什么它还受到严重伤亡呢？其原因是：蒙旗保安队人数虽少，但是地形熟悉，枪打得准，百发百中，每个人都有不放空枪的本领。战后该团有一位郭排长对我说：“唉哟！蒙古人真不好打，比打日本鬼子还费劲，他不给你正面干，都是三人一

群，五人一伙，甚至一两个人隐蔽在沙柳林子里边和你干。我们不要说大队行动了，就是小到一班人也运动不开。他妈的！简直不能露头，一暴露目标，不知由什么地方就是砰的一枪，这一枪起码得伤亡一个。特别是轻机枪手，就不敢连续发射，一连发，很快就会暴露目标。我连阵亡的轻机枪手十有八九都是被冷枪打死的。同时在沙柳林中，骑兵又受不开，明知对方敌人不多，就是没有好的办法围剿。他妈的！就这样让敌人打死的不少，连我也险些送了命。你看我的钢盔上让子弹打的这个窝子。最后将我们打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放火烧柳林。火一烧起来，就不管他是人、牲畜和蒙古包，给他来一个一烧而光。不然，他妈的！真是“西瓜皮擦屁股——没个完”，但是，虽然那样的烧，那些老蒙古也不知是烧死了，还是跑掉了，始终未见消息。他妈的！真怪！好像神兵似的那样出没无常。这次战斗，我们团的损失大了，我连人虽没有死多少，也敲死了三个优等轻机枪射手。唉！太可怕了！”

就在这样烧杀战斗中，牧民老乡为了躲避灾难，全部都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行动早的，将牲畜也赶走了，行动迟的，只顾人的生命，将大部分牲畜都遗弃了，丢了的牲畜就多被骑七师二十团赶走，除了队伍每日杀吃以外，还拉到其他地方卖掉不少。据我知道的，住在“昌汉庙”陈长捷司令部的机枪连，有一排人随着陈长捷派在札旗的最高指挥官黄副司令在前方参加战斗，将蒙民的牲畜除了杀吃、卖掉以外，还给他们董连长拉回三头牛、一匹马。另外还有个“地把头”在那个时期，将那些队伍拉回的大小牛条子，还买了六七头。其他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 (四)

陈长捷在“昌汉庙”开垦，明明是强夺蒙民的牧场，但康参谋时常对参加开垦的汉民老乡说：“我们在这里开荒是为了我们汉族人民的生活，多收点粮食。但老鞑子的地宁荒废了也不让我们开，蒙古人想让我们汉人饿死，所以总司令（指陈长捷）为了我们有饭吃，过好光景，才通过中央（指伪国民党中央）批准，让我们在这里开荒。这些老蒙古还起来反抗，这还讲什么理呢！他不讲理，咱就以不讲理的对待。你们放心大胆地好好耕种，不要怕，出了天大的事情由我来负责。同时你们对老蒙古要提高警惕，随时看他们的语言行动，如有可疑之处，要马上通知我，就能将发生的事情及时得到解决。如果你们认为有事与你们无关，事情闹大了，我倒霉倒是小事，你们种不成地是大事……。”他们就是这样无耻捏造，挑拨蒙汉民族不和，特别助长了地主的气焰。

工兵连在“昌汉庙”驻有两月之久，至当年秋天，约在八月份（秋天的糜谷还未收割），因骑七师全部开驻伊克昭盟，同时事变也基本结束，就将我连调回杭锦旗“公尼召”（骑七师司令部所在地），归还了原建制。同时康参谋和董连长所率的机枪连也先后离开了“昌汉庙”。以后那里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 诺门汗事件亲历记

胡克巴特尔

## 前 言

诺门汗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于“九·一八”后，建立伪满傀儡政权的第九年，在伪满西北部“国境”线诺门汗地区，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生的战争事件，实际上是日本和苏联两国的战争。这是在一九三八年伪满东部“国境”线上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之后的一场规模较大诸兵种联合的现代化立体战争。

我在这里主要是记述亲身参加过的一段事实。在记述中，尽量不作分析或少分析，务求把事件的真实情况，如实地表达出来。因此在立场观点和语言运用上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再诺门汗事件，涉及到当时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題，情况复杂，原因众多，牵连面广，在日本是属于军事绝密的事情。苏联军方面的情况，限于我当时的见闻范围，更不能一一清楚地写出来。因此仅对伪满兴安师方面参战的经过和情况写得比较详细，对日本军和其他方面就简略一些。这些作为历史资料来说，很不全面完整，仅能作为参考。

其次，我还打算通过事实，将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以后，蹂躏蒙汉人民、对待内蒙古人民的毒辣政策、欺骗虐待“兴安军”的残暴卑劣手段，以及内蒙古人民不愿充当炮灰的厌

战情绪，予以反映。

## 第一部分

### （一）诺门汗事件的概况

诺门汗高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西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国境线附近。东北离海拉尔一百八十公里，东南距阿尔山二百五十公里，是在哈尔哈河支流胡拉斯台河夹岸的一片高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塔姆察格布拉克地区毗邻。哈尔哈河沿着两国边界，从东南向西北蜿蜒流入贝尔诺尔湖。

诺门汗地区，是一片沙漠地带，多年来由于生长着一簇一簇的河柳、黄榆、沙蒿，固定了流沙，形成丘陵连绵，绿草茸茸的起伏地带。东南方达尔汗山长满了马尾松，成了方圆十几公里的森林隐蔽区，是一处天然美丽的牧场。自从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以后，这一带被伪满划为“国境”禁区，乌云笼罩，朔风凛冽，成群的牛羊不见了，美丽洁白的蒙古包迁移了，人烟绝迹，山河荒凉，除了三三两两的边防巡逻兵不时往复巡查或偶有几只羚羊、野狼寻找食物出没其间外，其他什么都不见了。

伪满“国境”线，从西部到东部长达四千三百余公里，加强“国防”线需要巨大数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日本军为了经常保持兵力集中，把一般地区的边防事务都交给伪满军和警备警察担任，重要地点和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沿线的城市，则都有日军重兵驻屯。在西北方面，如满洲里、海拉尔、昂昂溪、齐齐哈尔、阿尔山、白城子、洮南等地驻屯师团或联

队以上的兵力，受驻在齐齐哈尔的西北防卫司令官第十三部队长领导。在西北“国境”线上，由“兴安北省警备军”负责。“兴安骑兵第八团”驻在陈巴尔虎旗黑山头，负担满洲里以北地区的边防任务。“兴安骑兵第七团”驻在新巴尔虎左旗贝尔诺尔湖北岸的查冈敖包，负担满洲里以南地区的边防任务。“兴安骑兵第七团”的第三连驻在那木得苏荣，负担诺门汗一带地区巡逻警备。

参加这次战争的兵力，日本军方面为：步兵约四个师团、安冈坦克师团、炮兵一个师团、空军一个师团，总兵力约计八万余人。伪满兴安军方面为：属于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部领导的兴安骑兵第一团、兴安骑兵第二团、兴安骑兵第七团、兴安骑兵第八团、独立炮兵连，以上各骑兵团的编制，以骑兵三个连、一个机枪连共四个连组成，总兵力二千五百余人。属于郑家屯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领导的兴安第一师司令部、兴安骑兵第四团、兴安骑兵第五团、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炮兵团、迫击炮团、独立骑兵连、通信连、梁瀚汽车队、野战病院，以上各骑兵团的编制，以骑兵三个连、平射炮和机关枪各一个连共五个连组成，每骑兵连三个排，每排轻机枪两个班、掷弹筒一个班。兴安炮兵团三个连组成，四一式山炮八门、克式山炮四门。迫击炮团三个连组成，重迫击炮四门、轻迫击炮八门，共计四千五百余人。还有伪满军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司令部领导的石兰彬部队（一个步兵旅）约五千人。

“兴安军”参战部队的队号及团级以上指挥官的姓名是：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中将、兴安骑兵第一团团团长金振吉少校、兴安骑兵第二团团团长何维成少校、兴安骑兵

第七团团长郭文通上校、兴安骑兵第八团团长郭美郎中校。

兴安师师长野村登龟郎中将、军事顾问野田少佐、参谋长后藤外马上校、参谋正珠尔札布上校、曾根崎中校、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副官希拉布少校、佐藤上尉、王海山中尉、军需谷垣长次少校、杉森中尉、铃木中尉。

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团附木村少校，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团附吉野少校，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上校、团附井上中校、阿克旺希拉布少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团长金永福上校、团附笠田少校，兴安炮兵团团长平川森上校，独立骑兵连连长小林少校，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上校。

## （二）战争发生的原因

关于战争发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双方边防哨兵之间互相射击冲突惹起战争；一种说法是日本蓄意和苏联进行一次装备兵力的较量试探；还有一种说法是苏联为了策援中国，对日本兵力进行一种牵制的行动。当时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间，在“满洲国”的军事基地基本稳定，日本确有首先进攻苏联的冒险野心，曾经一度 and 蒋介石政权进行谈判，建立共同防共协定，酝酿使华北地区为军事缓冲地带，日本军全部退出长城外，迫使中国政权承认“满洲国”，然后集中兵力攻击苏联。这是以石原莞尔中将为为首的北进派的主张。

在此期间，号称日本军中之“樱花”的关东军，在“满洲国”集中的兵力竟达到一百万左右。同时“满洲国”的各军事学校、各个兵团部队，在训练士兵、教育学生时，不论研究战术、演习教练和政治思想工作，都以苏联军为对象。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的战略方针有了变化，决定首先进攻政治腐败、兵力薄弱的蒋介石政权，吞并中国大陆，并将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势力驱逐出去，壮大充实自己以后，再进攻苏联。这是以东条英机中将为为首的南进派的主张。

从侵华战争开始，到诺门汗战争爆发前夕的二年当中，日本军的侵华火焰，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华南以及海南岛，战线长达一万余华里，占用一二百万大量兵力，关东军在东北部队，也调出一批投入中国内地，从此关东军由一百万兵力降到六十万左右。

为了顺利进行侵华战争，保持后方军事基地的安全，需与苏联保持正常关系，才对日本有利。但“七七”事变以后，“满洲国”东、西、北三面，半圆马蹄形连绵长达四千三百余公里的“国境”线上，哨兵之间，互相射击和越境事件，频繁发生，一九三八年较一九三七年增加七十余件，这两年当中竟发生一百六十余件之多。其中较大的如一九三七年乾岔子岛军事冲突、长岭子日本军与苏联军的冲突、金厂沟事件；一九三八年张鼓峰事件等。另外双方哨兵之间的互相袭击，互相射击的事情，已成常事。这使关东军极为不安，不得不在“满洲国”保持六十万左右的兵力。

根据当时日本情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苏联在远东方面逐渐增加了兵力，达到四十三万人，二十二个



狙击师团，飞机增加一二倍。这些数字虽不太精确，总之较一九三七年前增加了兵力，是可以肯定的。

诺门汗事件扩大以后，日本当局一方面命令驻苏联莫斯科的东乡大使和苏联莫洛托夫外长多次进行停战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日本作了许多让步，于九月十五日双方停火。另一方面对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以违犯战略方针扩大战争的罪名，于同年九月十一日连同他的参谋长矶谷中将一齐予以撤职处分，命梅津美治郎大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全权大使。

按上述情况，当时的日本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是力求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稳定后方，加强“国境”防卫，集中力量扩大侵华战争的阶段。

因此第三种说法：苏联为了策援中国，分散日本兵力，进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是接近合理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支援民族解放战争，是义不容辞的正义行动。发生的事实也是如此。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五十余名袭击伪满西林套拉该兴安骑兵第七团第三连的哨所，引起了战争。

苏联军方面，在战斗中几次占优势，满可以长驱直入“满洲国”内地，可是只在诺门汗地区进行防御，并未深进一步。说明苏军只作牵制，使日本军后方不安，也不想扩大战争。因为苏联对欧洲方面，希特勒德国虎视眈眈，企图进犯苏联的野心，不能不作警惕。

但日本的最终目的，还是企图进攻苏联。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一九四〇年间，当时有名的曾经在南洋一带被称为“马尼拉老虎”的山下奉文中将，视察阿尔山边防时，

在王爷庙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官们讲话时，他就露骨地说：“帝国皇军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建立东亚共荣圈，确保东亚永久安定的新秩序，以果断的行动在北支、中支、南支进行战斗，并占领了大部地区和重要的城市。但由于皇军节节胜利，使在中国享有非法权益的英、美、法等国甚感不安，以各种方式物力、财力援助蒋军，帝国将以果断的行动对待他们。然而帝国的真正敌人不是他们，而是在北方，应该对北方敌人不时警惕。你们是成吉思汗的好子孙（指伪满的蒙古军官），不应该忘掉成吉思汗的英勇、果敢战功奇迹，要你们的铁蹄重踏帕米尔高原，挺进中央亚细亚，这才不愧称为蒙古人。”根据山下奉文的这段讲话，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仇视苏联已到极点。

### （三）当时“满洲国”内的政治、军事情况

从“满洲国”成立到一九三九年止的八年当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作了许多改革，逐步加强了对“国内”的各项统制工作。一九三八年中更加具体制定了五年产业计划、开拓计划、“国境”建设计划。这是所谓“全国”总力完成的“三大国策”。根据这“三大国策”，充实加强国防力量，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特别在与苏联毗邻接境的省分，如间岛省、牡丹江省、安东省、黑龙江省、黑河、北安以及兴安北省设立开拓厅。改组充实“满洲国”产业部拓政司为开拓总局，开始移民工作。从日本本土移来大批青年农民和在乡军人，分布在边境各地，进行开拓土地。同时，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国务总理”张景惠官邸召集蒙古王公代表人物十

八名，以座谈为名，强制土地“奉上”，废除了王公们的世袭土地特权，收归“国有”。颁布各种统制法：小麦粉统制规定、米谷管理法、劳动统制法、皮革统制法等一系列的统制规定。

同时相应地整顿了军队，“满洲国”建国当时，各种军队不下五十余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的官兵，都是原东北军和收降的土匪。有许多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为逐步实现军队正规化，于一九三三年秋季施行了募兵制度，几年当中精简了许多官兵，以募兵来代替。到一九三九年初，由五十多万人减到二十万人左右，绝大部分被精简了。当时日本关东军方面认为发展“满洲国军”无异吞食定时炸弹，不如大力精简“满洲国军”，将节约下来的军费用于扩大日本军方面。但是“满洲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不能不设军队，因此只保留少量军队，“国防外征”完全由关东军负担。对“国内”治安和各项统制工作，依托在警察和宪兵身上，因此警察由原来十万多人增加到三十余万人。这样更显出警察比“满洲国军”的重要性。为了军警统一领导集中，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将各种警察的领导权集中在治安部，下设警务司。解散撤销各县旗的治安队（保安队性质的地方武装，私马公费），从中挑选一部分年青可靠份子编入警察，同时在边防地区设立警察游击队和山林警察队。从此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进入了高度统制阶段。

开办军官学校，在沈阳东山嘴子利用原东北军讲武堂的校址，设立“中央”陆军训练处。长春设立军官学校。在王爷庙设立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专门训练蒙族军官，到一九三九年该校已经培养出四期蒙古青年军官，充实到各部队，加

强了骨干。替换下来的老弱、吸食鸦片、不适合正规化要求，或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官兵，都派到“蒙疆政府”充当骨干。同时收降在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的流动土匪，如老二哥、黑河、海龙、东边等数百人，派到“蒙疆”编成团队。日本当时采取这些措施，一方面精简了军队，逐步实现了正规化，不费一枪一弹肃清了土匪，稳定了治安。另一方面充实了“蒙疆”方面兵力，补救了日军兵力的不足现象，就可以更多地抽出兵力，进行侵华战争，来实现他们所谓的“大陆政策”。

从当时关东军来说，认为蒙古人比汉人思想单纯，头脑简单。因此在大力精简汉族部队的同时增加蒙古人部队。将“兴安军”原来的八个骑兵团和四个独立山炮连，增加为十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两个独立山炮连、一个汽车队。一九三八年冬季，为了集中统一，撤销兴安西省警备军司令部和兴安东省警备军司令部，保留兴安南省和兴安北省两个警备军司令部，添设一个兴安师司令部，上设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在郑家屯）统一领导所有的“兴安军”。

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对蒙古人的同化工作，便于日本人直接领导，“兴安军”的口令、公文、命令、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强制完全使用日本文字、日本语言，即便是蒙古人和蒙古人之间，也要用日语说话。重点学校如“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授课完全用日语，把对待朝鲜人民的同化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内蒙古来了。

在“兴安军”的日本军官，开始只担任团附、队附等副职，后来逐渐担任重火器连的连长等职务。到诺门汗战争时

期，除各警备军的重火器连由日本军官担任外，团长队长司令官以及各骑兵连长还是蒙族军官担任。而“兴安师”为野战部队，上自师长，下至连长，差不多都是日本军官，蒙族军官只是少数。

## 第二部分

### （一）第一次诺门汗战争的概况

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以来，在诺门汗西北边境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哨兵和伪满兴安骑兵第七团第三连的前防哨兵发生过几次互相射击的事件，同年五月四日，忽然发现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五十余人，进入伪满国境，袭击了锡林套拉该第三连的哨所，并将该地占领。第三连的骑兵跑回那木得苏荣第三连驻地，把情况报告了第三连连长棍布札布中尉（棍布札布中尉是布利亚特蒙古人乌尔金司令官的女婿）。第三连连长棍布札布带领全连兵力，于五月五日拂晓向锡林套拉该攻击，双方战斗数小时，把五十余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击退，夺回了该地。五月七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增加了兵力，又将第三连击退。这样反复了几次，五月十一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三百余名，攻入锡林套拉该。第三连连长棍布札布中尉报告伪兴安骑兵第七团团长郭文通上校，郭团长率领全团人马急往发生事件的地区参加了战斗，并击退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该团报告给警备军司令部和日本军司令部。日本军出动了。五月十四日夜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军进入诺门汗高地，日本军配合伪兴安骑兵第七团把他们给击退了。

十五日，日本空军出动，和苏联空军展开了空战。双方屡次增加人数，并互有胜负。自五月十五日到二十四日之间，进行了几次战斗。五月二十四日午后薄暮前后，配属加农炮数门的约四百余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大举进入诺门汗“巴如善嘎拉”高地，占领后并修筑阵地。五月二十五日午后，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三百余名袭击了锡林套拉该，并占领了该地。这时苏联军也大量加入，日本军海拉尔师团及其空军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伪兴安骑兵第七团撤回原驻防地（查岗敖包）守卫警备。另有兴安骑兵第八团、第一团、第二团等投入了战斗。五月二十八日午前，苏联空军大举进攻，在诺门汗上空和日本空军开展了激烈空战。苏联空军部队不断空袭阿木古郎、甘珠尔庙、将军庙等地。六月上旬，苏联机械兵团，配属数百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占领了整个诺门汗高地，日苏两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这次战斗中伪兴安骑兵第一团团长沙振吉少校指挥全团士兵，正在进行徒步战下马攻击前进时，突然遇到几十台苏军坦克的奇袭，苏军以超速行动对下了马徒步作战的骑兵进行了反复的冲击。毫无防备的下马士兵，束手无策，死亡很多，几乎全团复灭，金振吉少校仅带少数士兵幸免得脱。伪兴安骑兵第八团也调回黑山头警备。从此伪兴安骑兵第一、二两团由于损失过大，只能担任日军两侧警戒，再没有参加正式战斗的能力了。

## （二）第二次诺门汗战争“兴安师”参战经过

### （1）“兴安师”出动

一九三九年，诺门汗战争开始时，我正在沈阳东陵附近

（东山嘴子）“中央”陆军训练处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战术专科），为期一年，全班三十名，都是从各部队派遣来的校级军官。其中汉族军官十二名，日本军官十名，满族军官三名，蒙古族军官四名，白俄军官郭索夫中校一名。“兴安军”方面派遣的六名学生是：正珠尔札布上校、曾根崎中校、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

自从诺门汗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朝日新闻》、满洲《日日新闻》和其他新闻报纸，不时刊登有关战斗情况，如“苏、蒙军不法越境，被我军击退驱逐出境”“我军地上精锐部队，经常以寡克众，创造了光辉战迹”等，尽力欺骗、宣扬和鼓吹。我对这些欺骗和吹牛夸耀的宣传报道，总是不很相信，但也不能不读。因为除了这几种宣传报纸而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帮助了解消息。总的来说，战争一天一天地扩大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六月十九日的午后上课时间，我们的主任教官握粟上校来到课堂，领上我们从“兴安军”派遣来的六名军官到学校本部，见了学校干事真井少将。真井少将对我们六人说：“现在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来电报，调你们六人即刻回到郑家屯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听候调遣。”并宣布我们暂时休学。我们请求为了安置家属家务，六月二十日出发，真井少将同意。我们回到班里，同学们纷纷探问情况，我只意识到是要出发作战，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就对同学们说调回郑家屯军管区司令部。这天晚间我们坐着专为学生们准备的大篷汽车回到家中。高等军事研究班的学生准许携带家属，那时我在沈阳市内旧城大南关外租住一所民房。学校准备一辆大篷汽车，早晚沿途接送我们。我回家后告诉妻子准备回家，并连夜帮助

我妻子捆装行李物品。

六月二十日

午前准备我自己随身携带的行装：手枪、望远镜、水壶、图囊、雨衣等全套武装。还带上照像机，在街上买了十几个胶卷，打算拍摄战场照片。十二时左右我辞别了妻子直到白云航中校的家中，那时阿勇巴图中校也在他家。我们三人按约定集合的时间，到了沈阳车站，这时正珠尔札布上校、曾根崎中校、堀内章少校等已经先后来到了车站等候着我们。

是日彤云密布，细雨蒙蒙。午后二时左右，坐上沈阳直通北安的列车，向郑家屯出发。一路上车外面下着雨，大约晚十二时左右，火车开进了郑家屯车站。我们下车后，夜深雨大，只好雇了两辆马车，冒着大雨去一家日本旅馆投宿。郑家屯的街道是土马路，已经泥泞不堪行走，我们到旅馆住下了。

六月二十一日

吃了早饭，天仍然阴得黑黑的，小雨不停地下着。我们叫了两辆马车到伪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找到参谋处，一位参谋领我们去军事顾问部，见了军事顾问野田少佐。我第一次见他，野田顾问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黑矮汉子，睁着圆溜溜的一对贼眼，满腮新剃暴长的短须，熊一样的身躯，滚圆肥胖，浑身蛮气，那双臂好象从来不垂直，“牛鞅子”一样挂在肩上，胳膊肘老是朝外张着。他一面展开地图，一面给我们介绍“敌我情况”。他说：“自从五月初旬在西北部诺门汗地区发生战争以来，日本军击退数次苏、蒙军不法进攻，截至五月末，日军战果统计，击坠敌机六十余架，击毁坦克三十



余台，装甲车十辆，击毙敌军二千余名。六月中旬以来，苏军约二三个狙击师团配合蒙古军，在大量坦克、大炮和空军的掩护下，已经深入国境内部，在诺门汗一带占领了阵地，修筑了各种火器掩体和散兵壕，并在哈尔哈河上架设两座水下军用桥梁。目前苏、蒙军还在继续增加。苏军前线总指挥官为朱可夫中将。日本军为了贯彻日、满共同防卫的使命，保卫满洲国领土，以果断的行动，给敌人严厉的惩罚，彻底粉碎其进攻并驱逐其出境。”

命令的概要是：“兴安师”迅速出动，于六月二十五日前到阿尔山集中，受日本安冈中将指挥。正珠尔札布上校、曾根崎中校、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等六人为“兴安师”参谋，立即出发赴阿尔山兴安师司令部集合。

我们接受命令后回到参谋处，每人要了一组二十万分之一的战场附近“国境”线一带的地图。他们回到旅馆，我冒着雨去司令部部附王新之上校家中，王新之上校给我预备了许多食品。他对我说：“这次战争，日本军和兴安北省的警备军损失相当严重，战局说不上到什么地步。”我们谈到下午四点多钟，在王新之上校家中吃了晚饭，辞别了他，就去日本旅馆找我的那几位伙伴。小雨仍然不停地下着，到了旅馆，他们几人正在吃酒。正珠尔札布说他的妻子有病，曾向野田顾问请了十天假，以后再赴前线。我心想正珠尔札布真有办法。于是我们五个人在夜间十二时左右到了车站，站里很肃静，看不见几个旅客，只有几个军人来来去去地走着。我们上了直通北安的列车，一直向北前进了。

六月二十二日

午前八时，火车开进了白城子车站，我们下车后马上坐上白城子直通阿尔山的火车。当时仍然是细雨连绵，途中已由小雨转为中雨。十一时到王爷庙（即乌兰浩特）车站，大概停车二十多分钟。上车下车的都是军人，很少有普通旅客，已经有了不太平的战争气氛。这时车上进来几个日本人，头前的一个我认识他是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军事顾问兼王爷庙特务机关长的泉铁翁中佐。他后面跟随几个人，都穿着雨衣，带着手枪，腰间横插一把日本武士道用的古刀，穿着军不军、民不民、不三不四的服装，活象封建官僚们的一群打手。我们向泉铁翁中佐行了军礼，他说他们也去阿尔山。和我们谈了一些情况。他忽然对白云航中校说：“你不必去前线，留在王爷庙另有任用。”这样就将白云航中校留在王爷庙了。当时我不明白不让白云航中校去前线的道理，后来才知道白云航曾在苏联基辅骑兵学校学习过，因此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认为不可靠。火车一直向西北开进。过了索伦车站，列车员放下窗帘，不知道是防空措施，还是不让看见外边情况。午后九点多钟到了火车终点站阿尔山车站。一走出车厢，乌黑的天空，给人不快，蒙蒙的细雨，仍然下着。站台附近的道路上，杂乱地来往驰奔着汽车、大卡车。马达发出隆隆震耳的声音，一台接一台连串成队的坦克在泥水中吃力地传动着钢链铺轨，走一走，停一停，不时发出吼声。同时有十几条探照灯的强烈的光芒，穿透密密层层积云，不时交织着、分散着。乍看车站一带，好象夜景闹市，但是维持交通秩序的，不是手拿指挥棒的交通警察，而是一个一个头戴钢盔、手执步枪、全佩武装的士兵。我们走进票房不久，来了两位接站的军官，我都不认识，说是兴安师司令部来的，把我们领

到温泉的北山坡上一排木制的房子里。随后提来一木桶不热不冷的大米饭，一点蔬菜，还有一铁筒黄豆酱汤。黄豆酱汤是我最不愿意吃的东西，但因一路上没有吃着东西，饿得肚子乱叫，于是打开水壶盖喝了几口酒，便大吃起来。饭后曾根崎中校到大和旅馆（阿尔山的日本旅馆）见师长和参谋长去了。我一路疲劳，倒在床上就睡了。

六月二十三日

早晨五点多钟，有人把我们唤醒，说是吃完早饭到大和旅馆门前集合。我们赶快吃完饭，佩挂整齐武装，带上自己使用的东西，到了大和旅馆的门前。这时满山云雾，街上一辆汽车也不见，静得鸦雀无声。昨天夜间的那些卡车和坦克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站房和大和旅馆屋顶上的对空监视哨不时用望远镜向四空观察探望。大和旅馆门口站着两个岗兵。佩挂全副武装和没有武装的军官们在大和旅馆进进出出地穿梭不停，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雨已经停止不下了，我们在大和旅馆门前两根大圆木桩子栅栏门旁边等着。已经八点多钟了，曾根崎中校才随着师长、参谋长走出旅馆，来到我们这里。参谋长后藤外马上校是我熟识的，过去曾经给我当过战术教官，五十多岁，黑瘦干瘪、须发苍白的小老头。师长是日本军的现役中将，五十上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下边配着一个突出的红鼻子，挺着胸脯，大有“征服世界的神气”。我们几人立正站好，先行军礼，依着级别顺序，报告级别姓名，举行了申告仪式。师长什么也没说，问副官汽车准备好没有？副官报告马上就到。又等了一会，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装着军用帐幕、行军锅、汽油、粮食、肉类罐头等等。师长命令上车，我们同几个士兵，满满地坐在汽车厢里，师长

坐在前头司机旁边。汽车开动，一直向西北方向前进。我这时简直是盲目地坐在车上，不知往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兴安师部队在哪里。在郑家屯，野田顾问说部队在阿尔山集中，可是现在又往什么地方去呢，只好听天由命吧。将近中午，汽车开到伊尔斯，没有停止，继续前进。又走了约有两个小时，望见前面泥泞道路上，有一二百辆卡车和坦克正在前进，还有几辆卧车，不少小吉普往来奔驰。我才明白昨天夜间在阿尔山车站的那些车辆都来到这里。这就是安冈坦克师团的全部兵力。我们汽车跟着这些坦克走了一段路。忽然这些坦克部队离开我们的前进方向，转向正北方宽广草甸，向宝格得敖拉方向去了。我们仍然顺着原来的前进道路走去。午后七时左右到达一处山坡旁边，车停住了，师长命令下车就地露营。我们赶快下车后，架设帐幕，安锅煮饭。一夜没能休息，军官们轮流值班，担任警戒。

六月二十四日

在云雾笼罩的黎明，我们撤除帐幕，整装起营。卡车走上辽阔的草原，开足了马力，高速度向正北方向前进。午前八点多钟，远远望见前面一片松林，刹时间，卡车向左方拐进两边松林密封的山口，到靠近北山坡附近的两间小土房跟前，停住了车。这便是“兴安师”各部队的集结地，有名的罕达盖了。这地方四面环山，东、南、西三面山上密密地生长着松林，中间形成约方圆数平方公里的草甸和湿地。

两间小土房是日本军安冈司令官的暂时司令部，我们就在两间小土房的东侧附近山坡上选择了一块草地，架设了四个帐幕，师长和参谋长住一个帐幕，师司令部的无线电台占用一个帐幕，我和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曾根崎中校、

佐藤上尉副官五人一个帐幕，另一个帐幕里安置了军需后勤人员。午后又下起雨来，伪兴安师司令部派曾根崎中校为联络军官，经常与日本军司令部联系，受领命令。

这时“兴安师”的各部队，还没有到来，罕达盖附近的警备工作，由日本军负担。当时日本军的情况，从海拉尔方面来的军队都集结在阿木古郎、红图庙、将军庙一带线上，空军基地在将军庙和阿木古郎。阿尔山方面的军队都集结在罕达盖以北宝格得敖拉附近线上。“兴安师”在罕达盖集结。

六月二十五日

依然一阵一阵地下着细雨，日本军的小型坦克和轻装甲车来往不停地向北方搜索敌情。日本军的司令部（两间小土房），有许多军官往来出入。南方洼地草甸子上，有几十名日本军演习试放“火焰放射器”，象唧筒射水一样，喷射出熊熊烈火。

沈阳梁瀚部队的汽车三十辆和三辆装甲车，配属给“兴安师”，担任后方运输工作，陆续从阿尔山运来弹药给养。我们把运来的弹药和给养，都疏散开隐蔽在西山坡松林中间。司令部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钢盔，一副防毒面具。副官没有给师长准备，野村中将大发雷霆说：“在战场上不先给师长准备钢盔和防毒面具，是最坏的一件事情。”副官赶快把自己的钢盔和防毒面具奉上，师长这才消了气。

“兴安师”的集结地，最初伪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指定在阿尔山，后来据日本军的行动，安冈中将命令在罕达盖集中。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准备忙乱，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第五团和迫击炮团，半数以上都没马，未及就地补充。现派人去海拉尔、王爷庙的乌兰毛特等地派购军马，因此一面督促

部队迅速出发，一面计划将鞍具马匹在集结地补充。这样紧迫的情况下，部队到阿尔山后，一部分用汽车输送，一部分徒步行军。

六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

汽车运输的部队已经先后到罕达盖，马匹未到而鞍具先到，在师司令部附近堆积如山。

徒步行军的部队也陆续来到，在海拉尔和王爷庙的乌兰毛特派购的军马一千多匹，分批运到阿尔山，又分作数群，从阿尔山赶赴罕达盖。途中受到几次空袭，跑失、死伤一百余匹，勉强赶到罕达盖集结地，补充到各团去。这些新军马没有调教训练过，有的是根本没有骑过的生马，士兵们开始骑乘训练。

这几天有时降雨，有时晴天。师司令部的人员每天忙于分配补充弹药，编整部队，制定作战计划。

“兴安师”是不久前新成立的单位，上自师司令部下至各团队，除了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导团和伪兴安骑兵第五团是原来的而外，其他团队都是临时从各部队抽调编成的。因此官兵之间有许多互不相识，有的士兵不知道本团、本连的团长、连长叫什么名字，更提不到有什么情感。加上部分军马生性不驯，造成许多困难。虽然如此，到六月二十九日为止，各部队的编制和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不管好歹，总算完成。

六月三十日

这天雨停云散，天气晴朗。约中午十二点钟，日本军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的概要：“在罕达盖以北宝格得敖拉附近和将军庙附近集结的各部队，于七月一日拂晓开始

前进，沿着胡拉斯台河两岸向巴如善嘎拉、诺尔台高地进出，对盘踞在诺门汗高地一带的敌军，以果断的行动，给予彻底歼灭，军主力攻击重点为巴尔善嘎拉高地。兴安师协同军主力行动，在军主力左翼向诺尔台高地南方三角标高高地进出。”

根据日军司令部的命令要求，“兴安师”于本日下午四时左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的概要：“兴安师为了与日本军协同作战，并为掩护日本军左翼安全，于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由罕达盖集结地出发，经达尔汗山向胡拉斯台河左岸的诺尔台高地南方三角标高高地前进。行军序列：兴安骑兵第五团为左侧纵队，教导团为前卫部队，本队（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兴安炮兵团、追击炮团）、后卫部队、兴安骑兵第四团的顺序前进。左侧纵队和前卫部队各派军官斥候（军官侦察）一组。集合地点罕达盖西山松林附近”等等。

## （2）“兴安师”进攻

六月三十日午后四时，师司令部召集各团队长直接传达了命令。师司令部作出发准备。我忙碌了一天，快要出发了，自己还没有勤务兵，参谋长让我到独立骑兵连去要。我认为离出发时间还早，独立连的宿营地就在南山松林中不远，吃过晚饭骑着马去南山松林中找独立连也不晚。谁知途中经过一段湿地，陷在里面，费了好长时间，才走出湿地。到独立连的宿营地已经十点多钟，独立连正要出发去集合点，我对小林少校连长说明来意，连长不痛快，罗嗦着说：“师司令部的军官们将我的士兵都要去了，不是这个传令兵，就是那个勤务兵。”我说：“独立连的任务就是司令部的勤务连，

那有什么办法呢。”连长诚心和我作对，派了一个徒步的二等兵名叫昭德宝，他说没有马。我只好领上昭德宝回到师司令部所在地，已经午夜十二时左右。帐幕空空地只剩下少校军需谷垣长次和几个士兵在那里整理物品。我问过他才知道师司令部早就走了，我只好领着徒步的二等兵昭德宝去西山松林中找师司令部去。已经是一点多钟了，黑暗深夜，更显出松林阴森森地肃静，连一个人也不见了，想是司令部和部队已经出发多时。怎么办呢？勤务兵又没有马，正在踌躇无策的时候，忽从远方传来马嘶声音，顺着声音找去，发现松林深处拴着一匹白马，在那里嘶叫。到跟前看时，这匹白马佩着全套新式皮鞍，躯体长大，四肢健壮。我四外寻找它的主人，大声呼唤，始终没人应声，正好我们少一匹马，先骑着，有人找再说，遂把我原来的马交给昭德宝，把我的行装搭在这匹白马的鞍后边，紧紧马肚带，解开缰绳，牵到一处空地沙滩，骑上这匹马和昭德宝一同向司令部的前进方向追去。这匹白马，昂首奔驰，四蹄如飞，果然是一匹好战马。途中遇见三三两两的骑兵，不慌不忙地走着，我向他们询问司令部的去向时，有的说在前面，有的说不知道，我以急行军的速度超过他们向前赶去。将近黎明的时候，追上了师司令部，进入了行军行列。大家见我骑着这匹白马赶来时，非常惊讶，说：“你怎么骑上的呀？”曾根崎说：“你堪称征服马的英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我也摸不着头脑。原来这匹白马是在千百匹马中特意为老师长挑选出来的座骑，可是昨天夜间披上鞍子人们试骑的时候，这家伙不知为何发了脾气，接二连三地摔掉许多人，老师长发了火，把副官骂了一顿，换上别的马骑上出发了，因此将这匹白马拴在松林



中没人管它。但是我骑的时候，它却老老实实没发脾气，可能是恋群的缘故，急欲寻找它的伙伴，加上我的骑术敏捷，使它没有来得及发脾气就骑上赶路了。从此这匹马归我所有，没有人向我争夺，因为许多人都已领教过它那不驯的威严。

七月一日

部队正在前进的时候，忽有左侧卫第五团报告发现“敌人”装甲车。师长命令继续前进。师司令部越过一个漫长的山岭，瞭望见一片草原，远远有一个大湖，师长说：“这是不是查干诺尔湖？”派我去了解湖水情况，我便离开本队，和昭德宝二人向东北湖水的方向走去，看着好象距离不太远，可是走也走不到。为照顾马匹的体力，缓缓游行，中午十二时左右才到湖边，打开地图对照，不是查干诺尔湖，好象查干诺尔湖西南方的一个碱水小湖。湖边不知在什么时候死掉一匹马，有十几只苍鹰秃鹭聚集在尸体上行进会餐。我们二人找到湖边一块高处草地，把两匹马拴在一起，取出饲料袋，装进一些携带的燕麦，挂在马头上喂养它。我们吃了一点饼干权当午餐，休息一会又骑上马前进，向正西方向去追赶部队。一望无边的草原，除了我们二人以外，看不见一个人影。在夕阳西沉的时候，望见前面生长一片松林的山岭，便是达尔汗山。午后七时左右到达了达尔汗山，部队正在这座山上安排露营。我见了师长，报告了解湖水情况。这时在师司令部坐着一名俘虏苏军中尉。原来苏联军的一队侦察兵、三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我军左侧卫第五团遭遇，并被第五团包围，装甲车突围跑掉，剩下卡车上的十二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士兵全被第五团击毙，俘虏了中尉军官。这时达尔汗山西南

五

方山岭上发现几十名“敌军”，并以两门炮火向达尔汗山南方湿地进行炮击，阻挠我军士兵下山取水，控制水源。同时还有三辆装甲车，利用林缘地带向我军进行搜索。“兴安师”没有应战还击，只派出几组爆破组和两门平射炮，对进行侦察的装甲车进行了阻止。

七月二日

四点多钟，师司令部召集各团队长和司令部参谋副官集合，传达作战命令：“兴安师仍然继续向诺尔台高地南方三角标高地急进。为便于展开，随时随地攻击敌人，区分两个纵队分进。左纵队：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兴安骑兵第四团、迫击炮团、纵队指挥官第十二团团长方申上校。右纵队：前卫、兴安骑兵第五团、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兴安炮兵团、教导团。胡克巴特尔少校为左纵队斥候长（侦察队长），带骑兵一个排，在左纵队前头搜索前进。阿勇巴图中校为右纵队斥候长，带骑兵一个排，在右纵队前头搜索前进。两纵队的军官斥候于午前五时出发。各团队受领命令后于午前六时出发。师长在本队前头行进。”

我接命令后，即带由第十二团早已派出的第一连的第二排，排长日本人森中尉，共三个班四十多名，携带轻机枪两挺，掷弹筒四个，每人三四枚手榴弹和十数颗反坦克地雷。我们向军需官领取给养，军需只发给一日份的军用饼干。我交涉想多带一天的给养，可恨军需少校象平时演习一样，扣得很紧，说什么也不多给，我只好带队出发了。这时师司令部派佐藤上尉副官去日本军司令部报告并联系情况（佐藤上尉去后，当日被俘）。我带领一排骑兵，向前方又派两组搜索兵，顺着松林深处，灌木丛间，处处隐蔽前进。是日赤日炎

炎，途中一点水源也找不见，出发前所带的一壶水，差不多都快喝光了，还经不起燥热。十二时左右，远远听着从靖门汗高地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望见升起一片一片的黑烟。东北方向忽起黑云一片，雷电交加，分不开炮声和雷鸣，连成一片。我走在部队前头，突然，派出的搜索兵跑回报告，在我们前方发现“敌人”装甲车三辆，卡车两辆向我们冲来。森中尉想要以全排展开攻击，我说不行，必须迅速占领阵地。我把部队带进右方沙丘中间的两个盆坑里，利用周围密密层层生长的河柳灌木，占领了阵地，马匹完全隐蔽起来。向敌人装甲车前进方向，派出三个爆破组，每组两名，由森中尉带领，埋伏好了。并命令士兵没有我的许可，不准乱开枪，准备到最近距离，一举歼灭“敌人”，因为“敌”我装备悬殊，如果明面展开遭遇战，我们敌不住机械化装甲车部队，一定会吃大亏的。果然“敌人”进入前面的沙丘后面，把汽车也隐蔽了，沙丘上发现十几名散兵。沙丘左侧出现两辆装甲车，沙丘右面又出现一辆装甲车，向我们左右两侧包围而来。距离我们五六百公尺停止不前，开始机枪射击。根据他们发射弹道判断，证明没有发现我们的阵地。我坚决保持沉着，一枪不放，引诱他们再前进。可是他们也奇怪，一步也不前进。双方对峙一个多小时。忽然“敌人”装甲车转回去了。沙丘上的散兵不见了。我很奇怪，马上派人去尾追搜索，我正准备带领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我军主力部队已经赶到，才明白“敌人”撤退的原因，是发现了我军主力部队而跑掉的。我迅速前进。到午后六时左右，离诺如台高地大约还有三十余公里，前方完全是沙丘起伏，灌木丛生，只有呼拉斯台河附近传来一阵一阵的炮声，除望见一片云烟而外，

在我们方向看不出任何“敌情”征候。师主力和左纵队停止在前面一带的沙丘高地附近。我便回到师司令部向师长汇报了情况。这时野田顾问也来到师司令部，他担任“兴安师”的军事顾问。曾根崎中校提出建议说：“目前地形复杂，敌情不明，敌人的阵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布置如何，在我们还没有十分了解以前，不如部队完全下马，把马匹安置在后方，各部队以开进队形前进，多派几组徒步斥候兵，进行周密侦察，比较稳妥可靠。象这样盲目前进，会受损失的。”师长不同意说：“我是师长，听我的。”决定仍按现在队形继续前进，在什么地方遭遇，就在什么地方展开战斗。重新部署了部队，右第一线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左第一线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第二线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伪兴安炮兵团、追击炮团、伪兴安骑兵第四团。教导团为预备队。各部队根据部署，分作三部梯队，全部乘马，以开进队形向西北前进。午后八时左右，师长命令各线部队按前进队形就地露营，并向前方派出二组军官斥候，侦察“敌情”。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和第五团各派前哨连一个连。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向左侧方派出一个连，占领阵地，掩护部队露营地。各前哨连占领阵地作好警戒后，又派出若干军士哨、复哨，潜伏在各个要点，保证部队露营安全，并使其充分休息。

我在司令部附近一处柳树丛下休息，第五团的团附德勒格少校来了，我们两人坐在树荫下，谈论这一天的经过事情。德勒格少校一九三七年攻击大同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立过多次大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猛将”，不大识字，土匪出身，迷信佛教。他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战斗，今天下午第五团前进地区，骤雨来袭，雷击伤了一名少尉和

二名士兵，其中一名死去，战马击死两匹。还没有作战，先遭雷击，这说明老天爷不容，违犯天意的战斗，将不会有好结果。”我说：“敌我装备悬殊，这个战斗不敢说如何，但事不由己，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两人取出剩余的一点白酒，狠狠地喝了几口，吃了几块饼干。德勒格少校又说：“昨天有川副官出斥候，要我的马骑，我不给，他对我发脾气，我抽出手枪要枪毙他，吉野少校出来从中劝解开了，日本人太欺压人。”我说：“你忍耐一点吧！在战场上，日本人急了眼，什么缺德事都会作出来的。”我们谈到深夜，他离开我走了。

七月三日

虽然夜间进行了侦察，对前方“敌情”仍不太清楚，知道离“敌人”阵地已经不远。这天由于夜间下了一阵细雨，拂晓时候云雾弥漫，在几十公尺的距离内，什么也看不见。师长命令按昨天部署的队形前进。午前八时左右，太阳上升，云散雾消，看前面第一线的各部队都在马上，以连疏开排密集四五纵队的队形正前进当中，前方突然出现几十挺机枪，向前进的我军密集部队开始了反复不停地扫射，我军第一线骑兵，应声纷纷落马。我军炮兵忙于寻找放列阵地。这时从哈尔哈河与胡拉斯台河汇流的方向（我军右前方），先是几门炮火向我军第一线散兵射击，后来增加为几十门的炮兵群，向师司令部、第一线、后方部队，同时开始猛烈的炮击，千百发炮弹落在我们左右前后，溅起高高的沙上，烟火冲天，对面不见人，战斗开始了。与此同时，约一百余架苏军飞机，从哈尔哈河西岸高空袭来，分成数批，遮天盖日，日军高射炮开始射击，炮弹在苏军飞机编队的前后左右以及上下中间爆

竹一般开了花。刹时间，天空中好象悬起千百个棉桃一般的炮弹烟，日军飞机也由将军庙方向飞来，空中大战开始了。师长迅速命令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增加到第十二团左翼，伪兴安迫击炮团增加到第五团方面，伪兴安炮兵团在师司令部左侧附近进入阵地，开始射击。师长命令我去后方迅速用卡车运输教导团，迂回到苏军阵地右侧进行攻击。午前十时左右，我骑上马飞奔后方，到一处四面沙山环绕中间一片草地的地方（预定的后方补给所），疏散放置几堆弹药箱，用松树枝伪装着，还有十几辆卡车，疏散隐蔽在河柳灌木中间。有的空车，有的满载着弹药。我下马后，遇见了加藤上尉（原第五团连长，一九三七年攻击大同时出名的“猛将”），我要求加藤上尉协助我运输教导团的工作。加藤上尉指挥士兵把车上的弹药全部卸下来伪装好，我把马交给补给所的士兵，于是我和加藤上尉带领十一辆卡车到教导团所在地，给金永福团长传达了命令以后，把教导团的一部分兵力载上卡车，由金永福上校指挥，另一部分乘马的由团附笠田少校指挥，我和加藤上尉坐在前头车上，带部队迂回前进。途中遭到苏军大炮频繁阻击。卡车以最高速度冒弹前进，终于插入苏军阵地的右翼，展开了侧面攻击。我等到教导团全部展开完了，战斗前进后，便和加藤上尉坐上卡车返回补给所。已经午后四五点钟，歇了一会，要点粮食喂了马。午后七时左右回到师司令部，向师长报告了情况和处理经过。便很快地寻找一处死角可以隐蔽的地方，用钢盔挖掘个人掩体。因为沙土地容易挖掘，但不坚固，往往经不起三两发炮弹，就会塌陷。抬头忽见两个人戴着钢盔坐在掩体里吸烟，仔细看时，认得原来一个是治安部最高顾问平林盛人少将，一个是高级顾问小川大佐，不

知他们在什么时候来的。由此可见日本人对“兴安师”参加这次战斗寄托很大希望，也怀着若干担心。

这时第一线的各部队，仍在紧张地战斗，但也未能前进一步，战果还未扩展。苏军炮兵不断向我们射击着。十点来钟，苏军炮击停止，我们缓了一口气。师长决定：今晚各线部队利用夜间接近“敌人”阵地，明天拂晓，一举夺取。由于我军右前方高地，苏军侧射炮兵火力严重地威胁着我军第一线部队和师司令部，遂命令教导团从我军左翼撤出，转移到右翼，利用夜袭夺取西北高地，掩护师主力拂晓攻击。当时“兴安师”兵力部署情况是：右第一线伪兴安骑兵第五团、迫击炮团。左第一线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第四团。第二线伪兴安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伪兴安炮兵团。

是夜各第一线的正面，一阵一阵地传来激烈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哈尔哈河、胡拉斯台河的汇流点方向，远远传来隆隆炮声，火光冲天。想是日本军进行夜袭。师司令部随着第一线部队，逐步向前移动着。拂晓时候，前方阵地中的苏联军全部撤退。不知道是有意放弃阵地，还是被我军猛攻而被迫退的。我军第一线各部队乘胜追击前进，大约深入二、三公里。这时教导团早已占领了西北高地。七月三日这一天，苏军伤亡情况不明，我在阵地上没有看见遗弃的尸体，阵地中只留有一小袋一小袋的白方糖，成桶的白酒和许多蒙古人民共和国制造的印有两人摔跤画的“那达慕牌”香烟。“兴安军”官兵伤亡一百余人，军马五十余匹。

七月四日

早晨，在胡拉斯台河汇流点、巴尔善嘎拉高地方向，黑烟冲天，隆隆炮声，连续不断，从昨夜以来，一直未停。成

群的苏军飞机，从西方高空一批又一批地掠过我军上空向将军庙、阿尔山方向飞去。午前七、八点钟，苏军步兵约两千余名、坦克二十余台，向我军进行反攻，在我军第一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伪兴安炮兵团在师司令部的左侧南方沙岭附近进入阵地，猛烈地开炮射击，支援第一线的战斗。但是我们的大炮都是日本军不用的陈旧废品，射程近、命中率低，加上我军炮兵阵地一般在沙岭后面，又没有很好的观测所，对苏军后方远射程重炮兵群基地，根本射不到。对苏军第一线的炮兵阵地，又看不见、找不到。只有对反攻来的散兵和机枪阵地进行制压射击。可是在发射当中，就会招来大量苏军远射程野战重炮的集中炮弹，不得不迅速转移阵地，否则会被完全歼灭。比起苏军的大炮，简直象小孩玩具一样，无能为力。午后两点多钟，我军炮兵团正在射击，突然飞来苏军大量集中的炮弹，象骤雨冰雹般的榴弹和烧夷弹倾泻在伪兴安炮兵团的阵地上，炎炎大火，团团黑烟，直冲天空。有的炮身炸碎了，有的炮车轮炸飞了，弹药起火，自己在爆炸。爆炸得尸横遍野，血染黄沙，官兵们潮水般退下来。师长和参谋长都慌了，忙派阿勇巴图中校和堀内章少校去阻止，他二人骑上马跑去，好歹阻止住了，命令他们重返阵地。可是十二门大炮一半受到损坏，官兵伤亡很大。从此兴安炮兵团成了有名无实的单位，溃不成军，只好作些偷偷摸摸的行动，在这里放射几炮，赶快又跑到那里放几炮，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暴露位置和“敌人”炮兵对战了。

这时候师司令部位置在有一棵松树的沙坑里，四边周围生长着河柳灌木，中间可容纳一千余人安全隐蔽。午后六、七点钟，钱家店伪满军官学校候补生蒙古族学生少年队八十



余人，坐着卡车来到师司令部，都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儿童。据说这次是领他们来战场参观学习的。他们穿着肥宽长大和身体不相称的军装，使用的步枪差不多高出他们一头。师长命令他们和独立骑兵连在一起保卫师司令部。这些离开亲爱父母怀抱不久的一群小孩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战斗。一同来的还有郭索夫中校，他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从俄国逃来我国东北的白俄的儿子，是“满洲国”特种部队的队附（特种部队是完全由白党俄国人组成的秘密部队），和我在沈阳“中央”陆军训练处军事高等研究班是同学，见我非常亲近，开口便说：“前几天就派到日本军当翻译，夜间日本军差一点把我当作苏军的化装侦探而刺死，日本军不使用，才派到兴安师来。”并要我多加关照。我开玩笑地说：“当然应当关照，但不能保险你不会受炮弹袭击。”

七月五日

日本军沿着胡拉斯台河两岸，在巴尔善嘎拉、诺尔台高地线上继续开展着激烈战斗。我军第一线各部队用尽一切力量，击退苏军几次反攻，处在双方对峙阶段。中午约有二百余架苏军空军编队和日军飞机在呼拉斯台河上空展开了空中大战。苏军坦克约七十余辆渡过哈尔哈河向巴尔善嘎拉高地挺进，其中十几台坦克向我军第五团的正面冲来。另有五、六台坦克冲破我军第一线部队，直奔师司令部方向而来。曾根崎中校迅速派梁濑部队的两辆装甲车阻击，我们的装甲车开去不到半个小时，全被击坏，烧起大火。我们随后用卡车去炮兵团运来两门克式山炮，这才把来攻的五、六辆坦克击退。我和几名士兵去看烧毁的装甲车时，见一名中尉队长和四、五名士兵全部死亡，烧的面目漆黑，皮开肉烂，我们把

这儿具尸体清理回来，送回后方。这时昨天才来的郭素夫中校，因为乘马去后方补给所不知联络什么事情，在归途中被苏军炮兵射击，马惊坠地，不能动转，抬回师司令部时，已经半身麻木，行动不灵了，当夜送回后方，他真是来得晚，回去得快。这几天苏军飞机编队，不断地轰炸阿木古郎、将军庙、阿尔山、白狼、五叉沟等地，并将阿尔山至罕达盖、诺门汗高地间的我军后方运输路线，进行了遮断控制。我军的后勤运输车辆，由于每日遭受空袭，只好利用夜间行车。苏军第一线部队逐次增加向我军阵地连续进行反攻，成群的加农、榴弹等远射程野战重炮，由哈尔哈河西岸高地，不时向我军阵地集中射击。

我军各部队的官兵，自从七月三日战斗开始以来，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太阳火似的烧着，肚子饿得瘪瘪地，嗓子里火辣辣地，舌头却象搅在粘胶里面，唾沫早已吐不出来了，可是还在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残酷的战斗。伤亡相继，甚至每个小时都有死亡，都有负伤人员，全师人数逐渐消耗。可恶的军需官们，好象诚心作对，在战场上竟准备平时普通兵营里供应的给养“高粱米饭”。他们在后方补给所安装了十几口大锅，从每个团队抽调十几名官兵，现砍柴，现运水，烧火煮饭。四、五千人的伙食准备工作，即便平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何况在战场上每天遭受几次空袭。煮出来的饭，不是烧焦烟熏，就是半熟夹生，还要一袋一袋地装进麻袋里，再用卡车往火线上送。由于交通路线已经被苏军飞机和炮火完全封锁，一车一袋也送不到火线。加以苏、蒙军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攻势，俘虏士兵当场教育释放，飞机散布日、蒙文对照的宣传单：“不要替日本法西斯

充当炮灰，蒙古人不要来杀蒙古人，你们快杀掉日本军官投过来吧！你们快回家吧！不要受日本人的欺骗，参加毫无意义的战斗。”等等，对这样的宣传文件，不管日本军官如何控制，很快传遍全军，全线士兵和蒙族军官大为动摇。每天各团队都发生逃兵事件，三三两两脱离战场。第一线的士兵虽受到饥饿和死亡许多困苦，但是在严肃的军令统制下，还是坚持着战斗。

七月六日

天明的时候，日本军在巴尔善嘎拉、诺尔台高地线上仍与苏军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苏军不断向我军第一线正面增加兵力，连续反攻。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左侧方发现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千余名、装甲车十几辆，进行压迫。只有西北高地教导团方面的情况稍有缓和。总的情况第一线与我军左翼部队的情况十分严重，各团长不断请示师长和军事顾问，迅速向日本军请兵支援，但老师长坚决不同意。原来野村师长和野田顾问曾在日本军司令官安冈中将面前吹了牛皮，“兴安师”保证单打一面。为了履行这个诺言，命令我去第一线给五个团传达命令。在第一线各部队正在开展激烈战斗的情况下，穿过敌我交错的火线，给一个团传达命令，尚且困难，何况给五个团传令，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以军人绝对服从的姿态，毫不踌躇地接受了命令，乘马向西北高地出发了。午前八时左右，到达西北高地，这时教导团于夜间击退苏军一次反攻后，到现在还未发生新的情况，只是不断受到苏军炮击，炮弹溅起高高的沙土，烟云笼罩着山头。见了金永福团长交给了命令：“由西北高地撤回教导团，迂回到左翼支援第四团战斗。”金永福上校在信封上签注收到命令的时间后，

交给了我。这时该团的第一连长札玛彦札布少校，夜间战斗中胸部贯弹，排长鄂青顺中尉头部负伤，还有几个负伤人员，正在准备送回后方野战病院。我歇了一歇，吸了一支烟，骑马转向东南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奔去。第五团的正面，没有突出的高地，都是一般沙岗起伏的丘陵，丛生着河柳灌木。

“敌”我阵地经过几天的反复战斗，形成犬牙交错，每天每小时都有变动，地形复杂，情况也比较复杂，一不注意就会有误入“敌人”阵地的危险。根据我的战斗经验，每到一个沙丘，利用灌木隐蔽。仔细侦察前进方向附近的地形“敌情”，判断机枪的射击方向和弹道啸声，然后再向另一个沙丘山岭跃进。这样一处又一处地前进着。

中午十二时前后，便找到了第五团的团部，团长秦焕章中校和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上校都在一起，他们接到“坚守阵地不许后退一步”的命令后，对我说：“已经连接四天四夜，官兵们没吃到一点东西，已分配的弹药几乎使光，伤亡增加，逃兵事件屡屡发生，兵力减少，后方补充断绝，支援部队不来，让我们如何坚守啊，把情况报告师长吧。”我只好答应，歇了一会，又向正南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的方向奔去。

当时的情况，由于前进过猛，战线过长，五个团的战斗正面，竟达十余公里，各团陷于孤立，中间空隙很大，每个团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因此寻找团本部的阵地是极大的困难。午后两点来钟，好不容易找到第十二团的团本部所在地，团长田中秀一上校坐在一个沙丘后边的个人掩体里，现出一副苍白的面孔，几天没见老了许多。他见我一声不语，我把师长让他们继续坚守阵地的命令交给他，看了半天，问我说：

“师司令部对第一线的情况了解吗？”我说：“师长是接到昨晚你们的情况报告后才下的这个命令。”田中上校说：“不能守，守也守不住，我亲自见师长去。”因为当时第十二团的处境和第五团一样，如果不来援军确实是守不住了。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辞别了田中上校，向南方第四团的方向前进。穿过复杂的起伏地带，于午后五点多钟，找到了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哭丧着脸，深度近视眼镜的一条腿不知什么时候弄掉，用根白纱布条拴着，挂在耳边上，右手掌包着绷布，双手拄着战刀，蹲在一个沙丘后面的斜坡上。在他的旁边坐着第一连长郝尔罗札布少校，左胳膊肘缠着绷带，用三角卫生布挂在脖子上。我上前交给高桥团长命令，说明来意，他大发雷霆说：“师长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左一命令，右一命令，现在这样情况，让我如何坚守阵地。”他写信让我带去交给师长。因此我一面等他写信，一面和郝尔罗札布少校谈话，问他为什么负伤不下火线，郝尔罗札布少校说：“团长寸步不离，不放回去呀。”当时第四团面临的情况，比其他团更困难，左侧方千余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协同十几辆装甲车和正面的苏军步兵，已经形成三面包围，并把第四团的全团兵力，压缩在约二、三百平方公尺方圆的地区。第一线前面的苏军步兵迫近到几十公尺的距离上。苏军炮兵现已停止射击，士兵们正在进行短兵火器射击或互相投掷手榴弹阶段。自从午前以来，第一连长郝尔罗札布和第二连长特木其勒少校都负伤。平射炮连长、重机枪连长、乌令阿中尉等十几名军官阵亡。士兵们的伤亡更是严重，处于这种情况，师司令部屡下督战命令，无怪高桥上校发脾气。我考虑此处不能久留，向团长接过信后，便上马离开阵地，向师司

令部方向奔去。

离开第四团阵地还不到一公里左右，正在前进中间，忽听后面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我急忙跑上一个沙岭往回看时，第四团的阵地上黑烟冲天，许多士兵纷纷退下火线。与此同时，在全线阵地上机枪声、炮弹声、熊熊大火，团团黑烟，紧接着，第一线各团的士兵象潮水般撤退下来。我叹口气说：“完了！迅速回师司令部吧！”遂即策马向东北急奔。途中遇见退兵，三五成群，十个八个一伙，有的骑马，有的徒步。我向他们询问情况时，他们齐说：“苏军已经迫近，少校快走吧！”我再问：“军官们都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是“都死啦。”我离开他们又走，遇见一个退兵，骑着一匹白马，马走不动，他下马牵着走，还是走不动，他于是顺过枪来砰的一声，把马打倒，回手把枪扔在地上，把身上带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全部抛掉，空着手一摇一晃地象两三岁小孩迈台阶那样吃劲地在沙地里拔着腿走去。我走到倒在地下的那匹白马跟前，它的身躯下浸着一片红血，正在那里挣命。我下马拾起那支枪，追上那个士兵问他为什么把马杀死，把枪抛掉？那个士兵哭着说：“走不动，又找不见部队，没办法才杀的。”我指给他去后方补给所的方向，离开他向前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西沉，接近黄昏薄暮，无论如何也找不见师司令部所在地的那棵松树，好象迷失方向。正走中间，见伪兴安骑兵第五团的团附吉野少校和上尉副官带着十几名士兵。吉野少校满身溅染着血迹，上下衣裤破了许多口子，不知是炮弹破片炸的，还是被荆棘刺破的，横背着战刀，骑着马一步一步地和徒步士兵们一起走着。他问我去哪里？我说：“找师司令部。”他说：“第一线全部撤退了，

师司令部现在也是存亡不保，你不要找了。”但是我总不放心，还是离开他们仍向东北方向走去。又遇见十几名士兵赶着一辆花轱辘车，套着三匹马，车上拉一具尸体（想必是途中死的）和二门迫击炮的炮身，拉车的马匹已经走不动了，几个士兵走在两边，手拿着皮带，一步一步地鞭打着。他们是迫击炮团第二连的士兵，问他们的团长时，他们说：“已经跑散，不知去向。”我只好变更前进方向，转向东南松林达尔汗山方向走去。南、西、北三方面射出一串一串的各色信号弹，划破黑暗的天空，这说明苏军逐渐在包围我军。慢慢地走进松林，听到有人说话，顺着声音找到他们，原来是第四团的准尉张兴亚、宜色春，班长玉林和二、三十名士兵在那里休息。我下马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把我的马接过去拴在一边松树上。我问第四团的情况，他们说我离开第四团阵地不久，苏、蒙军蜂拥般冲进阵地。机枪连、平射炮连和第三连的士兵大部未能退出火线，只有第一连和第二连的士兵撤出来了，但不知去向。高桥团长和木村团附见事不妙，夺过他们勤务兵金山的马，两个人骑着一匹退下火线。第一连长郝尔罗札布少校眼见苏军突入阵地，他忙提起一挺轻机枪，没来得及扫射，被击毙在阵地里。我们互相交谈当中，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看情况，如果苏军不追来时，我们可以先到后方补给所找点东西吃，饱一饱肚子再说。”由于过度疲劳，当夜就地睡了。

七月七日

黎明时，四面静静地，昨天撤退的那些士兵，不知都到了什么地方。前方听不着炮声。我和张兴亚、宜色春两个准尉商议，决定先回补给所看看情况。因此我们带领二、三十

名士兵慢慢地向补给所方向走去。午前八、九点钟，到了补给所。他们一切照常，好象平安无事。我见了少校军需谷垣长次。他身材瘦长，细细的脖子，黑黑的长面孔，特别是嘴唇发青，好象多年鸦片瘾者。他和几个日本军需官们坐在掩蔽部里，正在早餐。公文箱子上边摆着几筒已经打开盖的牛肉罐头、鱼肉罐头和福神清牌的咸菜罐头，饭盒里满满地盛着大块炖猪肉，身旁放着一大筒白酒和几瓶月桂冠牌的清酒，还有许多黄焦焦的豆油白面烙饼，正在大吃二喝。见我进来忙让我一同吃饭。我正饿了一天一夜，不客气饱餐一顿。一面吃，一面想士兵们在第一线，连高粱米饭都吃不着，饿着肚子拼命厮杀，他们却在后方享福。我吃完后走出掩蔽部去看张兴亚、宜色春和那些士兵们，他们也在吃高粱米饭。这时候曾根崎中校来到补给所，他是来收容退兵的，我把情况告诉曾根崎中校，问师司令部的情况时，他说：“师司令部还在原地未动。”曾根崎想和我一同去收容退兵，我想回师司令部，没有同他去，遂把张兴亚等人留在补给所，午后一点多钟，便单骑独马向西方师司令部走去。远远望见师司令部一棵松树附近，一发两发的零星炮弹在爆炸，别的好象没有什么紧张情况，便骑马走进司令部的沙坑里，看见师长戴着钢盔，穿着汗浸泥污的一件白衬衫，近视眼镜下边突出的鼻子格外发红，拄着战刀蹲在一个沙坡的斜面上，一声不语。野田顾问几天没洗的黑胖发灰脸上，配着满腮胡髭，一手提刀，另一支弯曲不直的胳膊，象发疯似地挥动着，不知在挥什么。老参谋长好象被判处死刑，苍白着瘦脸，蹲在师长旁边。我见师长行过军礼，报告情况，他很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转身来到阿勇巴图中校跟前，他说：“胡克！”



你回来作什么？”我当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师司令部已处在三面被包围的地步，苏军步兵迫近一、二百公尺的距离，接近白刃战阶段。在你来前一个多小时，师长宣布谁也不许后退一步，否则枪决。”我才明白师长和参谋长狼狈的原因。既然回到司令部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低声对阿勇巴图说：“如果真到紧急关头的时候，讲不起我们可以试验一下白云航中校教给的要诀，举手喊叫是蒙古人。”原来我们由沈阳出发时，白云航中校曾对我们说过，如果被苏、蒙军包围不得逃脱时，举手喊叫“蒙古人”：保险苏、蒙军不会杀害的。说完，我离开阿勇巴图中校独立骑兵连向“少年队”的阵地走去，望见阵地后面沙坑里摆放着三、四具短小尸体，旁边坐着几名十四、五岁的蒙古族少年队员，都用绷带裹头缠腿，呻吟流涕地等候他们最后的命运。这些小孩谁也预想不到在这里断送了他们少年的青春。同时“少年队”的一个队附有川中尉，满头蓄发，长达及肩，头上裹着一条印有红日光的平纹汗巾。腰插一把战刀，刀刃朝上，右手按着刀柄，活象一条疯狂的野狗。不知道他想准备切腹自杀呢，还是要杀人，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我军教导团在师司令部的南方约三、四公里的一个突出沙岭上，被七、八百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和十几辆装甲车团团围住，开展着激烈战斗。正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候，苏军炮兵忽然延伸射程向师司令部的东方进行猛烈地集中射击。原来日本军派来一个联队约三千余名，配属十公分口径的远射程加农野战重炮十几门来支援我军。

午后六时左右，日本军第一线步兵战斗前进，超过我军师司令部阵地，逐渐击退苏军，联队本部进入兴安师司令部

阵地沙坑里。日本军炮兵向苏军炮兵开始射击，于是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兵战。由于日本军联队长长谷川大佐阵亡，联队附一个中佐继任联队长职务，就在伪兴安师司令部阵地沙坑里举行就职仪式，拜受军旗。第一线各大队连接不断向新任联队长报告：“第一线各中队先后相继突入苏军阵地，并在继续追击。”八、九点钟，薄暮以后，联队本部也前进了，枪声渐远。包围教导团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也被击退了，伪兴安师司令部就此解围，松了一口气。

自从七月七日教导团遭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和装甲车的袭击和包围后，接连击退数次围攻并击毁“敌”装甲车三辆，虽然伤亡五十余人，但有力地掩护了师司令部的安全，使师司令部稍得喘息时间。师司令部方面这天损失也很大，“少年队”伤亡三十多名，队长日本人（名字忘了）也战死，伤亡占全队的将近一半，独立骑兵连也伤亡了二十余名。

七日八日到九日

天明，师司令部一方面派阿勇巴图中校、希拉布少校、包永福少校等去达尔汗山附近收容退兵，一方面派人扫除清理战场，收容负伤官兵，分别送往阿尔山和海拉尔后方病院。由于“少年队”伤亡过重，影响不好，命令撤回钱家店。这时人们交头接耳，互相谈论，说是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附德勤格少校和副官旺吉勒上尉，昨夜失踪，不知去向。

在师司令部南方三、四公里处，教导团曾被包围的突出沙岭，远看象一头跪卧着的骆驼，师长命名为“骆驼山”。这天清理战场的人们，从骆驼山附近拖回三辆装甲车，这是我军唯一的缴获胜利品。从车里拖出两具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尸体，曾根崎中校在旁边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我当是

苏联人，原来是混蛋老蒙古。”我当时听到，一时触动民族情感，好象骂我，非常刺耳。

从七月六日下午脱离战场的士兵们，三五成群，三、二十名一伙，有的休止在达尔汗山松林里，有的奔向宝格得敖拉山，其中人数最多约六、七百人的一帮，由教导团的一个中士班长名叫小喇嘛的和伪兴安骑兵第五团的一个班长率领，从宝格得敖拉山南方绕道直奔五叉沟而去。阿勇巴图中校等几个蒙族军官追到达尔汗山以东宝格得敖拉山一带，好歹劝阻住两千来人，收容回来，其他零星退兵和小喇嘛的一帮，已经走远追不上了。

在这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中，“兴安师”损失很大，原来四千五百余人，经过大力收容，仅剩二千六、七百人，损失将近百分之五十。其中最惨的是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原编制八百多人，现在仅剩高桥上校团长以下五十三人，全团被歼。因此除抽出三十名补充到独立骑兵连而外，其余二十名派到后方补给所充当炊事员，从事担水砍柴煮饭工作。高桥团长暂时成了补给所长，但他在补给所工作不到几天，就请假去沈阳休养了。从此第四团的番号在“兴安师”的编制里不见了。另外各种武器丢失损坏的很多。

七月十日

经过两天的整顿编制，调整了武器，补充了弹药。根据日本军司令部的命令，午后一时许，“兴安师”司令部及所属各部队，向南方骆驼山附近转移，司令部位置于骆驼山上，着手部署军队，准备明早拂晓攻击三角标高高地。午后五时许，师长和野田顾问召唤我，命令我为军官斥候（侦察），带领中士以下四名士兵，并拿出怀表来，把十二点时字指向

正北，平放在地上，命令从八点钟的方向前进，十一点的方向回来。主要侦察我军左前方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的兵力和三角标高高地附近的苏军阵地配备情况。我知道这次的任务是艰巨的，师长好象诚心和我作对，下的命令非常严肃，没有丝毫回旋余地。我只好接受命令。将待出发时，野田顾问把我叫住说：“你这次去侦察，存亡难保，如果被俘怎么办？”我毫不踌躇地说：“军人不能被生俘，执行自杀。”野田顾问说：“你是蒙古人，不能自杀，如果被俘，应当向蒙古骑兵宣传满洲国的好处，日军的强大，并争取将八百名蒙古骑兵带回投降我军。”我答应个“是”字，复诵了命令，骑上马带领四名士兵（中士班长敖特根巴雅尔、勤务兵昭德宝，另外三个士兵），向西南八点钟时字方向出发了。我在马上想，师长和野田顾问过于单纯，凭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本，三言两语就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八百骑兵说服带领过来，那么容易！他们愿意到我们这里受日本人的气，吃高粱米饭吗？

当时夕阳反射，对前方的敌情地形看不清楚。只得利用灌木、沙丘隐蔽掩护，一段一段地搜索前进。午后六点多钟，正在前进时，突然发现七、八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从左前方沙岭后边出来，向我飞奔，我迅速占领阵地，命令两个士兵牵马，我向士兵要过一枝马枪和敖特根巴雅尔中士及一名士兵据枪等待。及至他们前进到将近百公尺的距离时，我们三人一齐开枪，三个骑兵连人带马应声倒下，其他几名骑兵拨转马头奔向北高地，向我们应战。正在这时，从我右方发现几十名骑兵纵马袭来，手中挥动着马刀，闪闪发光。我考虑如果抵抗，非被包围歼灭不可，立即命令上马撤退。我骑

上马箭一般地退下沙岭，转眼跑过两个沙岭，收住马向后看时，敖特根巴雅尔中士也随后赶到，三名士兵没有来，估计他们的马慢，不是被俘，便是被杀。跟随了我十几天的昭德宝伙伴，从此再没有见面。任务没有完成，损失了三名士兵，这时已经日落天黑，我们两人只好往回走去。夜间十点多钟才到达骆驼山，师司令部已经前进，一个人也不见了。往哪里去找师司令部呢？正在这时听到骆驼山南方传来马达声音，有一个红灯光时现时隐，我估计不是我军汽车，很可能是“敌人”装甲车夜间侦察。我们赶快离开骆驼山向西北方走去。深夜里方向难辨，再不能盲目乱走。在一片灌木林下，将马拴好，在相离五十多公尺的另一片灌木林中歇下。凉风侵肤，顺风一阵一阵的飘来臭味，是什么气味呢？不管它，就地睡下了。次日黎明，隆隆炮声震醒了我们，急忙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土，回头看时，原来我们睡在四五具尸体附近。这些尸体已经腐烂，散发着臭味。我们找到了马匹，整理了鞍具，骑马朝炮声方向走去。午前十时许，望见前方有许多马匹在沙岭后方灌木中隐蔽着，这是我军第十二团的战马。我询问牵马的士兵们，知道第一线部队已经攻击前进，师司令部进入三角标高高地了。午前十一时许，我到了三角标高高地，向师长作了汇报，这次任务总算交代了。

三角标高高地，上有木制三角架，是日本军安置的地形测量交会基点（师司令部占领该高地后将三角架撤去），是诺门汗、诺尔台高地南端的一处突出高地，苏军阵地南侧的一个据点。设有两道密密麻麻的屋脊形铁丝网，构筑立射散兵壕，各种重火器掩体，一条一条的交通壕交织地连在一起。工事的内部为防止沙土坍塌，附有柳条篱笆。阵地附近修成

通往诺尔台高地和哈尔哈河一带几条平坦的汽车公路。可以说阵地组织周密，交通便利。站在三角标高高地上，远远地可以看见哈尔哈河两岸夹生着丛柳灌木，遮住了河水。

第一线的枪声一阵一阵地时紧时缓，但苏军炮兵对我军第一线和师司令部不停地射击，千百发炮弹连续不断飞落在每个阵地上。我们忙于挖掘个人掩体，并给师长、参谋长挖掘掩蔽部。我一直到下午七八点钟还没有吃到一点东西。

根据日本军的命令，要求“兴安师”守好三角标高高地，以掩护日军左翼安全。为此，师长命令各部一边作战，一边构筑防御工事。

### （3）“兴安师”防御

师长根据“兴安师”的任务，下达防御命令，进行兵力部署。右翼地区兴安师骑兵第五团和迫击炮团。左翼地区兴安师骑兵第十二团和教导团。师司令部和独立骑兵连在三角标高高地。

七月十二日到十五日

这几天来第一线方面，苏、蒙军没有反攻，只是局部战斗，不断冷枪狙击。但苏军炮兵却以大量炮弹，连日不断地集中轮番地射击我军各个阵地。我军伤亡相继，陆续拾下火线。

进行战场清理工作，这几天找到我军尸体二百余具，但由于天热腐烂，认不清面貌，每人虽有小木牌符号，多数遗失，不好查对，只好一车一车地运到后方补给所东南（沙岭后面）进行集体火葬，然后将骨灰装在一个一个小木匣里，根据各团报告的花名册在小木匣上填写死亡士兵的籍贯、姓名，骨灰是不是就是他的骨灰，天才能知道。（后来有这么

一个笑话，喀喇沁旗有个募兵名叫皮拉，在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入伍，于七月六日战斗中失踪，战争结束后，第四团派人将骨灰送到他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可是死皮拉到家不久，活皮拉生还，弄得一家老少哭笑不得。）

正在尸体焚化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名日本和尚，手敲着单面太平鼓，围绕着焚化场来回直转，念着日本经，意思是超渡亡魂，引起补给所的士兵大为不满，当面指骂：“我们还没有死，这混蛋和尚到这里念催死咒呢。”不管士兵如何咒骂，这日本和尚还是坚持念经。有一天夜间，补给所遭到严重空袭，堆积的物资全部烧毁，这个和尚才逃回王爷庙去。

第一线各部队的战斗紧张时期，日本军司令部来电话，说我军迫击炮连续射入日本军左翼阵地。曾根崎中校和我一同去现地检查，会见迫击炮团长中野上校。他身躯肥大，有爱睡的习惯，平时和他交谈，一不注意，他会鼾声大作，我们到他的掩蔽部时，他正在熟睡，好象平安无事。曾根崎中校问他炮击日军左翼阵地的事情，他一再否认，迷迷糊糊地走出掩蔽部，向迫击炮放列阵地走去，忽然遭到侧方苏军阵地的机枪扫射，他吓得踉踉跄跄地跑回，对我们喊叫说：“那不是敌人是什么。”曾根崎中校对这种糊涂人真也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一些“注意”，我们就回来了。

有一次，三架日军飞机被苏军十几架战斗机追击到伪兴安师司令部阵地上空，展开了战斗。我们阵地上有四架高射机枪，王海山中尉和我各使一挺对空射击，因为苏军飞机和日军飞机在高空现出同样的银白色，我们分不清“敌机”和“友机”，一阵乱射。几分钟后，忽有一架飞机尾部起火，冒着

黑烟向哈尔哈河西岸飞去。一机头朝下落到哈尔哈河边。另一机在空中闪了闪火光，即刻变成千万个碎片，雪花般飘落下来。空中出现十几个小白点，日本军的三架飞机完整无损，脱出重围向东飞去。当时日本人一齐喝彩，说“逃得好”。与此同时，由东方飞来十几架日军战斗机，向在空中飘荡着的降落伞反复冲击后飞向西方。一个降落伞落到三角标高高地附近，我们跑去看时，仅剩空伞，人没有了，想是被日军飞机在空中冲掉。

在这几天的战斗中，伪兴安师炮兵团的官兵仅剩五六十名，逃的逃，亡的亡。所剩四门四一式山炮，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放列射击，不时在这边发射两炮，就迅速转移阵地到那边放射几炮，只是来回流动。这一回又到师司令部右后方进入阵地，开始发射几炮，引来苏军大量集中炮火，成百上千的炮弹落在师司令部和山炮的阵地上，一时烟尘笼罩，人马相继伤亡。四门山炮被击毁三门，兴安炮兵团的寿命从此结束了，平川森上校因病也回后方休养去了。

后来从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派来一营野炮（三八式野炮八门）。新到的野炮营，想显示一下神通，在司令部的左后方，构筑放列阵地；但开始射击不久，同样招致苏军炮兵的集中射击，将野炮营的火力制压下去。士兵们心慌手乱，竟将泄火信管的延期分划，误调整为零对零的分划射击，以致炮弹将出炮口就爆炸了，把自己人炸伤了六七名。野炮营受到这次教训后，再也不敢逞强对苏军炮兵作战了。

有一天忽从高空飞来一架苏军飞机，向我军阵地上散布了大量传单，师长急忙命令人们不许看，送到师司令部一起焚烧。但我已拾得几张，藏在衣兜里，迨一看时，见印有德



勒格少校和旺吉勒上尉的照片，并有他们二人的发言，说“兴安军的蒙古官兵不要受日本法西斯的欺骗，进行蒙古人杀蒙古人的愚蠢事情，替日本法西斯充当炮灰，付出毫无价值的牺牲。蒙古同胞们，杀掉日本投过来吧，或者回家去吧，父母妻子盼望着你们早日平安回家呢。”这时我才了解德勒格和旺吉勒的失踪是投降苏军了。

从七月十六日以后，苏军炮兵的主力用在日本军方面，对伪兴安师只是在每天早晨七八点钟和午后六七点钟时，象有计划似地在我们吃饭时，发射一阵榴弹和散弹，使我们饮食不安。我们也抓住了这一规律，吃饭时间不定时，不是提前，便是挪后。第一线阵地前的情况稍有稳定，保持互相对峙局面，苏军一步也不退，但也不进攻。不时冷枪狙击，我军机枪射手或军官一不注意，不是负伤，便是阵亡，因而天天有伤亡。三五成群的苏军士兵，荷着枪，提着饭盒一类的东西，有时从我军阵地前缘走出，走向哈尔哈河西岸，有时从哈尔哈河西岸到这边来，往来不断。往往成群的苏军坦克渡过河从我军阵地前缘向诺尔台高地日军方向奔驰，我们也不阻击。但日本军方面，战斗仍然激烈，日日夜夜炮声不绝，熊熊火焰弥漫天空。每天都有双方的飞机进行着空战，互有胜负。我军后方运输各线，几乎完全被苏联空军控制，日间仅仅利用空隙时间，单车往来通行，大量运输完全依赖夜间行车。

这时伪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上将带领参谋阿思根少校（李友桐）和他的专属副官包启元上尉来前线慰问，于午前十一时到达三角标高高地。我们首先给他们准备了掩蔽部，并专设一个军用帐幕。巴特玛拉布坦上将原来是

礼贤特旗的世袭王爷，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扁扁的鼻子，脸蛋和鼻子几乎相平，上嘴唇蓄留一副黑油油的仁丹胡，一对大眼龙睛鱼般的突出面部。全身由于不常运动，胖的不平衡，上身肥大，下体细削，两只脚尖一贯朝外，迈起步来好似两条细腿支不住体重，一摇一晃地画着八字。

这位司令官给第一线官兵们送来许多香烟、白酒，送给师长和参谋长的特别高贵，有“维思忌”、火腿肉等。并召集各团长和司令部的军官训话，说“本职不辞千里路遥，特来慰尔将士，尔等应本着日满一德一心，共同防卫的精神，同心协力，英勇善战，为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和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尽忠效劳，奋勇破敌。且勿遇难而惧，临阵脱逃，方不愧为成吉思汗的英雄子孙、优秀后代。希尔将士莫负本职期望”等等。并要求我们把他的训话精神传达给每个士兵。讲话后，请他们进午餐。包启元上尉要求我领他到第一线阵地，过一过枪瘾。我答应晚饭后可以到十二团的阵地上去。午后六时许，苏军炮兵惯例向我军阵地开始炮击，又是一次黄沙与黑烟冲天，过了几十分钟，射击渐渐停止，我走出个人掩体，去探望三位贵宾。巴司令官满脸尘土，睁着大眼，仁丹胡子一角朝上，一角朝下。我问候：“将军阁下平安！”他呆呆地半晌没发言，假装镇静说：“没有什么。”这位世袭王爷初尝火药滋味，想必是吓坏了。我又看望包启元上尉，这位瘦小身材、能弹能唱、多才多艺、好诙谐的专属副官，面孔苍白，一声不语，蹲在掩体里。我说“出来吧，危险期过去了。”阿思根少校强挑起重沙眼的上眼皮，说：“这地方一时一刻也不能逗留。”这位满脑策略、东京陆军大学毕业的日本宠儿，才说出一句真心话。我说：“这

样生活我们已过了半月有余，习以为常了。”晚饭后，我请包启元到十二团阵地去过枪瘾，他说：“算了吧，已经过了炮弹瘾了。”次日拂晓，他们坐上装甲车匆匆离开我们回去了。

这时正珠尔札布上校来到阵地。自从德勒格少校和旺吉勒上尉投降苏军以后，日本人对我们蒙古族军官特别警惕。我虽是参谋，对作战计划根本见不到，连自己以为是日本人并且把名姓更改为“田中正”的正珠尔札布，轻易也看不见作战计划了。但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对我说：“日本军决定于七月二十日开始总攻击，现在集中了几十门十五公分口径的榴弹炮和十二公分口径的加农炮，于二十日开始向哈尔哈河两岸苏军阵地以及哈尔哈河西岸僧布尔敖拉山的苏军野战重炮阵地进行毁灭性地射击。”果然七月十七日午前，在我军阵地的右后方升起一个黑圆气球，我用望远镜看时，气球下边没有吊篮，说明气球上没有人。七月二十日，僧布尔敖拉山一带，满天积云，这天没有开始炮击。

七月二十一日天明

日本军的观测气球忽然变成灰色长圆形，下边吊有篮子，里面坐着三个人。午前七时许，炮击开始。苏军沿河阵地和河西高山上，一处一处升起黑烟。苏军炮兵亦与应战。日军第一线部队也开始了总攻击。午前十时许，从我军阵地前方飞来一架苏军E16型战斗机，低空飞行，离地面仅数公尺，沿着沙丘起伏棱线，直奔气球冲去，气球立即起火，摔掉下来，上面的三位日军炮兵观测军官和气球同归于尽。日军炮声顿时停止。约半小时后，日军轻重爆击机从东北方向大批飞来，每六架飞机为一编队，约数十组编队，向僧布

尔敖拉山和沿河两岸的苏军阵地，进行低空爆击，轮番俯冲。日军第一线地面部队，已经迫近河岸，一部先头部队冲过河去。苏军沿河两岸阵地的士兵，受空、地夹攻，全线向僧布尔敖拉高地撤退。这时从僧布尔敖拉东西山口以及平坦的山顶上，涌出六七百辆坦克，布满了山野，撤退的苏军步兵，随伴着坦克复又返回阵地。苏军大批战斗机冲进日军机群。双方高射炮发射不停，展开了激烈的陆空大战。午后三四点钟，日本军地上部队被迫退回原阵地，这次总攻未成功。从此日本军改变了作战计划，只作局部攻击，没有进行全面进攻。我军阵地和往常一样，只是双方互相射击，没有变化。

这几天，我军后勤方面运来许多啤酒、日本清酒、白酒、牛肉罐头以及饼干等各种食品，分配到第一线各团队和师司令部，日本军官都得双份，而蒙古族军官却分得一份，士兵们简直什么也分不到。说是“日本人生活水平高，蒙古人不习惯吃喝。”待遇非常不平等。

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秀一上校，将分配的食品放在自己掩蔽部外，堆积如山，给全团士兵们宣布，这些食品现在不分配，等攻过哈尔哈河，占领僧布尔敖拉高地以后，准备开庆祝宴会使用。可是他自己却每日三餐，喝得醉生梦死。

自从“兴安师”防御以来，每日都有几十名伤亡官兵退下火线。有一个士兵脚腕被打碎，曾根崎中校看见说：“这小子想是逃跑才被射中脚腕的。”我听到非常不平地说：“不一定是逃跑，即便是前进也有被击中脚腕的可能性。”日本人对待蒙古人就是这样残暴，替他们拚命作战，还不说一句好话。

临阵逃亡事件不断发生，派出去的斥候和联络兵，往往一去不返。老师长想出个办法，打算将马匹全部送到后方，一方面可以保护战马安全，增加战斗兵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士兵乘马潜逃。野田顾问不同意，认为马匹是蒙古骑兵的生命，如果使士兵离开战马，全部送到后方，说不定会造成更大的乱子。顾问是关东军的军事代表，师长也不得不听，只好作为罢论。

补充的新武器和各种弹药，从后方源源而来。但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们，却一天比一天减少下去，后继无人，只好将补充来的武器弹药，堆积在师司令部的右后方隐蔽马匹的附近。

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的军官和士兵伤亡严重。缺额三名连长，师司令部派加藤上尉、宫本中尉、杉森中尉三人去第十二团担任连长职务。加藤上尉原来是伪兴安骑兵第五团的连长，一九三七年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出动关内攻击大同时，加藤上尉以作战有功，曾得过一等金质武功十字勋章。他们到第十二团就任不几天，发现哈尔哈河附近有一群马在那里放牧，他们三人擅自挑选各连强壮士兵八十余名，率领前去赶这群牧马。没想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军早有准备，等他们走到马群附近时，四面突击包围，仅跑回两名士兵，其余全部被歼。

七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

一天午前十时许，天气燥热，我们在帐幕里乘凉，苏军爆击机约三十余架从西方高空向我军阵地飞来。与此同时，忽有七十余架E 16型苏军战斗机，沿着沙丘起伏被线，低空飞行，冲到三角标高高地，闪电般对我们进行轮番反复扫射。我急忙向自己的掩体跑去，这时里面早坐有一个人，原

来是师司令部属官山田章。个人掩体容纳不下两个人，我只好半身外露，半身在他和他挤在一起。苏军战斗机反复扫射时，我抽空忙用照像机对准摄影拍照。山田属官不耐烦地对我说：“什么时候，还有心照像。”我说这样镜头千金难买，不死时带回家是很好的纪念品。

七月三十一日

夜间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阵地被苏军步兵攻陷，田中团长带领残缺不全的两个连跑回师司令部阵地，将许多弹药和堆积如山的准备攻到僧布尔敖拉高地开庆祝宴会时使用的各种食品，全部抛弃在阵地上，成了苏军的掳获胜利品。他显得非常狼狈，师长命令他们和独立骑兵连合在一起，在师司令部南侧构筑阵地，进行防御。

听堀内章少校说，日本军一个联队约三千余人，于七月二十一日由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率领，迂回到贝尔诺尔湖西岸，偷渡国境，挺入苏军背后，经过连续八昼夜的苦战，仅跑回一百余人，联队长以下全部被歼。这几天我军第一线阵地，步步被迫后退。苏军炮兵又开始整天不间断地射击。我军左前方发现一千余名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和二十多辆装甲车，挺入我军左后方，遮断了交通线。“兴安师”占领的阵地面积一天一天在缩小，官兵一天一天减少。“兴安师”全军被压缩在三四百平方公尺的狭小地区，情况愈来愈严重。这时师长、参谋长以及日本军官，对我们蒙古军官更加警惕，加强了保密。我除了目睹耳闻以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又不敢问，怕问出麻烦来。官兵普遍流露厌战情绪。听说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的石兰斌步兵旅来接替“兴安师”，但久无音信。

第十二团派出的军士斥候，斥候长徐尔逊札布准尉回团报告说，有八百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已逼近第十二团阵地前方，约在一公里的沙丘后面。曾根崎中校和我去第十二团阵地了解，看前面沙丘后不象藏有八百名骑兵的征候，曾根崎中校让我去请田中秀一上校报告情况。我走到田中团长的掩蔽部，他正在熟睡。我请他时，他慢慢地随我走出掩蔽部，来到沙丘顶上。曾根崎说：“请你把前面敌情介绍一下。”田中上校用手指划着说：“前面沙山后潜伏着八百蒙古骑兵，千真万确。”曾根崎要求田中团长立即派部队攻击，试探一下是否真实。田中上校遂命令鄂文良上尉带领一连进攻沙山。鄂文良上尉指挥散兵攻击前进，攻到山下，不见敌军射击，攻到山腰，也没有枪声，攻到山顶，鄂文良挥动帽子，表示通知没有敌兵。我们都笑了。田中上校面红耳赤，火炮似地把徐准尉怒骂一顿。

这一时期派遣的斥候，差不多都是虚报情况，互相欺骗，上下隐瞒。

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长沙焕章中校因病退下火线，所剩一百余名士兵补充给教导团。这时官兵战斗意志大大下降，天天盼望换防。

八月一日

午后二时许，苏军爆击机约三四十架飞到我军阵地投下大量炸弹和烧夷弹，全线阵地刹时变成一片火海，露天堆积的弹药全部燃烧起来，自行爆炸。师司令部的马匹，全被炸伤炸死，我那匹心爱的白马也在其中。野田顾问负了重伤，阿勇巴图中校背部负伤，官兵伤亡很多。当夜把野田顾问和阿勇巴图等官兵用卡车送往海拉尔后方病院。

八月二日

这时全师官兵不到二百人，人心恐慌。左侧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渐渐构成包围形势，遮断了退路，我只好从日本军的后方通往补给所。午后三时许，左侧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开炮射击师司令部，野村登龟郎中将师长，头部划破一道口子，他便急忙将师长职务移交给后藤外马参谋长，带领王海山中尉副官匆匆离开阵地，奔回海拉尔休养去了。山田属官对我说：“最好耳朵穿个洞，也好下火线。”他是在讽刺老师长。

八月三日

天明，参谋长召集军官讲话，说：“蒙古人不论官兵，把武器留下全部撤退（后援部队不来，官兵情绪非常不好，再坚持下去怕出乱子），日本人全部剩下，最后决战，死守阵地。”我乘此机会坐汽车到后方补给所。巧遇梁濂部队的一名上尉日本人（名字忘了）自己驾驶一辆指挥车想回阿尔山，我就坐他的车回阿尔山，从阿尔山坐火车直回郑家屯，向伪军管区司令部请了一个月假，回原籍喀喇沁旗休养。

后来我听说，后藤参谋长宣布“兴安师”蒙古族官兵撤退时，蒙古人全部留下武器撤退了。只有正珠尔札布未走，和日本人在一起，坚持到是日午后八时，将阵地交给日军的一个中队。他们三十名日本人和一名蒙古人正珠尔札布，于是日夜间全部撤退。八月四日拂晓，苏、蒙军占领了三角标高高地，将一个中队日军完全歼灭。从此诺尔台高地日军阵地受到严重威胁。

“兴安师”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严重，大败而回。从开始四千五百余人到最后只剩三十一人。（其主要原因详第三



部分沈阳会议)

### (三) 第三次诺门汗战争的概况

八月五日

驻齐齐哈尔伪第三军管区的一个混成旅——石兰斌部队，包括步兵二个团，炮兵一个营，约五千余人。从阿尔山下火车，徒步行军开往诺门汗，沿途遭到多次苏联空军袭击，损失很大。开到达尔汗山附近，还没有进行正式战斗，部队发生叛变，杀掉日本军官，一个营、一个连地投降苏军。石兰斌少将虽然积极整顿部队，已经扭转不了混乱局面，不能作战。因此迅速将该旅调回原防地。伪第三军管区的顾问报告关东军司令官，石兰斌少将治军不善，需按军法会审处理。

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苏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大反攻，日军被迫节节后退，苏军又全部占领了诺门汗高地，并进兵到达尔汗山附近。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下令于将军庙、宝格得敖拉山线上，集中十二个步兵师团，企图决战。但日本当局命令驻苏联的东乡大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于九月十五日双方停火。

九月二十日在将军庙南侧莲花山，举行大内少将以下阵亡将士的合同慰灵祭。

这次战争历时五个月，日本军官兵死伤二万八千人。百分之九十死伤于苏军炮火之下。“兴安军”没有详细统计数字，也没有公布。“兴安师”方面，焚化的尸体三百一十多具，被俘三百三十余名（交换俘虏的数字），其余大部是逃

亡。

这次战争，日、苏双方损失伤亡都很大，最后日本军终归惨败。

## 第三部分

### （一）“归还兵”

在七月六日的战斗中，“兴安师”第一线各部队的士兵，大批脱离战场，逃向达尔汗山和宝格得敖拉一带。经军官努力劝说并保证不处分，才收容回绝大部分，又参加了战斗。小喇嘛等率领的五六百人，不敢归队，从宝格得敖拉通过阿尔山北部兴安岭森林，直奔五叉沟、白狼车站（因为阿尔山有日军防守，不准通行）。

小喇嘛是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的中士班长，诺门汗战争前，曾因公去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喇嘛库伦庙，私自收买一些牛羊皮，来王爷庙贩卖，从中取利。不料被宪兵查获，以违犯皮革统制法的罪名，扣押在王爷庙宪兵团。后来诺门汗战争爆发，教导团配属“兴安师”出征，因此学校顾问泉铁翁大佐从宪兵团把他要出来，使他带罪出发，在战场上立功赎罪。他在这次战斗中没有立功，反而率众临阵脱逃，这是小喇嘛不敢归队的原因之一。其次在战场上连续几昼夜进行残酷战斗，得不到饮食，加上苏、蒙军的政治宣传，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也是主要的原因。

小喇嘛部到白狼车站后，驻了两天。这时贡布札布（包文贵）中尉从王爷庙到白狼车站，进行宣传招抚。由于贡布

札布中尉的态度生硬，摆出军官架子，惹起归还兵们的不满，使用刺刀将贡布札布中尉刺死。

关于“归还兵”的名称，小喇嘛等本来是临阵逃亡，按“满洲国”的陆军刑法规定，凡是临阵逃亡，属于违抗命令，“不论主从，一律判处死刑。”这次逃亡事件，因为人数过多，同时为了迅速平定下来，缓和矛盾，解除逃兵顾虑，避免扩大事件起见，在达尔汗山、宝格得敖拉一带时叫“离脱兵”。对小喇嘛他们叫“归还兵”，用意是称呼他们是回家来的兵。尽力讳避“逃兵”二字，这是日本人用的政治策略。并通令沿途各地军警不准阻击，尽可能满足“归还兵”的各种要求，尽量供应。

“归还兵”沿着铁路附近一直东进，到达归流河车站附近。王爷庙军官学校顾问兼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大佐派白云航中校去归流河招抚，并送去许多慰问品。经白云航中校劝说招抚，收容了一部带回王爷庙。但小喇嘛等始终不听劝说，带所剩二百余人，窜入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在六户、学田地、宝石沟、杜列毛特一带活动，凑集一些散兵惯匪，又扩充到四百余人。这时他们完全变成地方土匪，到处抢夺，奸淫妇女，造成地方上极大混乱。

诺门汗战争失利以后，“兴安师”的部队大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说是苏联军进入“满洲国”，日本即将垮台。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驻防巴林左旗林东的兴安骑兵第六团的第三连和机关枪连二百余名士兵，以不堪日本连长的打骂虐待为名，携带全部武装，由上等兵聚宝等率领叛变。先到白音卜统，后转到开鲁西双合兴，在双合兴大门外枪杀了招抚军官王秀兰上尉。又移转到查卜干庙东北方黄羊

洼村，驻了三天。该村居民大部分是汉族，聚宝部进入该村后，大肆抢掠奸淫，十五六岁到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无一幸免。时值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部附王新之上校赶到该村招抚，聚宝等给王新之送去一名妇女过夜，该上校也收纳，后来引起“兴安军”的军官普遍反对唾骂（不久将王新之免职）。

当时巴林左旗的日本参事官大为恐慌，叛变要求什么就给供应什么，如大烟土、香烟、洋服以及牛羊肉、白酒等等。只要叛兵们肯接受招抚，用尽全部力量供应。

聚宝部从黄羊洼又窜入科尔沁右翼中旗北部，在杨得胜窑、喀喇沁爱拉附近，与该地警察队遭遇，交战数小时，击毙警察队长胖小儿，聚宝部也被击毙五名。这时原第六团团团长，当时任通辽司令部参谋处长洪景祥中校到聚宝部，利用过去旧隶属关系，进行说服劝导，聚宝等同意归降，但提出条件：（1）将第六团第三连长和机关枪连长（都是日本人）撤职查办；（2）不回第六团，要单独成立部队，并要求在查卜干庙驻防；（3）不咎既往罪名，保证聚宝等几个领导头人无事。洪景祥中校与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大佐联系，完全同意要求，并指示在东科中旗舍伯吐村集结受编。同时驻通辽的兴安南省警备司令部派达理札布上校和副官处长关雅亭少校到小喇嘛部招抚。小喇嘛的条件不高，只要不判罪，保证生命，情愿归降。

一九三九年十月上旬，聚宝和小喇嘛部先后集结在东科中旗舍伯吐村，当时兴安南省警备军参谋长德永恭助上校率领兴安骑兵第十一团到舍伯吐村点名。将部队部署在村外，命令聚宝部去阿鲁科尔沁旗查卜干庙驻防，命令小喇嘛部进驻通辽。

十一月上旬，在通辽市内以训话为名，将小喇嘛部全部解除武装，并把小喇嘛为首的十七人提交军法处会审审判。与此同时，德永恭助上校赴查卜干庙打算解决聚宝部。德永上校到查卜干庙时已中午，不知谁向聚宝等透露了消息，聚宝当时率部撤出查卜干庙街。但德永上校早已布置第六团的一二两连和第三团的两个骑兵连在查卜干庙近郊待命。因此将聚宝部包围在查卜干庙西北山上，交战不到两小时，全部缴械，于是日午后六时许将聚宝等十八名头目，徒步赶到查卜干庙警察署，德永上校立即命令枪决。薄暮时把他们十八人赶到南门外山坡上，执行枪决。次日检查尸体时，只剩十七具，其中一名伤轻得脱。

在通辽军法处，对小喇嘛等进行多次会审，最后判决死刑。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在通辽南门外沙坨里执行枪决。

其他一般逃亡叛变的士兵，遣回各原部队，编造名册，分别遣散回原籍，并委托警察、村长看管监视，后来部分派到矿井工地，强迫其终身劳动。

不论“归还兵”或是“叛乱兵”，普遍反映了蒙族青年对日本法西斯的反抗情绪。但当时没有政治领导和政治目的，因此流为土匪，反而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引起受害居民极大愤恨。日本当局枪杀他们，也是借此以平民愤，缓和日本与东北人民矛盾的一项政治措施。

## （二）交换俘虏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我在王爷庙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时期，伪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少校军法官白

晓东从海拉尔到王爷庙，曾在我家住了几天。我们谈到诺门汗战争时，白晓东对我谈过交换俘虏的情况如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日、苏双方在满洲里互换俘虏。日本军的俘虏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派人来接收的。“兴安军”的俘虏是由第十军管区司令部派参谋、军法官、宪兵接收的（那时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撤销，建立第九军管区司令部于通辽。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在海拉尔）。白晓东军法少校和宪兵团长（名字忘记）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兴安军”俘虏共计三百三十一名。其中有日本人军官三名（没有蒙古军官），两个日本人中尉（名字不详），一个是兴安师司令部副官佐藤上尉。他们是七月二日派往日军司令部取联系，在胡拉斯台河岸附近被俘的。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和宪兵团将接收的三百余名蒙古士兵，分别编造花名册，遣散还乡。将三名日本人军官扣押在宪兵团院内三个房间，不使互相通气。过了几天，一名中尉服毒自杀，留有遗书，另一名中尉用手枪自杀，死在房后墙角，也有遗书。这次轮到佐藤上尉头上，有一天夜里在佐藤上尉房间里大摆酒席，有日本人军法上尉和宪兵团长（日本人）陪同佐藤上尉喝酒。他们二人劝佐藤自杀，佐藤反对说：“苏联军没有杀我，你们为什么杀我呀？”军法官和宪兵团长一再劝说，非自杀不能表达对日本天皇的忠心。佐藤说：“如果你们这样相迫时，请你们把我带到诺门汗高地，我在那里自杀好了。”他们三人相持到深夜。次日早晨发现佐藤上尉自杀，平整地仰卧在炕上，尸体上复盖一面日本国旗，并有很长遗书一份，这是日本法西斯对待被俘人员的控制政策。

### （三）德勒格与旺吉勒

听说德勒格与旺吉勒二人于七月六日投降苏、蒙军后，在乌兰巴托住了一个时期，后来他们二人从乌兰巴托回到厚和市（即呼和浩特）。德勒格到厚和市以后，逢人便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如何好，不分对象场所，到处宣传。在日本法西斯在伪蒙疆统治时期，弄得当时人们谁也不敢接近他，特务到处监视。他没有办法，只好到山西省五台山当了喇嘛。后来据说金川耕作大佐（当时通辽特务机关长）派人把他带到东部失踪了。

旺吉勒到厚和市后，玩阔气，从东部哲里木盟把他的家属也接到厚和市。一九四五年春天，在王爷庙特务机关工作的拉西德瓦上尉对我说，旺吉勒被扣押在王爷庙街北上坎“保护院”（集中营），到是年八月十一日在“保护院”被日本人集体屠杀。

### （四）沈阳会议

沈阳东山嘴子“中央”陆军训练处的高等军事研究班，在我们参加诺门汗战争以后，由于战时关系，该研究班暂时停课。九月十五日停战以后，该研究班于十一月一日开始复课，我们又被召集到沈阳学习。十二月中旬，听说“兴安军”方面的高级日本军官都到沈阳，在沈阳旧城大南关里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原张作霖官邸）开会。我们同学曾根崎中校和堀内章少校也被召集参加会议。正珠尔札布上校和白云航中

校说：“他们开什么会议，我们去看一看。”于是一天的午后，阿勇巴图中校、正珠尔札布上校、白云航中校和我四人打算到会场上听一听研究什么。可是当我们到大南关里第一军管区会议室门外时，堀内章少校出来说：“你们如果有事，可以晚间到沈阳旅馆。”因此我们知道是开的秘密会议，未便参加。

一九四一年我和堀内章少校都在一起担任教官。有一次我到堀内章家喝酒，谈起沈阳会议的事情，堀内章透露的情况如下：

沈阳会议共七天，主要研究今后对“兴安军”的方针政策，总结诺门汗战争的经验教训。由治安部最高顾问花谷少将主持，有关东军参谋人员参加。“满洲国”军方面参加的有第三军管区的参谋长、第一军管区参谋长、陆军兴安军官学校顾问泉铁翁大佐、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大佐、兴安师长野村中将、参谋长后藤外马上校、伪兴安骑兵第四团长高桥上校、第十二团长田中上校、迫击炮团长中野上校、炮兵团长平川上校、曾根崎中校、堀内章少校等三十余名日本军官。

会议上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是“兴安军”空有虚名，不能作战，不如撤销“兴安军”改用警察；另一种意见是“兴安军”发生逃亡的原因，不能加罪于蒙古人，因为使用上有问题。再有“兴安军”逃亡，都往回跑，不象石兰斌部队成营成连地投降苏联，认为蒙古人比汉人可靠。

最后花谷少将下的结论，说“兴安军”失败的原因是：

（1）战略上的错误。不应该以蒙古人去打蒙古人，以后应使用蒙古人往南方去打八路军，以避免民族问题；（2）凡



是日本人充当团长的团，逃亡人数较多，蒙古人当团长的团逃亡较少，战斗力也强。因此都换用日本人当团连长的方针是错误的，今后应当除重火器部队仍应由日本人充任团连长外，一般骑兵部队完全应该用蒙古人当团连长，好掌握使用方便。“兴安军”应该建立步兵。（3）战场上待遇不平等，临时凑编，伙食供给不好，装备低劣。这都是失败的原因。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认为蒙古人头脑单纯，兴安省是他们绝对可靠的根据地。但他们没有想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前后的几天当中，痛恨日本人、杀日本人最激烈的还是“兴安军”。

#### （五）小喇嘛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参加第二师长城户常规少将指导的现地战术，在泰来县的街上住了几天。有一次晚饭后我和王海峰少校在街头散步，忽听背后有人喊我，回头看时，不觉大吃一惊，经军法处会审已经执行枪决的小喇嘛，突然出现在面前。小喇嘛说：“咱们到一家饭馆谈一谈。”于是我们三人走进一家饭馆，当时日本统制烟酒，饭馆没酒。小喇嘛出去，不一会拿来一小瓶白酒和一大瓶“月桂冠”牌的名酒。我们边吃边谈，我们问他的遭遇情况，小喇嘛说：“在通辽军法处会审把他们十七名判处死刑，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押到通辽南门外沙坨里执行枪毙时，金川大佐坐着卧车赶到刑场，问小喇嘛还有什么话说，小喇嘛说：“投降时已有条件在先，保全生命，为什么现在要枪决，不履行诺言？”

金川大佐说：“现在还不晚，如果你能给我终身服务时，我可救你不死。”小喇嘛当时给金川大佐叩头，认他作干父。同时要求对一同处决的汪海龙和另外一人（名字忘记）赦免处死。金川大佐同意，当时赦免小喇嘛、汪海龙和另一个人的死刑，将其他人完全枪决后，带他们三人回到特务机关。金川大佐对小喇嘛说：“真的小喇嘛业已枪决上报，你现在不是小喇嘛了，而是另一个人了。”

从此小喇嘛当了国际特务，曾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三次。他的工作方法是两头说实话，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据自己知道的照实说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内防人员，回来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也照实说给金川大佐。我们谈到深夜才散，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这位“神秘”的小喇嘛。

# 肇 源 事 件

鲍靖方

## 前 言

肇源事件，是徐泽民同志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十二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白山黑水和松辽平原上，展开英勇无比的游击战，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鼓舞了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得到了沦陷区人民支持的具体表现。

我是该事件的当事人。在“抗联”袭城后，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下面叙述的，没有扩大和缩小，都属于真实情况。那时候，我没有人民的立场，只有民族主义的“中间”立场。如认为，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大国，我们蒙古人不能得罪任何一方的想法，就是证明。

我在叙述中用了第一人称，这样比较容易说明问题，但个人文化水平有限，有错误的地方，还请读者指正。

鲍靖方是政协呼盟委员会驻会常委，事件当时使用的名字是“额尔和谟毕勒格”，简称“额旗长”。

## (一)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晚十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在徐泽民同志的指挥下，以三十六人的武装力量，袭破了伪郭后旗（郭尔罗斯后旗）公署所在地肇源街，杀死了十一名日本人，缴获了不少枪械和物资，并把三泰粮栈的搜荷（搜集）粮谷分给群众，还出了布告，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九日早七时，抗日联军十二支队从肇源街撤出时，已经变成了一百多人的武装力量。这就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胜利信心。

这时东北抗日联军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抗日将领杨靖宇、冯中云、王名贵等同志的领导下，已坚持抗日战争十年之久。在此十年当中，由于“抗联”有救亡的决心，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且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终于获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抗联”有了人民群众的雄厚的政治基础，所以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英勇无比的游击战；有的还到平原地区袭击城镇，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提高了人民群众反对伪满洲国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觉悟。

## (二)

事前我到日本进行了行政视察旅行四十天，于十月二十五日回到伪旗公署。这时候，三浦参事官（副旗长）对我

说：“旗长到日本去以后，日满军队和我旗警察讨伐队一千多人，于十月十二日，在前敖木台屯（距离肇源街东南二十里）消灭了共匪四十余名。旗长失此立功良机，甚为可惜。”同时，看到他的神气傲慢，不可一世。我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从七月以来，经由密山、东兴、海伦、呼兰、兰西、肇东、肇州等县，窜入郭后旗（现在改为肇源县）境内的。这次算是把共匪消灭干净了。”我说：“这是保境安民，剿匪除害，有啥了不起，更谈不到什么立功呢。”他接着有些不满意地说：“共匪不同土匪，他们不为抢夺财物，因此，他们是最可恶的东西，不能不注意！你是不知道的。”

十一月六日晚间下起雨来，半夜后，雨变了成雪，边下边冻，所有的树木杈杈和电线上都挂上了冰溜，更因天亮时刮起大风，树枝折了不少，电线杆倒了一大半，各地的电话都不通了。

八日晚十一时，我在家里刚躺下，突然听到枪声，慌忙跑出来细听，枪声是从大楼后边的警务科发出来的。警务科的后一排是枪械仓库和宿舍。我立刻跑到三浦参事官的宿舍，找他研究，到后才想起他已上哈尔滨去了。但是，炕上倒着一个人，原来是新转来的田中警务科长。我说：“警务科发出枪声，不是土匪进来了？”他带着沉醉的口气说：“日本人‘有’的地方没有土匪。”他仍然倒在炕上，再不说话了，我看出他的妻子异常恐慌。我刚跑出参事官的宿舍，没走两步，就被“抗联”战士抓住了，看到他们穿的很破烂，不象个军队。乍一看见就同“乞丐”一样。这时候，“抗联”战士急快地把枪械仓库的门锁用斧子打坏了，从仓库里

拿出了重机关枪一挺、轻机关枪二挺、大小枪一百余支。

“抗联”战士们把轻、重机关枪试验的结果，枪声嘎嘎，完全好使。他们很高兴地说：“顶呱呱！”随后，“抗联”战士把我带到电话交换台的屋子里，我看见十余人都在炕上坐着。我能认识的有四五个人，不过都是面面相觑，默默呆着。

这时候，有一位“抗联”战士讲话了。他说：“汉人、蒙古人都是中国人，你们都不要害怕，啥事也没有。”他又说：“这里的旗长是蒙古人，他还会说日本话，可是根据老百姓的反映，他对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好，否则，今天就要他的命。”听了他的讲话，我心里想：“抗联”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个人的不被杀，是借了“中国人”的光。因此，感激不杀的心情“油然而生”。

接着又有一位“抗联”战士唱起歌来，用的是《林黛玉悲秋》的调子，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虐政。歌词是：“开拓占地、粮谷出荷、苛捐杂税、统制经济、要国兵、要劳工……。”唱了约二小时，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地送入了所有人的耳里，委婉悲惨，令人泪下。经过这一宣传教育，我的心里感到亡国奴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抗联”战士把伪旗公署的枪械和物资全部拿走以后，一把火烧了伪旗公署大楼和枪械仓库。九日早五点钟左右，撤出了伪旗公署院子。但是，我们仍在电话交换台的屋里沉闷着，听外边啥动静也没有，才出去看一看，果然“抗联”战士都走了。这时候，我才认清十余人中多半是监狱的看守和轻罪犯。我就带着一个人先到我的家里去，家小都没有了，估计也没啥危险。我跑到职员王兆珩的家里去暂时休

息。同时看到很多人背着口袋，拿着水桶来来往往忙个不停。我打发王兆珩上街去打听一下“抗联”的消息。他很快地回来说：“‘抗联军’在七点钟撤出了本街。可是街里的秩序很乱，刚才看见的人们是拿‘三泰粮栈’的粮谷的，还有很多人都到旗公署院里去拿东西，旗长快去想办法制止。”因此，我同王兆珩又找了些职员们到了伪旗公署院里，看见一千多人在拿东西，还有的进到日本人家里去拿被褥和其他物品，在此情况下，我就大声喊着说：“这儿不是你们捡东西的地方，你们快快离开这个院子，倘被快到来的日本军队堵住，都有生命危险。”这样，他们才跑出了伪旗公署的院子。

我们到日本人的宿舍检查的结果，日本妇女和小孩都安全无恙。因此，我佩服“抗联”的纪律严明。看到特务股长梨本家里的炕上摆着两个大桌子，中间各有一口火锅子，并摆着炒、溜、煎、炸等菜，还有各式各样的酒类七八样，丝毫未动。可是梨本、高桥（警务股长）两个人被红缨枪刺入胸膛而死，满炕血迹斑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下场的预兆。

这时已经十点多钟，在街上被蒙汉人家掩护救命的日本人约有二十余名，陆续来到伪旗公署。最后，在伪旗公署院内外发现十一具被杀的日本人尸首，当即分别派人看守，根据“死尸不离寸地”的法律常识，以待使日本人看到实际情况。

### （三）

九月十一点钟，日本军队乘三辆大汽车到了。日本军官

粮场部队长气势凶凶、怒目斜视地问道：“共产匪怎样进来的？”我把见到的实际情况说了。他问：“这个事件怎么发生的，你能知道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他横持刀柄，冷眼瞪视。这时候，又有一个日本军官对他说了些什么，粮场部队长就说：“你去吧。”随后，日本军队把城门都关闭了，断绝了交通，带着伪警察挨户检查，颇为严厉，人心慌慌，不寒而栗。在此情况下，我估计自己的性命已危在旦夕，十分恐惧。

过了一小时，伪滨江省警务厅警务科长山崎和本旗参事官三浦等人来了一大汽车，我迎接了他们后就回到家里。随后就有一名伪警察到家里对我说：“旗长知道吗？日本人要屠城。”我经过冷静考虑，觉得怕死已不济事，于是勇气顿生。又过了半点钟，山崎找我谈话。我到警务科里见了山崎、三浦和其他几个日本人。山崎以严肃的态度向我问事件发生的线索，我回答说：“事件发生的线索茫然不可知。”他们认为不可能。表示了怀疑的态度。我在此被逼的情况下，坦率地回答说：“你们日本人对于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我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强国；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国。因此，这个事件是强国与大国之间的斗争问题。我这个蒙古人——弱小民族，自然不可能知道事件的线索，这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事情。今天你们这样怀疑我，我死也不能瞑目——冤枉。”这时，他们都说：“不杀你！只是问一问事件的线索，知道最好是说一，说，如果不知道那也没啥。”山崎又问：“共产匪把你抓住以后，说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把我抓住以后，带到电话交换台的屋里，看见有十余人，内有认



识的四五人——值宿的职员们。这时候，有一个人对我们说：“汉人、蒙古人都是中国人，你们都不要害怕，啥事也没有。”他又问：“还说什么了？”我答：“再没有说啥。”

山崎很生气地说：“听说是民变了，是实在吗？”我回答：“这是什么说法呢？如果民变了，把全城的日本人都杀了，那才算是民变了。全街日本人有多少，我不很清楚。”他说：“六十二人。”因此，我说：“除了出张的，逃跑的和妇孺以外，仅能有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昨天夜里在共匪攻破本街以后，受到满、蒙人家的掩护救命，有的把日本人隐藏在菜窖里、被褥里、柴堆里……。共匪挨家问：‘有日本人吗？’只回答：‘没有’就算完事，连屋子也不进。根据满、蒙人的报告：日本人都有很多的钱，怀里一掏，就是五百、八百、数千元不等，他们做了汉人的作揖、蒙古人的下跪叩头等礼节，事后硬要把钱给救他们的人家……。”对此，我说：“那些日本人是为了性命的安全，一时性急的行为，当然不能认为奇怪。但是，这是坏事情中的好事——日满协和精神的彻底表现。”我又说：“我以前很是崇拜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不怕死，可是据昨晚的实际情况来看，人都是怕死——好死不如歹活。”山崎有气地说：“他们都不是日本人！”我以很自然的态度说：“那末，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东京、大阪、九州、四国、北海道的人吧？总之，我认为这次事件日本人少死了，就应该庆幸。”他又说：“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我说：“如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可受严惩。”他说：“好！我调查调查就会明白的。”我还继续说：“这个事件的发生，固然与天气不好、电信电话不通有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警察人员自

从前敖木台屯战斗胜利——消灭共匪四十余名以后，警戒心松懈造成的。你们到特务股长梨本家里去检查一下，就会明白了。他的炕上摆着两个大桌子，每个桌子上都放着一口火锅子，还有各种炒菜和各样酒类。梨本和高桥二人的死，都是被共匪用红缨枪刺入胸膛而死的。因此，我认为这些人的死，不能承认他们是尽忠于天皇陛下，相反的，死了还有应得之罪。”山崎他们都默然沉闷着。最后，他还说：“你还是找一找事件发生的线索。”我答：“为了给死者们报仇，不能不好好地调查。”这样就结束了谈话。

#### (四)

洗城的话流传开了，闹得全城人心慌慌，大有死在眼前的景况。我冷静考虑事态的发展，做了些随机应变的思想准备，主要是如何避免洗城危机。对于死，我认为：“只有一个命，答对阎王乐。”这样再一次地增加了勇气。

当日午后五点钟，山崎科长和三浦参事官来到我家，他们的表现极为伪善，山崎说：“日本人被满、蒙人家设法救命的事实，我已经调查好了。希望你对此事件的发生，不要有性命危险的顾虑。”三浦说：“我家里预备了些酒菜，咱们就走吧。”我们在三浦家里饮酒叙谈，先是东拉西扯，后来逐渐书归正传——谈事件问题。我特别警惕酒后失言，并且为如何打开洗城危局而考虑着。到了十点多钟，我喝醉了，胆子也就大了。我说：“现在城里传出了洗城谣言，全城人心慌慌，这个事情是实在吗？”山崎说：“这是没有的事

情。”我又说：“虽然似乎系无根之谈，但是也有它的原因，今天上午我们谈话当中，你说‘听说是民变了，是实在吗？’这不能不涉及到屠城问题。”他说：“我的说法不能肯定为屠城，这实在是一种谣言。”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紧急设法制止谣言，安定民心是必要了。”他说：“好！如何办呢？”我说：“这个问题的处理很容易，明天上午以‘协和会’旗本部的名义，表扬拯救日本人性命的满、蒙人，解除谣言，安定民心。同时被满、蒙人救命的日本人都以点心、茶叶、手巾、酒类等礼物来表示感谢。”他说：“这个意见很好。”次日，在“协和会”举行了“表扬”式，被拯救的日本人手拿礼物，面对救他们的蒙、汉人站着。我以“协和会”旗本部长的资格讲了话：“此次事件里彻底做到了日满协和的精神，救出了日本人的性命，是坏事情中的好事，值得表扬的。另一方面，被救的日本人都自动的预备了礼物，表示谢意，更是令人钦佩的。”并且谈到在街里有洗城的谣言，闹得人心慌慌，正好通过这个“表扬”式辟谣——决不洗城。希望大家安心，勿得庸人自扰。如此结束了讲话。这时候，被救的日本人先行鞠躬礼，然后把礼物捧送到救他们的蒙、汉人的手里。当时看到：那些日本人羞臊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其他参加的如山崎以下日本人，都表现了愤恨与失望。最后，发奖状，闭会。从此城门大开了，交通也恢复了。

#### (五)

五天后——十一月十三日，伪滨江省警务厅派来了“特搜队”，头子是警务厅特务科长，还有伪警佐三名。他们下

车以后，就在街里开始抓人。听说把抓来的人以过于电的酷刑来逼供。我是重大嫌疑的人，自然无法插嘴，只是悲愤无奈，静观将来究竟如何。过了十天，听说被抓的约有一百五十余人，多半是拿日本人东西的，拿三泰粮栈粮谷的人们。为此，我到“特搜队”的伪警佐们的住处——天发盛百货店，我见到他们以后说：“听说你们抓了一百多人，都是犯什么罪的？”他们说：“特搜队长每天向我们要二十个人。”我接着问：“你们以什么理由抓呢？”他们说：“这个街上的穷抽大烟的人们，指谁抓谁。”正在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很面熟，但想不起是何许人。他说：“旗长好？”我问：“你是谁？”他笑着说：“人们都叫我的绰号说‘王尔烈’（清朝时，闻名文豪）。”这时候，我才想起他是穷抽大烟的，于是怒气顿生，痛骂他是大混蛋，无天良。他一溜烟逃跑了。当时看到的人们都解了恨。过了几天，听说那个自称什么王尔烈的大烟鬼以下十余人也被“特搜队”抓去，受了过于电的刑法，结束了他们被利用的、灭天良的罪恶活动。后据传闻，他们被抓是由于完不成任务——每天检举二十个人。他们就这样饱尝了日本人的“推完磨杀驴”的滋味。

“特搜队”到旗半月后，我得到三浦参事官的通知：特搜队长明天回哈尔滨，今天午后五时在一品居饭馆设宴欢送，并嘱务必出席，同时要在开席前致词，意思是叫我表示态度。因此，我也准备了应该说的话。我到馆子里看见摆了四桌席，除满、蒙科长几人外，多数是不认识的日本人和其他几个人。我在开席前致词：“这次事件发生以后，经过‘特搜队’的活动，遭到了不幸的郭后旗，变得安定了，好人都

乐了，坏人都怕了。这是特搜队长阁下和各位努力的结果。我代表郭后旗二十三万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我又接着说：“我还有要说的话，今天，我也不敢说，郭后旗的二十三万人民谁也不敢说，但是，我要把不敢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这个地方在建国以前叫东三省，是世界上出土匪闻名的地方。那时候，东三省的头子是张作霖，他是土匪出身，所以他对于绿林英雄，非常重视——物以类聚。他的军队的大官大多数是土匪出身的人物。因此有一句流行话：‘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那时候的匪帮，由三五十人、几百人，多到几千人。这些匪帮攻破城市和大屯子以后，就把有钱的人杀的杀，绑的绑，并把他们的家人都圈在一个屋子里，在抢掠贵重和细软的物品以后，把不能拿的如：粮米、破鞋、烂布……，叫穷人来拿，这叫做‘捡洋捞’（捡便宜的意思）。但是匪帮走了以后，被抢的人们，就是认出是自己的东西，也不敢向穷人们要。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更谈不到什么犯法行为。这个街的穷人们，对于‘捡洋捞’很有经验。大同元年春（一九三二年），尚在建国之初，李海清匪帮一万多人进攻农安县，被皇军打败后逃窜到此，就照老规矩办了——叫穷人‘捡洋捞’。此次共匪袭城以后，本街的穷人们认为‘捡洋捞’的好机会又到了，就开始拿粮谷、拿东西。这说明了他们是没有‘法律’常识——愚民无知。此次被抓的人里，除了真正通敌的坏人以外，多数是‘捡洋捞’的。如果对他们都以国家的刑法处分，似乎太重了。前几天，共匪攻进‘古龙村’公所（乡）后，叫穷人拿义仓粮，但是他们谁也没敢拿，原因是以肇源街的‘前车之鉴’，免得犯国法。这样，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所以，希望特

搜队长阁下深深怜悯愚民无知，把这个问题提到‘协和会’中央本部，以‘风俗习惯’来处理，比较适当，不可以国家的法律来惩治。请特搜队长阁下做个参考。”这时候，特搜队长抱着冷静态度，没说什么。次日，参加宴会的“总务科长”桑春、“行政科长”格增久等，都以亲密的关系，爱护的热情对我说：“旗长这样大胆说话，有啥意思？只是惹日本人不高兴，对你个人没有好处。今后应该少说为佳。”我说：

“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不替愚民说话，还有谁敢说呢？该说的还是大胆说，只怕死是没用的。”

几天后，释放了一些人，听说还剩下十几个，但因监狱是归这“监察厅”管理，“旗长”向来没有过问的权利。因此，对于那十几个在押的人，就成为爱莫能助的事情了。

## (六)

抗日联军到过的村屯，伪警察署总是调查不出来，老百姓“一问三不知”。“抗联”的行动神出鬼没——形成了人民抗日战线的铜墙铁壁。在“抗联”的游击战略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日本鬼子方面造成了可怕的孤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伪山崎科长、三浦参事官等提出了召开民心动态座谈会。主要是想使老百姓把“抗联”的行踪消息，随时报告给伪警察署，以便了解“抗联”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伪山崎科长、三浦参事官等二十来名日本人和我以下二十几名蒙、汉人出席开会。开会前准备了名茶香烟、美酒佳肴。山崎说：“这个座谈会的内容是：怎样使老百姓把共产匪的行踪消息，随时报告警察署的问题。

咱们这个会是充满着民族协和精神，一家人商量事，所以就是说了反满抗日的言论也没事，决不能当成思想犯。希望大家不要客气的喝酒吃菜，随便说话。”席位是为了劝酒方便，日满人搀杂着坐的。这样演了一出“鸿门宴”。我见到我们的人，都是面色苍白，恐惧异常，谁还有心贪图吃喝。但是，我是胆子大的人，谈吐自若，随便吃喝。山崎一再催促大家发言，谁也没有说话。沉闷了一个多小时，仅有一二人小心谨慎地勉强说：“我国因为粮谷出荷、统制经济、要劳工等，失掉民心。”又过了约一个钟头，仍然沉闷着。这时候，我才发言：“我是想啥说啥，请山崎科长做个参考。现在老百姓为什么把共匪的消息不向警察署报告呢？根本原因就是怕‘活埋’。如前四十多天，共匪路过肇州县托谷村赵金屯（区划）后，次日赵金的儿子（区划长）到肇州县公署报告了，几天后共匪在半夜里又来到该屯，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说，把‘抗联’的消息报告给日本鬼子的人是什么人呢？群众中就有人回答说：‘汉奸！’掌握大会的人又问群众说：‘把汉奸怎么办呢？’群众一致说：‘应该活埋。’结果挖了两个坑，把赵金（七十多岁的恶霸地主）和他的儿子都‘倒栽葱’的活埋了。从这个消息传出以后，老百姓只是‘烧高香，叩响头’，但不愿共匪到他们的屯子去。第一怕活埋，其次怕警察盘问。我听说：共匪三十几人是从七月以来，经过密山、东兴、海伦、呼兰、兰西、肇州等县向西窜入郭后旗境内的，为啥日满军队不截击而早日消灭他们呢？这是我个人思想中怎么也不能明白的问题。过去，我听说日本兵一个人能打中国兵二十名，既然这样，若有二、三个日本兵就能够消灭共匪了。现在的皇军还有飞机和大炮，难道消灭不了

吗？其实老百姓有啥能力，一味追求民心动态，既不起应有的作用，更解决不了多大问题。”这一席话说得日本人内有深思，外现委蛇。

### (七)

徐泽民领导的抗日联军十二支队，仅以三十六人，袭破了伪郭后旗肇源街，杀了十一名日本人，缴获枪一百多支及其他物资无数，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胜利信心。翌日早七时撤退时，该支队的人数突增到一百多名。这正说明了抗日联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相反的，日本鬼子不得人心而孤立了。“抗联”到十一月末，已经攻破了郭后旗的大官村公所、古龙村公所，并且扩大了活动范围，发展到大赉县、泰来县和杜尔伯特旗境内，声势浩大，所向无敌。那年冬天雪大，汽车仅走公路，所以，日本军队、伪满军队、地方讨伐队等，对“抗联”作战就有了很多的困难。

十二月上旬，伪滨江省警务厅命令郭后旗组织蒙古骑兵（一百名）。他们的意图是利用蒙古骑兵来协助日本军队讨伐“抗联”。那时候，长期驻在郭后旗处理肇源事件善后的伪滨江省警务厅警务科长山崎，立即责成我火速募集蒙古骑兵。我在淫威之下，自然不敢反驳，只得勉强来做。十二月十二日募集了一百多人，经过检查以后，录取了八十几名（被淘汰的蒙古警察占多数），队长人选是萨仁超克陶。他是曾经当过警察署长被免职赋闲的人。我们二人的关系是亲戚和同学，是知己的人。十四日，成立了“萨仁骑马队”（日本习惯以人名为队称）。山崎叫我讲话，我讲话的大意是：蒙古健儿，擅长骑射，忠君爱‘国’，消灭敌人。



午后，驻伪旗公署的原田部队长率领二十五名日本兵，并指挥“萨仁骑马队”到肇源街的西郊区去进行打靶演习，我也被邀跟着去参观。结果，“萨仁骑马队”的队员们的打靶成绩优良，超过了日本军队，当时得到原田部队长的赞扬。在原田部队长赞扬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感到，如果“萨仁骑马队”认真地和“抗联”作战时，恐怕“抗联”要吃亏。同时还有了如何应付这一问题的考虑。晚间，萨仁队长到我家闲叙时，我就对他说：“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强国，我们蒙古人处在两大之间，不能得罪哪一方面。这次‘抗联’抓住了我，我借中国人的光没有被杀，我应该终身感激。咱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只顾目前利益而得罪汉人，就是说需要两面光的手段。”当时他表示态度说：“我听懂了旗长的高见，能有把握，请旗长放心。”我又叮嘱他说：“我们的那些人——‘萨仁骑马队’的队员们，枪马娴熟，稍微忽略，在战斗中打伤打死‘抗联’的人们，那就是祸根。因此，在作战时，可以多打朋友枪——枪口向天空打，就能保证无事。但是，这事情是要保持极密，如果稍露马脚被日本鬼子察觉时，你我都有性命危险。”他说：“我们的队员是‘青一色’，没有向日本鬼子告密的。”

十二月十六日发令，调我到伪滨江省地方科当事务官。十八日七时，我就前往滨江省就任去了。

当天午后三时许，“抗联”为了再破肇源街进军到该街西北方约十八里地方的一所房屯子（旧称沿海屯）时，听到日本军队和“萨仁骑马队”出动应战消息，停止了进攻目的地——肇源街而宿营于该屯。当晚十一时左右，日本军队因为地理不熟而没参战，距离该屯约五里远，停止进军，其实是

对“萨仁骑马队”还有些怀疑。“萨仁骑马队”进攻“抗联”宿营地——一所房屯子，双方在形式上战斗很激烈，但是双方毫无伤亡。结果，“抗联”退出了该屯，“萨仁骑马队”得了两支破枪和几匹马，就算胜利了。在这一战争中，萨仁队长按照我的“对于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强国，我们蒙古人不能得罪哪一方面”的两面光手法做了。这次战斗以后，日本鬼子的看法是“可以利用”；汉人的看法是“最可恶的”。其实战斗的内幕是——极为不忠于日本鬼子的“要花招”。以后“萨仁骑马队”再没有和“抗联”打过仗。

## (八)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晚十一时，“抗联”十二支队袭破郭后旗肇源街。事情过了一个多月后，十二月十六日，把我调到伪滨江省地方科当事务官。过了二十天，又把我调到伪国务院地方处当事务官，被告给“停职两个月，罚俸百分之二十。”这就是对于我的处分。停职两个月的期满那天，伪国务院兴安局庶务科长赖崎找我谈话，他说：“你在停职两个月当中，怎么没有好好地反省？反而参加人家的结婚典礼，到别人家去吸鸦片呢？”我说：“我反省啥？这个常识我还没有。”这时候我才明白有人监视我。因此，我又接着说：“我还到朋友家去打过‘麻雀’，也看过电影，听过戏。”他又说：“本来你能继续保持官位，但现在只能给你免官处分，还给你退职金。你愿意吗？”我答：“我这样倒霉的人，受到国家的恩遇，没有受到任何刑事处分，并且还给退职金，我心里十分感激。”对我来说，肇源事件就算结束

了。我想我没有被杀的原因是：当“抗联”袭城以后，旗公署大金库里的二十万元没有被“抗日联军”拿去。因为伪出纳股长任香九怕负责任，带着钥匙跑了。“抗联”战士找到出纳员，问金库里是否有钱？他们说：“最近以来，现金都存放在兴农金库了。”“抗联”战士把兴农库的金库砸开，得了一万多元。其次，伪旗公署的大小汽车三辆没被开走。原因是“抗联”战士问了一位值宿的伪职员，汽车在库里吗？他答：“都叫军队开走了。”他们认为实在，也没到汽车库里去实地检查。最后，十五桶汽油没丢。因为汽油仓库在距离旗政府建筑物约有半里来远的西北墙角下，是为了避免火险的，也没被发现。根据以上三点，认为伪旗公署职员没有通“抗联”的嫌疑，我也包括在内，所以幸免杀头。

# 国民党“蒙古国大代表”在“行宪国大”会上的活动纪实

那 复 礼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所谓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并选举总统、副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当时我曾参与过一部分“蒙古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也是出席过一届“国民大会”的蒙古族代表之一。虽然事隔多年，已变为历史陈迹，但回首前尘，记忆犹新，如此选举，如此民主，不仅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主要的是从这里看出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没落。现在把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拉杂写出，不但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些可供参考的资料，在抚今思昔新旧对比的情况下，还促使自己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迈进一步。叙述中错落遗漏，在所难免，还希望知者予以指正或补充。

## （一）盟政府的“复员”和选举机构的成立

一九四七年春季，内蒙古人民革命运动已经达到最高潮，内蒙古广大地区，除西半部的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和阿拉善、额济纳，土默特三个特别旗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外，当时称为东四盟的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各盟和察哈尔部，都全部解放，并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国民党

军队仅占据着这些盟旗边缘上的一些“点”、“线”，并摆出随时向解放区进攻的态势。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派出的“热河蒙旗”、“察哈尔蒙旗”、“辽宁蒙旗”各党部，和“东北蒙旗复员会”，以及以吴鹤龄为首的“蒙古宣导团”互相配合，根据民国二十年十月国民政府所公布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把这几个既无土地，又无人民的“盟政府”，就在“国军”所盘据的“点”、“线”上复员起来，目的在于“随军前进，收复失地”。好多国民党的党老爷幻想着到解放区去，当上一名“接收大员”，可以混水摸鱼，捞上一把。

听说“卓索图盟政府”也在北票“复员”了。把“九·一八”事变前曾由国民党政府简派的卓索图盟盟长，唐古特喀尔喀旗札萨克，在日寇侵入热河的时候，将八十两银子铸成的盟长官印投入水井内，一直称病未出的达克丹彭苏克请了出来，又重新让他坐在盟长的宝座上，副盟长则由伪满洲国土默特中旗旗长，“八·一五”光复后又被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命为“热河第四骑兵支队少将司令”的沁布多尔济兼任。盟总务处长是伪蒙疆萨拉齐县县长韩绍祖。沁布多尔济的参谋长色某（名字已忘记）兼盟政府的行政长。另外还有几名科长秘书之类的低级人员，也都是沁布多尔济的部下。因为“盟政府”没有经费，索性和“热北第四骑兵支队司令部”合署办公。他们占据着敌伪遗留下的一所大楼房，在门禁森严岗哨林立的大门上，挂着两面蒙汉合璧文字的大木牌，表面看来，也很象一回事，但内容空虚，一无所有，连这位老病垂死的盟长，也时有断炊之虞。我记得他们有几派人到当时还没在朝阳的“热蒙党部”来借钱给

盟长治病、买粮食。盟政府的一切行政都被沁布多尔济所把持。

昭乌达盟的盟政府在锦州成立起来。伪盟长是奈曼旗札萨克索达那睦多尔济（解放后死于北京）。由一度参加革命，而当国民党军队占领赤峰时又中途叛变的前敖汗旗海力王府总管于海峰任总务处长。

哲里木盟在沈阳成立了办事处，由关荫南任处长。敌伪时期住在北京，装聋卖傻，不问政治，光复后国民党认为忠贞不贰，屡经表扬而任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的那木济勒色楞兼任盟长，不过他仍然长期住平，始终未到任视事，盟长职务由驻沈办事处长关荫南代拆代行。

日寇投降后，奴颜事敌、出卖民族利益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曾一度带着一群随员飞到重庆，拜谒过他的老上司蒋介石，以后就在国民党的庇护纵容下，租居于北平北门仓二十一号，当起“寓公”来，表面上装出一付韬光养晦，闭门谢客的假相，在政治上仍不堪寂寞，把他的亲信部下派到张家口，得到“察蒙党部”的大力支持，就成立了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的两个办事处，一切都要秉承他的意旨办事，他是唯一的幕后操纵人物，同时好象在告诉国民党，锡察两盟仍旧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这一年的夏季，国民党根据他们的选举法，通令蒙古各盟旗，成立“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选举事务所，同时公布了蒙古方面应产生的“国大代表”及“立监委”的名额，并提出各盟候选人具报中央党部和总选举事务所备案。

据说这个名额是按照人口比例来分配规定的。如东部的

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各盟，因为人口稠密，每盟应选出“国大代表”四名，“立法委员”二名，两个盟合选“监察委员”一名，和妇女“国大代表”一名。锡林郭勒、察哈尔两个部盟，西部的伊克昭、乌兰察布等各盟，阿拉善、额济纳、绥远土默特等特别旗，还有青海、新疆的蒙古各盟旗，每盟或特别旗，只能选出“国大代表”二名，“立法委员”一名，几个盟或特别旗合选“监察委员”一名，“妇女代表”一名。这样蒙古“国大代表”的总名额为五十几名，“立法委员”二十几名，“监察委员”和妇女“国大代表”仅十儿人而已。据了解内幕的人说，“中央党部第四处”（以前称为边疆党务处）初步提出的方案中蒙古“国大代表”的总额达到一百多名，后经国民党的内政部和全国总选举所一再削减，仅仅保持了五十几名定额，蒙古代表的总额，还不到普通一个省份的二分之一。对于这一点，许多蒙古人很不满。

经“东北蒙旗复员委员会”和“热蒙”、“辽蒙”、“察蒙”几个党部，惨淡经营出来的几个奄奄一息的“盟政府”和“办事处”，也都把选举事务所的牌子高高挂起，盟长和副盟长，也都就任了选举监督，可是既无选民，又没有管辖区域，又在解放军重重包围中，如何能具体来进行选举工作呢？在当时说来确实是很严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不久，朝阳和北票相继解放，在朝阳的“热蒙党部”，很狼狈地流亡到锦州，有一名叫乌鹏的特派员，在化装潜逃途中，被解放军查获。这个党部的工作人员，多一半都逃避于北平，只有十几个人僦居在锦州北关外平安病院的楼上两个病房里，一谈到如何选举的问题，代理书记长的张子明（名

秉智)也是一筹莫展。

北票解放的前夕，“卓盟盟政府”的这面招牌和那位病盟长，也被他们的秘书或者是科长送到锦州来，和“昭盟政府”比邻而居，彼此见面，相对歔歔，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叹。什么选举“国大代表”“立监委”这些事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最可笑的是所谓昭、卓两盟地方政权的各“旗政府”和“热蒙党部”直辖的各“旗党部”，也都由叶柏寿、平泉、凌源、林西、开鲁、赤峰各地，纷纷撤退到锦州，他们在近郊找到了三间土房子，包括旗党部书记长、旗长的十几个旗的几十个工作人员，都挤在两铺大土炕上，衣服褴褛，囚首垢面，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北平天桥“鸡毛小店”的住客，绝对看不出这是卓、昭两盟旗政府、旗党部“衙门”的官员。这个地方的附近，还聚集着些罪恶累累害怕人民清算斗争，由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流氓、恶霸、地痞、还乡队队员、散兵游勇，这些形形色色人物，大约二、三百人左右，他们是这一个“联合衙门”的唯一拥护者，他们也和这个“联合衙门”有同生死、共存亡的关系。如果在锦州举行卓、昭两盟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时，也只有他们是唯一的选民。

国民党中央所规定的选举“国大代表”和“立监委”的日期，越来越逼近了，可是卓、昭两盟的选举工作，仍未得到丝毫的开展。这时候，住在北平的劫收大员中统特务薛兴儒来到锦州了。薛兴儒是什么人呢？这里倒须介绍一下：听说他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上学的时候，得到了偶然一个机会，即被CC的头子陈果夫所赏识，拿到CC的津贴，在



学校里搞一些鬼鬼祟祟的特务活动，升入昆明联合大学后，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职业特务。在校期间，和“热河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一个姓张、一个姓邓的西康藏族女同学，搞过三角恋爱，几呼演出一幕轰动全校的凶杀案件。最后还是和姓邓的（名邓育英）结婚，同学们对于他这个家庭，称做“蒙藏委员会”。薛在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即正式参加了“中统局”这个特务组织，当过行动队队员，屁股上挂过手枪，也用绳子绑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光复后他是第一个由重庆飞到北平的蒙古方面“接收大员”，对外用“热河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仍然是“中统局”的负责人之一，已经取得了专员的身份，是“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的最得力助手。

薛兴儒到北平后，即威胁利诱地吸收了一部分在敌伪政权工作过的蒙古青年知识分子，很快把“热蒙党部”组织起来以后，立即派往在解放军包围中、孤城悬立、朝不保夕的朝阳来，开展对蒙旗的党务工作。同时支使他的一些亲信特务，潜入朝阳附近已经被解放的蒙旗，刺探军事情报，并在党部的院内架设电台，直接和北平联系。他却一直住在北平北池子号，和他一同飞来的狐群狗党李育才（中统局北平区区长）等接收大员，整日忙于“五子登科”的活动。

据说一九四六年夏季，薛兴儒也想来朝阳视察一下“热蒙党部”的党务工作，他把素常所穿的西服革履脱下来，换了一套不太合身的灰色便衣，在衣服口袋里暗藏了一支加拿大手枪，认为身入重围，前途堪虞，这样在一朝有事的时候，可以混迹人群，立即走脱，起码能减少当俘虏的危险。他带了三四名也穿了便衣的随员，由北平上火车赴朝阳的途中，

在锦州换车的时候，他这样一个既不是农又不象商人的穿着，引起国民党车站稽查人员的注意，马上进行盘查。薛觉得自己是“中统局”的堂堂专员，因有恃而无恐，不但严词拒绝这些特务的盘查，并且神气活现地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遂激起这一群特务的愤怒，毫不容情的把他包围起来痛打了一顿，当他已经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被素与他认识的伪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的副官张某所瞥见，排解双方，并向特务们说出薛兴儒的身份，这才清楚了“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这些小特务，诚惶诚恐地当场道歉，用汽车把薛送到伪热河省的驻锦办事处，薛住在那里养了几天伤，中止了朝阳之行，悄悄地回到北平。薛因为吃了这样的眼前亏，仍然气愤难除，除向“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哭诉外，还给陈果夫打电报告了“御状”。薛兴儒最好打人，这次却挨了一顿毒打，他的秘书邵厚仁说：“打人者，人恒打之，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薛兴儒由锦州回到北平以后和我说：“我走南闯北二十多年，大小七十二战，战无不克，这次却在锦州这个小地方，栽了最大的筋斗，这是我生平常忘的耻辱！”言下还有些愤愤不平。

## （二）如此选举、如此民主

在锦州遭到一场风波以后，薛兴儒把到朝阳视察党务的这件事，一直视为畏途，一提到锦州，便有些谈虎色变，心有余悸。这次到锦州来，一方面是迫于“中央党部第四处”的命令，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也要在“卓盟”竞选“立法委员”，于公于私，都不能不重游一下生平栽最大筋斗的地方——锦州。

薛到锦州的第二天，对卓、昭两盟进行选举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听到卓、昭两盟流亡在锦州的“选民”仅二、三百人，这未免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和国民党选举法所规定的选民人数，相差太远，如果不够法定人数，选举就有被中止的危险。凑足选民人数，是目前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薛兴儒情急智生，他就很巧妙地变起戏法来。本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操纵和控制这次的选举，拨给了地方党部数目不算太少的选举经费，“热蒙党部”也不例外地领到了这一笔钱，可是薛兴儒大部分都装入自己腰包，这次却拿出少得可怜的几个钱来，分给了他这一个党部所管辖的卓、昭两盟各旗党部书记长。同时命令他们协助两个盟的流亡政府，每一个旗要分别编造五百至一千名的选民名册。这些穷得发慌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党”和“旗”的工作人员，看到钱数虽然不算多，还能解决目前的吃饭问题，对于薛兴儒这个荒谬绝伦的布置，好象奉到圣旨纶音一样，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立即开始行动。他们有的爬在联合办公衙门的炕沿上，也有的借来美孚油桶当桌子，无昼无夜地伪造起卓、昭两盟各旗选举国大代表和立监委的选举名册来。起初把一些住在解放区的亲戚朋友的名字都写上了，仍然感到不够，以后就乱写了一大阵，把什么乌勒吉、白雅尔、六柱、金锁、跑不了、六十八这些不论男的女的，死的活的，他们所知道的一大堆蒙古人名都罗列出来，最后总算达到了薛兴儒所要求的数字。薛把这样的“选民名册”郑重其事的盖上了“热蒙党部”的官印，航邮到南京的“中央党部”和“总选举所”备案。不久由南京就打来“准予备案”的回电，薛兴儒脸上浮现出笑容，欣赏自己的戏法变得很成功。

薛兴儒这头一炮总算打响了，他又马上转入他所预定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如何使卓、昭两盟的选举事务所通过他所拟定的候选人名单的问题。

秋风萧瑟，华灯初上的一个傍晚，热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薛兴儒在锦州车站附近的一座大饭馆（字号已忘记）摆了两桌酒席，招待卓、昭两盟选举事务所的全体人员，还有些“党部”的人作陪，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这位主任特派员站起来就说：“卓、昭两盟，过去是伪满的一部分，我们叫做沦陷区，这里要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和立监委的大多数人，都参加过敌伪组织，不客气地说就是蒙奸，中央不按照‘汉奸惩治条例’来逮捕惩办，已经是很幸运了。如果他们还要参加竞选，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这里把他们列入候选人名单内，中央也不会通过，更不会支持，所以由我们党部初步拟定了候选人名单，请大家通过，并应由两个盟的选举事务所即日公布。”他说完以后，就从衣袋把名单掏出来，当众念了一遍，我记得他所提出的名单内容是：

卓索图盟：立法委员候选人李永新、薛兴儒。国大代表候选人白海风、刘廉克、史秉麟、李春霖。

昭乌达盟：立法委员候选人吴云鹏、白凤兆。国大代表候选人白云梯、金志超、陈孝贤、吴化鹏。

两个盟的监察委员候选人白瑞。妇女代表候选人邓育英。

这个名单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也是清一色的抗战“英雄”，薛兴儒念了以后，颀盼自雄，满认为可以得到全场一致的拥护。卓盟副盟长沁布多尔济马上站起来说：“谁同意，我也不同意。这个名单里的候选人，不但我不认识，就是所

有的选民也不认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几位抗战‘英雄’，你们谁认识谁就去选，我是绝对不选我不认识的人。”他的话还没讲完，就引起几个人的掌声，因为以席振铎、于宝衡为首的“蒙古青年同盟”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要在选举中争个最多的席位，以便扩大他们的影响。同时还内定于宝衡在卓盟竞选立法委员，暗示在各旗党部和各旗政府工作的“蒙古青年同盟”成员大力支持。他们听到薛兴儒关起门来，一手包办的名单以后，感到他们毫无置喙的余地，引起他们最强烈的反感，就有人大声疾呼地说：“参加敌伪组织的人是蒙奸，被剥夺了被选举权，那么沦陷区的人民就是奸民，也应该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如此，这个地区的选举只好停止。”在座的人饭也不吃了，都纷纷离席，拂袖而去。弄得这位请客的主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比起在锦州车站被特务痛打的时候，还要难过，这个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薛兴儒认为一帆风顺满有把握的选举工作，又遇到意料之外的“难航”，出现了“抗战派”和“沦陷派”争夺席位的斗争和对立的形势。

过了很短一个时期，薛兴儒为了打开这个僵局，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和我说：“你去找卓、昭两盟选举事务所的两位监督谈一谈，让他们也提出几位‘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我带到南京去研究一下，只要中央同意的话，我是没有成见的。”我把薛的话毫未添减地向两个盟的当局转达后，他们很乐得的找到这个台阶，副盟长沁布多尔济说：

“只要不认为我们是蒙奸，也有被选举权就够了，多选几名抗战‘英雄’，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薛兴儒对沁布多尔济的答复，还算满意。

当日下午，卓、昭两盟选举事务所派卓盟总务处长韩绍祖、昭盟总务处长于海峰，给薛兴儒送来由两个选举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内容是：

卓索图盟：国大代表候选人邢复礼、韩绍祖。

昭乌达盟：立法委员候选人杨俊陞。国大代表候选人卓里克图、策仁多尔济。

这不是“地方派”和“抗战派”平分秋色的名单，还是给抗战“英雄”们留了很大的面子，留了多半数以上的席位。可是薛兴儒并不因此而满意，总认为“地方派”提出的人数过多了些。他和我说：“你是党部的特派员，他们提名你为国大代表候选人，这是很对的，鹤龄（李永新的别号）也会支持。他们不提，我们也准备要提。不过韩绍祖、策仁多尔济这几个人都有问题，尤其杨俊陞是从匪区跑出来的，我们看不透他是站在那一方面。”他虽然这样说，再也想不出和这些地方人要价还价的办法来，怕再弄巧成拙，选举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他又早想脱离开锦州这样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环境，在四郊发出的隐隐约约昼夜不断的炮声，好象时时刻刻都在告诉他早些回到北平去。实在感到心惊肉跳，不能在锦州再呆下去了，于是把这一部分选举工作的全权交代给我，让我替他来发号施令。同时和我约好，他在半个月以后一定回到锦州来。他携带着两个选举事务所提出的这份名单，匆忙地离开锦州到南京商量最后决策去了。

薛兴儒走后不久，就由南京给我打来一封“卓、昭两盟国大代表及立监委候选人名单已由中央决定”的电报，具体决定的内容，我是一无所知，也不敢和两个选举事务所去讲，仍在闷葫芦里过了几天。这位主任特派员，真没有失信，果

然不到半个月就回到锦州来，马上就发表了他到中央后所定的名单：

卓索图盟：国大代表候选人白海风、刘廉克、邢复礼、韩绍祖。立法委员候选人李永新、薛兴儒。

昭乌达盟：国大代表候选人白云梯、金志超、卓里克图、策仁多尔济。立法委员候选人吴云鹏、杨俊陞。

两盟合选监察委员候选人张秉智。妇女国大代表候选人多淑秀。

这一个抗战“英雄”和“沦陷区的蒙奸”混合组成的名单，当然受到两个选举事务所的欢迎，毫无异议地通过了。这时一切选举准备都做好，只是等着投票，薛兴儒认为不久可以把一名立法委员弄到手，高兴得了不得，他用京剧黑头的腔调大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把楼下平安医院一名有心脏病的女护士，吓了一跳，病了几夭。

这时，南京“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处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吴云鹏，以内蒙古选举副总监督的名义，由南京飞到沈阳、锦州两地，视察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个盟的选举准备工作。他到锦州后，看到昭乌达盟立法委员候选人名单里面有他的大名，感到很满意，同时看到锦州的“釜鱼幕燕”朝不保夕的形势，只逗留了两天就飞回南京。

听说哲里木盟在沈阳的选举工作，也由于“辽蒙党部”的主任特派员金崇伟的独断专行，任情操纵，而引起所谓地方人的反感，选举已陷入停顿状态。国民党监察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第四处长李永新，亲自到沈阳住了一星期，也公布了一个“国民党人”和“地方人”平分秋色的候举人名单，才结束了这一幕“骨落于地，群犬相争”的丑剧。

卓、昭两盟的选举工作，保持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平浪静的状态，于法定投票日期的前四、五天，忽然由北平赶到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乌臻和，另一名是笃多博，他俩也都想在昭盟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这又给薛兴儒出了难题。

乌臻和是乌古廷的三弟，绰号“机关枪”，因为他说话速度很快，字音不清，唾沫四溅，如果靠近他一些，就可以被这个“毛毛雨”所淋湿，有人恭维他说，这是真正的“口若悬河”，许多人不呼名而直以“机关枪”呼之，他也受之而不愠。他还有一个特点，身体由上而下形成几个弓字形，当他穿西服时，更为突出。他是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毕业。热河事变后，乌古廷投敌，任伪兴安西省警备司令官，乌臻和却在北平，和乌古廷信札往返，暗通消息，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所发觉，以通敌的罪名逮捕下狱，关了二、三个月，才由当时北平同乡会保释出来，即由伪满洲国派往日本留学，考入山口县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回国后，“德穆楚克栋鲁普”即昇以交通部秘书官的职务。张家口第一次解放，他就逃到北平来，过着“寓公”生活，这次突然来到锦州竞选，是得到乃兄乌古廷的授意和怂恿的。“八·一五”光复后，乌古廷由伪蒙古军中蒋参谋长，摇身一变为国民党东北行辕少将参事兼“东北蒙旗联防指挥部”司令官，他的“指挥部”就设在锦州车站附近。他可以指挥和调动卓、昭两盟保安队和一些地主武装，给国民党驻锦州的守军征粮征草，有时还配合“国军”进行扫荡。乌古廷早有竞选“国大代表”的意图，觉得自己是榜上有名的蒙奸，国民党没有按照“汉奸惩治条例”逮捕问罪，也算是侥幸了，如果妄想到南京立于国民党庙堂之上，等于是自投罗网，反而招祸，所以



把他的兄弟叫到锦州来参加竞选，由他来全力支持，谊属同胞，何分彼此，乌古廷打着这样一个如意算盘。

当乌臻和向薛兴儒表示要参加昭盟国大代表竞选时，薛兴儒以候选人名单业经中央批准备案，再不能随便更换为借口，严词拒绝，乌臻和碰了一鼻子灰就跑回去了。

薛兴儒看到乌臻和为人猥琐，语言无味，很藐视地和我讲：“象这种人还想当代表，真到南京去的话，活活给蒙古族丢死人。”看起来阻挠乌臻和竞选的意志，非常坚决。

翌日清晨，乌古廷亲自出马和薛兴儒谈判。薛兴儒仍然很坚持，双方激辩达一小时，最后乌古廷用威胁的口吻说：

“你不许可臻和参加竞选时，我要当众揭露你伪造选民名册的把戏。”薛兴儒也反唇相讥：“我不怕耍流氓手段，我马上给中央打电报。”薛兴儒自己拟了一个“蒙奸乌古廷称兵包围党部，破坏选举，请即依法惩办。”的电稿，交给我让译电员发出去。我觉得事情闹大了，彼此都不利，好容易把乌古廷劝走了。

当天晚上，卓、昭两盟的两位总务处长，韩绍祖和于海峰前来转圜，他们想把昭盟国大代表候选人策仁多尔济撤销，拟以乌臻和递补，征求薛兴儒的同意。薛说策仁多尔济是你们提出来的，愿意撤销，我没有任何意见。这样乌臻和在昭乌达盟竞选国大代表的事就不成问题，乌古廷和薛兴儒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

笃多博拟在昭盟参加竞选，因为没有象乌古廷这样“地方势力派”做他的后台，本来没有什么把握，所以他在薛兴儒面前完全装出一副摇尾乞怜苦苦哀求的可怜相，同时还采取了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唯薛兴儒之命是从的态度。

薛兴儒知道笃多博在不久以前，把袁世凯赐给他父亲贡桑诺尔布的北平太平街王府，以几万美金的高价卖给了天主堂的一位神甫，笃多博正是拥有雄资腰缠累累的时候，薛兴儒想敲一笔竹杠。他也知道吝啬成性的笃多博绝不会很痛快地拿出钱来，如果竹杠敲不成，就有了拒绝他参加竞选的借口，薛和笃说：“党部的经费由今年起，不再由国库开支，为了以党养党，必须经营些生产事业，你对这一点有所贡献时我可以支持你在昭盟竞选。”笃多博意识到非破钞行贿不会有“登龙门”的希望，再三考虑的结果，就亲手写了一张文契，把叶柏寿附近的肥沃土地五百亩，捐献给“热蒙党部”，做将来开办农场之用。薛兴儒对于笃多博这一慷慨施舍，极为嘉许，立即答应撤销金志超的候选人资格，使笃多博补入，让他在昭盟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征得昭盟选举事务所同意后，并电请中央党部备案。他们这一批买卖就这样很顺利地成交了。

候选人名单公布出来了，用擘窠大字写在红纸上边，贴在两个选举事务所门前的土墙上，附近的一些居民围着看，不大一会儿，就被风刮走一半。锦州国民党的地方小报上，也把候选人名单登载出来。

选民投票是在十一月初旬举行的（具体日期已忘记），由中央总选举事务所根据两个选举所呈准备案的总选举人数，发来几万张选票，卓、昭两盟选举事务所，也分别准备了两个投票箱。投票开始的第一天，两个选举事务所的门前，有些流亡地主、还乡队员、保安队员、地痞流氓和他们的一些家属们，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人物，排成了一列长蛇阵，你出我进，倒也显出热闹非常。这一天的下午就开始冷落了，

仅有寥若晨星的几个人，走过来，走过去。从早到晚，投进票箱只有二、三百张，还剩下二万多张，薛兴儒仍然用他编造选民名册的老办法，让各旗党部，各旗政府的工作人员，按照候选人名单的次序，分途填写，给每一个候选人，都写了几千张票，在夜静更深的时候，一整批一整批都塞入了投票箱，第二天开箱唱票的时候，事前所公布的候选人当然毫无遗漏地都当选了。这又是最后一次戏法。

哲里木盟（在沈阳）、察哈尔部（在张家口）、锡林郭勒盟（在张家口）这三个盟部，据说也用卓、昭两盟大同小异的办法，完成了这次的选举。

我们这些“国大代表”就是这样选出来的，虽然是十几年以前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赧赧然。

### （三）李宗仁的两次招宴

“国大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召开，二月间内蒙古东部几个盟的国大代表、立监委大多数都来到北平，当时因为津浦路火车不通，都准备买机票南下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以欢送为名，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很豪华的宴会，蒙古国大代表的请柬，是由伪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代送的。

这一天来的客人很多，除华北地区留在北平的国大代表，立监委外，还有北平市一些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被邀参加，约有二百多人，把一座瑰丽堂皇的宫殿，挤得水泄不通。蒙古方面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哲里木盟立法委员白大诚、金养浩，国大代表金崇伟、杨丽君（以上几人，解放前夕均逃台

海），锡林郭勒盟国大代表札奇斯芹（即于宝衡）、张若华（于的老婆，解放前均逃往美国）、超克巴图尔（即陈绍武），察哈尔国大代表官布札布（现在美国）、还有卓索图盟立委薛兴儒，国大代表韩绍祖（已死）、昭乌达盟立委思钦绰克图（即杨俊陞），国大代表笃多博、卓里克图、乌臻和（以上三名均逃台湾）等十几个人。还有伪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长何兆麟也在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都聚在室内东北隅的一排毛椅子上，有的人没有座位，站在人们的背后。我们看见一位衣服华美的中年妇人，在这个宴会场中象穿梭一样地走过来走过去，和这一个握手言欢，一忽儿又和那个窃窃私语，可能是全场最活跃最有吸引力的人物，我们谁都不认识，后来才弄清楚这位就是李宗仁将军的“贤内助”郭德洁女士，她以女主人的身份，正在招待来宾。不大一会儿有三、四名随从副官模样的下级军官，簇拥着一位身材矮小、面目黧黑、穿着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将军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不用说这就是大名鼎鼎、操华北数省军政大权于一人之手的国民党封疆大吏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将军了，他被高级侍从简单介绍之后，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开始讲起话来。我目不斜视聚精会神地倾听，但是这位国民党的挂系领袖，可能讲的是广西官话，叽叽喳喳两个字一句，前言不搭后语，我因为久住北平接触颇广，自信听懂各省方言的能力还不错，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一小时，我却没能理解他说话中的最主要部分。有几位汉语不太好的我们同路人，让我翻译给他们听，我是瞠目不知所答。只好悄悄地和他们说，现在不能交头接耳，以免破坏会场的严肃气氛。

李将军讲话结束，宴会遂即开始，蒙古代表仍然坐在一

起，我坐在于宝衡的左边，我们吸着英国制的三五牌香烟，还有法国制酒大王亨利·波尔索工厂出品的白兰地酒，在烟香缭绕，酒味芬芳中，我们把罗列满桌的珍馐佳肴，一样一样地送到嘴里去咀嚼着，当刀叉声、笑语声混成一片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想，李将军对我们如此垂青地殷勤招待究竟是为了什么？

宴会散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这一伙中有两个人喝得烂醉如泥，我们搀扶着这两个醉汉要出中南海的后门，在石砌的甬道上，一步一趔前进，有三、五人走在我们的前面，昏暗的路灯看不清楚是谁，说话的口吻和声调仿佛是北平行辕民政处长王捷三，他们在讲：“这一次李先生要竞选副总统，我们北平市要全力支持。”又听另外一个人说：“天津市也没有问题。”我从这个简单的谈话中才清楚地了解到李宗仁今天招待国大代表的主要目的，是他在竞选副总统时让这些人给他“抬轿子”，但是我觉得以我“神圣”的一票报答他这次的“一饭之恩”，还是有些划不来，因为这位李将军并没有给我比较好的印象。

没过几天，我们又接到了李宗仁在怀仁堂招宴的请柬，这次邀请的是清一色的蒙古人，除了上次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外，还添了两位新客，一个是东北政务委员会哲里木盟盟长那木济勒色楞，另外一个为国民党骑兵独立旅（即白海风旅）副旅长汪涛（在陇东作战被解放军俘虏获释，当时在北京住闲）。筵席设在李宗仁办公室外面的会客室，雪白的粉墙上，挂着徐悲鸿杰作（画马）一幅中堂，上面落着“德邻先生雅属”的款，特别引人注目。中间放着四张圆桌，四周围都摆着皮沙发，我们就坐在沙发上略事休息，由他的副官长

出来招待（名姓已忘，说话是东北口音），约过十分钟，我们已经见过一次面的李德邻先生从后面的办公室缓缓地走出来了。他和客人一一握手寒暄，告诉他的副官，把代表和委员们在北平的住址都写下来，以后有事可以随时联系。他还和那位“年高德劭”的达尔罕王特别周旋了一下，并请他坐在筵席的首位上。餐具非常讲究，牙箸银匙，瓷器上都有龙凤花纹，可能是怀仁堂旧藏的光绪大婚官窑出品。饭菜也极精美，毫无疑问，一定出于“御膳房”服过务的老厨师之手。我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又坐回皮沙发的时候，李先生又开始讲话了，这次他讲话的声音很低沉，但每一句话都可以清楚地听懂，他首先把国民党在华北各地全面发动内战的情况大吹大擂地讲了一大阵。接着说：“戡乱建国是中央既定的方针，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在六个月以内，改变华北的局面，甚至于把全国的共匪全部肃清……。”

这位将军最后蔼然可亲地说：“蒙古族同胞要求自治，是我最理解最同情的，我到中央去以后，一定尽我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听到这一席话后，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象在余音袅袅中暗示了一个政治上的交换条件，也就是在说，蒙古族代表能在副总统竞选中支持我，我到中央就努力促成你们蒙古人的自治。

当时对于他所提出的这一个政治上的交换条件，有一部分人是接受了，连我也包括在内。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伟人”说出同情内蒙古自治的话。

“八·一五”光复后，在国民党统治下，一心想走国民党路线的封建上层，和一些自己认为有一段抗战历史的蒙古族政洽活动家，以及参加过敌伪政权、受过敌伪教育的青年

知识分子，他们都合流起来，很早的就提出了“内蒙古实行自治”的这样一个共同口号，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曾受过以白云梯为首的所谓中央蒙古宣抚团的欺骗，也受到了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政学系头子熊式辉的冷嘲热讽。一九四七年还都南京后的国民党，正在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内蒙古方面参加这个会的代表，也曾提出走“内蒙古实行自治”的具体方案，要求大会通过。绥远土默特特别旗和伊克昭盟联合起来派出了一个以荣祥为团长的“抗日蒙旗庆祝代表团”；一度沦陷而又复员起来的东部蒙旗，也组织了所谓“蒙古地方自治请愿团”，同时到达南京，和出席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的蒙古代表，互相支援，通力合作，目的是想把蒙古自治问题，正式列入国民党正在制定的宪法里面，想取得法律上的保障。他们的这一个企图，首先遭到了绥远省统治者傅作义和山东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反动学者傅斯年的强烈反对。一个是暗中操纵绥远省代表潘秀仁、于存灏、赵厉师、李聚五等，每逢讨论内蒙古自治问题的大会和小会上，用尽方法来横加破坏和阻挠。一个是根据反动民族学的观点和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蒙古民族的存在，大放厥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随声附和的还大有人在，遂形成了一座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最坚强堡垒。找不出什么理论根据而空谈内蒙古自治的这些蒙古代表和“政治家”们，被这些人抨击得体无完肤，噤若寒蝉，不敢再谈自治问题。亲眼看到国民党这一部荒谬绝伦的宪法，一条一条地都制定出来了，但他们幻想着得到宪法保障的内蒙古实行自治，并无一个字的规定，在这场斗争中完全被大汉族主义者所吞没。

这些蒙古“政治家”们，最恨傅作义和傅斯年，称“二

傅”为“二虎”，认为他们是蒙古民族生存发展前途上的两只“拦路虎”。大有“庆父不除，鲁难未已”的想法。蒙古“地方自治代表请愿团”成员之一的于宝衡回到北平以后和我说，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要求蒙古人的自治，这等于与虎谋皮，是根本做不到的一件事。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伪热河省教育厅长刘廉克也说，蒙古要自治，需用自己的实力来解决，到南京去向国民党苦苦哀求是一件最可耻的事。国民党制宪代表大会闭幕，蒙古代表和一些为了内蒙古自治到南京请愿的地方代表铩羽归来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销声匿迹，很少有人再提到自治问题。同时看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出现了新的高潮，形势发展，也迫使这些人暂时放弃了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

但在这次宴会上，听到李宗仁这一篇简短而富有吸引力的讲话以后，对于我们这些人又重新起到了鼓舞和诱惑作用，从而也坚信倚靠“美援”的国民党，和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的斗争过程中，仍有足够的力量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我们还是走国民党的路线，在国民党人中争取内蒙古自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的课题，更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现在既然得到在国民党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李宗仁将军的同情和支持，就应该没有顾虑地大踏步前进，区区“二虎”又何足挂齿。能够把李宗仁捧上副总统的宝座，不但是对民族前途利其大焉，对于个人的出路也有很大的好处。这几名“国大代表”在没有到南京开会以前，把自己选副总统的一票，就决定给这位将来要为内蒙古自治问题“尽瘁”的李宗仁将军了。

我们由宴会场出来的时候，和上次一样已经又是深夜



了，仍然要出中南海的后门，在昏暗的路灯下，走在石砌的甬道上，和上次不同的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着很愉快的微笑。

#### （四）“霸王”飞机包庇走私， 珠江饭店藏垢纳污

“国民大会”本来预定这一年三月二十日召开，后来又延期到四月一日，会期越来越逼近了，住在北平的蒙古国大代表和立监委都自筹旅费，纷纷买机南下，我也到非去不可的时候了。可是在国民党的法币贬值、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飞涨的情况下，我把由“热蒙党部”所拿到的特派员的工薪积累三个月也买不到价约“中人之产”的一张飞机票，正在万分焦灼、一筹莫展的时候，热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薛兴儒，给我送来一张直飞上海的“霸王号”飞机票，同时约定他也和我一道到南京去。我对于薛兴儒这一个能够“雪里送炭”济人之急的慷慨行为，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既然是一位堂堂的“蒙古代表”，在仪表方面也须要讲究一些，我把十几年前在日本留学时代所做的一套旧西服，从箱子的最底层翻出来，穿在身上试了一试，虽然有些窄小还能差强人意，觉得到南京以后，即周旋于衮衮诸公之间，也不会自惭形秽。这样在临上飞机的这一天，就带上这一套衣服和一些零星使用的物品，重量一共不到五公斤，坐上市内电车，先到锦什坊街玉带胡同“薛公馆”（事前约好的），准备搭乘他的汽车再到西苑机场。薛兴儒一看我手里拿的行李很简单，他很高兴的问我：“你就这点东西吗？育英有一件

行李（他的老婆邓育英此次当选为西康省国大妇女代表），在上下飞机时候，你帮他拿一拿。”我当然毫不迟疑地慨然答应。他马上给商业银行打电话，不久，由经理阎景尧（热河人）亲自送来一只红色皮箱。我过敏地认为这只箱子可能就是薛兴儒让我拿的邓育英的行李了。但是邓育英的行李箱，为什么银行经理亲自送来呢？使我又大惑不解。

我们到飞机场以后，就由北平市政府招待所每人给了一枚红绸子条，上面有“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四个金字，让我们挂在胸前，以便和普通旅客有所区别。当挂在胸前的红绸小条迎风飘扬的时候，我也有些飘飘然了，这好象发给我们一张“沿途军警关卡免于检查”的特别护照，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土上，好象得了“治外法权”。

在上飞机的时候，薛兴儒把一只红皮箱子交给我了。我那时还很年青，在日本学校的时候练过“剑道”，腕力很强，一只手提几十斤的东西还算不了什么。但拿到这只箱子的时候，却感到非常吃力，尤其是上飞机扶梯的时候，气喘呼呼，摇摇晃晃，几乎来了一个“倒栽葱”。踉踉跄跄地放在自己座位旁边，进入舱内，随着引擎的发动，我的心脏也在怦怦地跳。经过这一番的搬运过程，我意识到这箱子里绝不是邓育英的衣服和化妆品，黄金乎？美钞乎？烟土乎？总而言之，是触犯刑章的违禁品，一经查获，就有物被没收，人被逮捕的危险。

“霸王号”已经在云层中飞行，坐在我对面一排座位上的薛兴儒夫妇，似乎看出我的神色不定和惶惑不安，屡屡以目示意，好象正在告诉我，不必担心，绝没有什么意外。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妖艳的白衣侍者，送来一杯咖啡和

几片美国制的饼干，她却回过头来，对我身边的这只红皮箱流目送盼，又狠狠地看着我们胸前所佩带的红绸字条。她的举动，有些异乎寻常地轻佻，这时候薛兴儒很机警地拿出一迭花花绿绿的钞票，看起来数目还不算少，也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很快就塞入她的衣袋内。她看到钞票的一半还露在外面，用手按了一按，脸上还是那么很自然，丝毫没有感到意外或突然的表情，微笑着对我们三人点点头，也许在表示谢意吧，接着便翩若惊鸿似的走到前面去了。她走了之后，薛兴儒夫妇也来了一个会心的微笑，薛兴儒告诉我说：“这就一帆风顺了。”把这些怪现象看到眼里以后，我就肯定这只红皮箱里面是“私货”了，可能是给白云梯带的“热河土”，可是我又觉得薛和白之间的交情泛泛，不会送这样重又这样多的礼物。听说陈果夫也有“烟霞癖”，那么可能就是给他的“果公”带的了（薛在当面背后称呼陈果夫为“果公”），不过这都是些揣测和判断，蒙古族的“立法委员”，图伯特族的“国大代表”，“蒙藏委员会”的贤伉俪，究竟搞的是什么把戏，在我说来，仍然是很大的一个“谜”。

“霸王号”在上海的龙华机场降落了，我依旧把这只红皮箱提在手里，依旧是摇摇晃晃地走下了扶梯，幸而薛兴儒的狐朋狗友有三、四个人（可能都是“统字号”的人物）来欢迎这位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他们也似乎正在欢迎这只红皮箱。其中一个彪形大汉，早从我的手里接过去，很敏捷地放入一辆“雪佛兰”汽车的后背箱里，这时候，车也开动了，他和薛兴儒声音很低地说了一句什么，和其他人挥手告别，坐上车一溜烟就无影无踪了。这我才如释重负似地喘了

一口长气，再也不用为这只红皮箱提心吊胆了。“谜”还是个“谜”，箱子就这样不见了，“谜”的成分更加重了一些。

我们胸前的红绸子条，仍然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上海市政府来出面招待，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大马路的“中华旅社”，给薛兴儒夫妇开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在他们对过，给我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薛兴儒一进门就忙于应酬，访问他的客人很多，无非都是些獐头鼠目的人物。上海我还是头一次来，我要看看这“十里洋场”的市容，我一个人偷偷地溜了出去，先到吴淞路找到了一位开诊疗所的亲戚，他的家就住在诊疗所附近一所四面为臭水沟所环绕、浊气四溢，中人欲呕的“弄堂”里，只有两间小屋，外加上只能睡下一个人的“阁楼”，用“仅堪容膝”这一句话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我这位亲戚是法国留学，还顶着一个“医学博士”的头衔，在上海还多少有点名气，当然收入也不会太少，没有想到住在这样一个湫隘嚣尘的地方，未免太有点那个了。后来在谈话中才了解到他起初到上海的时候，找到这一所房子很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很多的关系，用了四根金条才顶来的。这我才恍然大悟，刚才认为他是个吝啬鬼，这有些委屈了他。在他家里吃了一顿家乡风味的煮饺子，由他来做向导，我们逛了一会全国有名琳琅满目充斥着外国商品的“先施”、“永安”两个大公司。又到外滩公园去漫步，又看到很多停满在黄浦江的各国商船和美国军舰。归途又通过了两条混乱嘈杂的闹市，他把我送回旅社的时候，有“中华旅社”四个字的霓虹灯已经发射出一片红色的光亮。薛兴儒的客人有几位还没有走，他们要到外面去吃饭，薛兴

儒说等我等的很着急。一共有七八个人，分乘了两辆汽车。走了不到五分钟，就在灯火辉煌的一座大建筑物门前停住，据薛兴儒介绍说这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广东饭馆，据我看来也很普通。穿着白衣服的侍者，端上好多鲍鱼、鲑鱼之类的名菜，也许在几个钟头以前，家乡风味的饺子吃的太多了，还没有消化，这些名菜吃起来并不适口。薛兴儒虽然把他的客人都给我一一介绍过，可是他们的“大名”我连一个也没有记住，什么银行经理、洋行买办的这一类人物，都和我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大吃大嚼，高谈阔论，终于谈到本题上了，也就是把那只红皮箱的“谜”底揭开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这时，上海和北平两地的黄金牌价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在北平运来现钞在上海买上黄金时，就可以赚一笔大钱，再把黄金转运到北平，那就可以利市不止三倍了。但是因为火车不通，只有豪门巨绅、官僚政客用他们的特殊身分为掩护，往返都利用飞机运送，才能做这号投机倒把的买卖，薛兴儒和他住在上海的同行，互通声气，由于这一个生财之道，大大捞了一把。红皮箱里面满满装的是钞票，到上海以后几小时内，钞票已经变为黄金，黄金什么时候运到北平再变为钞票，那只有这一群大吃大嚼、高谈阔论的人们自己知道罢了。带上“国大代表”的红绸子标志而感到飘飘然的我，还没有到南京给李宗仁副总统的轿子当轿夫以前，却被一张飞机票所雇用，当了一次上下飞机搬运现钞的脚行，我暗暗地叫了几声惭愧。但通过这一件事认识到薛兴儒并不是什么能够“雪里送炭”、“济人之急”的“义士侠客”，不过是一个和国民党官僚政客沆瀣一气、唯利是图、无恶不作的蒙古败类而已。这只红皮箱的“谜”底揭开

以后，我的思潮起伏，躺在旅社的软棉棉的“茜蒙斯”床上，一直过了午夜，还没能入眠。

翌日下午，伪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也乘“霸王号”来到上海，住在“中华旅社”，我们又多了一位伙伴。

我们在上海一共住留了三十小时，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一行四人，搭上了京沪特别快车，车在黑暗中急驶，人在卧铺上睡觉，“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风景，一点没有领略到。在晨光曦微中，到达了国民党首都的南京下关车站，刚一下车就看到何兆麟、薛兴儒和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很亲切地在握手，经介绍后，才知道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此次新选出的立法委员，一向被他的这些部下们誉为奔走蒙事数十年如一日的蒙古大政治活动家李永新先生，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只是给我一个“沐猴而冠”的印象。

我们下榻于被“国民大会筹备处”指定招待国大蒙古代表和立监委的珠江路“珠江饭店”。我和何兆麟住在一个房间，两榻并陈，一桌横立，就器皿的简陋，褥被的粗糙所有这一套设备而言，与其说是“室小如舟”，不如说是和小城镇的挂着“安寓客商，仕官行台”的牌子的小客店差不了多少。最难使人忍受的是楼窗后面秦淮河的一泓浊水，横贯东西，烈日蒸发，臭气腾溢，一股股由窗隙不断地进入室内，使人随时都感到呼吸紧促和窒息。有人说，国民党款待“国大代表”的这一场所，还不如草原上的蒙古包舒服，我亦云然。

我们还算姗姗来迟了。这时，除了青海、新疆的蒙古代

表住在介寿堂外，所谓东四盟、西三盟、绥远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等特别旗的代表，都先期接踵而至，其中也有王公贵族、福晋太太，也有喇嘛活佛，更引人注目的是“不系明珠系宝刀”的蒙古女司令。也有穿着长袍马褂迈着四方步的官僚政客，也有穿着蒙古袍子蒙古靴子行动蹒跚一般人观念中真正的蒙古人。也有少数西服革履，风度潇洒的时髦青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已经把“珠江饭店”的大小房间全部塞满。他们也都在“大会”上报了到，领取了数目不算少的旅费和津贴。每人胸前也挂上了“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红绸子标志，腰缠五光十色的数千万法币，白天大摇大摆地到新街口、大行宫、太平街等繁华中心的地方去，吃馆子、听戏、看电影。有的还到夫子庙去听清唱，捧歌女，极少数的到钓鱼巷或秦淮河两岸的东、西石坝街“白相白相”，欣赏一下“南朝金粉”的特殊风味。只有三两个人专门跑几家大金店，每天买二条卖二条，把自己列入“金鬼子”的行列中去。一到晚上，这所专门招待蒙古贵宾的饭店，更显得热闹非常，客人们都按照每人自己的兴趣，分别聚在几个比较大的房间内，有的参加“竹城之战”，敲敲打打地彻夜不停，有的做樗蒲之戏，围上一大群人，把国民党的花花绿绿的法币，相互传递，呼卢喝雉，通宵达旦。还有一些“瘾君子”们，男男女女也凑在一起，在雕刻精美的“太谷灯”下，互相品一品“热河土”和“绥远土”味道的不同。更有少数纨绔子弟们，公然在自己的房间里，挟妓饮酒笑语谑浪，无所不至，他们忘却了天下还有耻辱这一件事。附近的几家小吃店忙的不可开交，不断送来什么小笼包子、鸡丝汤面等食物来，供应这一群寻欢作乐的人们吃夜宵。招待贵

宾的饭店，却变成—个藏垢纳污、乌烟瘴气的场所，也可以说是一个吃、喝、嫖、赌、抽，—应俱全的魔窟。这个饭店的门口，也有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昼夜不停地往来巡逻，当然洞悉内部的一切糜乱情况，假设是普通住客，这些鹰犬们早就依据国民党所公布的堂乎皇哉的禁烟、禁赌、禁娼的法律，逮捕问罪，最起码也是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但是对于这一群要把他们的老头子蒋介石捧上总统宝座的重要角色们，岂止是不敢动—根汗毛，相反地还要曲尽保护的责任，这也就是素被大汉族主义者轻视的“老蒙古”，—旦被选出为国大代表和监委以后，所受到的特权和“荣誉”了。因此有些人感到骄傲，也情愿忠心耿耿地为国民党效力了。

#### (五) 大会花絮

—九四八年四月—日，伪国民大会在锣鼓喧天中开幕了。会场在新建筑的国民大会堂，这一天蒙古方面包括青海、新疆的五十几名“代表”全部都参加了这个“旷古”的开幕大典，多—半都穿着蒙古服装，坐在会场的东侧，在新疆维吾尔族“代表”的后面。维族和—两名哈萨克、彝族的“代表”，也都穿着富有特征的自己民族服装。尤其是全国各地来的数以百计的“妇女代表”，她们更是奇装异服，花团锦簇，和会场屋顶悬挂的几十个绚烂夺目的宫灯交相掩映，的确有—种春风怡荡、百卉争艳的感觉。有些黄色新闻记者，给北平满族妇女代表唐舜君（清光绪瑾妃的侄女唐石霞之妹）加上了“国大之花”的封号。又把—名维族女代表，叫做“国大红牡丹”，把参加大会说成是“逛花园”。更有人以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极有封建色彩的旧诗来形容当时会场的不正常的豪华气氛。把行将爬上总统宝座的蒋介石，描绘成黄袍加身、多少臣仆匍匐在他脚下的中华民国大皇帝。这是恭维，还是讽刺，只有他们这些当事人自己才清楚。总而言之，国民党这一个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召集的所谓最高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乌烟瘴气。参加这个会的大多数“代表”，似乎都带着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今天是否还有明天的疑虑和不安的情绪，因此也都以喜笑怒骂，玩世不恭的姿态来出现。有些敏感的人，更看出蒋介石王朝已经是大势已去，而在苟延残喘了。

大会一开始的头几天，国民党政府各部部长，虚应事故地分别作了政治、经济、司法、粮食等报告的时候，人们都漠不关心，出席的人数逐渐减少到三分之一，尤其是蒙古代表的席位上，只能看到寥若晨星的几个人，坐一坐，打一打盹儿，装一装门面，大多数人都以没有翻译，听不懂话为借口，有的在饭店，作一名昼寝的宰予，补偿他夜间的失眠，有的仍然到夫子庙蹓蹓蹓蹓去了。

我记得只有国防部长白崇禧做军事报告的时候，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出席人数，总觉得听不懂汉语的蒙古代表，也不约而同地全体出席，足见人们对当时形势的关心和注意。

这位国民党的一级上将的国防部长的报告内容，无非煞有介事地把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的所谓军事优势吹嘘了一大阵，“共匪”长，“共匪”短地骂了一大阵，最后的结论还是大言不惭地讲出：“不出六个月，可以把全国的匪军肃清，完成戡乱建国的任务……。”这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

一再失利，在几次“剿匪”中树有赫赫战功而取得蒋委员长信任并依为左右手的陈诚将军，已经在东北行辕主任的椅子上坐不稳，并从他坐镇的沈阳潜逃到南京，称病不出（还有逃往美国的传说）。有些东北和山东的“代表”，让白崇禧当众交代陈诚丧师辱“国”的真象，并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二楼上边也大吵大嚷“要陈诚的脑袋”，会场空气非常紧张，秩序也顿成紊乱，这位部长木立讲话台上，脸上做出苦涩的表情，我听到我后排河北省座席上有个“代表”大声说：“这是共产党捣乱。”这时看见有很多戴钢盔的国民党宪兵由会场两边旁门（太平门）徐徐而入，一排一排地站在会场里的四面八方，如临大敌。好多人都溜走了。我们这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蒙古代表，怕他们要弹压，要逮捕人，为了免遭“池鱼之殃”，三三两两地借登厕为名，都溜之乎也。我很自豪地说，我是我们这一伙中最后溜出来的一个，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一场混乱演变出来的结果如何，收场如何。

由一场虚惊，说明了蒙古代表都是些胆小鬼，从此更少在会场上出头露面，有时上午去应卯，下午照例是各找方便，谁也不去。记得有一个下午只有额济纳旗代表牛顿和我占据着全部蒙古代表的座席，台上是于斌的执行主席，好象正在通过什么议案，我们的牛顿先生，这位在蒙古草原长大的代表，天真极了，他象小孩子得到了好玩的玩意儿一样，把电器表决器在椅子后背上的机钮按了一按，按了自己的又按别人的，按完这个又按那个，有时用两只手同时按，一连接十几个或二十个，这样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和我用蒙语悄悄地说：“有时只按一下，表决器的电灯，红的绿的亮几十个，有时接到二十个，才看到亮一两个，是不是表决器的

后面还有人操纵？”我们的牛顿先生虽然不是英国科学家那位牛顿，可是也把国民党民主表决器的秘密一言道破了。

在“国民大会”开会期间，蒙古代表也不是完全吃喝玩乐地把时间混过去了，也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另一件就是这次的蒙古国大代表仍弹上一届代表的旧调，精雕细刻地提出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具体方案”请求大会通过。

选举蒋介石当总统，蒙古代表们认为是天经地义、毫无异议。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不是那样敏感，但也很清楚地观察到国民党在结束训政的幌子下，蒋介石要登上总统的宝座，实行个人在政治上的独裁，也就是召开这一次大会的主要目的。选蒋介石当总统，是代表们的唯一使命，蒙古代表和其他代表同样有这样感觉，自然要给蒋介石投上一票，就算完成参加这次大会的最主要任务。

在选举副总统的时候，就热闹起来了。先后公布的副总统候选人，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孙中山先生的哲嗣立法院院长孙科，湖南省主席、同盟会老会员程潜，还有东北系老牌政客、“九·一八”事变前一度任过驻苏公使的莫德惠（满族）。他们在国民党内都是“德高望重”，“勋业彪炳”，互相颉颃的一些大人物，这四位候选人毫不留情地摆好了“逐鹿中原”的阵势，展开了竞选活动。五十几位蒙古代表的副总统选票，当然是他们争夺的对象，谁也知道因为一票之差，就注定他们能否当选的命运。他们都暗中找出来了在国民党内比较有地位又和他们接近的蒙古人，在蒙古代表中进行活动，也就是给他们来“拉票”。孙科的竞选副总统，是由蒋介石来支持，所以由这位国民党总裁的直属部下

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李永新来担当了给孙科“拉票”的角色。另外一个助手，就是一度到锦州监督卓、昭两盟选举事务的吴云鹏，吴是立法委员，孙科是立法院长，院长竞选副总统，委员给跑龙套，这是很自然的事。李永新和吴云鹏在国民党阵营的蒙古人中，都算是老资格，这两个人因为争权夺位，极不相能，尔虞我诈了多少年，这次都替孙科拉拢蒙古代表，据了解内容的人说，在他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合作。

最令人发笑的是自封为“党国元老”的白云梯，他也站在孙科的这一方面。我亲眼看到在会场上，他对一些蒙古代表，用蒙语来宣布“谁要投孙院长一票，马上就送他回去的飞机票。”沈瑞莲（马超俊的老婆）拿着把钱数已经写好的支票本，在白的身后站着，还把支票本冲着大家晃了一晃，似乎在说：“只要你们答应，马上就可以拿走支票，我们是现钱交易，绝不除欠。”在座的二十几名蒙古代表还很知趣，谁也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攫取这样一张支票，总是怕引起旁人的非议，担当出卖选票的恶名。“党国元老”在稠人广众之间居然以支票收买副总统选举的一幕丑剧，在人们的沉默中只好收场了。

伪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为李宗仁的竞选问题，奔走不遗余力。何和李永新的关系很密切，既为同乡，又为同学，在没有到北平以前，何是“边疆党务处副处长”，既是同事，又为“同志”，一般看来，在这副总统竞选中，他应该和李永新采取一致行动。可是他在北平的时候，已经被李宗仁拉过去，到南京以后，不但没因与李永新的关系而中途“变节”，相反的他除了和在北平吃过李宗仁两顿饭和李

宗仁有默契的十几名代表经常保持联系外，并扩大了活动范围，找到了得力的助手。前参议员新被土默特旗选出为立法委员的荣照（字光庭），据说和李宗仁的亲信甘介候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自告奋勇地出来捧场，与何成了联手。李宗仁临时给他们俩调拨了两部汽车，春风得意，跑来跑去，听说跑的成绩还不错，把蒙古代表半数以上的票，都跑到手，堪称是李宗仁的“功臣”。

胡风山和程潜，一在江南，一在塞北，不知道经过何人的介绍，胡凤山给程先生当了竞选总统的宣传员，可能也在蒙古代表中争得了少数几张选票。还有伪满洲国时期驻在热河八大庙自称班禅堪布的伊希札拉莎（即白玉亭，伊盟“三·二六”事变前被打死的伪绥境蒙政会委员白音仓的师父），因为行为不端，违犯戒律，被八大庙的僧众驱逐，跑到南京来向蒙藏委员会告状，也住在“珠江饭店”，在偶然的场合上和程潜的秘书认识了，于是这位喇嘛也参加了给程潜拉票的活动，用黄色绸子包着程潜的大型名刺，不论他认识或不认识，只要看到国大代表就要给一张，他还指着名片说：“这是好人，你们一定要选他。”当时有人说，程潜真够神通广大，能找到黄衣黄帽的“佛爷”给他助威。

据说这些为人作嫁的拉票纤子，都由主人那里支取一笔数目不少的选举活动费，他们“拉票”的方法是讲交情讲面子，并许以政治上将来的出路，如对方仍不为所动时，最后直截了当地用金钱来收买，要价还价，争论不已。有一张选票，还有两头吃的，卖给李宗仁以后，还要使程潜的一笔钱，据说胡凤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时期胡以养病避嚣为名，由“珠江饭店”东院搬到蓬蒿丛生人迹罕到的西半边的

废园，就是为进行这些买卖。当然这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勾当，他们都是暗中交易，互守秘密，个别进行。当其中有一二名不能做到守口如瓶的人，在得意忘形的时候吐露一二，便成为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真象如何，毕竟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这几位副总统候选人把南京的几家著名的大餐厅都长期包了下来，只要带着国大代表的红绸子标志，无论何时，都可以随便进去，任意进餐，这也是他们的别开生面的一种“贿选”手段。

据我所知，李宗仁包的是“安东酒店”和“中央亭”，孙科是广东菜馆“龙门酒家”，程潜是湖南“曲园饭店”。我们这些吃惯了牛羊肉的蒙古代表，对于鱼虾之类的食物，总感到有腥味，不合口胃，虽然有大多数人支持李宗仁和孙科的竞选，但很少到他们所指定的广东菜馆去。倒是三五成群到“曲园”去叫一桌酒席，好象掉在“酒池肉林”一样大吃大喝，天天如此，差不多继续到投票选举副总统的前夕。有一天昭乌达盟代表卓里克图良心发现地和我谈：“我们既然决定投李宗仁的票，却到‘曲园’来吃饭，这就叫吃里爬外。我是吃谁向谁，吃了这些日子饭，我这一张票一定给程潜了。”他就这样一说，究竟投的是谁，只有他自己知道。

投票选举副总统的那天，“盛况空前”。几千名代表全部出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和孙科夫人都站在国大会堂的大门旁边，和进入会场的代表们一一含笑握手，好象在提醒大家投票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们的“老头子”。在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主持下，秩序井然地很快就把票投完了。“李宗仁！”“孙科！”唱票的声音一直到黄昏的

时候还在继续着。蒙古代表们感到无聊，都回去了。晚间才听到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大力支持李宗仁竞选的一部分蒙古代表，脸上都浮现出胜利的微笑，认为蒙古民族有了广阔的前途。

这位副总统果然没有辜负这一部分蒙古代表的期待，在这一年的秋季，因为国内革命的形势逼人，总统蒋介石被迫下野跑回浙江奉化原籍的这个阶段，李宗仁代理总统的时候，由于他的支持，把北平解放前夕逃到南京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搬到阿拉善旗的定远营，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有些给李宗仁抬过轿子的蒙古国大代表，由北平、南京各地纷纷赶到定远营，正想粉墨登场扮演主要角色的时候，已经听到解放宁夏的隆隆炮声，“守土有责”的胡宗南、马鸿逵都抱头鼠窜。这个短命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昙花一现中宣告垮台；除达理札雅、白海风率部起义外，德穆楚克栋鲁普这一伙已作鸟兽散。这就是李宗仁同情内蒙古自治而履行他诺言的结果。

在国大开会期间，还有蒙古代表共同关心和注意的一件大事，就是怎样拟定“内蒙古自治方案”提交大会上通过的问题。在大会进行期间，几乎每天都在大会所指定的“康乐食堂”，利用共进午餐的时间，共同来研究和讨论，蒙古方面的“立监委”也被邀参加，是一种饭前或饭后座谈的性质，多一半由李永新来主持。谈过几次以后，虽然有了要求自治的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但在具体措施上意见分歧，难趋一致。国民党元老派白云梯和李永新等所主张的“蒙古地方自治”，充其量也不过是根据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中政会所通过的“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在地方军阀

为“太上皇”的“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统治下的什么绥境、察境，新设上几个热境、辽境、黑境这样一个把内蒙古支解为数段的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成立起来，<sup>①</sup>就算达到内蒙古自治的最高目的。以席振铎、札奇斯芹、胡凤山为首的“蒙古青年同盟”派，对于“元老派”所提出的这一方案认为是“开倒车”，不合乎目前的形势。他们主张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原則下，内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可是“高”到什么程度，连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有的说应该仿照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除国防、外交属于中央政府外，在包括新疆、青海在内的广大区域上，组织一个最高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来管理自己民族的一切事务。有的还说，新疆、青海距内蒙腹地相当遥远，暂时可以不管，目前仅就西三盟、东四盟、察哈尔、呼伦贝尔两部、绥远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三特别旗为蒙古自治区域，组织一个直隶于国民党行政院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来发号施令。还有人主张应该效法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有的人说内蒙和中国是自治邦和宗主国的关系，所以应该成立一个半独立状态的高度自治政府。诸如此类，既不具体，又象痴人说梦似的意见，提出的很多，因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赘述。

由于“地方自治”和“高度自治”的意见分歧，“元老派”和“青年同盟派”也形成了对立的态势，在每次开会的时候，双方都喋喋不休，争辩不已。“蒙古青年同盟”分子骂“国民党元老派”是昏庸老朽，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见解，只知道打着蒙古的旗号骗国民党的官儿坐，秉承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意图行事，出卖自己民族利益。“元老派”也反唇相讥地说他们是唱“高调”，不符合实际情况，“如



果想革命就应该回到自己的蒙古草原，揭起堂堂正正的革命旗帜，如今白天在国民党的首都空喊革命口号，晚间就要到金迷纸醉的场所去跳舞，你们算是那一路英雄！”当双方互相谩骂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报以缄默，有的人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有一次以官保加为首的青海代表看到他们声色俱厉，争吵不休，就要全体退席，当场被“蒙古青年同盟”分子所阻拦，并骂他们不热心民族的事情，官保加急得号啕大哭，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们的马步芳主席不让参加你们的争吵大会。”说完以后马上走出了会场。通过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会的不感兴趣。另一方面由官保加的哭声中，也可以理解到“青海王”马步芳对蒙古代表的控制，使他们完全失去行动自由。

蒙古代表除了自相践踏狗咬狗以外，在大会所编成的民族问题讨论组上还要同设在内蒙古原有区域的热、察、绥三省的汉族国大代表们不断交锋。这三省的汉族统治集团最怕听、也最讨厌听蒙古喊出“自治”的口号。如果蒙古真的自治起来，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在内蒙古地方的统治地位，他们要失去很多的征兵、征税、征粮的对象，直接影响到这一个集团的兴亡隆替，当然要集中力量，拼命地破坏和反对。他们在一届的“制宪大会”上和蒙古代表多次接触，连战连捷，已经取得了很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一次更早有所准备，大会刚开始的时候，就组成一个实力庞大的“热察绥三省国大代表联谊会”，由绥远省代表、有战斗经验的于存灏来任会长，听说傅作义将军还特别给了一笔用于反对内蒙古自治的经费，兵多将广，粮草充足，以数达几百人的成员对付五十几名蒙古代表，已占压倒优势而立于不败之地。在起初

的几次会上，蒙古代表还能稳扎稳打，还能把自治问题提到桌面上谈一谈，尤其对于国民党“元老派”所拟的在“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之下要实行蒙古地方自治的方案，热察绥的代表也并不反对，仅在具体实行的方式方法上，多少有些争论而已，还能够保持着“西线无战事”的状态。当“蒙古青年同盟”的成员一提到什么高度自治这一问题时，就被他们集中火力，一齐扫射，弄得发言人再抬不起头来。象这样的会也不知道开了多少次，蒙古代表和热察绥的代表，始终是保持着敌对的立场。在开会期间，傅将军在集宁飞机失事与随员一名负重伤的消息，很多蒙古代表竟相走告说：“这一次傅作义可能是完蛋了，那样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线生机。”在这些小问题上也看出蒙汉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有增无已。

蒙古代表由于内则兄弟阋墙，外有强邻压境，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当时的客观环境，所谓他们理想中的自治问题，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为了敷衍搪塞，就由中间派陈绍武等几个人（陈为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亲信，李永新的亲戚，故此时能以中间派的姿态出现）草拟了一个既非高度又非低调的“蒙古自治实施方案”，用全体蒙古代表的名义作为议案向大会提出后，大会交立法院审议。吵吵嚷嚷许多天，包括着各方面矛盾的这一个“国大蒙古代表”向国民党要求自治的问题，不是暂时告一段落，而是永远消沉下去了，仅给历史上留下一点“雪泥鸿爪”的痕迹。

国民大会闭幕后，当时还保持“半壁江山”的蒋总统，在他自己的官邸还召见过一次“国民大会全体蒙古代表”。在一个天朗气清的初秋上午，由他的随从秘书曹圣芬带着我

们在客厅里等候，客厅很窄狭，两套皮沙发的前面放着五、六排小椅子，白云梯等的“党国元老”坐在皮沙发上，我们这些人就坐在小椅上，等候了约半个多小时，这位新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才出来接见。他坐在沙发的中间，白云梯等几个人毕恭毕敬地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声音很沉。我因为坐在后面听不清楚，只听到这位总统连声说“好”，在一连串“好！好！”的声音中，会见就结束了。以后大家聚在庭院的树荫下，拍照留念，仍然听见“好！好！”之声。这是我和蒋介石初次会见，也是最末次的会见，除了连声说好的语调和光亮的秃头以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会见蒋介石的第二天，我和何兆麟坐上了一架国民党的军机，回到阔别了四个月的北平，正是沈阳和锦州解放的前夕，北平处在风鹤频惊、豪门贵客纷纷买机南逃的时候。

## 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

博彦满都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封建王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宾图王棍楚克苏隆。

棍楚克苏隆（以下简称宾图王）是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札萨克宾图郡王，宾图是他的封号。

宾图王生于一八八七年，死于一九一四年，得年二十八岁。通晓蒙、汉、满三种语文。性爽直而勇敢，不畏权势。好读《孟子》，他常说：“在中国圣贤中最崇拜孟子，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最为合理。”十八岁时袭王爵。短身材，粉白圆脸，眉清目秀，性情活泼，固一翩翩少年。

宾图王任札萨克时期，为本旗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肃清了多年的匪患，创办了学校，派学生到内地求学，自己也到北京上学。筹办警察，安定了地方秩序。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听任日俄两帝国主义为争夺朝鲜和“满蒙”势力范围在我国领土上作战。日本特务收买地方上的蒙汉土匪编制了蒙汉洋队。

“汉人洋队”的头目有张作霖、冯麟阁等。“蒙古洋队”的头目有巴布札布、巴特尔桑、穆荣阿、宝音达来等。这些“洋队”到处扰乱，为所欲为，民不聊生。当时清朝地方官怕洋

人，概不过问。但科尔沁左翼前旗的人民并没有受到特大的损害，因为宾图王组织了民团，亲自带队保护人民，不容“洋队”扰乱。有一次冯麟阁洋队的兵，强奸了一个民女，宾图王找冯质问，冯道了歉，处决了犯人，将首级送到出事地点，悬示了一个月。

宾图王组织民团缺乏武器，亲赴沈阳购买。当他到沈的那天，适值俄军战败退出沈阳，日军进城。当时城里日兵岗哨遍布，其势甚凶，成群的日兵，挨户搜查，刀枪威逼，语言稍有抵触，非打即杀，商店紧闭门户，各图自保。宾图王睹此情况，不顾日兵阻挡，即走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责他不设法维持。赵说这是国家软弱，并非我不管。宾图王说主要是撤去日兵的岗哨和停止他们的搜查。赵说我想一想。宾图王说我建议邀他们赴宴会，在宴会上见机交涉。赵说已经请过一次了。宾图王说不妨再请一次。

当日宴会上日军将领来的很多，如大山、小山元帅，乃木、东乡大将等。大山问宾图王：“小王爷，日本好还是俄国好？”宾图王答：“由我看来还是俄国好。”这时另一个日本军官将他的军刀狠狠地顿了一下，厉声问道：“俄国好，怎么败了？”宾图王答：“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以一次的胜败定好坏。”这军官站起来拍案大叫：“怎讲？”宾图王说：“我说俄国好是有根据的，俄国人在我们城里的时候，不干涉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城门市街，由我们自己设岗放哨，俄国兵并且有纪律，不害人。你们来后，赶走了我们的官警岗哨，全归你们军兵设岗，你们的官兵以搜查为名，到处刁难我们的人民，甚至有不少无辜人民被你们的官兵杀害，闾城居民恐惧至极，闭户不出。由此看来，你们的确

不及俄国人。”大山说：“你们的事情还是由你们自己办，不过在战争时期我们也要防备敌人。”宾图王说：“俄国人都败走了，那里还有遗留的，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由我们来给你们代查，这件事我们的总督大人可以保证，望你们马上停止搜查和设立岗哨，这样我们的民心就安定了，商民就可以开市营业。”大山说：“好！就这样办，我与贵总督明天即出联名布告。”宾图王笑着说：“何必明天，今晚就可以办。”接着就向总督说：“叫人来拟稿。”大山说：“好一个急性的小王爷，就依你的话办吧。”次早，沈阳城的街道上，果然不见日军岗哨，中国军警照旧出现在街头，商民纷纷开门。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春节，宾图王适值年班(清朝制度，蒙古王公进京朝见皇帝贺新年)，西太后要看一看这位年青有为的宾图王，特别降旨召见，西太后问：“蒙古地方的戈壁沙漠，可以种稷子？”宾图王答：“沙漠不毛之地，草且不生，何况稷子。”西太后目视左右，左右呼退，宾图王即退出。当晚有两个太监来访说：“王爷今天在佛爷面前犯错误了，知道吗？”接着又说：“佛爷说沙漠之地可以种稷子，按规矩您应该答以‘者’字，而您答的是什么沙漠不毛之地，草且不生，何况稷子。这种答法是违旨，是大不敬。幸亏佛爷仁慈，原谅你年幼无知。再由我们替您说话，这才没有怪罪，否则这还了得。请您以后要注意！”宾图王只是默默不语。当时在座的宾图王的母舅道尔布克赶紧向前一再请安说：“谢谢二位公公在佛爷面前多说好话了，请二位公公以后更多照顾。”说着即把一百两的两个银票用红纸包好，搁在哈达上，屈膝跪地，双手奉献。这两个太监走后，

宾图王很不愉快，对道尔布克说：“理他们作甚！哼！佛爷！佛爷！我看她还厉害不过大山。”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地方人民倡议给宾图王建生祠，宾图王不许，数请不准。结果在柳条边秀水河边门外，人民竟给他建立了三个大石碑，用蒙汉文歌颂了他的功德。

一九一〇年的冬季，宾图王还在北京贵胄学堂读书，这时科左前旗来了一个喇嘛，自称是外蒙的那拉班禅活佛，说要见宾图王。他的左手用黄缎包着，说掌心有眼，能照见一切。有人向他问事，有时口答，有时袒露他的背，皮肤上现出蒙藏文字，用以作答。这样轰动了一时，远近四方来参拜他的人日益众多，但也有一些人怀疑，以为他未必是真佛。正在这时，宾图王由北京毕业回来，闻之甚怒，即传这活佛到王府，要治以惑众之罪。这活佛说：“王爷，请你不要发怒，你先看看我的身背。”（下面一段神话般的传说，是宾图王故神其说，用以骗人的，后面还要谈到）宾图王见其背上果然突现了几行字。宾图王说：“既然如此，我还要你给我显示一件事情，我的王爵相传已经十世，我想看看我的祖先九位先王的灵魂。”活佛说：“善哉！”即指其右腋说，“你来由此观看。”宾图王看后泣拜于地说：“请佛师恕弟子无知。”活佛将他拉起说：“不要紧，我二人有缘，你我是过去数百世的朋友，不过你现在不认识我了。”当宾图王的母亲要拜这活佛时，这活佛赶紧向前跪拜说：“我吉（蒙语母亲）！您千万不要拜我，您是菩萨，您是我前世的母亲。”

从宾图王崇拜这活佛以后，拜佛者更多了，怀疑者也没有了，宾图王府的周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拜佛，纷纷谈论说：“活佛说了，宾图王是嘛哈嘎拉佛下界，他是真

主，他要起兵平定天下，这活佛是军师，他能撒豆成兵，他掌心的眼睛，能照见一切妖魔。”

这活佛不穿喇嘛衣服，其服装和俗人一样，只是没有辫子，好喝酒、吸旱烟，好听音乐，常使经箱子喇嘛作乐。酒后好打人，打死了一个经箱子的喇嘛，这喇嘛名叫金必业喜，说他罪恶甚重，要巫蛊宾图王。

一九一一年正月，宾图王偕活佛到北京，有人看见这活佛的行为可疑，向清政府告密，说宾图王有异志，他王府中有妖人。宾图王怕败露，即派心腹（包登阿）乘京绥火车将活佛送到张家口外放走。

我见过这活佛。听他说话的口音，象是察哈尔人。宾图王死后吾友丰升额对我说：“这活佛是由外蒙哲布尊丹巴派来，勾结宾图王在内蒙起事，响应外蒙独立的。宾图王有发动内蒙独立的野心，想利用宗教迷信以煽惑人心，因而在宾图王府作了那一套骗人的把戏。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又进一步到北京想诱惑内蒙古各王公，不料露了马脚，才将这活佛送走。至于他皮肤上能现字，乃是用白矾和其他一种药料配的，用手指沾着划在皮肉上，用手掌擦之即现字。至于其手掌之眼和宾图王之见九祖，都是骗人。”我同意丰的话。

辛亥革命的这一年，宾图王经常住在北京。当时内蒙的王公、活佛，呼图克图的多数也都住在北京。这时他们都已接到哲布尊丹巴的檄文，他们最怕中国起革命，怕清朝廷垮台；他们的唯一希望是怎样才能够保持住他们的世袭罔替的爵位，和继续维持住他们的封建统治特权，但大家都没有主意。宾图王乘此机会开始了他的野心活动，怂恿各王公响应哲布尊丹巴。他提议从哲里木盟起事，北联呼伦贝尔、西结



西部各盟，和外蒙统一起来，搞一个蒙古独立王国，这个计划曾得到各王公的赞同。其中最与宾图王密切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博多罗葛台亲王阿穆尔灵珪和阿尔花公，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札萨克图郡王乌太，科尔沁右翼后旗的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奈曼旗的郡王苏珠克巴图尔。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了，清廷闻之大震，只有一途，起用袁世凯赴武汉督师。这个时候，清朝廷召见蒙古王公开过一次御前会议，隆裕皇太后临朝，摄政王载沣扶宣统皇帝登座，以庆王为首的一些贝勒大臣列朝。隆裕对蒙古王公降旨说：“我朝开国以来，对尔蒙古恩遇甚厚，尔等先祖亦皆效忠朝廷，如博多罗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平定洪杨之乱，立了殊勋。现在革命闹事，国事危急，望尔等献策效劳，一如僧王。”当时各王公默默无言，都目视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宾图王即奏对说：“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袁世凯夙有异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今已起用袁世凯，大权已归于彼，奴才等虽有效忠之诚，亦实无能为力。”语至此，隆裕等皆饮泣流泪，朝会就如此告终。

清帝退位了，成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宾图王即离京回旗。他面色苍白，不愿说话，一个人住在书房内，日夜踱来踱去，不时喝酒。其间由北京来过几次急电，催他火速进京，其中一个电报还提到要任命他为蒙藏院总裁。这样过了七天，宾图王即带亲随六人（色登阿、丰升额、讷勒和布、阿木尔、德楞额、色卜正额）去库伦。

丰升额说：“宾图王之在书房踱走，是为发动就地起事，

而又怕一时号召不起来，再思再想，最后决定出走。”宾图王深悔带活佛到北京之失败，他说：“我若携活佛游各盟旗，我的事早已成矣。”

宾图王出走后先到奈曼王府，想和奈曼王苏珠克巴图尔同往库伦，商议几日，决定苏暂不走，由苏派兵十名，送宾图王到锦州东边的一个小站（历家窝堡）上火车，经沈阳、哈尔滨到满洲里，转西伯利亚铁路经恰克图到达库伦。

一九一二年，宾图王在库伦任了哲布尊丹巴王朝的副总理大臣，给哲布尊丹巴条陈了不少的“治国安邦”之策，都没有见诸施行，因大权都操在当地喇嘛王公之手，都是一些封建迷信腐朽守旧之辈，那里还能看的惯如宾图王这样的好事之人，甚至诬宾图王为袁世凯的间谍，这就致这个颇有野心、自负要成为成吉思汗第二的封建统治者的宾图王终日抑郁，不到四年就死去了。

宾图王在库伦时盼奈曼王苏珠克巴图尔甚切，而苏始终未去，宾图王常对人说：“好友奈曼王竟至如此失信，其他内蒙王公更复何言。”

一九一五年春季某日，宾图王赴某大臣宴会，回寓走到院内，大叫一声“丰升额”而倒地。丰等闻声赶至，宾图王面色赤红，口吐白沫，已气绝矣，享年二十八岁。

对宾图王之死，有两种说法：有的说，宾图王在朝敢言，弹劾了不少人，可能是宴会上仇人下毒。另一种说法：宾图王有羊癫疯症，过去犯过四次，这次也许是第五次犯病。其灵柩运原籍入葬。

以上叙述，一半是我亲身所见闻，一半是由我友丰升额口述，丰是宾图王的心腹，始终未离其左右者。

# 解放前原绥远省甘草和甘草 行业的概况

尹子衡口述 阎秉乾整理

甘草（行话叫根子，土名为甜草苗），为我国西北地区如陕北之三边、盐池，宁夏之宁朔、宁夏县，内蒙古之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甘肃省之甘州、肃州、民勤的特产。主要产区是伊克昭盟。全国甘草产地面积约达四千余平方里，可掏量据估计约有四千万斤。销售地区很广，如河南、河北、广东、山东、湖南、湖北、天津、上海、汉口、香港；国外如朝鲜、印尼、日本等地。甘草因产地之不同，产量质量大有区别。经营甘草的行业亦有草场与草店之分。兹分别叙述于下。

## （一）甘草生产情况和甘草的出产地

甘草产地分边里、边外。边里是指长城以南的几个地方而言，如陕北的三边、宁条梁、盐池县。边外是指长城以北的地区而言，如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右旗、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及宁夏的宁朔县和宁夏县。杭锦旗和达拉特旗沙梁以北黄河两岸地区又分别叫作

上河川和下河川；杭锦旗黄河两岸以西的地区叫作上河川。甘肃省之民勤县、甘州、凉州、肃州亦产甘草。这些产地，以杭锦旗，达拉特旗和鄂托克旗所出产的甘草数量最大。

### 甘草之年产量

陕北的三边、宁条梁和盐池县三地年产量约有三十余万斤（至民国年间产量增涨到二百万斤）。宁夏之宁朔县和宁夏县年产量约有五十余万斤，阿拉善左旗、右旗年产量约为六十余万斤。伊克昭盟之鄂托克旗年产量约为一百万斤上下，杭锦旗年产量约有二百余万斤，达拉特旗年产量约有二百五十万斤，准格尔旗年产量约为十万斤上下。甘肃省之民勤年产量约为五十万斤，甘、凉、肃州年产量约为六十万斤。这些地区年平均总产量，据估计，约为八百余万斤，有时超过，有时降低。产量之高低完全是依甘草生产情况及销售情况来决定。不论产量高低，总不能全数运到市场销售。比如：民国七年由于美商梅隆洋行收购荒草（甘草的一个品类），产量就突然增长，主要产地是梁外、阿拉善左、右旗，上下河川及民勤县。这一年的产量约为一千万斤，可是运到托县（内蒙古一个县）河口镇（当时的甘草主要集散地）的约有八百五十万斤。日寇侵占绥包时期，由于交通阻塞，河路不通，梁外、上河川、阿拉善和民勤这些地区的甘草生产均陷于停顿。仅在下河川和包头附近有小部分生产，年产约六十万斤，而运到包头销售的草不过四十余万斤。民国三十四年日寇投降后，各主要甘草产区逐渐恢复生产，年产量约有五百余万斤，而运到包头的不过四百余万斤。为什么在草场所

生产的甘草不能尽数运到码头呢？原因是：各草场秋后所收购的甘草，必须经过铡割、晾晒、捆包等一系列工序，花费了相当时日，在黄河流凌之前，未能运至河岸装船运走，这就势必把一小部分甘草留在草场，等待来年开河之后，再行起运。

### 甘草的质量

前面说过，甘草因产地之不同，质量亦有所不同。杭锦旗梁外和阿拉善所出产的甘草为最好。梁外（即陕北各县）货，皮色鲜红、粗细均匀，枝头肥实，骨气重，质地坚，粉多、筋少，货好价高，列为上等货。王爷地（即阿拉善）货，皮色稍黑，粗细均匀，骨气重，出粉亦多，也列为上等货，销路最畅。上河川、下河川、鄂托克旗和准格尔旗所出产的甘草列为中等。上河川的货，皮色淡红，骨气较轻，粗细不匀；下河川的货，皮色黑红，不鲜亮，骨气轻；鄂托克旗的货，皮色紫红，皮质粗糙，骨气不如杭锦旗的好；准格尔旗的货，皮色有淡红的，有黑红的，骨气轻，根条细。民勤和甘、凉、肃州的货列为下等。民勤的货，皮色大半发黑，虽间有红色的但为数甚少，粗细不匀，大头小尾的多，骨气轻；甘州和凉州货，皮色浅红，猪尾形状，骨气轻，心发黑；肃州的货，皮粗色黑，唯骨气重，出粉亦多。盐池等地所出产的甘草不如杭锦旗的好，但比杭锦旗的粗，也列为中等货。

为什么梁外和王爷地所产的甘草就好，而其他地区出产的甘草就次呢？这与土壤有很大关系。梁外和王爷地的土壤自上至下都是黄沙土质，所以出产的甘草皮色既好，骨气亦

重，粗细也均匀；而其他地区的土质就不是这样了，上层的土是黄沙土，而下层的土是油碱土，因此所出产的甘草皮色既不鲜亮，粗细亦不均匀，骨气也较轻。

### 甘草的品类

甘草品类并不是天然的分法，而是加工时按销路来分的。

(1) 大草：长短由八寸至一尺二寸，最细的也得有大拇指粗，比大拇指粗的更好。这种草销售地带是广东、香港、印尼和日本等地。(2) 二草：长短由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有中指粗。这种草也是销售于广东、香港等地。(3) 红粉：长短由八寸至一尺四寸，皮细色鲜亮，有食指粗。这种草销售于上海、宁波等地，以宁波为最多。(4) 白粉（把红粉刮去皮即为白粉）：长短由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有食指粗，唯骨气须重，粗细要匀。这种草销售于安徽、湖南的湘潭、江西等地。民国十二年以后，鄂托克旗也刮做白粉了，唯粗细不很匀。(5) 次红粉白粉：长短、粗细与红、白粉相同，唯骨气轻，色气不好。这种草销售于河北祁州。(6) 河草：长短由七八寸至一尺，有小指粗，骨气有轻有重。这种草销售于河南禹州。为什么叫作河草？在铁路未修至绥远之前，销于河南的甘草统由河路运往河南汜水卸货，再转运至禹州。因此，走河路运往河南的草叫作河草。(7) 截子：不论大草、二草或红白粉，即加工时不够规格而剃下来的短草叫作截子。最长的截子不过五六寸，中等的不过三四寸，最短的也有二寸多。大草截子装于大草捆内，二草截子装于二

草捆内，红白粉截子装于红白粉捆内，随着销售。后来也单独装于席包运销河南禹州。（8）渣子：甘草正条上的奶毛奶串和十号头（根子与茎之间的一节）都叫渣子，只装于河草捆内，运销于河南禹州。（9）疙瘩头：甘草根条的头部不分大小，销售于天津等地。（10）通草：长短由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有中指粗细，皮红骨重，销于上海、宁波等地。

（11）皮草：是打捆时编作外皮用的细草。（12）毛条子：是打捆时用作上下贴头的。（13）荒草：是一种只靠地皮生长，不往深处扎根的，长不成材的草，有筷子粗细，不分长短，不分路分，价格一样，独售美商梅隆洋行。

大草、二草、粉草、截子、疙瘩头以及通草，出售时均按平秤过秤，价银每百两加色二两四钱，合为净宝，因为草价均以净宝计算。河草价格以“直银”计算，这种银子成色更差，每百两加色十一两二钱，合为净宝；过秤每百斤加十斤。废两改元之后，加色就逐渐没有了，一律使用“现洋”。

## 用 途

（1）我们都知道甘草为“药中之王”。《本草纲目》载：“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由此足见甘草在中药中的功用之大了。（2）可做口香糖、酱油、仁丹及纸烟等之配料。（3）能做防腐消暑的原料，故在热带日常生活中为不可缺少的东西。

## (二) 经营甘草的行业

经营甘草的行业分为两种：一种是草场，另一种是草店。这两种行业的经营者大部分是山西保德州人。草场专门掏草、收草、做草；草店是接待卖草和买草的商人，从买卖双方打佣取利。它们的经营目的是相同的，但它们的经营方式却是不同的。兹分别概述于下。

### (1) 草 场

#### 设场情况

各旗设场包草的办法各不相同，有的是一家垄断，有的是以向王府申请包场的先后为定。各旗王府于阴历腊月十九日封印，至次年正月十九日开印。开印之日要举行典礼。资本家在开印的日期来到王府，一来拜年，二来给王爷和仕官送礼，礼物是砖茶、水烟、糖果、烧酒等，并且商订好包场的范围。包价多少，这时不能言定，因为包价是按出草的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此后即或再有人来王府请求包场，王府也不再应允了。这种办法是行之于杭锦旗和鄂托克旗。达拉特旗则不然，由包头“西滩王家”永远独包。王家的草场字号叫“西碾房”。王家的先人王蕊于清乾隆年间由山西保德州来到口外，在达拉特旗黄和硕召佣工受苦。王蕊为人老实勤劳，有才干，因而得到该召的信任，于是向黄和硕召租到属于该召的荆棘地一段，东至蒲圪卜，西至红亥补拉，南至沙



梁，北至黄河，招佃开垦耕种。经营十数年，这段荆棘地遂变为膏腴田。王蕊之子王天申又向乌拉特西公旗梅力更召租到特拉亥苇地一块，南连达拉特旗，北至黄河，开渠淤澄耕种。因此，在离包头西南黄河南岸昭君坟西南七八里远的地方，安下火房，盖起碾房。于秋收之后，把原粮碾成米，雇船运回保德。久之，“西碾房”就成为村名了。清嘉庆年间（有人说在道光初年）托县河口镇设立了草市，王家当然不肯放弃机会，于是一面种地，一面把包地扩大至梁外收购甘草。这样就逐渐成为达拉特旗的垄断甘草的资本家了。那时有“王家不到河口，草价不开市”的说法。“西碾房”收购甘草的支号很多，有中和西、西万成、万兴西、再成西、全成西等名称。“西碾房”各草场工人所需要的粮食，掏草、铡草所用的工具，包打草捆所用的苇席、麻绳，打捆架捆所用的杠椽，这一切用的东西不是地上的出产，就是雇人打造，决不向外购买。纵然有人要在达拉特旗收草，也得与“西碾房”的支号联系。由此可知“西碾房”实力之雄厚。“西碾房”在日伪时期对于营业抱消极态度。日寇投降后，“西碾房”就让给各散户而停止经营了。

杭锦旗的甘草，首先由山西定襄人张六乡之子及其孙张连德包掏。张六乡于清乾隆年间来到达拉特旗，以卖菜籽为生，后来在梁外米塌地租到梁地一段耕种。因地接杭锦旗，就渐渐地把买卖扩展到杭锦旗。张六乡为人忠厚，深得杭锦旗王府之信任。在清道光年间张六乡之子就在杭锦旗开设草场，名“德盛成”。张六乡之孙张连德继承祖业，就垄断了杭锦旗的甘草。至清咸丰年间，杭锦旗的甘草就不为张家所垄断了，有保德州张家开设了广盛恒，太谷李家开设了德盛

亨，忻州张家开设了永和西等草场，收购甘草。这几家的设备情况跟“西碾房”不相上下。

鄂托克旗的甘草，在清同治年间由董福祥开设了祥泰魁、祥泰和、敬盛魁三个草场，包办收购。当时人称“董府三大号”。

上王爷地（王爷地西部）由包头马家和保德州杨家合资开设了“义成远”，专门收草；下王爷地（王爷地东部）由祁州张家开设了“广庆泰”，一面收草，一面牧畜和耕种。

陕北盐池县一带的甘草，开始由当地人掏掘。民国十五年，保德州人卢凤五（现任包头市政协委员）到盐池开设草场，名仁和永，收购甘草。收下的甘草，在河运通行的时候运送至宁夏黄河岸装船运包头，在黄河封冻的时候用骆驼直接运至包头。仁和永自己就养着骆驼二十余峰。

设场投入的资本，有的多，有的少。西碾房、广盛恒、德盛亨、永和西的资本就雄厚；仁和永的资本在设场时就少，才一万元，以后逐渐增加至十多万元。资本的主要用途是：购置掏草和做草的工具，打捆的包装以及供给做草工人和掏草人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如米、面、茶、布、水烟、糖等。现金在场地用处不大。

### 掏草和收草

掏草的人都是穷苦人民，汉人多，蒙人少。掏草所用的铁锹与普通的不同，其形窄而长，专用于掏草，由场方准备，借给掏草人使用。发现草苗四五苗在一起的，大部分系粗条甘草，掏草人就得从周围往下掏，以免铲断根子和铲伤根皮。

一般情况，每个劳动力一日能掏三十斤或五十斤湿草。达拉特旗，一个劳动力一日至多掏草三四十斤；而杭锦旗一个劳动力一日就能掏百八十斤。这是因为达拉特掏草的都是当地人，都是利用耕种前后和秋收之后的农闲时间来掏草；而杭锦旗掏草的，不论外来的或当地的却都是专门掏草，不作别事。

不管掏得草多寡，当日都拿到草场出售。草场收草所用的秤，是二十两的秤，是一根棍子上刻着些道道的秤，所给予的价格是很低的。不仅如此，而且掌秤人是资方的爪牙，在提秤上是有功夫的，每百斤只给过三十多斤（以三斤湿草折成一斤干草收进）。如果掏草人拿来好草，粗实的草，过秤时给加一二十斤。这不是场方对穷苦人的恩赐，而是诱惑掏草人多掏好草的饵食。掏草人交草时，当时不开价，只是把交草的数量，登记在账上，一俟收够一船草（三万多斤）的八成，才给开价。因为当日开价，怕掏草人嫌价低，也许就不掏了，影响收购。至于掏草人的生活，每天只给面粉三斤和一些烟火，借以维持，而最后算账，还要加倍计价。这也可以看出资本家的剥削本性，在任何方面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甘草码头移到包头以后，由于掏草人的抗议，才打破“当时不开价”的旧例，当日交售的草，一过秤就得开价。

### 掏草季节

每年以春秋两季为掏草时期。早期每年清明至立夏（一般至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圣诞节止）为掏草时期。后来延至夏至。秋季自立秋开始掏至地冻为止。掏草季节不同，草

的质量亦有差别。经过一冬地下的滋长，春季尚未发芽吐叶，掏出的草质量最佳，质地坚实，粉多筋少，掏的数量也多。秋后气候渐冷，甘草的茎叶一天比一天枯干，草心也逐渐地长满了，掏出的草质地也可以，但是总不如春季掏的好，数量也不如春季掏的多。草码头移至包头后，有的地区夏季也掏草了，但质量最次，质地松虚，筋多粉少，因为根条精液完全外发，滋长了枝叶。

### 加工和包装

场方雇用一帮专做草的工人，有长期的，有临时的。这些工人，除吃饭睡觉外，整天的铡草、晾草、捆草，所得的工资当然是很少的，还得受把头的剥削和压制。工人把收进的湿草及时铡剁，铡剁所用的刀是特制的，刀口要锋利，为的是保持横断面的光亮整齐。加工时先把奶毛奶串剁掉，切去毛梢，再把疙瘩头整个剁下，然后分开粗细，按照规格要求，应该铡大草、二草的铡成大草、二草，应该铡粉草的铡成粉草，够白粉资格的刮为白粉。甘草铡剁好之后，分开品类，把弯条理直，捆成小把，在垫木上垛成井字形的码子晾晒。要使阳光直射横断面，少晒草身，这样就能保持横断面的黄亮，皮色不变。晾晒甘草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要经常倒垛，以免发霉变质。晾晒时应注意防雨，因为一着雨草就霉变质。

草晒干之后，按品类分别打捆包装。打捆包装时要分清等级，栽桩扎紧，用麻绳或草绳扎四道腰，外包苇席，两端堵头上的草一定要整齐。甘草打捆后，在包皮上标明重量。

大草、二草每捆重约二百四五十斤。红白粉大捆每捆重约二百四五十斤，小捆每捆重约一百二三十斤。河草每捆重约四百五十斤。疙瘩头和截子每包重约四百五六十斤。

成捆的甘草，在未起运前，必须特别注意保管。垛底要垫枕木，为的是通风防潮；垛顶要盖苇席，以防雨漏。

### 王府收租

甘草加工成捆，在起运之先，王府即派仕官到草场收租。收租的办法，不是按包下的场地范围大小而定租银的多少，也不管每捆草的轻重，而是按甘草捆数的多寡来计算租银。每捆草约抽租八九钱银子。仕官们到达草场后，场方就美酒肥肉地招待着，烟茶充足地供应着，招待好了，仕官们有时敷衍地数一数捆数，有时连捆子都不数了，只由场方报个数字就完了。王爷是听仕官们的话的，仕官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 运 输

在铁路未修至包头前，各草场所出产的甘草都河运到托克托县河口镇。因为草码头在那里，各地买草的客人也都集中在那里。河口镇是甘草和其他货物的集散地。各草场的甘草，有的以牛车运到黄河岸口，有的以骆驼运至岸口装船。比如：民勤和上王爷地的草，驼运至磴口；下王爷地的草，驼运至后套杨家河子；盐池的草，驼运至宁夏黄河岸口；杭锦旗和达拉特旗的草，以牛车或骆驼运至该旗的附近岸口。

旱脚运费有时涨有时落，没有一定。装草的船要坚固，载重量要大。一般能装五万斤的船，只装三四万斤草，因为草轻，装得多了难免上晃，途中要遇上大风，就有倾覆的危险。甘草码头在河口镇的时候，由宁夏运至河口镇每船运价得五十两银子；由磴口装船，每船运价得四十两银子；由杭锦旗装船，每船运价三十两上下；由达拉特旗起运，每船运价得二十多两。草码头移至包头后，航运运价即以元计算了，数目比用银两时大一些。各草场在码头上各有各的相与，草运到码头后，就卸于有“相与”关系的草店的货栈了。

## ( 2 ) 草 店

### 草店的设立情况

草店未设立前，甘草的交易是在河口镇黄河岸口上进行，因为那时从后套碱柜运碱和从三湖湾装红柳条的船多半捎带小量甘草，就在河岸上出售，由当地的药铺买去。后来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和大同府的药铺来买草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船家捎带甘草也多了。嘉庆年间（也有人说在道光初年）有山西保德州马家，鉴于甘草交易日渐旺盛，就在河口镇首先开设了晋益恒草店，接待客商，兜揽买卖。晋益恒的资本并不大，至清咸丰年间，晋益恒的财东抽了本钱，把铺底推让给掌柜王永恒。王永恒把晋益恒改名为荣升昌，连东带掌都是他自己。荣升昌营业时期最长，至民国十四年（火车已通至包头）因无力移包，遂告歇业。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六年，这四十来年之间，在河口镇先后开设的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和集义昌等七家草店。庆和成开设于清

光绪初年，资本约一千两银子，光绪二十八年歇业。信成店于光绪二十八年庆和成的基础上设立的，营业不到一年即告歇业。光绪二十九年日生店开设了，资本三千两，营业至光绪三十四年歇业了。公义昌开设于光绪二十九年，资本二千两，于民国十二年停止营业。庆记草店于光绪三十四年开设，是庆隆货栈附设的，于宣统三年歇业了。裕隆店于民国二年开设的，资本二千一百两，营业至民国十二年停止了。集义昌草店民国四年开设的，营业至民国六年即行停业。民国六年以后，河口镇存在的草店只有：荣升昌、公义昌和裕隆店三家。

#### 河口镇草店营业情况

开设草店，总得有宽阔的存放甘草的货栈（离河岸要近）和接待买卖主的客房，还得专用一个手艺高的厨子，给客人们做好菜饭。当然客人的食用是吃一算二的。各草店住的客人被称为“老板”。“老板”们的生活很阔气，宿妓请客是常事。各草店的跑街的（跑街的都顶三厘生意），每日早晨到茶馆喝了茶，拿上样品到各草店客房向客人报告行情，进行交易。买卖成交之后，店家就向买卖双方每两银子各打佣金二分。甘草行情有时大有时小。就拿民国八、九年的行情来说，大草每百斤价银约十两，二草每百斤约七两，白粉每百斤约十两，红粉每百斤约八两。唯杭锦旗梁外出产的红粉价格与大草一样，专走宁波。草店做的买卖越多，当然打的佣金就越多。荣升昌营业时间最长，在王永恒经营期间倒是发了很大的财，可是传至其孙王学谦，为人保守，家用浩繁，因而买卖只能维持现状，这也是因为相与家念在荣升昌是个

老字号，处处予以照顾，卖草的要给它卸些，买草的也要通过它买些。裕隆店于民国二年开业，民国六年开红一次，每股分红一千二百两，身股子四个，财股子三个，共得红利八千四百两；开红之后，财股子倍成三千两。裕隆店的买卖本来很有前途，可是后来财东之一的刘汉伟死了，其子刘兆瑞是个官僚，稍不如意，就对经理们加以斥责。在民国十二年结业。公义昌的规模较大，资本虽是二千两，但是周转灵活，因而买卖做的多，获利也就大。公义昌计有财股子四个，身股子七个，在民国四年开红一次，每股分红三千两；民国七年又开红一次，每股分红六千三百两；民国十年又开红一次，每股分红三千七百两，总计算了三次账，平均每股每次分四千三百两。它能获得这样大的利润，是由于清宣统二年，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始到河口镇买草，买的是荒草。荒草是一样长不成材的细甘草。在英美烟草公司未来收购以前，荒草是根本无人过问的，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掏。英美烟草公司到河口镇，只有公义昌一家接待，其它草店如荣升昌，不但不兜揽这宗买卖，反而反对公义昌跟外国人做生意。这次英美烟草公司购买荒草是试探性质，看一看产量如何，仅买了五十余万斤，每百斤价银四两二钱，河口镇交货，由英美烟草公司自己雇脚运走。民国三年，英美烟草公司又到河口镇买荒草，仍由公义昌兜揽。这次买了二百五十万斤，张家口交货，每百斤价银十两五钱（旱运脚费在内）。公义昌对这二百五十万斤荒草一面自己雇人到准格尔旗（离河口很近，仅一河之隔）掏掘，一面向各草场收购，购价每百斤约五两银子。由民国三年至民国五年，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经理罗上达，都是带上翻译来到河口镇购买。英美烟草公司名义上说



是为他本公司购买，实际上是替美商梅隆洋行购买。因为梅隆洋行从来就在土耳其买草，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来，土耳其参加了战争，不能在土耳其买了，才来中国买草。梅隆洋行初到中国，牌子不如英美烟草公司响亮，所以委托英美烟草公司以其公司名义代购荒草。民国六年，梅隆洋行在天津挂牌收购荒草，至此公义昌就直接跟梅隆洋行进行交易。鉴于公义昌经营这项买卖发了财，荣升昌和裕隆店也就参加了交易，但以公义昌为领导。他们与梅隆洋行订立了合同，每年买草至少二百万斤，多至三百万斤。民国六年和七年在丰镇交货，每百斤价银七两五钱；民国八年在天津交货，每百斤价洋十二元七角五分（这时就不以银两计算了）。合同是每年冬季订立，次年五月开始收货，随交随收。民国九年梅隆洋行通知公义昌于十月以前把订货交清，过期即不予收货。在限期之内共交了荒草三百余万斤。至此，梅隆洋行不再在中国买草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们又回土耳其买去了。参加这次贸易的三家草店所得的利润，荣升昌和裕隆店远不及公义昌获得的大。公义昌既发了财，为什么于民国十二年算账开红之后，倒收市不做了呢？这是由于财东与掌柜闹了意见。财东马玉珠为人多疑诡诈，跟人不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当家掌柜陈隋宝（别号候三）为人能干，豁达不拘，善与人交。公义昌成立之后，陈隋宝经常到天津拉拢相与，进行买卖。公义昌之发达，与陈隋宝的才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马玉珠一向就疑心陈隋宝在津营私舞弊，为自己打算，若长此下去，恐怕公义昌为陈隋宝所有，其它财东当然听信马玉珠的话。因此，于民国十二年算账之后，公义昌就结束了。

## 河口镇码头迁移包头

河口镇原来是一个水旱码头，西路来的小淖儿碱，后套的油粮、红柳、苜蓿以及各蒙旗的甘草，都在此地集散。小淖儿的原碱，后套的红柳、苜蓿都要在河口镇加工为成品。甘草也要整理一番，船上湿了的草晾晒，草捆子松了也得重新捆紧。发往山西保德州和碛口的油粮，发往河南的甘草，都走水路。发往天津、河北、山西等地的甘草和硷碱等货，都用套车（单马车）和骆驼运输。为什么西路由船运来的货物经过包头不住脚而一定要运到河口镇才卸货呢？原因是：船运运费不管到包头或到河口镇，都是一样的；但包头至归化城的旱程比河口镇至归化城几乎要远一倍（河口镇至归化城一百六十里），旱运路程远了，运费当然就多了，买卖人不能不算这一笔账。铁路运输不但快，而且运费也省。民国十二年京绥铁路由绥远延长至包头了，火车通至包头，当然运输便利了。河口镇水旱码头势难存在了，就逐渐地迁移至包头，这是势所必然的。

### 包头草店的开设及营业情况

火车通至包头后，民国十二年义合永草店首先开设了，但由于没有内行参加，在民国十三年就歇业了。河口镇的几家草店，公义昌和裕隆店歇业了，而荣升昌又无力移包。参加过河口镇草店的本地人相继来到包头；装卸甘草和做草的工人，为了谋生也来到包头。包头广恒西皮毛店鉴于河口镇

草店大发其财，在民国十三年就聘请了曾在河口镇参加过草行的人，兼营草业。广恒西并没有另拨一笔本钱，仅在南海子设了一处存草货栈，就开始营业了。是年又有广和公草店开设了。包头既然有了草店，河路下来的甘草当然就在包头卸货了。经营了一年，广恒西看到由甘草所获得的利润远不如由经营皮毛所得的大，因此于民国十四年把甘草业务撤销了。广和公也在这年停业了。接着，有永恒西草店、中兴栈草店和义兴永草店开办了。这三家草店的开办人多半是托城人，都没有多大的资本，均以买客的存款来周转，凭空取水，于民国十四年年终，永恒西获纯利二千五百元，中兴栈获纯利一千元，义兴永获纯利三千元。这三家草店各以所得的利润作为资本，于民国十五年正式开业。中兴栈营业至民国十八年，因周转无力遂倒闭。民国二十二年又有公记草店开设，资本一千五百元。义兴永营业至民国二十三年，买卖亏空了一千余元，亏空的原因是动用了买客的钱，而交付不了甘草。如果我（尹老先生自称，当时为义兴永的副理）接续营业，所有欠款可以停利分期还本；我要不接续，义兴永就得尽产还债。因此，我就把义兴永的底盘和债务全接下，改名为永和铨，继续营业。民国二十四年有公义西草店开设了，资本二千元。

民国二十六年包头被日寇侵占了。民国二十七年，大蒙公司来包购草，各草店的营业大为活跃。我和永恒西经理卢德与大蒙公司经理李恒久（东北人）接洽，售给甘草约三十万斤，大草每百斤价洋四十余元（伪蒙疆票），次大草每百斤约三十七元，粉草每百斤约三十元。售给的甘草，杭锦旗出的占少数，达拉特旗出的占多数。永和铨卖给的最多，约十一

万斤。大蒙公司先付了七成定款，各草店就拿上这定款购进甘草。至民国二十八年交货时期，大蒙公司采取了拖延手段，不予收货。当经包头商会向大蒙公司一再交涉，李恒久始派其子李瑞甫来包，商妥按七成预付款数收货，其余三成定货给各草店退下不收。这宗买卖就这样了结了。

民国二十八年下半年，各种草的价格上涨一倍，原因是：河路不通，甘草不能源源运来，存货缺少。民国二十九年，公记草店因内部种种矛盾，逐渐收缩，至民国三十一年就歇业了。永和铨营业至民国二十八年，除还清债务外，积存下四万元（伪蒙疆票）的甘草（上、中、下三种），约二十万斤，加工整理之后，全数发往天津。永和铨因受日寇的欺压，就把包头的买卖往小缩，不再往大贪图了。发往天津的甘草，存至民国三十一年，生了虫子，这就得拆捆大加整理，重行铡割，把好的售出去。结果，除付清栈佣等花消外，仅得三千元（伪联币）。永和铨的买卖至此结束了。公义西的买卖也不景气，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后，铺底、存货、农具与包头土产公司合作了。永恒西的买卖始终是平平常常的，后来虽然增加了股份，但也没兴旺起来，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永恒西改为旅店了。

在日寇侵占包头时期，于民国三十三年有信泰公草店开办，资本约一万元（伪蒙疆票），股东均为托县大烟贩子。这帮大烟贩子与“日本通商会”有勾结，因此信泰公的买卖非常兴隆。可是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了，保镖的没有了，加之西路客人对他们又不信任，信泰公就衰败下来，勉强维持至一九五〇年，就出卖了铺底，归还了债务而告歇业。

以上所叙述的关于甘草行业的材料，可能有遗漏甚至错

误的地方。希望曾参加和深知这种行业的先生们加以补充和  
指正。

---

尹子衡老先生名铨，自幼在河口筑公义昌学生意。民国二年裕隆店开张时，尹老先生就到裕隆店当了上街（营业员），一生经营甘草，对甘草行业的情况知道得很详尽。

# 包头死人沟的“梁山”

——清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内蒙古西部的  
一个游民无产者的“江湖”组织——

刘 映 元

京绥路于一九二三年修至包头，一九二六年包头才由萨拉齐的一个镇设治为县。包头是长城口外一个水旱码头，从乾隆年间修起“绥远城”，汉民从晋北、陕北迁入蒙地开垦以后，就与张家口（东口）、“归化城”（西口）、多伦（喇嘛庙）齐名，成为商业上和军事上的重镇，也成了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东走哩，西窜哩，每天也要吃饭哩”的游民无产者觅食的地方。同治年间马化龙和白彦虎在甘宁起义，左宗棠奉旨“平回”，“嵩岳军”张曜的后方便设在包头。李鸿章“淮军”的“水上巡防营”和“洋枪队”，也在包头和托克托的河口镇及萨拉齐的善岱镇驻守过，曾一度为内蒙古西部带来名叫“簧腔”的“徽剧”。包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和丝竹盈耳的繁华城市了。到了光绪年间，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还非常荒凉，河套的隆兴长和梁外的羊厂壕，虽然设治了五原厅与东胜厅，但是五原和东胜的“厅官”与西蒙垦务盐务上的行政人员，嫌那些地方生活艰苦，都住在包头镇内办公，这样包头自然地形成内蒙古西部的政治中心。因而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冠盖往来，

军队屯聚，一年比一年繁华，社会也一天比一天复杂。但当时地方的管理，在清末时只是由萨拉齐厅派出一个“巡检”来管理；到了民国初年，也只是由萨县巡警营分设了一个分驻所。这时包头已发展到五六万人口，各个阶层都有，一个巡官带着三十多个警察，怎能会有力量统治这么大的局面，因此，包头长久以来一直是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街面的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

所谓“大行”是包头工商业资本家的公会组织，到了民国改称为商务会。所谓“农圃社”是郊区地主们的封建集团组织。所谓“梁山”则是包头游民无产者的“江湖”组织。他们在包头设县建市以前的管理办法是：由“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里边办公，受萨拉齐厅和以后的萨拉齐县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买卖人和庄户人只能出钱出粮出车交草，其他有关地方警察的辅助工作，便由“大行”和“农圃社”雇用“梁山”的人来担当。

因此“大行”和“农圃社”的议事机构，就是当时包头的行政衙门，死人沟的“梁山”，就是当时包头的警察机关。死人沟在包头旧市区草市街以北，解放以后改称为“慈人沟”。原先是一个停厝棺材的地方，后来乞丐在那里掏窑打洞居住，成了包头的贫民窟。清朝和民国初年，死人沟有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头逮捕和五原、东胜与萨拉齐后山地区送来的犯人，先在死人沟看管，然后再往萨拉齐监狱解送。死人沟除了居住乞丐，还有好几家鼓房；“梁山”的头儿所在地——“忠义堂”，就设在鼓房以内，它的人马都散

布在包头各个角落，给“大行”和“农圃社”打杂，并执行警察和特务工作。“梁山”的人首先是负责巡查街道和弹压会场，清朝的时候包头有好多聚赌的“宝店”，庙宇上经常唱戏，阴历正月十五和二月二大闹“红火”，七月十五在南海子放河灯，这些地方最容易打架斗殴和阻塞交通，“梁山”的人抗着“大行”的虎头牌，手拿牛毛鞭和铁绳铁锁走过来倒过去，不用说平常的百姓们不敢捣乱起哄，就连在赌场顶好汉股子的“白花”，也都对他们畏惧。由于“梁山”里边什么人都有，更不乏“拳棒手”和“顶命鬼”。象在辛亥革命时攻打大同的“二麻烦”，他于宣统元年从大同到包头闯码头，自恃武术高强，不把包头的“江湖”看在眼里，得罪了死人沟的“梁山”，就被“梁山”的头儿派了些拳棒手，趁他在剃头铺低下头梳辫子的时机，用石灰先把他的眼睛蒙住，然后拉到街上殴打，几乎打死。“二麻烦”虽遍体鳞伤，没有哎呀一声，但也吃了大亏。梁山的人在夜间负责全城的巡逻打更，提着“大行”的灯笼，可以盘问、检查、逮捕夜不归宿的行人。守城门的兵丁到外边要钱，有时还叫他们在城门房子里掌管钥匙，因而也敢于在夜间私开城门，放行商旅。其他如街道上的垃圾，官厕所的粪便，倒毙路旁的死尸，全由他们来清理。发生火警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亦由他们负责扑灭。一九一八年包头鼠疫流行，死了三千多人，都经“梁山”的人给抬到城外焚化。凡是恶死的人，也由他们协助“仵作”检验或是抬埋。罪犯执行死刑，如无尸主领尸，他们即将衣服剥下，洗掉血迹，卖给估衣摊子。甚至挖心挖脑，泡制成药，以高价出售。他们除过“大行”供给柴米工资，每年四大节，商号还给他们送礼，有时也用讹诈的手



法，找点“外快”，并不缺小钱使用，因之有鸦片嗜好的也能解决，有家口的也能养活，于是便把“梁山”这个“江湖”组织，视为衣食的父母，终身的依靠。

“梁山”是包头游民无产者“江湖”的总称，它命名为“梁山”，并没有“替天行道”的“理想”，只是要把一些游民团结起来，象宋江等一百单八将那样互相帮助，彼此关照，不受外人欺侮，能在包头寄生和鬼混下去。“梁山”是“锁”“里”两家的联合组织，以后才把不属于帮会的“跑腿子”的流浪汉都吸收到“梁山”的组织以内。“锁”家是乾隆年间“归化城”公主府打更的马三红和种菜的秦四海给建立的，故分为马三红和秦四海两门子人。“里”家最早由北京城满族八旗的八个穷王爷当首领，故分张门、高门、韩三门等八门子人。这两家的组织过去在华北的其他城市都有，他们的区别是：“锁家独霸一方，里家走遍天下”。“锁家供奉的祖师是明朝的永乐皇帝，以吹鼓手和六合铺的抬轿夫为基干，但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范围叫“方场”。如包头锁家的“方场”，就是东至萨尔沁镇，南至大树湾，西至麻池镇，北至石拐沟。鼓房和“六合铺”超出这个“方场”的范围，即不能招揽红白喜事。里家是以乞丐和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吟艺人为基干，可以在天下任何地方流浪，不受空间的限制，供奉的祖师是范丹老祖。据说孔子当年在陈国绝粮，经范丹救济才没有饿死，因此乞丐供奉范丹为祖师。他们向贴有春联的商号要饭，含有替祖师向识字的孔子的徒子徒孙讨债的意思。其实孔子是春秋时的人，范丹是东汉桓帝时的人，这两个人相隔千年，根本不可能有来往，可见说的是荒诞无稽。但范丹是历史上出名的“穷

汉”，他们也是“穷汉”，供奉他当祖师，还不无理由。至于锁家为什么要供奉明朝的永乐皇帝当祖师，则说不出什么道理。按当时两家的组织成立，如上所说，是出自清宗室和他的下人们开创的，但看他后来的行动始终是当“顺民”，对统治阶级采取恭顺态度，这就有可能是当时的雍正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削弱青红两帮“反清复明”的斗争力量，授意他的宗室和家奴，去另外组织两个反动的下层社会集团，来进行分化和瓦解。但却又把明朝的永乐皇帝供奉当他们的祖师爷，则骨子里似又含有青红两帮“反清复明”的意义，并且在辛亥革命还有人打过刀什尔（陶思浩车站），这究竟是何缘故以及是否有矛盾，因找不出有关的材料作根据，很难臆断。

“锁家”和“里家”这两大派系，在其他地方都是各立门户，但在包头，一方面由于“大行”和“农圃社”有意的利用和集中管理他们，一方面锁、里两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便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为一个“梁山”，谓之“锁帮里，里帮锁，锁里是一家”。但“梁山”的领导权却始终被“锁家”的鼓房把持，由各鼓房的班主中产生“梁山”的领袖“头儿”。那家的鼓房班主担任“梁山”的“头儿”，那家鼓房就是“忠义堂”，门口挂着“大行”的虎头牌和牛皮鞭，闲杂人等都要肃静回避。里边的神堂中供着“锁”

“里”两家的祖师，除过囚室伙房，还有专供记帐先生和“把式匠”（打手）居住的宿舍，俨然是一座森严的衙门。“头儿”出门有保镖的跟在后边。他的兵符印绶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平时放在祖师前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时候用它行刑打人，“头儿”以外谁也不能撼动。其他地方花子朝拜

的那个“杆儿”，也许就是这件东西。“梁山”对内完全实行家长式的封建统治，有三大规矩和惩罚的办法：第一是“踩穷汉窝铺”（跟自己本“家”里的女人通奸）的活埋；第二是“唾臭”（捏造事实损坏别人的名誉）的挖眼；第三是违犯其他制度的跪在祖师供桌底下，用“拐挺”殴打。他们标榜“梁山”的“忠义”两字，是忠诚老实地替“大行”服务，保护各商号的利益。“锁”、“里”两家的人不能行动时，由“梁山”养活，死后给买一个“狗碰头”棺材。民国三年，山西第一师孔庚的军队在包头哗变，变兵从东营盘出来，路过死人沟的时候，叫“梁山”的人跟他们去发“洋财”，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地走出窑洞，看见“头儿”樊虎娃横眉竖目，手执“拐挺”站在那里，大喝一声“那个敢动！”都慌忙缩回窑洞，吹熄灯睡觉。“梁山”的人平日全叫“拐挺”打怕了，到了非常的时候，才有这么大的威慑力量。

“里家”的流动性很大。“锁家”是根深蒂固的“坐地户”。加上“梁山”的头儿由鼓房产生，因此包头的鼓匠很“硬”。商民举办红白喜事，说是“订一班鼓匠”，他们就不高兴，说是“写一班鼓匠”他们才喜欢。“写鼓匠”的时候，订钱很少，可是写下以后就百般勒索，除了工资酒饭烟茶，还有“赏赐”、“喜钱”、“辛苦钱”、“水烟钱”、“折饭钱”这些名目。并且每次打一个“曲牌”，还要额外的附加钱。写时已讲妥是十块钱，到吹打完毕非二三十元不能开销。他们先是以好言好语恭维东家，用软法达不到目的，便要无赖和“跌死皮”。由于“梁山”在背后给撑腰，普通商民都惹不起他们。况且凡是举动鼓乐的人也不在乎这几个

钱，尤其娶媳聘女都是大喜的日子，谁也不愿意生气，只好忍气吞声地吃哑吧亏。如果遇见懂“梁山”规矩的人给代东当总管，他们也就适可而止，不敢发野放刁。至于“里”家的乞丐，平日就在指定的街巷讨要，遇见喜庆宴会，亦不能越界来凑红火热闹。“梁山”为了使东家不致失去东西，特派专人给站岗，叫做“蹲门的”，这个人在门口整蹲一天，除了替东家打发乞丐，还制止闲杂人等入内。工资通常是一天一元银币，临走还替“梁山”不能行动的乞丐代讨一元，拿回去交柜，不敢私自克扣。他们并且从不混进鼓匠棚子吃饭，说是“我们上不了桌面，怕犯了梁山的规矩”。好象“里”家的地位不如“锁”家高超。“锁”、“里”两家都是“和尚教”，传徒不传子。到了包头设县建市以后，“梁山”一天比一天衰败，许多戒条也被打破。象解放以前死人沟的保长李根罗，他原先是个兵痞，在商震的“三十二军”当过排长，冷口抗日时受伤回到包头，可巧他的叔父是“梁山”的“头儿”，因病逝世，他在王靖国统治包头的时代，依靠伤兵的势力，硬把他叔父的徒弟赶走，承继了鼓房的财产，篡夺了“梁山”的领导。

包头在解放以前是一个剥削消费的城市，除了大的商店，还有许多暗房买卖，并且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各种货物都在这里进出，客商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普通市民也是大吃二喝，所以乞丐和“跑腿子”的人把包头看成一个“乐园”。只要和商店字号的伙房搞好关系，给他们掏炉灰、倒泔水，就可以把成桶的剩饭打回。遇到过生日或满月，乔迁开业，或是庆寿过节，念几段吉利的“喜歌”，更能讨到新鲜的酒食，自己吃不了还给人。鸦片烟也可以用“偷鸡摸

狗”的“外快”换到。如果肯拣些破烂，割些柴草，越发不缺零钱。死人沟的乞丐，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方起，因为“梁山”禁止“锁”、“里”两家在夜间偷盗，晚上十二点钟即锁窑门，他们必须在这以前赶回。死人沟的白天非常清冷，到了夜间特别热闹，每座窑洞都是灯火辉煌，有歌有唱，煤火炉子四周，放着茶壶和热饭的小桶，炕烧的滚烫，在数九天亦不寒冷。除了地下的尿桶熏人和墙上的臭虫与身上的虱子咬人，简直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乞丐们吃完剩茶剩饭，每个人都摆着一盏“闷灯”，把鸦片灰子一吸，眉飞色舞的灰说，聊到天亮才睡。内蒙古西部“讨吃三年，给官不坐”及“阳沟沿的鸭子，皮毛不好肚囊肥”的说法，就是指此种游民无产者而言。至于在包头黄河两岸和阴山前后讨要的乞丐，的确有骑着毛驴装米装面的事，这不是梁外后山河套人憨厚，也不是粮食多得没有地方存放，而是“里家”和土匪勾通，并给官兵担任侦探，农民恐怕得罪了他们生事惹祸，才显得那样“慷慨”。包头的乞丐，由梁山的暖窑热炕收容起来，如遇天阴下雨或是冬季严寒，还供给稀饭，并不是真用义气待遇他们，主要是派他们担任各个街巷的眼目，打听新闻琐事，注意行踪可疑的路人，要是不马上反映报告，出了问题便拿“拐挺”对待。并且平时“头儿”也完全是家长式的统治，稍有不合，非骂即打，因此他们虽表面上是及时行乐，内心中也都有不少的苦闷，只不过是“高高山上一根棒儿，好活一阵儿是一阵儿”的泡混。但参加和脱离“梁山”都很困难，当乞丐也得拜师。“锁”、“里”两家怕人稠地狭，收徒有一定限额，特别是“里”家考察更严，答不上“行话”，即驱逐出境。如果赖着不走，也有最残酷的对待

办法，或是打成残废，扔在城外的山沟喂狼，或是找一个僻静地方把人活埋。又“梁山”对内控制极严，“锁”、“里”两家的人谁也不敢泄露“梁山”的秘密。为了封锁和保守秘密，参加进来的人就很难脱离出去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只有当了兵和准许离开包头的人，才有可能。因此“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也就多年来发展的非常平衡。

本来小偷和窃盗不包括在“里”家以内，可是包头的“梁山”，一方面给“大行”缉盗，一方面为了坐地分赃而通盗，也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组织当中。凡是外埠来到包头的小偷盗窃，必须先到“梁山”上挂号，由“头儿”根据偷盗的类型，指给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黑夜偷盗叫“跑红条的”，白天偷盗叫“跑青条的”，一早一晚偷盗叫“打灯虎儿的”。

“跑红条的”分为两种人，站在房上巡风放哨，叫“登杆子的”，进入院中升堂入室，叫“跳池子的”，在分赃物时，“跳池子的”要比“登杆子的”多顶厘股。“跑青条的”分为四种人，偷大商店门市部的叫“高买”，偷市场小贩叫“扫摊子的”，偷农民旱板车或毛驴驮子叫“滚轮轮的”，偷街上行人叫“捏把子的”。他们各干一手，跑了“青条”就不能再跑“红条”，扫了“摊子”就不能再“捏把子”，指定在西前街活动，也就不能再到东前街游窜，谁要违犯这个规矩，被讨吃叫街的乞丐发现，回去报告给“梁山”的“头儿”，死人沟即派人扣捕。初犯用“拐挺”殴打，屡犯不改，便送往萨县。如果听从“梁山”的指挥，可以一直在包头存在，不过这也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偷到东西以后，三天以内不得处理，恐怕偷在“碴儿”（有势力的人）上，“梁山”得给负责往回寻找；第二是东西变价以后，须以百分之三十捐献

“梁山”做为“公益金” 据“头儿”对小偷窃盗们说，这笔公益金，是为了作养活残废、埋葬死者、修缮窑洞、购买柴炭以及给祖师爷“领牲”唱戏等项的开支。其实这些开支用不了多少，何况多由“大行”给拨款，结果是“梁山”从小偷窃盗身上征收了百分之三十的“重税”，都入了“头儿”的腰包，一直到包头设县建市以后，“梁山”还掌握着小偷小盗，只是这百分之三十的重税不能由“头儿”独吞，还得把一半孝敬刑事队长或侦缉队长一类的警官。但随着偷盗案的增多，头儿所得的仍然不少。

私入头儿腰包的，并不止此。如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梁山”的“头儿”就冒名顶替，领取过社会上的物资捐款。一九二九年大旱时，华洋义赈会的赈米，也被“头儿”中饱的不少，至于凭借“梁山”的力量，作其他投机和讹诈的勾当，更手眼通天。在“梁山”全盛时期，“头儿”有大小老婆和大小厨房，“大行”的执事老板，到了标期周转不灵，也得以高利贷向他们借钱，“头儿”以正常和非正常的手段，弄个万儿八千两银子，比钱庄票号还来得快当，虽然列不入缙绅阶级里头，却是地方上真正有势力的恶霸。

包头死人沟“梁山”的没落，主要是以后的警察机关代替了他们大部分职权；其次是“哥老会”分裂了他们的组织。在一九二五年杨万楨（小五杨）未被石友三枪毙以前，东川（土默特旗）、河套、后山和梁外，都是“哥老会”的世界，“白牛头”（非会员农民）简直无法存在。包头四面都被“哥老会”包围，“梁山”上有“出息”的人，看见“哥老会”快要独霸西北，特别是“里家”的人便都参加了“哥老会”，后来却沦落为土匪。只有“窝囊鬼”仍依靠死人沟过

活，所以“梁山”的声势就不若过去煊赫。经过日伪统治的八年，“梁山”的威望越发低落千丈，不过还管理乞丐和掌握小偷窃盗。我因好奇心驱使，一九四五年从陕坝回到包头以后，就想了解死人沟“梁山”的内幕，可是被鼓匠和乞丐吸了我好多纸烟，他们却坚不吐露其中的实况。一九四六年春天，还是包头伪警察局长韩霁堂派他的刑事队长牛占田把死人沟的保长李根罗找来，才给我很详细地介绍了以上的情况。虽然时隔十四五年，但由于当时我在“奋斗日报”上写过一篇“访问死人沟”的通讯，所以至今仍有深刻印象。那次我参观了乞丐的贫民窟，并且到李根罗家里窜了一个门子。死人沟里边除过鼓房是四合院，其余都是窑洞，并停厝着不少的棺材，活人跟死人为邻。有的是家庭窑洞，有的是集体窑洞，有的干脆和棺材住在一起，里边都被燥烟和灯烟熏黑，走进去非常阴森可怕。我去的时候正是白天，只有五官四肢不全的人坐在炕上捉虱子，能行动的人都上街了，由哈叭狗儿给看守各自的破烂行李。这些哈叭狗儿看见衣帽整齐的人不住哨吠，每盘炕上，都有二三十条。虽然我黑夜里没看见他们怎么样，但这以上所说的“梁山”兴盛时期死人沟是乞丐的“安乐窝”，气氛就大大不同了。又到了李根罗的家中去看，和这些窑洞相较，更是有天堂地狱之别。一进院，三间大正房全是玻璃门窗，里边一律紫漆家具，墙上有八扇屏和自鸣钟，炕上是栽绒毯和红缎被，正中的神龛中有两座金碧辉煌的牌位，供奉着永乐皇帝和范丹老祖。我问他“拐挺”到了那里，他说已被他叔父的徒弟带走。李根罗提起“梁山”的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并谈到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时他说：“辛亥革命时这里的人跟阎



锡山当兵，有八个人在‘晋军’中升了团长和营长。现在有一个给孙殿英当过县长的人，也在这里讨吃。抗日战争时我曾掩护过‘调查室’（军统）的人。你老兄的朋友在包头丢了东西，只要你老兄来找我，不出三天准能给找回。”这个封建把头言下非常得意，表示他仍在包头有很大的社会力量。

死人沟的“梁山”，除过辛亥革命时民军“秦晋蜀北伐先锋军大都督”阎锡山到了包头，曾派大同的李德懋前去招抚时，有人跟上萨县的张万顺（胖撸子），随同同盟会会员王平章、绥远城将军云享、土默特旗都统经权和统带王家矩打过刀什尔，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而外；在这以前和以后的历次变革动乱当中，死人沟“梁山”的人，都是持着顺民的态度。例如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扶清灭洋，“梁山”的人没加入“神兵”。民国三年“晋军”因缩编队伍不发遣散费激起孔庚部下哗变，“梁山”的人没有帮助反抗。一九四八年冬天，第一次解放包头时，“梁山”的人亦未作响应，抢占国民党的仓库。而民国三年赵守钰的军队跟乌拉特三旗起义的部队在沙坝子作战，和同年卢占魁包围包头，以及一九三九年傅作义反攻包头与一九四五年董其武防守包头时，“梁山”的人却给“晋军”、日本军和国民党的顽固军稳定后方，并到城外担任侦探。至于他们为地主资本家看家跑腿，对老百姓欺诈勒索，更是平常事儿，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梁山”是什么本质。它对于一切剥削统治阶级始终是俯首贴耳，他们真正是“好人的害，灰人的菜”。也只有旧中国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商业剥削消耗的城市，才能那样长期的泡混寄生。

新中国诞生后，剥削统治阶级被推翻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飞速前进，许多消费城市都很快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城市，农村也迅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农村，这些游民无产者都有了真正生存的权利和出路，这样的“江湖”组织也就自然而然地冰消瓦解了。

## 抗日战争期间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

刘映元

现在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的陕坝镇，抗日战争期间是旧绥远的临时省会。这个城镇自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以后天主教堂修通黄土拉亥河，一九二五年冯玉祥的军队建成包宁公路，便由原先只住着一家名叫丹巴牧民的荒凉野滩，逐步发展成为河套最大的水旱码头。一九三九年傅作义来此搞起绥西的偏安小局面，更在经济中心的基础上，成了军事和政治中心，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文化和宣传工作亦配合着抗日的形势而活跃起来。不论是为了鼓舞军民情绪，或是为了贯彻当局的政策法令，特别是以后为了进行反共宣传，和装璜粉饰省会的门面，陕坝曾经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现过好几个文化宣传机关和一些报章杂志与一小部分文化人。从这些活动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动向和社会动态，很有必要把这些过程记载下来，做为研究内蒙古历史的资料。

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1）从一九三七年绥包沦陷以后到一九三九年五原战役以前，可以说是“延安文化”风行阶段。（2）五原战役以后到一九四二年“三青团”成立以前，可以说是“重庆文化”猖獗阶段。（3）“三青团”成立以后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可以说是“美国文化”渗透阶段。在“延安文化”风行阶段，

陕坝充满抗战歌声，进步书刊公开流传，处处有着热火朝天的气氛。到了“重庆文化”猖獗阶段，陕坝笼罩着白色恐怖，左翼文化人多半离开河套，各种活动都是冷冷清清。傅作义为了加强自我鼓吹，并扭转战区政治部和国民党省党部在文化上给造成的荒凉局面，他在一九四二年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是在“八战区副长官部”成立了一个“贯彻社”，做为全绥西的文化宣传指导机构；第二是把文化宣传工作交由“三青团”去执行，出版了定期刊物和成立了专业剧团，第三是改组了《奋斗日报》，充实了印刷和造纸厂。从这以后，陕坝文化才有了“新”的气象，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这一期间，陕坝的戏曲还有过一度“百花齐放”的景象。不过这一阶段和头一阶段比较，已经没有了进步的精神和实质，完全是仿照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宣传方式，用资产阶级的美学内容，把读者和观众带到纵情享乐和空虚的梦幻里边，使得广大人民不过问政治，所以可以称为“美国文化”的渗透阶段。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中，有三种不同的情况，文宣机构和文化人都随着环境而兴衰更替，因此相当光怪陆离和非常错综复杂。

抗战期间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在当时和以后从未用笔墨记录过，各种文件目前几乎全部遗失，许多文化人大半死亡流散，抗日开始距今已经二十四年，日本投降也有十六年之久，把这八年来陕坝文化宣传活动的经过，光凭记忆来加以整理，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我在下边按照文宣机构与机关刊物、报纸与通讯社、书店与出版事业、话剧与戏曲活动和陕坝的文化人这五个项目来追述，一定挂一漏万而不全

面，希望当时参加过陕坝文宣活动的同志们，予以指正和补充。

### （一）陕坝的文宣机构与机关刊物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在晋西北作战，绥远省政府到榆林流亡，河套成了无政府状态，五原、陕坝和临河形成三部分军队的三个军事势力范围。临河马鸿宾的八十一军，由于最封建落后，当时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文化宣传；五原门炳岳的骑六军，虽有政治部和政工队，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陕坝李大超的绥远游击军，尽管势单力薄，一方面因为它的政训处由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领导，另一方面绥远游击军系绥远的子弟兵和傅作义三十五军的后备队，是绥西抗战的主流和地方的“正统”，所以陕坝由于这一部分军队驻守，从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就成了河套的文化中心。

游击军政训处的宣传工作，由章叶频、郭敬、骆时等同志负责搞，他们在陕坝连一架石印机都没有的条件下，出版了《一条线》油印三日刊，使陕坝第一次出现了报纸。还把平津绥包的流亡学生组成政治工作队，在城市、乡村给部队和农民教歌和演剧。政训处还有一个小型的随军图书馆，同志们把自己心爱的书刊集中或是捐献给这个图书馆借给群众阅读，将进步思想和新的知识向社会上传播。政训处经常召开座谈会，由李仲权主任和王志诚等同志作时事报告，使得游击军的军官和社会上的人士，对抗战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游击军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开到陕坝，到一九三八年过

春节的时候，这个城市街头巷尾的淫词滥调，便被激昂慷慨的抗战歌声所代替。游击军政训处的这些文化宣传活动，使得河套的好多知识分子由抗战而走向革命，一部分人参加了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一部分人去了革命圣地延安。

一九三八年夏初，游击军东调五原，陕坝的文宣活动曾经冷落了半年工夫，可是到了秋天，“绥远省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绥省动委会”）便在陕坝成立。这个机构是战前“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的继续，把八路军晋西北“动委会”的许多先进经验，搬到河套来从事组训民众工作。

“绥省动委会”的干部除了过去的“乡导员”，还有从北路军、三十五军和游击军二个政治部调过来的许多政工人员，他们是抗战以后注入傅作义集团的新血液，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与进步青年。“乡建会”没有专搞宣传的机构，“绥省动委会”不仅有宣传组，还有一个流动宣传队。当时国民党的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在五原成立不久，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在陕坝刚刚恢复办公，所以“绥省动委会”成了河套规模最大的文化宣传机构。“绥省动委会”宣传组由肖离担任主任，里边有能写能画的青年知识分子；流动宣传队由刘育斋担任队长，他本人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出身，队员中不少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搞过文宣工作的学生。他们比较会编会演，宣传组每天出版一张四开的石印《通俗日报》（杨格非主编），流动宣传队经常在农村巡回演出，肖离和一个音专毕业的吴亚声创作了好多抗战歌曲，亦在乡下、部队和学校中吟唱流传。因为他们完全向八路军学习，同时战区政治部和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活动尚未正式展开，书记长于纯斋又是一个时髦维新的人，加上三十

五军和游击军两个政治部和他们配合起来活动，所以“绥省动委会”和军队的文化宣传，都搞得非常活跃。城市和乡村的墙壁上写满了醒目的美术字标语。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从延安回到陕坝，听见人们的歌声言论，看见人们的服装打扮，好象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之后，河套的偏安局面形成。战区政治主任张彝鼎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张庆恩，都想抓文化宣传的领导权，但是傅作义不放手，在副长官部专设了一个办公厅，厅里有个文化室，由刚从晋西吉县阎锡山那里回到绥远的秦丰川参事担任领导，干部有朱子平（朱葆光）、张恺然、贾晓峰、殷草野、陈湘屏、鲁凤昌等人，他们正准备有组织、有规划地把绥西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向高潮，不料“皖南事变”发生，绥西和蒋管区各地一样，从一九四一年春节以后，也展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肃反”工作，秦丰川被军统局扣到西安，其它的文化人有的被遣送出境，有的被关到“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集中营）管押，凡是爱做文化宣传工作的青年，都受到传讯和逮捕，陕坝城西刘七柜“战青团”的集中营，一下子就关起三百多人。连傅作义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亦不得不交给“中央通讯社”驻绥特派员王华灼去接办。从此陕坝大约有一年多光景，变成了一个不歌不唱的暗哑城市，和知识分子不敢看书的鬼混世界。

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由“延安文化”风行阶段转入“重庆文化”猖獗阶段，是由战区政治部和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持。战区政治部有一个宣传科，科长俞自善不学无术，玩弄女性，连一种杂志都编不出来；政工队长卜文瑞，腐化堕落，成天打牌烫鸦片，象沈逸千的妹妹沈珩那样有较高水

平的演员，在他领导的“长城剧团”里边也没演出一场戏。因此不得不由张彝鼎亲自出马，每礼拜日集合各机关干部，听他大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算是学术讲座。国民党省党部是由调统室指挥宣传科，完全依靠变了节的文人给支撑门面。这一阶段国民党省党部共有三个文化宣传机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促进会绥远分会”，由高映明担任总干事，出过四五期《绥远文讯》月刊；一个是“绥远晋剧改进社”，由宣传科长王国璋负责，演过王国华编的两个歌剧；一个是“战青团”同学会的《前进》杂志社，由王国华担任主编，由《奋斗日报副刊》变成自印的月刊，出了不到一年工夫便宣告停刊。“重庆文化”猖獗阶段，仅是几个人在张牙舞爪，发出反共的歇斯底里的叫嚣，但引不起群众的共鸣。《绥远文讯》因为陕坝的文宣活动在这一期间非常消沉，没有消息可登，所以三十二开本的小型杂志只维持了半年，便宣告寿终正寝。《前进》最后成了脱党宣言和悔过书专辑，文艺栏中净是国立绥远中学学生们的作品，人们看看封面，连里边翻都不翻，就撕成碎条在油灯上点着熏了水烟。国民党省党部发现自己编印杂志起的宣传效果很小，便利用组织的力量给人们推荐重庆“独立出版社”和“正中书局”以及西安出版的《黄河文艺》等反动书刊。人们差不多都知道叶青和谢冰莹这些人是革命的叛徒，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多半原封不动地扔在一边，不象对重庆、桂林出版的进步书刊，用包书纸包好如同珍品般地保存起来，或是按贵重的礼物赠送亲友。

“战青团”绥远支团，于一九四一年春天成立，由蒋经国的同学赵仲容担任干事长，实际的领导权掌握在当时任第



八战区副长官部机要室主任和以后任了“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的王明德（克峻）手里。傅作义想把绥远的“三青团”变成自己的政党，所以对“三青团”的各项工作都大力支持。在文化宣传方面，除过叫梁子材和张恺然负责编辑《绥远青年》月刊，并把“绥省动委会”流动宣传队解散后流落在西安的一些人叫了回来，并在西安和陕坝当地聘了好多演员，将沈珩也由战区政治部调到“三青团”，组成了一个阵容相当齐整的“青年剧团”。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奋斗日报》也改组，由从前游击军的政治部主任崔载之接替王华灼担任社长，版面由八开小报扩大成四开中型报纸，有了社论和文艺副刊。于是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略有了一点起色。就因为这个缘故，张庆恩对文化人进行了再次迫害，把张象曙、卢文荣、殷草野、赵锡、李西成、马映光、王绥之、王佐兴、黄河及吴家河等三十多人送往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管训。

“青年剧团”的主要演员都纷纷离开绥西，只留下沈珩、潘丙心和军统特务张传德、孙国威等继续维持演出，将曹禺的剧本换成了陈铨的剧本。话剧衰落以后，旧剧在陕坝开始抬头，各部队都成立了剧团，副长官部除成立了“唐声社”演蒲剧外，还成立了培养京剧演员的艺术学校。市政筹备处在火转盘南边新盖了一座中山堂，从此陕坝除了杨作舟的“永兴舞台”，又多了一个演戏的剧场。

傅作义不仅注意对外宣传，在内部宣传教育上也“煞费苦心”。他为了把自己的命令贯彻到每一个军政干部的身上，当秦丰川离开后套，“文化室”撤销以后，又叫他的随从秘书阎又文成立了一个“贯彻社”，出版两种杂志，一种是《军事贯彻》，一种是《政治贯彻》，主要是登载军令政令

和他的升旗讲话与各种集会上的训话。“贯彻社”并协助指挥《奋斗日报》和印刷、造纸两厂的工作。阎又文是一个思想较新的人，由于职权的便利，他还编了一种名叫《文摘》的杂志，把全国各种报章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在陕坝做了翻版，偶而也登载一两篇由郭灵壁执笔的社论，好象“无声”中的微吟，反映了当时另一面的思想和观点。“贯彻社”的中山室，有好多进步的书刊报纸，专供傅作义参考，和阎又文接近的人，也能偷偷地借阅。一九四五年夏天，“十二战区”成立，“贯彻社”改组为“宣传指导处”，仍由阎又文负责，以后他便直接掌握了张家口、陕坝、归绥三地的《奋斗日报》和“华北剿总”的《阵中日报》。

## （二）陕坝的报纸与通讯社

抗战以前河套没有当地出版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冬天，游击军政训处在陕坝出了油印的《一条线》三日刊，虽然不以新闻报道为主，总算是河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报纸。一九三八年春天，这个三日刊因游击军改编和政训处撤销而停刊。到了夏天的时候，五原出了《强民日报》，临河出了《临河日报》。《强民日报》是汉奸赵伯廉（五原战役后被枪决）所编；《临河日报》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侯复荣等所编。到了一九三九年秋天，陕坝才有了“绥省动委会”的《通俗日报》，这三个报纸都是石印，其中当然以《临河日报》办的最好，因为王一然同志担任临河县长，无论人力物力都非常充实，并得到广大订户的支持，虽屡受国民党临河县党部迫害，一直维持到一九三九年冬天五原战役开始才停

刊。《强民日报》在五原战役以前就关门，《通俗日报》在五原战役以后亦未恢复。从一九四〇年春天开始，整个河套只剩下在陕坝出版的一家《奋斗日报》，所以《奋斗日报》是抗日战争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报纸。

《奋斗日报》创办于山西河曲，起先是傅作义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随军油印报纸，部队到了河套，因为五原战役开始，故没有马上在陕坝出版。到了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结束，由西安运回一架平台机、两架脚踏机和一座新五号铸字炉，在陕坝南门外元长义圪塔建立起工厂，《奋斗日报》才以八开铅印的面貌和陕坝的读者见面。《奋斗日报》的创办者系由西安县人景昌之同志，在河曲的时候没有营业部，由“三十五军”宣传科代为发行。到了陕坝设立了编辑和营业两部，编辑主任是高也彭，营业部主任是潘友三，编辑有高杰、雷轰和杜思诚等人，义务主编副刊的是杨文昭同志，义务撰写社论的有王一然、秦丰川、郭灵馥等，在“皖南事变”前后给景昌之同志带来了不少麻烦，如副刊《草原》曾因“大人先生”一词惹起傅作义很大不满，认为是讽刺他，迫令即行停刊。又如有一次把“蒋委员长”的“蒋”字误排为“将”字，张庆恩认为是有意割“蒋委员长”之头，向傅指责该报主持人有“反动”思想。一九四一年春天，景昌之、高杰和雷轰等因共产党嫌疑被遣送出河套，张庆恩借机举荐王华灼去接办。傅作义对中统特务掌握他的喉舌很不乐意，所以只交给编辑权而不让给经济权，于是把《奋斗日报》营业部的机器，改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印刷厂。

王华灼接办《奋斗日报》的时候，报社只剩下高也彭和杜思诚两个人。张彝鼎给他调去政治部的李子余和史观政办

理营业，张庆恩由“战青团”集中营给他拨去刘映元、李西成和陈万华，担任校对、采访和编辑，才算凑成班底。王华灼对“战青团”拨去的人很不放心，李西成采访回的地方新闻不给刊载，而用战区政治部《扫荡简报》主任负涛秋供给的稿子，把刘映元派到印刷厂担任校对，不让插手编辑业务，说他们都是外行，叫实习三年五载再正式担任内外勤工作。后来经兰州《民国日报》社长关洁民的介绍，把太原教育学院毕业、在国立绥中教语文的赵锡聘为编辑主任。王华灼、负涛秋和关洁民，都是山西CC系苗培成、姚大海等的娄罗，他们在太原办过《光华晚报》，到西安办过《长安晚报》，所以王华灼完全是办小报的手法，从来没写过一篇社论，爱用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迎合读者的好奇心理，有时还放几声“大炮”，含沙射影地攻击傅作义的高级干部，所以傅作义只让他整整搞了一年，便由崔载之接替了他的职务，理由是他已被派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崔载之接王华灼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王华灼接景昌之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后来阎又文接崔载之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崔载之在接王华灼以前，曾进行过一件争取工作，他原先是带着在西安招收的好多青年，由西安经河曲到河套的，初任“游击军”政治部主任，“游击军”改编为十七师以后，他担任了暂三军政治部主任，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崔载之是一个才气较高的人，文章写的还好，他羞与赖拂庭（暂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彭光祖（一〇一师政治部主任）等列于同等级位，为了让傅作义知道他很有一手，特地写了一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问题论文，叫陕北第一个刻写钢板的能手、战区政治部的尹文骏，用美术套色纸油

印成单行本，向有关方面散发，结果这篇文章使王华灼编的《奋斗日报》相形见绌，引起好多人的重视。张彝鼎手下没有人才，很想把崔载之拉到他的周围，在傅作义跟前替他说了一些好话，结果崔载之如愿以偿地到了《奋斗日报》，表面上也算是由政治部的人接办了。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崔载之整整办了四年《奋斗日报》。他本人比王华灼能干，并有些基础，“游击军”政治部和“绥省动委会”宣传组的旧人都给报社投稿，所以他一接过《奋斗日报》就给了人们一个新的印象，尤其是在“青年剧团”演出“北京人”一剧后，他登载了杨文焰、郭灵墅等人写的剧评，在河套地方简直是开风气之先，赢得人们齐声喝彩，誉他是办报能手。他在内部首先是安定了同仁们的生活，报社的人由原先的军职待遇变成文官待遇，黄军衣换了黑制服，顶了省政府“公告组”的编制。其次是把报纸由八开小报扩大为四开中型报纸，除了每天有社论，礼拜天还有星期论文。副刊以新文艺为主，取消了王华灼时代打油诗一类的庸俗作品。编辑部还设立了一个资料室，叫刘映元给保管整理资料。因为报纸办的有声有色，张庆恩看见很不舒服，所以在押送张象曦等那一批政治犯到兰州时，刘映元、赵锡和李西成都列入名单，经崔载之向傅作义恳求，只把刘映元留下来。陈万华看见在报社工作非常危险，辞职到狼山办了学校。因为报社的人员骤减，便聘杨格非担任总编辑，不久亦被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扣走，于是崔载之把总编辑兼起来，叫刘映元除了管理资料还跑外勤。这时《奋斗日报》还没公开反共，但是已经开始亲美和媚美，刘映元管的资料大部分是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寄来的文件和图片，刘映

元写长篇专访也尽量仿效美国记者约翰·根室等的手法，这样就把“美国文化”表现在报纸上面，渗透到读者的思想里边。

第八战区副长官部“贯彻社”成立以后，傅作义本来想叫阎又文把报社和印刷、造纸两厂一齐抓起。印刷厂厂长吴匡一和造纸厂厂长潘友三都很听他的话，王华灼和崔载之就不好指挥。《奋斗日报》的电台是副长官部的新闻台，人事和经费由机要室管理，新闻台只向《奋斗日报》供给重庆“中央社”的电报，它还收抄延安“新华社”、南京“中华社”和张家口“蒙疆通讯社”的电报，那是直接送交阎又文给傅作义诵读，以了解中国的全面情况。阎又文在抗战时期就是傅作义的发言人，我为了往上爬，自从担任了外勤记者以后，便积极向他靠拢。他怕外埠的大报派专人到绥西采访，象王华灼那样随便拍发新闻，除过他给《大公报》担任驻绥记者，叫我经常给《中央日报》和《时事新报》投稿，并让“贯彻社”的戴毅跟《新蜀报》建立通讯关系，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外埠大报的记者站。一九四四年冬天，《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张剑梅来绥西工作，阎又文派我协助他到各处采访，经他向张剑梅多方介绍，我正式接了《中央日报》驻绥记者的聘书，并因张剑梅于日本投降后进了上海《申报》，我又兼任了《申报》的驻绥记者。由于这些关系，我能旁听副长官部和省政府每天早晨高级军政干部向傅作义的汇报，同时我在陕坝创办《绥蒙新闻》也没有受过为难就得到批准立案。

傅作义在绥西不许外人办报和成立通讯社，他用两种方法加以限制，一种是省政府不给立案，一种是印刷厂不给印刷。所以抗战以前绥包的好几个通讯社，都没有在陕坝恢

复。战区政治部的《扫荡简报》想扩大为铅印的《阵中日报》，国民党省党部的《民国日报》想在陕坝复刊，都没有成功。《扫荡简报》由贡涛秋和李丕才编辑，在陕坝用油印支持了一年多，因为无法和《奋斗日报》竞争而停刊。抗战期间只成立过三个通讯社，在我办《绥蒙新闻》以前，有过一个《西北通讯社》，由傅作义的秘书高云山担任社长，受傅作义的秘书长曾厚载领导，编辑有“乡导员”出身的李养年和刘殿文，它是和《奋斗日报》同时期在陕坝出现的一个通讯社，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把稿件寄到西安、兰州和重庆等地，新闻变成了旧闻，后方的报纸无法采用它的稿件；同时《奋斗日报》为了表现自己的工作，有记者采访地方新闻，也不用它的稿件，所以成了一个虚设的机构。由于曾厚载是傅作义的主管特务工作的负责人，中统局的人必须通过他才能在绥西活动，“西北通讯社”在成立期间，只是给了贡涛秋、杨恒三、赵浩然这些人以记者身份。在一九四一年春天“肃反”之前完成了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调查统计工作，“西北通讯社”亦宣告裁撤。

《绥蒙新闻》在陕坝不发布新闻，专向全国各地报纸供给长篇通讯，介绍绥西和伪蒙的情况，由我自己花钱买纸求印刷厂给印成三十二开的单行本，企图做出一定成绩，换取傅作义的津贴，或是让我领导一个单独机构。《绥蒙新闻》起先是旬刊，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单干，后来成了不定期的。它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发稿，出了六七期即遇到日本投降。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十二战区成立以后，阎又文还办了一个“新中国通讯社”，由他担任社长，我给编辑采访，仅仅是把《奋斗日报》的“本报讯”换成“新中国社讯”，以便

先打出旗号，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计划抗战胜利后用电台拍发新闻。后来到了归绥，怕引起蒋介石的误会，结果没有敢如此做，只是发了半年多油印稿。阎又文到了张家口，《新中国通讯社》亦跟着离开绥远；一九四八年秋天，他又叫我去北京去办《新中国通讯社》，因傅作义集团的崩溃而作罢。

### （三） 陕坝的书店与出版事业

陕坝在抗战以前不仅没有书店，连南纸局都没有一家。在三十五军未返回绥西的时候，人们想看书报杂志，需要托朋友到延安、武汉、重庆、西安等地去购买。三十五军一九三九年春天从河曲开到河套，才带过李健生王玉亭夫妇经营的“西北书店”。“西北书店”最初是傅作义的“二战区北路军”政治部的“三民主义书报社”，一开始就代销延安光华书局和新华书店出版的书刊，象《解放》、《群众》这些进步杂志，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重要著作，就是通过它介绍给傅作义的军政干部的。一九三九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开到河套后，李健生王玉亭夫妇把书报社也搬来了，改名为“西北书店”。这时李健生已离开三十五军政治部，成了半公半私的书店经理。

“西北书店”初来陕坝的时候，在二道街西头一条巷子（三十五军政治部隔壁）的土院里做“暗房子生意”，除了渴求新知识的青年干部和学生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都不知道那里边有个书店。“西北书店”来到陕坝以后，业务更加扩大，除了继续代销延安的出版物，还推销重庆和桂林的进步书刊。重庆、桂林的进步书刊在邮运途中，多被西安、平凉和宁夏的国民党检查人员扣留，所以杂志时常脱期，象《鲁



讯选集》那样大部头书，到了陕坝就残缺不全。延安的出版物是由三边的张家畔先运到桃力民的毋花梢，那里驻着八路军的部队，然后李健生派他的内弟王安邦化装成商人取回陕坝。王安邦当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跟着“跑梁外”做买卖的人往来伊盟河套，很不引人注目，所以延安的报章杂志能按期运到陕坝。因为交通不便，路上又有耽搁，由延安到陕坝，最快也得半个多月，虽然这样，人们也视为珍宝。所以“西北书店”的书报老是脱销，到了星期天无论有多少，都被各机关的青年干部和国立绥中的学生抢购一空。

一九四一年春天，国民党在陕坝“肃反”的时候，李健生亦被扣捕，王玉亭身怀有孕，也不时传讯。李健生因患三期肺病，幸未遭受非刑拷打，在刘七柜集中营关了半年工夫，得以“蒙混过关”，从“战青团”释放出来，张庆恩对李健生仍不放心，还派叛徒王鸣中经常监视他的行动。为了避免书刊被扣，李健生把店名改成“新生书店”。在这时候，书店还被迫搬过五次家。一九四三年随着陕坝的新市区向园子渠伸展，李健生把“暗房子生意”扩展成“栏柜买卖”，在大转盘的东南拐角设立了兼售文具的门市部。这时毋花梢的八路军被何文鼎的二十六师逼走，李健生为开辟第二条由陕北到绥西的路线，曾冒险前往伊盟，在东胜被伊盟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扣捕，几乎被陈长捷枪毙。从此陕北的交通断绝，“新生书店”专售重庆和桂林两地的进步书刊。李健生夫妇的“西北书店”，在抗战期间的陕坝起了传播新文化和新知识的作用。

陕坝的反动书店，是“三青团”的“青年书店”成立在前，国民党省党部的“中国文化服务社绥远分社”开张在

后。一九四二年“青年书店”在小转盘西街营业了多时，“文化服务社”才在小转盘东街设立起门市部。这两个书店因为都是卖的“正中书局”与“独立出版社”的货色，很不受读者欢迎，结果亏累不堪，仓库中积压着好多废纸，眼看就要关门。先是“三青团”聘鲁凤昌担任“青年书店”的经理，由于鲁凤昌很能折腾，包销了“时与潮社”的半月刊文艺月刊和每周副刊，并兼做纸张及其它投机生意，遂由赔钱变成赚钱。后来张庆恩索性把“文化服务社”也交给鲁凤昌去经营，“文化服务社”才扭转了局面。鲁凤昌在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成了陕坝的大书商和操纵文化用品的大老板，他本人又能刻能画，一九四四年冬天，利用废纸印制月份牌和窗花，就发了一笔财。他并且利用国民党党团的力量，向各县县长推销书，将两个书店积压的东西，清扫了百分之八十左右。鲁凤昌还善于利用广告宣传 and 登门售书的办法做买卖，象苏联叛徒葛诚科写的《我择取自由》一书，曾经成为陕坝的畅销书籍。鲁凤昌并计划到后方购买印刷机器，在陕坝成立出版社，后因日本宣布投降，他参加了“党政总队”而作罢。鲁凤昌在解放以前由文化特务而担任了伪和林与兴和的县长。“青年书店”搬到归绥，“文化服务社”改为“益友书店”，仍在陕坝营业，成了中统分子祁觉民的特务机关。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原先也想成立书店，已经由张彝鼎的同乡蔡镜潭在小转盘南街开了一个文化用品消费合作社，因为看到“青年书店”和“文化服务社”的最初赔钱，结果没有向书店的方向发展。

抗战期间陕坝的出版事业，由副长官部“贯彻社”所把持。因为日本人在绥包封锁物资，不仅白报纸不许运出沦陷

区，连色令纸都禁止商人往河套携带，陕坝各机关在四川的川贡纸没有北销以前，完全用白麻纸办公。川贡纸虽然比较价廉物美，但是只能一面印刷。“贯彻社”为了出书、印报，不得不就地解决纸张的来源，因此建立了印刷厂以后，又在陕坝南门外开办了一个造纸厂。河套的造纸原料很多，象遍地生长的芨芨草，本来可以制造高级的道林纸，但是陕坝既没有机器也没有技术人材，纸厂只好依靠马莲和乱麻来维持生产。副长官部的造纸厂除了有一个粗笨的压纸滚子，其它设备和旧式纸房一样简陋，生产的厚报纸老是一面光滑，另一面疙里疙瘩，印出的东西字迹不清。傅作义看了八路军的《晋绥日报》，叫阎又文设法赶上。由于纸厂的职员不请求技术革新，特别是工人按军队管理，绥西的纸匠又富有传统的团结美德和顽强精神，很不容易领导，当然不会给想办法找窍门，所以造纸厂从开办到结束，没有造出一张象《晋绥日报》那样两面平整的土制报纸。造纸厂的产品不但质量很差，数量也很少，四五十个工人每天只能往出捞二三百刀，仅够维持《奋斗日报》、军政《贯彻》、《文摘》和《绥远青年》的出版。好在这些报刊的销数不多，《奋斗日报》的纸张消耗最大，也没有超出四千份，其它杂志都是四五百份，所以造纸厂一直停滞不前，不曾提高和扩展。

在陕坝出版书报，印刷和纸张固然困难，政治上的限制也很严，想办一个同人杂志或是自己掏腰包出一本书，颇不容易。象陈玉甲的《云岚囚史》（记载他任绥远警备第二师师长时被奉军都统汲金纯扣捕的经过）是在榆林出版。“绥于雨”有个学生写了一本《风力学》的物理书，已经出重价让印刷厂给排好版，国民党省党部认为这个人形迹可疑，结果都

没有印成。只有“中美训练班”的几个翻译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由广东人潘然主编，不但没有办过立案手续，“贯彻社”还给贴纸白印，国民党省党部也未加干涉。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抗战期间陕坝的出版事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 （四）陕坝的戏剧活动

陕坝在抗战以前既然成了商业城市，也就有了戏院和小型的游艺场。除了杨作舟的“永兴舞台”经常有“六班主”常庆的“三盛班”演唱晋剧，市场里还有在绥、包两市吃不开的孙小辫，每天表演魔术和武艺。“三盛班”的演员多半是过了时的老艺人，须生有“疙瘩红”和“铃铃红”，青衣有“五月鲜”，花旦有“白菜心”，黑头有“高旺黑”，小生有“讨吃生”，小丑有“命命丑”，坤角有筱月仙和蔡玉凤。五原战役以后，从包头跑来“沙金红”、“盖蒲州”、王金爱和“十七生”，亦参加了这个班子。“三盛班”并没有随着抗战和陕坝的繁荣而发展起来，反而因为公家占园子和借戏箱，特别是好多军政人员携眷看戏不打票，给班主造成亏累，使艺人的生活陷于饥饿的境地。“铃铃红”春夏秋三季在乡下种地，冬天才进园子唱戏。“讨吃生”散了场在街上卖凉粉，“命命丑”在市场上当小缙。因为光靠“分子钱”难得温饱，非兼营副业不足维持生活。所以除了“铃铃红”打出一个“海棠子”，其它的艺人都无力收徒，场面上跑龙套的，尽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汉。豁牙露齿的穿着破旧行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永兴舞台”从一九三七年冬天开始到一九四三年中山

党建底以前，一直是陕坝的公共集会场所，差不多每礼拜总开一次大会。最初在“永兴舞台”举办文娱晚会的是“游击军”政训处，讲话完毕即进行文娱节目，我记得宋犁夫和左文英在这里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旧剧有军官团和骑兵旅的段文芸组织的山西中路梆子和特务营上士孙倩影组织的京戏。军官团和骑兵旅的业余晋剧团随着队伍开拔而解散。特务营的业余京剧团和陕坝河北帮商人中的票友，组织了一个“阳春社”，一直维持到李英夫在一九四三年成立艺术学校以前。“阳春社”自从一九三九年“督察处”的宪兵由河曲开到陕坝，即由康玉玺和周勤等领导，后来有流落在陕坝的京剧艺人杨鸿霖、花艳芳和在宁夏呆不住的张丽君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于是“阳春社”的阵容日渐整齐扩大，成了傅作义招待外宾的剧团。一九四三年并以这个业余剧团为基础，成立了第八战区副长官部艺术学校，由李英夫担任校长。艺校成立以后由杨鸿霖等担任教师，计划训练“文”、“化”、“建”、“国”四个科班，在日本投降时“文”字班已能登台表演（青年京剧团的卜文宝就是“文”字科学生）。

有灯光布景的话剧演出，是从“绥省动委会”的流动宣传队开始，主要演员有刘育斋、李佩蘅、肖离、肖凤、司徒凡塞、石杰、刘克里和海凤等人，比同一时期战区政治部“长城剧团”的任汉文、任汉杰姐妹和黄幼兰、刘婉箴等水平要高，只是不经常在陕坝演出，而是在乡下做流动宣传。一九四二年“三青团”的“青年剧团”成立，话剧才在陕坝风靡一时。“青年剧团”除了以“绥省动委会”流宣队的肖离、肖凤、司徒凡塞、石杰等人做为班底，并从西安聘请了丁尼、白玲、崔超、马心、王雯、潘丙心和冯玉书。由战区

政治部“长城剧团”调过沈珩。另外在绥西活动的“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赵波、赵增寿等人也参加了这个剧团。肖离还从国立绥中找了好几个热爱话剧的学生担任配角。并把抗战以前在“绥远饭店”当过茶房、抗战以后给傅作义充任副官的郑绍武，也聘为临时演员，担当仆役一类的角色。所以人材非常齐整，曹禺的剧本除了《原野》而外，都搬上了陕坝的“永兴舞台”。“青年剧团”在陕坝还演过果戈里的《巡按》、苏联抗德短剧《人约黄昏》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傅作义对沈珩的表演技术评价很高，曾对人们说“我在重庆看话剧，白杨和凤子也不过如此”。这一期间人们看“青年剧团”的演出，成了精神上最大的享乐。

“青年剧团”自从丁尼、白玲、崔超、肖离、肖凤等因受政治压迫离开绥西以后，声势已不如先前，经王明德把军统特务张传德、孙国威给调过来支撑门面，所以还能继续维持演出。孙国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担任反派角色很能叫座。张传德能拉能唱，并善于布置舞台和绘画露布，陕坝的物资条件很差，抗战时期连个沙发都没有，但张传德能把《日出》中的陈白露的卧室装置得非常逼真。他既会画中国画也会画西洋画，尤其精于图案和美术字，“青年剧团”每次演出的《海报》和香港、重庆的电影广告相较，亦无逊色。丁尼、白玲等走了以后，“青年剧团”除了接二连三地演陈铨的《天字第一号》、《野玫瑰》和《蓝蝴蝶》而外，也演过曹禺的《蜕变》。因为沈珩没有离开剧团，孙国威的“赚头”十足，“票房价值”一直没有衰退。以后张传德和孙国威成了王明德的得力宣传骨干，所以抗战结束以后，张传德升任了归绥的电话局局长，孙国威升任了张家口的广播

电台台长。

一九四三年春天，张庆恩看见“青年剧团”非常活跃。他也很想表现一下国民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便叫国民党省党部宣传科长王国璋和“三盛班”的班主常庆合作，搞了一个“绥远省晋剧改进社”，派范建中担任导演，王国华担任编辑，艺人都换了原先的姓名，“讨吃生”叫成高仲华，并派调统室的人把门查票，减少了“看蹭戏”的现象。王国华在被捕以前，曾任中共河套地委宣传部部长，写作能力很强，他想利用旧形式表演新内容，把晋剧变成歌剧，写了《三不浪过大年》和《喜拴子娶老婆》两个给傅作义宣传政策法令的剧本，里边有晋剧的腔调，《二人台》的曲牌和快板与顺口溜。范建中是个最爱出风头的人，竟亲自粉墨登台，结果演了一个四不象，使得舆论大哗。后来因为王国璋想掌握《三盛班》的经济和品行不端，艺人们对他非常反对；王国华和范建中怕叫他们编写表演反共的剧本，便借张庆恩一度回到重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换成王玉宾的机会，将“晋剧改进社”结束，仍由常庆把“三盛班”接回去独自经营。

陕坝所以在抗战后期出现了剧坛上的“百花齐放”局面，是因为傅作义的新兵多半是从陕甘两省用绳子捆来的壮丁，这些新兵因为思念家乡，不断通过绥宁边界的腾格里大沙漠往回逃跑。为了稳固军心，首先是一〇一师师长郭景云组织了一个“国光剧团”，专演陕甘的地方剧秦腔，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起了一些减少逃跑的效果。接着以师为单位都组织起剧团，通过走私的办法，差不多都派人到包头用皮毛、粮食换回戏箱。傅作义的军政干部，以山西晋南人为最多，他们很早就陕坝组织起一个演唱蒲州榔子和郿鄠的

业余剧团，曾在晚会上演出，一九四三年的冬天，这个业余剧团正式变成演唱蒲州榔子和郿鄠的专业剧团“唐声社”。由王靖国屯垦队组成的“五临警备旅”，官兵多系山西中路人，这时也组织了一个中路榔子“黄河剧团”。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也从西安请来一班驴皮影子戏。所以陕坝共有京剧、蒲州榔子、山西北路榔子、中路榔子、秦腔、郿鄠、皮影戏七个剧种，接连不断在新建的中山堂公演。其中以“国光剧团”、“黄河剧团”、“唐声社”和“艺术学校”最能叫座。于是陕坝成了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人们都在园子渠两岸起房盖屋，准备长久偏安下去，把沦陷区早忘到九霄云外，直把陕坝当成归绥了。

“国光剧团”成立很早，因为郭景云是个戏迷，当他未归傅作义以前，在“独立七旅”任团长的时候就有一个剧团，“七七”事变后把很好的一付戏箱扔到山西左云。他是陕西富平人，对秦腔尤为爱好，到了河套升为一〇一师师长，便派人回西安又买了一付戏箱，并聘来“易俗社”的王眉民和老艺人何福堂担任教师，从兵里也挑选了许多演员，定名为“国光剧团”，属政治部领导。五原战役以后，他的队伍一直在临河驻防，“国光剧团”不但给士兵们演，也给农民们演，临河人以陕北府谷和甘肃民勤的移民最多，秦腔很受老乡们欢迎，剧团的花旦仇彦昌成了家喻户晓的一颗红星，临河陕坝的大人小孩，差不多都会哼几句《柜中缘》里边许翠莲的唱词，山西榔子眼看要被秦腔代替。因为“三盛班”已经唱腻，和其它新成立的剧团比起来就相形见绌，后来由于《黄河剧团》兴起，中路榔子和北路榔子才没有在陕坝被其它剧种淘汰。“黄河剧团”是“五临警备旅”的参谋



刘曼云所创办，他出身于山西太谷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就喜爱玩票，拉得一手悦耳中听的好胡琴，他除了在士兵中挑选演员，还在农村中物色演戏的天才，结果在蛮会镇发现了一个木匠二挠子，给起名为李晋华，意思是晋剧演员中的精华。李晋华学的是“三盛班”筱月仙的腔调，嗓音非常清脆，表演特别细腻，一时成了陕坝的“梅兰芳”，“黄河剧团”便跟着他而座无虚席。当时有两句顺口溜，形容陕坝的“高级”生活，说是“仙岛纸烟僧帽蜡，日光肥皂李晋华”，可见看李晋华的演出成了人们很好的享受。在挽救晋剧危亡中，陕坝最大的商店经理兼商会委员胡耀成，在一九四四年冬天还组织过一个“晋声剧团”，聘“三盛班”的“疙瘩红”给各商号挑出的年轻店员教戏，并参加“三盛班”的演出，所以“三盛班”也有了新的角色，不象过去那样死气沉沉。

“艺术学校”和“唐声社”，是隶属于副长官部的两个专业剧团。“艺术学校”几乎网罗了全陕坝的京剧艺人和票友，在日本快投降的时候，已经能演全本《群英会》和《金玉奴》，在中山堂招待过张治中和蒋鼎文。参加“艺术学校”客串演出的张丽君，曾因桃色纠纷轰动陕坝和整个绥西，凡有她的戏出演，人们都是争先恐后去买票，“艺术学校”越发有了吸引力。“唐声社”的蒲州梆子和郿鄠，起先只有晋南人捧场，后来他们为跟其它剧团竞赛，也从西安聘来艺人王元凯、舒明贵和屈兴成，并由阎又文担任团长。王元凯、舒明贵和屈兴成都是“娃娃班”出身，有基本功，头一次在中山堂露演，王元凯《藏舟》的台步，舒明贵《黄鹤楼》的翎子，屈兴成《杀驸》的翅子和甩发，就给陕坝的观

众开了新的眼界，于是在“二挠子气死筱月仙”的说法之后，又有了“王元凯压倒张丽君”的论调。这时傅作义的军政干部公余无事可干，便产生了捧角的风气。参谋长张濯清把张丽君认为干闺女；苏纪忍（日本投降后曾任平津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到处给王元凯和二挠子吹嘘；谁要说是仇彦昌不捧。郭景云马上就跟人翻脸。从捧角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傅作义集团内曾有过晋南、晋中、绥远、直鲁豫、陕甘等山头。

后套的本地戏《二人台》和甘肃民勤的《镇番秧歌》，抗战期间被排斥于陕坝城外，始终在乡村给农民演唱。陕坝只是商会有《二人台》的乐队，由萨县人薛正权领导，每年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七月十五园子渠放河灯时演奏。王国华和范建中搞“晋剧改进社”时，想把《二人台》变成《绥剧》，因为无人支持，结果是想了一想和说了一说完事。许多假道学先生许自己捧坤角和花旦，不准别人提倡《二人台》，有一年园子渠放河灯，国立绥中学生史凤仪在船上清唱《走西口》，博得两岸千万群众的鼓掌欢迎，我在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并为《二人台》鸣不平，结果引起“高级干部”们的反对，说我替淫词滥调作宣传。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国民党的文化并不为工农兵服务，只是拿文化当反动统治的装饰物和享用品。象《二人台》、《爬山歌》和《莲花落》这些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抗日战争期间并没有把它们运用为宣传武器。

### （五）陕坝的文化人

抗战期间陕坝没有学术团体，没有研究风气，没有图书

馆，也没有科学技术专家，且较远的文化落后状态，并未因为抗战而有所扭转。战前在归绥搞新文艺运动的杨令德和从事边疆历史研究的荣祥，这一期间都住到陕北榆林。跟在傅作义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是因为追求升官发财而将书本抛开，就是因为生活腐化而无心写作，只有周北峰和秦丰川，曾给干部和学生们作过几次有关国际问题的时事报告，也因遭受国民党省党部的干扰，不能畅所欲言。到“三青团”成立以后，连这样的讲座都再没有举办。傅作义曾计划叫周北峰筹备成立“绥蒙大学”，由于经费设备和教师都无法解决，结果只给干部子弟成立了一所“奋斗中学”。抗战期间内地的驰名文化人来绥西旅行考察的也寥寥无几，仅仅有作家老舍随着重庆的全国慰劳团到过陕坝一次，但未跟当地的文化界接触，故未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事实上陕坝无文化这一界，我在此处所谈的文化人，是指一些经常给报章杂志投稿的业余文人，和几个宣传机关的专职干部而言。

在陕坝搞文化宣传的人，很少地方人和傅作义的老部下，多半是从内地来到绥西前线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当时是代表着进步的力量，特别在抗战初期，思想上都有过革命的萌芽。首先按着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分类，写诗的除了湖南人肖离和李行，还有河北人宋永年跟乔东君。肖离姓向，是湘西少数民族土司家的子弟，他和肖凤（北京人，姓张）两次来陕坝搞文宣工作，除了演戏写诗，还会写美术字。抗战以后他和肖凤都进了崔载之在北京给傅作义创办的《平明日报》，解放后参加了《大公报》，一九五七年夫妇都成为右派，现在已摘掉帽子。李行在“绥省动委会”工作，因写诗于一九四二年被送往兰州西北训练团，后来转到西安劳动

营，出狱后听说仍在西安写诗，日本投降后即不知下落。宋永年是“西北联大”毕业的学生，先参加“绥省动委会”工作，“绥省动委会”和民政厅合并后任民政厅科长，因为跟地政局一个科员的女人姘度，一九四三年冬天被本夫用铁锹劈死。乔东君在未参加胡宗南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以前，住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到绥西参加“绥省动委会”工作，“绥省动委会”结束后即不知去向，《平明日报》出版后，看见常发表有他的诗歌。这几个人的诗谈不上有什么独自的风格，完全模仿艾青和“胡风派”的鲁藜、曾卓的作品，除了辞句华丽，没有青春活力和战斗的气息，仅仅宣泄了当时年青人的苦闷叫喊，透出了一些微弱的反抗呼声。并且脱离群众，一点也不大众化和通俗化，未曾贴上街头，没有利用晚会举行过朗诵，除了引起中统特务的怀疑，在社会上没产生任何影响。

抗战期间陕坝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绥远青年》和《奋斗日报》上发表的只是中篇和短篇。写小说的以肖凤的人物刻画较为细腻。另外有两个河北人也写短篇小说，很值得一提，一个是王鸿鹄，笔名高塞，一个是王德薇，笔名瀚海。高塞在部队中担任参谋，经常随军在狼山里边驻防，他的作品多系反映乌拉特三旗的蒙民生活。瀚海先在陈长捷的政治部工作，以后参加了桃力民的“三青团”，作品中多描绘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风光。所以这两个人的文艺创作，都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高塞一直是《奋斗日报》副刊的支持者，瀚海是《绥远青年》的台柱，后来这两个人都改行参加了《奋斗日报》。高塞于北京解放后，在归绥《奋斗日报》工作，瀚海先在张家口《奋斗日报》，“九·一九”起义前

调往陕坝《奋斗日报》。在《奋斗日报》担任过编辑主任的赵锡，笔名夏沙，山西孟县人，常写讽刺性的短篇，他在兰州和诗人沙葺组织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甘肃分会”，欢迎过作家茅盾。赵锡在陕坝时也想成立抗协绥远分会，在国立绥中教语文时，常给学生们介绍鲁迅的作品，担任了《奋斗日报》的编辑主任以后，鼓励学生们给报社投稿，经他的提拔有魏沛和张嘉猷退学进了报馆。就因为这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送往兰州西北训练团又转往西安劳动营。

送往兰州西北训练团的政治犯中，除了马映光常写小品散文，还有两个杂文写得不错的人，一个是张象曙，一个是李寿民，他们的作品非常深刻而辛辣，投到《奋斗日报》不敢采用，以后他们索兴不投稿子，只在朋友中间传阅，张象曙就因在朋友中朗诵他写的“封住你的嘴”一诗而见恶于傅作义，于是住了几年劳动营。还有乡导员出身的李西成，常写批评文章，曾和肖离、肖凤在报上打过笔仗。因为肖离、肖凤以绥西的肖军、肖红自居，认为别人不懂诗歌和戏剧，故引起李西成的攻讦。李西成从西安劳动营出来，在秦丰川的天津《民生导报》担任过一度编辑。抗战时期朱子平同志搞过翻译工作，但没有发表和出版。除了王国华编了两个歌剧，再无其它剧本产生。傅作义曾想叫人给编一个以蒙、汉、回三族人团结抗战为主题的剧本，结果谁也没有执笔。好多文艺爱好者都是眼高手低，看不起当地的报章杂志和从事文宣活动人。同时这些人没有统一领导，只是偶然高兴起来写写，不肯刻苦用功，所以尽管时间很长，但未搞出名堂和作出成绩。

在陕坝搞美术工作的，战区政治部有山东人宋裕藩，

“三青团”有河南人齐金山，他们都学的是广告画，只画过《奋斗日报》的报头和街头漫画。绘画有田荣、沈珩夫妇，高一峰与《奋斗中学》美术教员张竞。其中沈珩的写生画因为受了她哥哥沈逸千的影响，别具一格，很受人欢迎。她的丈夫田荣是朝鲜人，画油画，这四个人除了张竞都在中山堂举行过画展。沈珩、高一峰和我，曾随阎又文于一九四三年夏天，到各部队中搜集过三十五军的抗战史料，从长城战役到五原战役都作了记录，重要场面由田荣、沈珩和高一峰画成油画，傅作义曾准备在重庆出版，因为道林纸难买，决定抗战胜利后再办。日本一投降，三十五军即投入反革命的内战，便把这事放过一边。田荣和沈珩因为孩子很多，薪金不足维持生活，便以作品换取衣食，在他们被迫离开绥西以前，沈珩画的《草原牧野》，成了“高级干部”的客厅装饰。现在内蒙美术协会工作的高步禄，抗战时期在副长官部任参谋，那时他就利用业余时间画中国画，不过知道的人很少。“三青团”在一九四三年由西安来了一个河北阜平人胡宁，爱写诗也能画画，还会木刻，笔名叫辛苦，在陕坝刻了一本文天祥的《正气歌图解》。在这以前鲁凤昌也曾编绘过一本《国际问题图解》，均由副长官部印刷厂出版，算是抗战期间陕坝出版的两本画册。《奋斗日报》以前用当地木刻插图，以后就完全采用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供给的铜版和胶版。

抗日战争期间在陕坝搞文化宣传的，多数是新文艺爱好者。写旧诗的只有傅作义的另一秘书长赵伯纯，研究边疆历史的只有张彝鼎的秘书胡肇封。这些新文艺的爱好者，大都受过国民党省党部的逮捕和传讯，“战青团”集中营先后关过一千多政治犯，里边很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

是喜欢看新书和爱写文章的青年干部与学生。他们多是没有勇气参加革命留恋傅作义偏安局面的人，因此有的由文坛踏入官场，成了御用文化特务；有的经过打击而意志消沉，用鬼混来消磨岁月；有的兼营了商业，苟图衣食茶饭；有的穷困潦倒，流落在街头巷尾。“青年剧团”的冯玉书，在陕坝小转盘西街开了一个“老乡亲”小饭馆，没有半年工夫便被一伙穷朋友吃的摘了幌子。潘丙心在西沙梁赁了一间作坊，演完戏回来用山羊油灌蜡烛，拿到市场上兜售，向小商贩说好话。还有一个河南人赵波，五原战役以前就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来到绥西给傅作义做文化宣传工作，后来到了“青年剧团”，因为单恋女演员白玲，被“三青团”开除，遭受社会各方面打击，剧团的人给起了一个“鼠疫”的绰号，吃饭时被夺过饭碗，他冒充共产党员跑到“战青团”自首，特务头子陈国兴亦不予收留，后来成了神经病患者，流落在陕坝街头，一九四三年冬天因盗窃被捕，活活因冻饿而死在警察局的看守所，尸首扔到陕坝西城壕，被野狗撕碎吃掉。赵波血肉狼藉的一堆干骨头，就是陕坝文化人的写真照片，同时由赵波的死，可以看出这一帮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可怜相和悲惨没落的最后结局。

（一九六一年八月记）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2 5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